

目 录

上海佛教概况	高振农(1)
先师圆瑛法师事略	明 畅(15)
新佛教运动先驱太虚法师	真 禅(24)
怀念亲教师应慈法师	真 禅(32)
复兴密宗的持松法师	静 华(41)
千年古刹龙华寺	明 中(46)
近代名刹玉佛寺	明 中(59)
静安寺的今昔	静 华(69)
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	高振农(79)
藏传佛教在上海的流传	高振农(85)
上海道教的传入与发展	丁常云(90)
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	南江子(96)
海上白云观今昔	丁常云(102)
上海的城隍和城隍庙	陈耀庭(111)
虹庙	张源荣(117)
钦赐仰殿道观	张振国(122)
嘉定城隍庙	丁常云(125)
上海伊斯兰教概况	江宝城(127)
上海清真董事会	金幼云 政柏年(130)

辛亥革命与反袁斗争中的上海穆斯林·····	江宝城(143)
为伊斯兰教奉献一生的金子云·····	马维寿(149)
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哈德成教长·····	金贵南(154)
哈少夫生平及其对上海伊斯兰教的贡献·····	马维寿(160)
小桃园清真寺·····	金幼云(169)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江宝城(174)
上海天主教简史·····	范良佐(177)
天主教历史人物小传·····	沈毓元(187)
上海主要天主教堂的历史与现状·····	顾连群(202)
上海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变化·····	马蹄(218)
上海天主教会所办文化及社会福利事业·····	顾连群(229)
基督教初传上海简述·····	姚民权(237)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片段·····	罗冠宗(248)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八十年·····	陈善祥(276)
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发起经过·····	沈德溶(295)
吴耀宗生平纪略·····	边文(302)
刘良模纪略·····	文思(310)
丁淑静和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	杨树因(315)
余日章及其国民外交活动·····	史明(325)
我所认识的江长川会督·····	孙彦理(335)
慕尔堂史略·····	彭圣儒(341)
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史略·····	许道武(346)
怀恩堂简史·····	戚庆才(354)
上海国际礼拜堂今昔·····	彭圣儒(359)
上海基督教出版事业简介·····	沈德溶(363)

上海佛教概况

高 振 农

佛教传入上海，相传在三国时代。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龙华寺和寺前宝塔，建于吴大帝孙权赤乌年间（公元 238～251 年）。另据南宋绍熙四年（公元 1193 年）《云间志》，静安寺系“吴大帝赤乌中建，号沪渎重元寺”。照这些记载看来，佛教传入上海地区，已 1700 余年，可谓源远流长。

唐代，青龙镇有“沪渎之口”，海外贸易繁兴，当时有七塔十三寺。见于载籍者，天宝年间（公元 742～756 年）建报德寺（即青龙寺），长庆元年（公元 821 年）建国清院。据称两寺“重楹复殿，观雉相望，鼓钟梵呗声不绝”。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他曾到青龙镇佛寺巡礼。至宋代，青龙镇益见繁荣，南宋高宗时，设市舶提举司于此，烟火万家，号称“小杭州”。应熙《青龙赋》云：“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不难看出，青龙镇佛寺众多，原因乃在于交通辐辏，经济繁荣。至于青龙镇民事佛虔诚之故，据陈林《隆平寺经藏记》云：“方其行者蹈风涛万里之虞，休生死一时之命；居者岁月祈禳，吉凶荐卫，非佛无以自恃。”这就是说，不论行者居者都要求佛菩萨保佑。

其后，沪渎之口逐渐淤塞，青龙镇逐渐衰落，同时十六铺一带逐渐人烟浩穰，海舶辐辏，佛寺随之逐渐增建。虽则如此，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当时上海地区偏处海隅，并非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佛

寺之多远不如中原大地。

开埠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佛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此时的上海,经济兴盛,市廛繁荣,华洋交通,中外杂处,形成中国重要经济中心,并为东方最大都市。一时革命党人、名流学者、豪绅巨富、三教九流,麇聚云集,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场景,新建佛寺增多(据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称,新建佛寺149所,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则谓民国以来新增添的寺庙为71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法藏寺、海会寺、圆明讲堂、清凉寺、福慧寺、庄严寺等。高僧先后有印光、太虚、圆瑛、应慈、兴慈、持松、虚云、寄禅、谛闲、冶开、月霞、宗仰、可成、震华、苇舫等;知名居士有了福保、蒋维乔、范古农、江味农、王一亭、施省之、关桐之、黄涵之等。佛教组织有中华佛教总会、上海佛教维持会、中国佛教会、上海市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上海特别市佛教会等;新兴的居士团体有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这样,上海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重要地区之一。

综观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约有以下一些情况。

一、宗派繁多,高僧云集

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在上海都有流传。

法相宗: 1918年太虚在上海觉社开讲法相宗基本理论,并于《觉社丛书》发表宣传法相宗教义的文章,在上海研究佛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被称为“中国唯识宗学之复兴”。1920年王与楫在上海佛教居士林设唯识专科,1922年改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并将唯识专科改为法相唯识研究会,扩大研究范围。1927年唐大圆出版唯识通俗著作,深受初学唯识宗者的欢迎。其后范古农独树一帜,创办法相学社,编辑《法相学社刊》,

特约在《觉讯》、《觉有情》上刊行法相讲义，登载有关法相学的重要论文，使法相学在上海的流传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曾有“宗教法相，行在弥陀”之说。

天台宗：谛闲于 1888 年，在上海龙华寺首讲天台宗主要经典《法华经》。其后，兴慈于 1918 年在哈同花园开讲《天台四教仪集注》，并发起创建法藏讲寺，设立瞻风学社、法藏学院，依天台教观讲授佛学，培育僧才。由于兴慈的大力提倡，天台宗教义开始在上海得到流传。1922 年，江味农居士根据谛闲演讲的《大乘止观》，整理成《大乘止观述记》一书，以后又系统讲述，使天台宗教义在上海进一步流传。

华严宗：1914 年，月霞经狄楚青推荐，在哈同花园首创华严大学，弘扬华严宗教义，招收学僧 80 余人，著名的有持松、戒尘、常惺、慈舟、惠宗等。月霞法弟应慈，自号“华严座主”，传讲华严经论数十年。他晚年常住上海沉香阁（慈云禅寺），以之为弘扬华严宗的根本道场。此外，他还于 1939 年与叶恭绰、蒋维乔等在上海重编《华严经疏钞》，使华严宗教义在上海得到较广泛的流传。其后还有常惺、持松等，也对华严宗教义的流传作出一定努力。

净土宗：在近代上海弘传净土宗的首推印光。敬仰皈依者甚众，梁启超、沈子培等读到徐蔚如收集出版的印光文钞，都题词赞赏。简玉阶兄弟曾施舍南园，创办佛教净业社，为净土宗在上海的进一步弘传奠定了基础。1922 年，印光住太平寺，施省之、王一亭、黄涵之、关絅之等均向他问法。他所著净土经论近百种，普遍赠送，使净土宗风在上海更加盛行。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佛教界在觉园上海佛教净业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印光到会说法，震动上海，一时皈依者 1000 余人，净土宗风又一次大振。印光逝世后，1941 年上海觉园法宝馆成立印光大师生永久纪念会，出版

发行《弘化月刊》，继续弘扬净土宗风。此后，在上海弘传净土思想、影响较大的当推黄涵之，他撰有《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和《初机净业指南》两书，出版数十万册。后来又陆续编写了《观无量寿佛经白话解》、《普贤行愿品白话解》等，受到中下层信众的欢迎。此外施省之、关纲之、闻兰亭等，也都对净土宗教义作了弘扬。

在上海弘扬净土法门的，还有其他宗派的一些大师，他们在弘传本宗思想的同时，往往兼弘净土。如上海留云寺住持微军，曾大力传播净土宗；谛闲、兴慈都是“教演天台，行修净土”；圆瑛虽嗣法禅宗，教演天台、贤首，但也深信念佛法门，提倡净土，并创设圆明莲池念佛会。由于各宗各派的大师大都兼弘净土，所以净土宗在上海的传播经久不衰。

禅宗：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寄禅作为第一任会长，把禅宗宗风带到了上海。常州天宁寺的冶开与禅宗在上海的传播有渊源关系。上海玉佛寺最早的几任住持如慧根、本照、宏法等，都是冶开的法嗣，重建玉佛寺的可成，也是承冶开之命来寺任住持的，冶开本人也曾至玉佛寺多设方便，卫护法门。在上海弘传禅宗的还有圆瑛，他先后随冶开、寄禅参学禅法，后又兼祧临济，曹洞二宗。1935年在上海建立圆明讲堂，传临济宗风，对上海禅宗的流传有一定影响。

律宗：弘一法师与上海律宗的流传有一定的渊源。弘一逝世后，由震华、白圣、夏丏尊等发起，在上海玉佛寺组织弘一大师纪念会，一些海上名人常在那里集会，研讨弘一法师所传律学。

密宗：居士江味农早年东渡日本，在高野山专究东密，回国后即在上海弘法。僧人大勇、显荫、谈玄对密宗在上海的流传，均有一定贡献。特别是持松，三次东渡日本，两登高野山，礼金山穆韶阿闍黎为师，得真言宗五十一世阿闍黎位，同时还在日本京都市睿

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轨,把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密宗,重新移返祖国。他 1927 年回国,即留居上海讲经弘法。1947 年起,任静安寺住持,在寺内建立真言宗坛场,同时撰写密教著作多种,使久已失传的密法,在上海重新得到流传。现在静安寺方丈室楼上,仍设有密坛和持松法师纪念堂,供四众弟子及游人瞻仰。

二、佛徒团结, 卫教护法

武昌起义,上海曾有僧军响应。清末民初,盛倡毁寺庙改设学校,天童寺住持寄禅和尚为团结教徒,保护寺产,于 1912 年在上海留云寺集会,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寄禅任会长,毅然赴北京向袁世凯政府请愿抗议、未如所请,寄禅愤而以身殉教。熊希龄以其事告袁世凯,袁乃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寺产得以保存。还制订各种计划,如开设各宗专科学校、中学、师范、小学,以及举办慈善事业等。

寄禅殉教后,中华佛教总会推选冶开和熊希龄为会长。

1926 年,施省之、王一亭、黄涵之、关炯之等居士,发起组织上海佛教维持会。该会会员限于在家居士,宗旨为:“凡关涉佛教重要事件,誓当尽力维护,不涉其他私人无理争讼。”以该会发起诸居士,皆当时社会名流,对维护佛教起了颇多作用。1927 年,曾电请冯玉祥停止在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封闭寺院、没收寺产。同年,李济深、陈铭枢两军长,应上海佛教维持会王一亭等之请,致电国民政府请罢改僧寺为学校之议。

1929 年,在上海觉园,成立中国佛教会,选圆瑛为理事长,以后圆瑛连续担任七届理事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圆瑛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又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同反对日本军阀。1934 年,中国

佛教会拟订《整理僧伽暂行规定》、《佛教剃度传戒暂行规定》，《佛教教育组织暂行规定》，1935年，又拟订《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1935年11月，全国教育会议提议将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圆瑛和常务理事大悲、关桐之、黄涵之、屈映光等公举代表到南京政府请愿，其议作罢。1936年，日军侵犯绥远、傅作义等部奋起抗击，中国佛教会在觉园启建护国息灾法会，请印光法师说法，并捐献赠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八一三沪战爆发，救出军民10000余人，中外人士一致赞扬。上海佛教界还组织佛教医院，医治抗战伤员。圆瑛两次赴南洋募集救护经费10余万元。1938年2月至5月，组织僧侣掩埋队，掩埋上海郊区战场死难军民。

1929年上海市佛教会成立，大悲法师当选为会长。1932年在觉园开代表会，拟建龙华普同塔、如意寮，俾本市佛教徒疾病死亡得有归宿。又以政府拟征庙产税办慈善事业，请诸山在可能范围内自行举办。1935年，圆瑛等在真大路创建佛教公墓。1936年，上海佛教名流发起成立佛教徒护国和平会，目的为抗日救国，反对内战。

三、居士信佛 结社弘法

近代上海知识界出现一批佛教居士，著名的有所谓“三之一亭”（王一亭、关桐之、施省之、黄涵之）等，章太炎、丁福保亦信仰佛教。许多佛教居士学识渊博，信仰虔诚，与政治界、实业界联系紧密，他们先后组织了一些弘法团体，著名的有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以及觉社、省心莲社、法明学社等，除从事传教活动外，还开展多种多样的佛学研究。近代上海出版的一些佛学研究

成果，多数出自他们的手笔，为数众多的佛学刊物，绝大多数是他们创办和编辑的。有些佛教居士还想利用佛教教理教育人群，改造社会，转变不良的社会风气。

1929年，王一亭、李经纬、范古农等发起，创办了佛学书局，初设于闸北宝山路界路口，后迁至胶州路愚园路。该书局容纳众流，包罗一切，集全国各地佛经于一处，合编辑、印刷、流通为一事，以弘法为目的，以营业为方法。初创时期，仅有一个局本部，1936年前后在上海设有6个分发行所，又在长沙、北京、杭州、福州、昆明等地设立分局，在仰光、新加坡、香港、成都、西安、重庆、营口、青岛、开封、武昌、汉口、安庆、台湾、汕头、广州、南昌、兰州、济南、苏州、长春、哈尔滨等地设立特约经销处，1934年，各地分局达8处，分销处达100余家。据1937年统计，该书局当时编辑出版发行的佛学书籍共有3319种。为了普及佛学知识，他们编辑了一套《佛学小丛书》，定期出版《佛学半月刊》，代理发行佛教学者专集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海潮音》、《佛学出版界》等。还建立刻经部，刻印木版古本佛经，设立造像所，彩印佛像、佛图，雕刻佛像，又设佛学文会，按期征文，创办电台佛学广播，灌制佛化唱片，附设流通图书馆。这时，全国佛学刊物大都由上海佛学书局统一发行，全国出版的佛典佛书，大都由它统一流通。还把大批著名佛教学者团结在周围，著书立说。对上海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居士名流曾发起印刷大藏经和佛学辞书。印刷的大藏经有：铅印《频伽精舍大藏经》，影印日本《续藏经》，影印宋版《碇砂大藏经》，影印《宋藏遗珍》，刊印《普慧大藏经》，编印《华严经疏钞》，出版《民国增修大藏经》。编纂出版的佛学辞书有《佛学大辞典》、《佛学小辞典》、《实用佛学辞典》、《法相辞典》、《在家学佛要典》等。

当时出版的佛学刊物有《佛学丛报》、《佛教月报》、《佛学月报》、《觉社丛书》、《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净业月刊》、《心灯旬刊》、《中国佛教会公报》、《威音月刊》、《佛学半月刊》、《佛教特刊》、英文《中国佛教杂志》、《佛学出版界》、《上海慈航画报》、《佛学研究》、《上海慈航周报》、《佛教日报》、《佛教新闻报》、《觉有情》、《弘化月刊》、《妙法轮》、《中国佛教季刊》、《觉群周报》、《觉讯月刊》、《佛教公论》、《学僧天地》等数十种。

四、培育僧才 兴办僧校

近代全国各地佛教界，为普及佛教，培育僧才，先后办起了不少佛教院校。上海的一些佛教院校，虽兴办时间不长，但在上海佛教界仍有一定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一)华严大学：这是上海首创的我国第一所佛教大学。校址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花园内。学习期限分为正班三年，预班一年。课程分读经、讲经、讲论、讲戒、修观、作文、习字等科。学习内容有华严教义、普贤行愿品、维摩经、四分戒本等，预科还讲授大乘起信论、八识规矩颂等。学员的学费、膳宿费、经书、纸墨、医药等费，全部由学校供给。学员僧俗兼收，但出家人须住过禅堂，品行端严，无诸嗜好；在家人须具有居士资格。入学者还要文理通达，能阅读经疏，年龄在20岁以上至35岁之间。1914年9月开学，招收学员80余人。持松、戒尘、常惺、慈舟、惠宗等，都是该校学员，月霞亲自讲授华严教义。不久，华严大学迁往杭州海潮寺续办。华严大学在上海办理时间前后虽仅四个月，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从华严大学毕业出来的僧徒，分散到全国各地，先后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华严大学和清凉学院等，推动了僧人办学在全国的发展。

(二)上海佛学院。1942年玉佛寺住持远尘发起，震华创办，院址设在玉佛寺。上海佛学院时有学僧30人，教师10余人，震华任院长兼教务主任。课程设置有佛学、佛史、国文、史地、算术、日语、梵呗等。抗战胜利后，震华邀福善法师来上海佛学院任教务主任，以加强领导和教学力量。1947年，福善、震华相继逝世。后推苇航任院长，分甲乙两班、学僧60人。印顺讲过学。演培、妙饮、度寰、楞竞、成一、大云、张鉴、尹波等任教师。商枚先任训育主任后任教务主任、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佛学院亦随之停办。但在前后办学7年中，上海佛学院造就了一批具有一定佛学知识的人才。1983年，上海佛学院恢复，由真禅任院长，已有3届正科班和两届研究班毕业，人数共70名。现还在继续为培养合格的僧才努力。

(三)法藏学院。1944年(一说1945年)成立，院址设在法藏寺。其先，兴慈法师在寺内设“瞻风学社”，1943年曾一度改名“法藏学社”，后有墨禅法师等来寺主持佛教教育，乃将法藏学社改组为“法藏学院”。同时订立章程，以培植弘法布教、住持佛法的僧材为宗旨。学习课程除天台教义外，兼授他宗学说和一般世间实用学说。当时设有专修、讲习两班，2年毕业。学员的一切费用，包括膳费、书籍讲义费和医药费等，概由院供给，并酌予津贴。大约2年以后，兴慈中学开办，在中学内附设育僧会，法藏学院即停止招生。

(四)楞严专宗学院。1945年圆瑛法师创办，院址设在中正西路(今延安西路)434号圆明讲堂，目的为培养一批专精于《楞严经》的佛学人才。他自任院长，招收学员32人(一说36人)。主要学科以《楞严经》为正课，《圆觉经》、《大乘起信论》、贤台教义、唯识、汉学为助课。所有学员的膳宿、经文、笔墨等费，概由学院供

给。开学以后，圆瑛亲自讲授《楞严经》，同时请应慈法师讲《华严经》和《发菩提心章》等，请兴慈法师讲《天台教观》，请萧指今和梁孝志居士讲国文和历史。雪相、无碍、宗持、密显等均曾在此学院学习。1947年毕业20余人。1948年，楞严专宗学院结束，改办圆明佛学院，招收学员30余人，聘守培、觉澄等为教师，讲授《大乘起信论》和《圆觉经》等。上海解放前夕停办。

(五)静安寺佛学苑。1946年5月正式成立，院址设在静安寺内，太虚法师为院长，当时有学员五、六十人。1947年3月，持松任该寺住持，立志把静安寺作为佛教文化事业的中心，因此兼任佛学苑院长，并聘白圣为副院长。同时健全学制，延聘教师，续招新生，一时办得颇有生气。1948年创办《学僧天地》，作为佛学苑学僧的学习园地。同年4月5日，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40余人。上海解放前夕停办。

此外，上海佛教界办有一些中、小学，也授佛学课。如：

兴慈中学。1947年兴慈令其弟子负责创办。开始时招收学生30余名，授以佛学，佛史等课，同年12月扩充名额，招收初中一年级生80名，初二插班生20名。1948年12月，又招收初中一年级生80名，初二插班生30名，另招免费生30名。

南翔乡村小学。1943年8月静安寺在南翔下院创办，免费招收当地贫苦子弟入学。抗战胜利后，改称静安乡村小学，后又改名嘉定县私立静安小学。1948年，学生增至150余名。酌收学费，不足之数由静安寺补贴。

慈光补习学校。1946年由法藏寺创设，免费招收清寒子弟入学，分设普通、专修两科，利用业余时间，施以初中程度的教育。

五、广办慈善事业

近代上海比较著名的佛教慈善事业有：

(一)上海佛教慈幼院。1933年2月由上海市佛教会创办，院址设在闸北共和新路宝莲寺内。先由关纲之居士发起，得到印光法师的赞助，1933年2月6日开学。该院以收养孤儿，施以教育，使之成为有用之才为宗旨。公推王一亭任董事长，关纲之任院长，第一期招收院生37人。1935年6月，又开办民众识字学校一所。

(二)上海佛教公墓。1935年10月创设，位于宝山县真大路4号，办事处设在云南中路35号仁济堂内。由圆瑛、远尘、屈映光、关纲之等10人发起，筹募基金2万元，由发起人平均认足，推举圆瑛为董事长，李经纬为经理。未几，购得真大路公墓基地80余亩，经过8个月的经营，建成了一座黄色灿烂的古宫式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办公室、陈列室、寄柩所、祭堂、念佛堂等。大门口还建有七如来幢一座，其他各处则建有茅亭数座，掘放生池，堆假山石。在山门牌楼正中，悬有朱漆金字“佛教第一公墓”六字。规模初具后，售出墓穴即超过半数。正拟加紧建筑，补购墓地，适逢日寇逼境，战火蔓延，致使预计的大礼堂、纪念厅、地藏殿、殡舍、火葬场、如意寮等工程均告停顿。抗战期间，由沈彬翰代理维持。抗战胜利后由屈映光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远尘、沈彬翰为副董事长。原拟重整组织，适当发展，因经济困难而未能如愿。建国后由李经纬任经理，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上海佛化医院。1936年12月建立，创办人陈其昌，以供养僧人、优待居士、救济贫病、普利大众为宗旨。院址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金神父路口乐善堂旧址。1936年12月16日开幕，聘请姚心源为名誉院长。院内设有内、外、妇、眼、喉、肺癆、戒烟、

针灸、按摩等 9 科，全天应诊，无论门诊、出诊，概不规定诊金，只收取挂号费以补助开支。

(四) 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1936 年西安事变后，上海就有“慈联会”（全称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的组织，由许世英任主任，黄涵之、屈映光任副主任，赵朴初任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具体负责救济工作。八一三战事爆发，大世界上空落下炸弹，赵朴初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紧急措施，一夜之间，设立了十几个临时收容所，把难民安顿下来。是年 8 月，屈映光、黄涵之、关炯之、赵朴初等与各界人士商议，决定在慈联会下面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屈映光任主任，黄涵之为副主任。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 5 股，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具体负责收容事宜。1938 年屈映光离开上海，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黄涵之负责。在黄涵之、赵朴初等人努力下，该会先后设立 50 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 50 万人次。

(五) 佛教医院。中国佛教会于 1937 年 11 月设立，由正道法师任院长，院址在牛庄路 764 号。成立后全天应诊，重病随到随诊，得医师许可，可住院治疗，供给饮食，一概免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施诊给药达 8000 余人次。

(六) 上海佛教同仁会。由胡松年、乐慧斌等发起，得印光法师赞助，于 1939 年成立。范成被推为董事长，会址设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418 号佛教净业社法宝馆。开始时所办事业有：酌量补助来沪贫穷僧尼，支持有志弘法的僧尼学佛经费；后来又办理施粥票、施棉衣、施诊施药及临时灾赈等。该会历年所办慈善事业略有 8 项：（1）施粥。5 年中得免费食粥的贫民总数达 1000 余万人。（2）赈济灾区难民。1940 年皖南各县大旱，灾民流离失所，该会范成董事长亲携大量赈款，于 1941 年 2 月前往灾区施赈，前后 3 个

月，放赈六、七万元，后因疫病流行，又返沪筹募救济。(3)对火灾区居民进行临时救济。1940年后，沪西法华镇、金家巷、余姚路等地棚户区多次发生火灾，该会一一予以救济，施放食粮、粥票、棉被，搭建瓦顶竹屋，还曾设立义务小学，招收学生100余人，免费就读。(4)收容外地来沪难民。抗战胜利后，该会在金家巷及西方寺设立苏北孤老院，收容难民80余人，其费用原均由该会负责，自1945年11月起至1947年5月，申请由联合国救济总署上海分署每月配发米、面、衣、布等物品。1946年冬季，联总上海分署还委托该会代办施粥3月，每日领粥难民多达500余人，并施棉衣300多套。(5)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1941年8月上海市难民被日军封锁7昼夜，佛教同仁会想尽办法，一夜之间募集馒头、大饼、面包、饼干等共四、五卡车，每日受赈者七、八千人。直至封锁解除，尚余款3000余元，继续救济上海市难民。(6)冬季施送棉衣。该会从1940年起，每年冬季施送棉衣，均在1000套左右。除在本地施送棉衣外，并施送苏北灾区数百套。(7)设立施诊所。该会成立后即办有佛教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常年不断。又曾救济杭州各寺庙年老贫困僧尼，3年中向沪上各界劝募数千万元。(8)上海佛教火葬场。1941年2月创建，场址在南市康衢路新桥路东首，接洽处设在法藏寺。。1950年海会寺创建了海会火葬场，1953年后，因营业清淡，难以维持，由上海市佛教协会移交给市民政局接管。(9)佛光疗养院。1943年8月成立，院址在马斯南路123号，由李思浩任董事长，吴蕴斋、诸文绮任副董事长，方公溥为名誉院长，马向我为院长，于分正，严克绍为副院长，丁福保、谢利恒、蒋志新为医药顾问。该院中西各科都有，设备完善。上午门诊，施诊给药，贫病者，可免费住院疗养。院内附设安心念佛堂、饒终助念团及佛光图书馆等，为身心并治的特色医院。后又别设义

务出诊部, 免费服务。

其他佛教慈善事业, 办理时间较短、影响较小的还有: 佛教慈悲会、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佛教平民诊疗所、苏北邳县急赈委员会、慈光施诊所、上海佛教保婴院、净业孤儿教养院、上海佛教救寒会等。

先师圆瑛法师事略

明 旻

—

先师圆瑛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堪称模范的中国佛教徒，凡是和他亲近过的人无不同怀敬慕。

先师俗姓吴，名亨春，清光绪四年（公元 1878 年）生于福建古田县平湖端上村。5 岁，椿萱俱失，幼读儒书，聪颖过人。以深感人生如梦，17 岁即思舍俗出家，因父辈伯仲五房只他一嗣，为叔父所阻。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896 年）18 岁，大病痊愈后，其志愈坚，乃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次年，依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先师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晚称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受戒后，发心参访诸方名刹，先后从当时禅宗尊宿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和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修习禅定，深得冶开、寄禅二老器重。其间又从当时有名大德通谛、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法师，听讲多年，广泛涉猎大小乘诸经论，博览精究，对《楞严经》的造诣尤深。

先师从 1896 年出家起，到 1953 年逝世止，60 年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钻研、注疏、讲解经论，从未间断。他说：“学习如撑上水舟，一心只望到滩头。若非努力勤精进，暂歇篙时便下流。”

他研究《楞严经》，从不放过一个疑难之处。在《楞严经讲义》

自序中说：“于经中疑义，深奥难解之处，遂一一书条，贴于壁上逐条静观参究，既明白一条，即扯一条。如是者八年之久，一房疑义，扯尽无余。”他对《楞严经》研读 8 年，但在讲此经编写讲义时，仍每夜备课，常到三更以后。他回顾写《楞严经讲义》时说：“每讲一次，则有一次发现，多一番参究，自有一番进步。”

先师从 24 岁(1901 年)听讲《楞严经》起，到 76 岁(1953 年)示寂，集中全部精力，听《楞严》，读《楞严》，参究《楞严》，讲《楞严》(先后讲了 13 遍)，注疏《楞严》，办楞严专宗学院(1945 年)，号称楞严讲主。学习上象他这样一门深入，在近代佛学家中，实不多见。由于他学习深入，对《楞严经》经文个别叙述颠倒之处，能大胆改订，使其文意贯通。

二

先师佛学思想的特色，是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台、贤、禅、净四宗，做到：“专宗楞严，台贤一致，禅净双修，显密同仰。”

先师的《楞严》思想，集中反映在《楞严经讲义》内。此书是他一生研究的成果。他初学天台，对天台教观十分敬佩。其后又宗贤首。他一生讲解和注释佛经，台贤二宗并宏，没有门户之见。他告诫台贤学者，不可分河饮水，若自是非他，非但不明他宗，亦不彻自宗。

先师得戒后，即到天宁、天童二寺参学，青年时代，对禅宗下了一番功夫。他注释经论时，引用了大量禅宗语录，他的文集和诗集里，禅宗的内容占有很大篇幅。如 1901 年他 24 岁时，于常州天宁寺带病参禅，禅七中定境现前，身心廓然，说偈云：“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1903 年 26 岁时，在宁波天童寺随禅宗尊宿寄禅老和尚习禅，一心参究，大

有省发。1905年冬，在禅七中定境复现，更胜于前，又说偈云：“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认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这二首诗偈，是他开悟法语，说明他禅宗的功夫是很深的。

1913年36岁，对净土宗产生信仰，便从禅入净，走上禅净双修的道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开始讲述净土经论。他在《劝修念佛法门》中写道：“从三十六岁后，禅净双修。每当传授三皈依，或讲经法会，力劝大家发心念佛，求生净上。告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应以持名念佛为正行，广修众善为助行。正助合作，如船帆顺风，更加櫂棹之功，往生净上，品位必高。”所以他的一生，除了专宗楞严外，对净土的弘扬不遗余力。他在1952年75岁时总结一生修持时说：“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先师的佛学思想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为一体，破除门户成见，消灭宗派争端。他的著作编为《圆瑛法汇》行世，以浅显笔墨，写深奥经义，易于领会。其生平事迹，编有《圆瑛大师年谱》行世。

50多年来，先师一贯主张僧伽要振兴佛教，教化众生，首先应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1909年初他主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历时多年，培养出许多人材。后来又在南洋槟榔屿创办佛教研究会，最后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有许多是毕业于这些讲堂、学院的。

先师宗说兼通，行解相应，一生演教讲经遍及国内外，自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潮州、长沙、武汉，远及香港、台湾、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所讲经文，如《楞严》、《法华》、《心经》、《金刚经》、《弥陀经》、《弥陀要解》、

《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性相通说》、《百法明门》等，均深入浅出，法筵之盛常座无虚席。

三

先师英年弘法，闻名丛林，各地名山古刹争相延致。先后主持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及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进山以后，都规模一新，清规整肃，海众安和。

住持天童寺时，他曾提出“十二不”对众宣誓，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天童寺不慎失火，天王殿等许多建筑尽成灰烬。不少人以为很难修复，但先师信心极强，得到两序大众和十方檀信协力，迅即修复。比前更为壮观。先师住持业绩，受到国际佛教界推崇。1929年初住福州雪峰崇圣寺，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在其所著《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中，记述印象：“圆瑛和尚率徒七、八人为一团，随众和尚者概为青少年，我看他年一定会从此中涌现出优秀人物的。和尚很有骨气，一见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经理大众的才干。”

先师除随处讲经说法，以法布施外，尤重视社会福利事业。清末，他初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即创立僧民二校，僧校教育出家青年，民校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兼施工读。1923年在南洋讲经时，遇星洲转道及巴生转物两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以收容失父失母的孤儿。先师说：“对此至穷苦而无告之孤儿，极思效先圣之仁心，学无我之悲愿，施以教养，予以安乐，衣之以衣，食之以食，课之以学，授之以艺，造就其相当之知识与技能，俾成人后，得有独立

生活之能力，可以献身于社会之用，此慈儿院所由立也。”（《一吼堂文集》）先师以为，“孤儿同一人类，佛性本来平等，即其体魄与脑力，较之常儿，初无稍异。若能有以扶持之，诱导之，其所成就，正未可限量也。合抱之材，起于毫末，今日之孤儿，果得生成陶铸，安知而非他日之伟大人物耶？”（同上）慈儿院学科依照普通学校，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全部免费，前后培植人材在数千以上。1926年为筹集慈儿院基金，再次远渡南洋群岛讲经，筹得巨额基金以归，使慈儿院得以维持发展。

先师毕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感人至深。1923年，先师对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关怀备至，曾两度赴台湾宣化和探访骨肉同胞，与当地佛教界建立联系，表达了大陆佛门弟子对台湾同胞的关怀，促进了海峡两岸中华各族同胞的团结，加深了彼此对祖国的热爱心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先师义愤填膺，以中国佛教界领袖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先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毅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团长。八一三沪战发生，组织苏沪佛教青年，成立僧侣救护队，设难民收容所于圆明讲堂，救护伤兵难民。僧侣救护队队员，在他的领导和教育下，出入于炮火纷飞的战场，其勇敢精神为上海市民所称道。对伤亡士兵他又成立佛教医院、掩埋队，予以救治、掩埋。上海沦陷后，随军由沪至南京，继续从事救护收容工作。为了在全国各地成立僧侣救护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携我赴新加

坡组织“中华佛教灾区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汇款汉口组织第二僧侣救护队。到吉隆坡、槟榔屿组织募捐委员会，汇款宁波组织第三僧侣救护队。汉、甬沦陷后，救护队随军转战河南。1938年9月又携我至南洋向侨胞汇报国内僧侣救护队工作情况，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所募款项，由各募捐单位径寄国内救护团体。

1939年夏，先师回国视察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后，重赴南洋，继续募款再次支援救济工作。同年秋，第二次回国，抵沪不久，时当10月19日，恰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期间，先师在大殿上供礼佛，突来7辆卡车，载有日本宪兵数十人，一部分包围附近弄口，大部分冲入讲堂，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先师和我逮捕，驰往北四川路桥逸日本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企图迫使先师承认抗日有罪。次晨又将我们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情况非常紧张。先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当夜阑人静，日本宪兵即对先师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先师从容陈辩，义正辞严，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同时，也对我施以严刑拷打，我以先师为榜样，毫不动摇，和日本宪兵周旋陈辩，坚持了民族气节。

经过一番激烈较量之后，日本宪兵队长见先师威武不能屈，转而劝诱先师与他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先师以老病相辞。他们无隙可乘，终于在11月10日将我师徒二人释放返沪，但已饱尝铁窗风味，备受严刑凌辱近一月之久。先师在这次魔劫中，始终临危不惧，应付自如，这正是他平时修持深入，深信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坚持爱国立场的坚定表现。

先师出狱后身体衰弱，在医院疗养一个月后回到圆明讲堂。后又有日本在上海虹口东本愿寺的僧人藤井草宣几次请老人出任中日佛教会长，先师以老病相却，并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

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纠缠。在此期间，先师对国家大事未曾一日忘怀，曾给北京中国佛学院师生赠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号召佛教青年挑起救国兴教两副重担。

四

全国解放前夕，上海人心紧张，不少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纷纷函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先师飞往南洋，安度余生。先师复信，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为词，婉言谢绝。

建国后，1952年在北京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前，先师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号召，曾致函中央领导同志表示热烈拥护。信里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祉，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的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其精神与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们佛教的教义，我们佛教徒竭诚拥护。”后来先师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出席亚太和平会议，这是中国佛教徒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性和平会议，对保卫世界和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此期间，先师曾和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徒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他在北京佛教徒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他说：“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还在锡兰贸易代表团宗教座谈会上发言，表示在新中国

“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语重心长，博得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参加和平会议后，先师回到上海即就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对宣传世界和平起到良好的效果。

1953年5、6月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民族、各教派、各地区的代表120人，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空前未有的盛会。先师因病请假，未能出席，仍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

先师早年即深感中国佛教界应加强团结，以适应时代要求。早在1907年（清光绪33年）寄禅和尚主持宁波僧教育会时，先师就极力襄赞，诸多擘划。辛亥革命后，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师出席并积极参加工作。1914年，中华佛教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当选为参议长。1917年，担任宁波佛教会会长。1928年，参加江浙佛教联合会的组织工作，被推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1928年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先师连续担任过7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直到抗战以后。全国解放后，又与赵朴初、巨赞、虚云、喜饶嘉措、陈铭枢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先师毕生致力于我国佛教界的团结工作，任劳任怨地负责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实际工作，获得全国佛教徒和国外佛教界人士的崇敬和爱戴。

先师毕生爱国爱教，积劳成疾，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53年秋，自知尘缘将尽，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临行前，写下遗嘱一纸交赵朴初居士，留待身后发表。他在遗嘱中说：“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全国佛教徒

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回到天童寺以后，病情日益恶化，于9月19日与世长辞，享年76岁。消息由新华社报道后，全国各报纷纷刊载圆寂情况，深致哀悼。中国佛教协会委托正在上海的副会长赵朴初居士负责办理治丧事宜。10月18日，上海佛教界于玉佛寺举行追悼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华东民委、宗教各部门的代表和弟子代表500余人。赵朴初副会长在追悼会上介绍了圆瑛法师的生平事迹和遗嘱后指出，圆瑛法师虽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爱护祖国的热忱，保卫和平的真诚，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即微尘也不存在，并号召大家努力学习圆瑛法师的爱国精神，朝着法师遗嘱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他的讲话使与会的人受到极大的感动。

日本道端良秀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佛教史》中说：“解放初期，中国佛教思想颇不安定，圆瑛法师为了统一、团结佛教界，拥护政府，毅然出任第一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虽然圆瑛法师在就任会长不久之后，便辞世归西，但他的业绩与功勋却永远铭记在国内外佛教徒的心中。”

（姜仪生整理）

新佛教运动先驱太虚法师

真 禅

太虚法师乃近代名僧，一生主张改革僧制，培育僧材，提倡人间佛教，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

法师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农历12月18日(公元1890年1月8日)，俗姓吕，名淦森，原籍浙江崇德(今并桐乡)，自幼习儒学，甚勤奋。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礼士达上人为师，法名唯心。同年，由师祖奘严上人取字太虚，后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因其敏慧好学，以法器租许，并介绍往宁波永丰寺岐昌老和尚处受读经典，嗣又听道阶、谛闲两法师讲经，研习天台贤首教观。是年，与圆瑛法师在天童寺御书楼订金兰之盟，互研经教。1907年，经华山、栖云上人等介绍，读康有为、梁启超及章太炎、邹容诸贤著述。1908年，复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从杨仁山老居士攻读佛学，并习古文辞。太虚法师所以能跟随时代潮流，成为新佛教运动领袖，与其幼年苦学佛教经典、各宗教义及儒学诗书，广泛接触当代进步思想，有密切关系。

太虚法师弘法利生四十余载，1947年3月因脑溢血在上海玉佛寺示寂，世寿59岁。我先在镇江竹林寺，后在上海玉佛寺，曾随侍法师左右，亲承教诲。今日追思，弥有教益。为此，将法师一生，按改革僧制、培育僧材、佛学思想等三个方面，简略介绍，以期社会各界和我佛门弟子，对法师有所理解，而知今日以“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为内容的“人间佛教”思想，实以法师为

先导。

一 改革僧制

太虚法师于1906年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1911年，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即协助栖云法师组织僧教育会。当时他虽为一释子，却与革命党人朱执信等联络，从事秘密活动，并以作诗凭吊黄花岗死难先烈，为清官方追捕，可见法师革命思想早植根于青年时代。1912年，与同学仁山法师等在南京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开成立会于镇江金山寺。不久，该会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被推为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寄禅和尚因卫教赴北京，抗议北洋政府没收教产，交涉失败，以身殉教，朝野嗟悼。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追悼大会，太虚法师即在会上指出，佛教欲图生存，必须进行三种革命，即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和学理革命。

1918年，法师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居士等，在上海创立觉社，出版《觉社丛刊》（后改名为《海潮音》月刊，在杭州面世）。觉社宗旨为“内铸佛学真义，外融新学思潮，倡导整理僧制，轨正谬说邪论，维持大教，鼓吹僧学，本佛陀之宿怀，期建立人间佛教，以觉导群伦。”法师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即在《觉社丛刊》发表。1920年，复发表《太虚宣言》，阐述整理僧伽制度之志愿。

1927年，法师根据《整理僧伽制度论》精神，于上海创办佛法僧团——法苑（亦有称觉苑者），2月，举行开幕典礼，著名人士章太炎、王一亭等，以及西人蔡彬华，日人津振、田山等参加盛典。法苑为一改良经忏、除去其迷妄、扩大其内容之组织，当时法师曾撰有《法苑宣言》谓“今世穷奢物质，极欲竞争，形体疲于奔命，精神失其宗主。本苑弘扬佛化，实行佛事，使存者生活裕如，逝者往生净

域，而共得精神之安慰。”法苑的布置和一般寺宇不同，入门为花园，园后华屋三层，下层为礼堂，中层为佛殿，上层为新僧修持室。但法师所倡新经忏制度和办法，当时未能为多数佛教徒所接受。

法师曾于法苑为张敬海及王森甫依佛式婚仪证婚，礼堂中央供玉观音像，桌上铺金线绣“佛”字之红毡。新郎穿黄色哔叽西装大礼服，左手套念珠；新娘长纱曳地，手捧鲜花。设黄缎领帐二，上书信士（新郎）、信女（新娘）姓名。六位新僧着浅色袈裟，于磬鼓声中宣诵佛号，法师居中，为之证婚，朴素庄重，祝新婚夫妇，结成菩提姻缘。此举在佛教前所未有的，守旧派猛烈反对。而法苑经忏经济来源又日益艰困，以致新僧运动难乎为继，仅两个月，法苑即告停顿。

1945年冬，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成立，法师为常委，圆瑛、昌圆、全朗、屈文六、黄庆澜等为委员，并在镇江焦山设佛教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力图为整顿佛教作准备。翌年，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结业，法师又在上海玉佛寺创办《觉群周报》，主张僧伽“问政而不干治”。惜法师于1947年示寂，如能长年，当对改革僧制有新的推动。

二、培育僧材

佛法赖僧弘扬，佛教赖僧光大，故培育有为之僧材实为首要之举。太虚法师早年参加僧教育会，对培育僧材即有所认识，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则为法师真正开展僧教育之始。该院举梁启超为董事长，李隐尘为院护。9月开学，僧俗兼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中国佛教界，自此始有高等学府。同时，出家人整理僧制，树僧规，立准绳，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向社会发展，使法师革新佛门之计划变为实际行动。还在庐山大林寺遗址修建讲堂，

供暑期讲学之用。武昌佛学院第一期为专修科，招收学生 80 人，原定学制三年，后改为二年毕业。第二期有从第一期毕业生中择优留下 20 人，作为研究部研究生，另招大学部学生 40 人。课程除佛教经论、佛学概论、印度及中国佛教史、因明学等外，另设汉语、日文、英文等课。1927 年 4 月，法师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

1928 年，法师出国访问，弘扬佛教。在法国巴黎，于东方博物院，筹组世界佛学苑，得法国学者伯希和等人赞同，商定法国设通讯处于东方博物院，中国设通讯处于南京毘卢寺。同年 10 月至英国伦敦，会晤哲学家罗素，交流西洋哲学与佛学之同异，并赴各地讲演佛学。岁暮，赴比利时、德国。在德期间，讲《佛学之变迁大势及其新倾向》于中国学院，以中国学院为世界佛学苑德国通讯处。1929 年 2 月游历美国。这是中国僧人第一次去欧美传播佛教，在世界上影响甚大，著有《寰游记》记其事。回国后，先在武昌成立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同时设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以北京柏林教理院为世界佛学苑华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后来又将 1931 年在重庆北碚缙云寺创办之汉藏教理院列为汉藏文系，同时派遣学僧赴藏修学，又至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留学，从事巴利文、梵文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在此期间曾任奉化雪窦寺住持，并先后赴湖北、四川、福建、陕西、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广东、贵州、云南等省讲演佛学。所有筹组世界佛学苑之活动，乃为沟通中外，力求以宗教之宣化，裨益于世界和平。而欲达此目的，势非培育大批有为之僧材不可。现中国佛教界在北京设有中国佛学院，各地亦有佛学院多所，其课程除研习佛学外，还攻读语文、历史、政治、经济学和英、日语，其研究班还有古代汉语、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周易、老庄哲学等课程。学习范围如此广泛，正与法

师倡导之培育僧材、宣化域外、致力和平之目的—致。

三、佛学思想

太虚法师对于佛学之经、律、论三藏及各宗要义、各家学说，无不深刻研究，而于法相唯识学尤致力弘传。法相唯识宗乃大唐玄奘法师远游西域归国后所创立，千余年来，玄奘法师名满寰宇，而法相唯识学仅不绝如缕。太虚法师早年曾受教于杨仁山老居士，杨为我国近代重兴法相唯识学之先驱，劝勉后学“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二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之楷模”。太虚法师于此用力为多，1918年以后主持觉社时，即在《觉社丛书》宣传法相教义，并于美国教士李佳白在上海主办的各宗教联合大会堂——尚贤堂，开讲《二十唯识论》，又在觉社多次开讲法相基本论点。当时上海《神州报》曾发表《中国唯识宗学之复兴》一文，内称：“吾国自唐宋以来，玩因丧乱，疏记遗失……此宗久成绝学……太虚法师在觉社开讲唯识宗学之纲要，诚学术界之好消息也。”可见其影响之大。法师认为，研习法相唯识学可得六种利益：（1）明诸法皆众缘所成，破除执我观念；（2）明人生宇宙之真相，断尽生（指有情众生之一生）法（指宇宙万物等）之感障；（3）了脱生死，解脱变坏之业报；（4）止于至善，满足心性之意愿；（5）成就永久之安乐；（6）证得无碍之清静。

太虚法师对“人间佛教”的提倡，不遗余力。他教导说：近之修净土行者，多以此土非净，必须脱离此恶浊之世，而另求往生一良好之净土。其实，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之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静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静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

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

什么是人间佛教?法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演讲中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呢?他认为首先要从普通一般人的思想中建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历来把佛教看作是神异的、闲隐的、朽弃的,这样就把佛教的真相蒙蔽起来了。若要佛教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怪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法师指出:“佛菩萨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以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佛是“觉者”的意思,“故佛非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亦非宇宙万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万有实事求是的觉悟者。将佛亲自所觉悟的道理如实说出来,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菩萨也不是普通人所认为的偶像,而是“求觉悟的有情众生,即随佛修学、立志成佛的佛弟子”。所以,“佛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若信佛不明佛之真相,虽信佛教亦不是真信”。法师之意,为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前述太虚法师在上海创办法苑之活动,正属佛教走向人间之实践。

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在40年代曾风行一时,他的《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于1933年10月在汉口市商会讲演以后,当即在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1934年,他所创办的《海潮音》月刊,特辟《人间佛教号》专辑,发表有关人间佛教之论文18篇,把宣传活动推向高潮。

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历尽艰难曲折。彼时，人间何处有净土，要实现人间佛教思想实非易事，但法师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界留下巨大影响。

社会主义新中国消灭了压迫与剥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回顾总结中国佛教历史的基础时，重新提出人间佛教思想。他指出，佛陀出生人间，说法度生于人间，佛法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就是要净化自己，利益人群，自觉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见《法音》1983年第6期）。这和太虚法师思想正相一致。

以上所述，为太虚法师在改革僧制、培育僧材和佛学思想等方面的史实与主张。法师还曾于1924年在庐山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并率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应日本各佛教团体和佛教大学邀请讲演佛学。在国内各地名刹也经常演说佛法。

抗战军兴，法师曾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和僧侣救护队等，又分赴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等地演讲，教育佛教徒踊跃参加抗日救国事业。数次函电日本佛教徒，劝其本佛陀大悲兼利之精神，联合抗议日本政府之残暴侵略，访问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宣传中国抗日救国政策。抗战胜利后，法师作《告世界佛教徒书》，号召联合起来，弘扬佛教，贡献于世界和平。

抗战胜利后，法师常驻上海玉佛寺，与震华、止方、苇一、福善、大醒、尘空、芝峰、亦幻、月耀等法师，研究进行佛教整理等问题。成立觉群社，创办《觉群周报》，宣传法师佛学思想和整理佛教等论述。还积极支持和参加上海各种佛教活动。

1947年3月17日下午，太虚法师示寂于玉佛寺，僧俗弟子围绕诵弥勒圣号，泣不成声。3月18日，上海大小报纸十余家，均刊

登法师示寂新闻，各地前来致哀者络绎不绝，约有 500 余人。上午 8 时许，遗体入龛，僧俗弟子 200 余人称念佛号。3 月 19 日下午 2 时，举行封龛典礼，由善因法师主持，我亦参加。当时参加者有各地大小寺院、佛教团体的信徒代表等约 3000 余人，佛号声与哭泣声交织一片。中央摄影场及上海各大小报社，纷纷前来采访摄影。4 月 8 日，法师灵龛在南市海潮寺荼毘（火化），灵骨舍利供奉于法师生前所居之玉佛寺直指轩。其后，将灵骨立塔建造于奉化雪窦寺。纪念总会设在武昌，并在南京、上海等地设办事处。1957 年，香港曾在荃湾芙蓉山建太虚法师舍利塔。1985 年，厦门南普陀寺五老峰麓重建太虚法师纪念塔，蔡吉堂老居士撰有《太虚法师纪念塔落成始末记》，内云：“近代新佛教运动领袖故太虚法师，浙江崇德人。早岁出家，从八指头陀及杨仁山居士治禅学及佛学，博通三藏，融贯古今。先后主持武昌佛学院及闽南佛学院，培育僧材，诸多建树，著作等身，世所共仰。其间住持普陀寺六年，清规严肃，住众恒逾千指，使此南闽丛林蔚为海内外名刹。中年弘法欧美，历游美、法、德、美诸国，阐扬佛教文化，被推为近世佛学界之泰斗。抗战期间，率领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各国，宣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之侵略，功绩卓著。胜利以后，自渝返沪，正欲为革新佛教而努力，可惜众生福薄，法师于 1947 年示寂于上海玉佛寺，时年仅 59 岁。群生眼灭，四众悲仰。厦门市佛学会诸弟子，特赴上海恭请舍利七颗来厦，塔于虎园路半山堂……”。

本文内容简略，法师一生详细经历，有《太虚法师年谱》，其著作有印顺法师等编纂之《太虚法师全集》行世。

怀念亲教师应慈法师

真 禅

大德应慈法师，乃我亲教师，籍同乡里，关系密切，情谊至深。我 18 岁时，即慕名前往扬州福缘寺亲聆老人讲演《楞严经》，其后亲近左右，听讲《华严经》等多种经论。34 岁，又特至南京华严师范学院学法，听应师宣讲八十卷《华严经》。此后常年随侍左右，1965 年应师示寂前，我无分昼夜，侍疾榻旁，示寂后，恭护灵龕至常熟兴福寺入塔。

我胞兄心岩法师，早年亦追随应师在清凉学院华严预科修学，前后五载，始终如一，不离不移，深得应师器重。1933 年，应师在扬州宝轮寺开讲《楞严经》时，心岩法师曾奉命代座。1946 年，应师到上海玉佛寺弘法，心岩法师又随侍应化。可见情谊深笃。

由于我兄弟均为应慈法师弟子，故对应师一生，知之较切。今特略述其生平及弘化事迹，作为对先师的纪念。

一、出家修学

应师俗姓余，名铎，号振卿，法名显亲，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又号拈华老人，并自称虞山翁、鹿道人、白毫翁。原籍安徽歙县，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二月初五（公元 1873 年 3 月 3 日）生于江苏东台。家业盐商，颇有资财。兄弟四人，应师最少。幼习儒，邑庠生，16 岁，遵母命弃儒习商。26 岁，因两遭折翼之痛，深感人生无常，遂萌出家之念，是年朝礼普陀山，遇明性禅师，从之披剃，后随至南京三圣

庵，研习《维摩经》、《法华经》、《楞伽经》等，发愿参究禅宗明心见性之学，从此尽除归习，恶衣粗食，担粪荷锄，不辞劳苦。1900年，奉师命至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嗣即随处参学，访谒耆宿。1901年春，至镇江金山寺从大定老和尚学禅；1902年，至扬州高旻寺随月朗老和尚参究，少有省悟。1903年，至常州天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从之学习禅法，一住四年，单提向上。某日，冶开禅师勘问“念佛是谁”话头，应师亢声对曰：“无是谁，无非谁！”又命其晒寺内所藏经像书画，前后三日方毕，冶开禅师又问：“此中佛菩萨像几尊？书画文字多少？”应师答曰：“佛菩萨像一并送入藏去，书画文字之事，老和尚自有数，学人无数。”自是每有酬对，辄针芥相投，冶开老和尚深器之，引为入室弟子。

应师与月霞法师同受记、得法于冶开老和尚，为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1907年，随法兄月霞法师到安徽迎江寺听《楞严经》。月霞法师研究《华严》，夙有心得，应师即随之学习，渐对华严教理有所悟解。此后12年中，常侍月霞法师左右，敬事如师，始终不懈。是年，偕法兄惟宽法师同礼五台山，次第顶礼，诵《法华经》，为母祈福。其母临终，电召归省，至则取云片糕两片，一片予应师，一片自食。说：“汝为高僧，我生高品。”言毕合掌含笑，安详而逝。

二、办学讲经

应师自1908年起，即开始讲经弘法，开办僧学，培植僧才。先在安徽成立僧教育会，于迎江寺开讲《法华经》、《胜鬘经》和《大乘起信论》等。1911年，随月霞法师至南京，创立僧师范学堂。同年夏，随月霞法师在湖北洪山宝通寺讲《楞伽经》。8月武昌起义成功，黎元洪令月霞法师统带僧兵，月霞法师乃携应师同避沪上，经狄楚青居士介绍，入哈同花园暂住。翌年，经康有为建议，应哈同花

园女主人罗迦陵之邀，在哈同花园筹备华严大学，预科、正科各三年，应师随月霞法师开讲经论，并在哈同花园内建筑禅堂，每日坐香。办学宗旨为教宏华严，行在禅宗，学僧有戒尘、慈舟、持松、常惺、惠宗等共 60 余人。嗣因哈同受人蛊惑，非礼相待，月霞法师和应师乃率学僧将华严大学迁至杭州海潮寺续办。在此期间，应师既从月霞法师受学，又为月霞法师助手，从未分离。

1917 年冬，月霞法师入寂。临终谆谆嘱咐应师：“善弘华严，莫作方丈。”应师终身服膺，继承冶开、月霞法师遗志，自 1924 年起，筹办清凉学院，讲说华严教义。我胞兄心岩和隆泉、龙辉、星光、惟周、孝光等 30 余人，均该院学僧。至 1931 年，华严正科学僧毕业。数年间，困难重重，院址屡迁，而应师卒竟其功，其办学弘法之毅力实可钦佩。

自 1931 年起，应师先后在芜湖禹王宫、苏州西园寺、常熟兴福寺和宝严寺、宁波天童寺、扬州宝轮寺和福缘寺、福建鼓山涌泉寺、杭州青年庵、上海报德庵、玉佛寺、崇德会等许多寺院宣讲《华严经》以及其他佛经。其间西次朝礼五台山，并曾于 1931、1933、1935、1940 年前后在安徽芜湖、福州鼓山、浙江天童、江苏无锡四次开坛传戒，每日坐香，多次打禅七，在扬州北来寺传戒时，我受聘为引礼师。

1940 年，无锡薛润培居士承担经费，应师又在沪开办华严学院，两度开讲 60 卷《华严经》，并每天坐香，1942 年 3 月方始圆满。是年，应师寿登古稀，常熟虞山兴福寺法裔苇乘和尚为之刊行《妄尽还源观疏抄补解会本》以作纪念。

1943 年起，应师应上海南市沉香阁（慈云禅院）住持苇乘法师之请，卓锡其中之印月禅室（印月居），息影潜修，同时开讲《华严法界观门》。从此以后，沉香阁即成为应师在上海弘扬华严宗道场。

间亦往南京、南通、杭州、苏州各地，讲经不辍。

1948年10月，由南京傅近秋、周尚等居士发起“华严法会”，请应师到宁主持，开讲六十卷《华严经》。规模宏大，历时一年方毕。1949年夏，上海静安古寺启建孔雀明王法会，应师在会上开讲《孔雀明王经》。时我任镇江竹林寺住持兼竹林佛学院院长，奉应师召到沪侍座听讲。是年秋，应师到南京继续主持华严法会，协办华严师范学院。我为追随应师，深究华严玄旨，乃辞去竹林寺住持职，赴南京入华严师范学院，聆听应师讲八十卷《华严经》全部。9月，法会圆满。应师年近八旬，法会期间一年之久，未曾一日间断，除大座两小时外，每日三时坐香亦未间断，毫无倦容，众皆称为难得。应师离宁返沪时，南京各界依依不舍，乃慨然赋诗一首，题名为《南京法会圆满临行赋诗留别》：“策杖离京去，西湖野外家。跏趺遍地坐，行脚走天涯。有缚终须解，无缘路亦踪。寒冬花坞里，相伴卧烟霞。”

建国以后，应师一如既往，到各地讲经弘法，我也追随左右，至各地丛林和佛教团体听讲、弘法，深受垂爱，成为应师入室弟子。

1950年应师先后在杭州宝莲堂、上海沉香阁传戒，我为正训兼教授阿闍黎。戒期毕，应师应请至寿圣庵等处讲经，我随侍听讲。后又奉师命，到圆明讲堂随圆瑛法师系统修学《楞严经》、《佛说阿弥陀经》、《大乘起信论》等。是年，应师任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委员。

1952年春，应师《正法眼藏》一书完成，弟子、门人等作序文于上海沉香阁之印月禅室，叙述应师之家境、身世及出家、参学、修持等经过甚详。应师曾作七言二偈以“自警”：

(一)

幻迹娑婆八十春，弘宗演教两无闻。
常惭一钵千家饭，遍种华严法界村。

(二)

百岁经眼才刹那，死生痛苦转蹉跎。
人人般若波罗蜜，遍界光明指似他。

应师又为圆瑛法师所撰《圆觉经讲义》作序。同时自编《撮其要》，订定年表一册，自34岁至80岁止，题名《拈华老人出家四十六年参学略史》。1952年仲冬，在玉佛寺讲经时，四众弟子中有人恐其身体不继，劝多休息，他回答说：“八十老翁，日薄崦嵫，余光垂微，不以说法利生供养尘刹，复何图耶？”以上讲经期间，我均随侍左右听讲。

1953年应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同时发表声明，声讨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颠覆活动。9月，圆瑛法师于浙江宁波天童寺示寂，上海佛教界在玉佛寺举行追悼法会，由应师任主祭。此后应师当选为上海市历届人民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56年农历腊月初八日，手书《遗嘱》，谓“生平游化四方，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宗承临济，教秉华严。”又说：“出家六十余年，不做方丈，不贪名利，每年打七，每日坐香。念念不舍分科三译《华严》及疏抄并余经。”1960年，又立《遗嘱》，要求身后“不报诸山，不惊外客”，同时叮嘱：“一生积蓄存储人民银行，以备修理清凉国师及杜顺法师二塔”。1965年，应师养病于上海沉香阁，后病势转危，我在病榻旁守护，8月31日（农历八月初五）凌晨2时许示

寂，世寿 93 岁。

三、佛学思想

应师平生不重著书立说，认为古往今来，佛经注释汗牛充栋，只要精研，依教奉行，足够应用，无需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

应师佛学思想，主要为“教演华严，行在禅宗”，或云“教遵般若，行在禅那”。他曾说：“饮水思源，教演华严三译，禅绵临济一宗。赞扬正法，开示佛见佛知，弘宣大教，胥令解入悟入。”（《复兴无锡南禅寺永久道场启》）又说：“金山、高旻、天宁、天童绵迎不绝者，有统系之禅宗也。古有‘三千衲子下江南，参透禅那向上关’之句，足见禅宗独盛于江南，亦足见提倡禅宗方可以续慧命而绍佛种。”（《复兴无锡南禅寺永久道场启》）他主张戒、定、慧三字并进，认为有戒无定，其戒必枯，慧从定生，定必生慧，如欲三学并进，除实现教遵般若，行在禅那外，别无他法。

应师遵照月霞法师“善弘华严”之临终遗嘱，一生以弘扬华严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并自号“华严座主”。他多次在各地创办华严学院、清凉学院等，虽财力物力两俱困难，仍坚持不辍，培育大批弘传华严之僧才。数十年中，在全国各地传讲晋唐三译《华严经》（即晋译六十卷《华严经》，唐译八十卷《华严经》和四十卷《华严经》）不下数十次，追随听讲之四众弟子何止千万。

应师为使佛法永垂后世，曾千方百计刻印经书。早年协助天宁寺冶开和尚创办毗陵刻经处，刻印卷帙几与金陵刻经处相埒。后又在扬州众香庵校刊多种经典，1933 年募刻《行愿品疏》贞元经文；1938 年，发起刊刻《增刊普贤行愿品别行本》，刊印唐译四十卷《华严经》；1939 年刻成晋译六十卷《华严经》；1944 年嘱弟子刘大照居士等校勘贤首《华严经探玄记》刊印；1945 年，由弟子刘大照

居士等校勘之《地藏三经》刊行流通；1951年，发起重刊《小品般若波罗蜜经》；1952年，由他重刊的《大品般若波罗蜜经》成书。

他一生所刻的经书中，工程最巨、贡献最大者为唐代清凉国师澄观所著《华严经疏钞》。此书是《华严经》的注释书，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之会合本，共80卷。以上两书，原各为单行本，明嘉靖间，妙明和尚始收经入疏，收疏入钞，成《华严疏钞会本》，惜考核欠精，疏、钞和经文起止配合颇多牵强。后世展转传刻删节，讹误更增，清《龙藏》未加订正，流通本又沿袭《龙藏》之误。早年徐蔚如居士得《嘉兴续藏》别行本清凉疏钞对勘，始辨其误。1939年，应师在上海与蒋维乔、叶恭绰等发起，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推应师为理事长，蒋维乔、叶恭绰（一说李圆净）居士为副理事长，黄幼希居士等主持编务，搜集古今中日各种不同刊本进行参校，1941年冬全稿完成，1944年春，全书校印完成。此为应师对中国佛教古籍整理之巨大贡献。

应师对净土宗教义有独到理解。他主张禅净一致，共同弘扬。有人曾以禅净二门不同，请应师开示。他慨然曰：“禅净同源，岂有二耶！”又说：“学者不自究心，纷然于门户，于言句间讨分晓，展转蔓延，抑何已焉！”（《正法眼藏·叙》）

应师主张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为佛事。他说：“当知佛陀住世间，说出世间法。所以世、出世间一贯而已矣。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若识得世间一切法，如梦如幻，了了分明，便可在尘劳作佛事，居火宅为道场，岂可埋没已灵，虚生浪死？”（《致弟子慧明居士书》）

应师在讲经说法中，在教导弟子时，常融儒入佛，以佛释儒。经常教导弟子，做人要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修身之本，本立而道生。修行人要格去一切物情，觉破一切迷惑，离念除妄，才能不

动心；不动才能定，定而生慧，觉己觉人，才是学佛之道。修行人应该尽此业报身，上求下化，念念不忘发菩提心，愿为一切众生受苦，而心无疲厌，常行精进，始为佛陀真正弟子。

四、爱国爱教

应师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爱国爱教典范人物。他在旧社会立身严正，常说：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从不巴结权贵，不贪图名闻利养，只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乐。抗日战争时期，应师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曾几次要他出面主持法会，他以民族气节为重，断然拒绝，高风亮节，为世所颂。在1943年出版之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再版序言中，他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敌寇之凶焰万丈，而我东南重镇之大上海，首当其冲。方是时，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共卫祖国，敌忾同仇，人怀雪耻之心，士无反顾之恋。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焉。旨在救死扶伤，实宏救世教人之大愿。”又说：“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吼奋心以赴。”（《奋迅集》再版序言）救国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解放前夕，当时佛教界某些好心道侣、友人纷纷劝说应师离开大陆，甚至已在海外为应师安排条件优越之寺宇。由于我为应师亲传弟子，亦有人相劝。但应师和我相互勉励，婉言拒绝，坚留大陆。当时应师曾说：我的弘法利生大业尚未完成，怎能贪图个人享受？建国以后，应师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56年，在上海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说：“解放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出现了新的气象，发扬了佛教优良传统，调动了佛教徒的积极性，认识到佛教徒在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方向，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上海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专刊》）在

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应师曾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国庆十周年献词》⁸ 偈，热情洋溢，充满爱国之心。1965年，应师临终时犹谆谆嘱咐弟子：“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努力学习，拥护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应师离开我们已25年了，但他一生实践佛陀“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之宗旨，爱国爱教之精神，永为我佛教徒光辉典范。我们要学习他精研佛学，求法不懈，为法忘躯之精神；学习他开办僧学，刊印经书，续佛慧命之精神；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大智大勇之精神，使他的硕德高行永传后世。

复兴密宗的持松法师

静 华

持松法师在静安寺建立密宗(真言宗)道场,恢复唐代惠果法师以来千年之绝响,诚乃佛门尊宿。

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14年),印度真言宗大师善无畏、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等三人,先后来中国弘传密教,建立真言宗。惠果法师承其法系,仅两传即已衰微^①。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惠果将胎藏界、金刚界两部秘法,传与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后,在日本弘传密教,至今千有余年,而密宗在中国汉地因唐武宗灭法及唐末五代之变乱,渐成绝响。持松法师三渡日本,将汉地千年失传的唐代真言宗金、胎两部大法从日本取回,续惠果法师千年之坠绪,其功甚伟。

持松法师(1894~1972),俗姓张,湖北荆门沙洋(今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李市镇)人。父绪炳,母宫氏,生子三人,持松居长。其家世代书香,持松幼年时,父亲在沙洋天主学堂执教,即从父启蒙,学习儒经、制艺。清末科举废,遂绝意时文,专攻经史小学。1907年,父亲亡故,因生活所迫辍学。不久,幼弟夭折,母亲又大病经年,加之襄水暴涨,淹没田舍,哀鸿遍野,幸免于死。因此深感人生无常。1911年18岁时,决意投荆门铁牛寺出家,拜默满法师为师。1912年,至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法名密林,其后,慕玄奘法

① 西藏地区的密宗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师高德，自号师奘沙门。翌年，在寺听可安法师讲《楞严经》。不能理解。适座间有人传阅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的招生简章，遂往投试，被录取。三载学习，深有所得，毕业后又往湖北当阳玉泉寺，参拜祖印老和尚，学习天台宗。

1918年，继月霞法师，住持常熟兴福寺。五年中，还清欠债，赎回庙产，并两度传戒。还继月霞法师遗志，续办华严预备学校（后改为法界学院），亲自授课，培育僧材，贡献颇多。同时，撰成《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1921年，应太虚大师之约，主讲《八识规矩颂》于杭州净慈寺。次年夏，抵汉口九莲寺华严学校讲《摄大乘论》。后又于武昌佛学院、安庆迎江寺分别讲《观所缘缘论》和《十二门论》。1922年，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叔谨特遂到校演讲，法师以“缘经”为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阐述了佛教关于宇宙万有始基问题的根本观点，颇受师生欢迎。

1922年冬，法师阅读《法轮宝忏》，觉瑜伽秘密部类哲理幽奥，知唐代密法在我国虽已失传，而日本现犹盛行，发愿挽回此千载绝学。遂与大勇法师东渡日本，入纪伊高野山真言宗道场，拜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闍黎为师，接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传授。由于学习勤奋，深有悟性，得第五十一世传法阿闍黎位。次年，日本东都地震，乃提前归国。先在杭州菩提寺传法灌顶，影响根大。1924年春，住持武昌洪山宝通寺，讲经、传戒、灌顶无虚日。还在寺内建法界宫、瑜伽堂，购置法器，绘诸尊曼荼罗像。准备在洪山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开国内密教风气之先。在短短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

1925年秋，日本佛教界发起在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持松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任教义研究部理事。会议期间，与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渡边海旭、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河口蕪慧等亲

切交谈。会议结束后，独留东京。不久，往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接受新义真言宗各流派的灌顶。第二年，又至京都市叡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轨。毕业后，再登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闍黎，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派传授以及真言口诀，同时学习印度梵文文法，1927年春回国。行前，金山穆韶将其珍藏多年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荼罗相赠，以志纪念。因得悉洪山宝通寺毁于兵火，遂居留上海，在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传法，并从事著述。

1929年夏，持松法师应朱子桥居士邀请，赴辽宁参加“仁王护国法会”，张学良将军偕省长翟熙人到会，并入坛护摩受戒。8月，偕朱子桥朝礼山西五台山，设千僧斋，结缘灌顶。1930年春，于汉阳归元寺讲《楞严经》，著名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率男女生十余人入座听讲，并相与讨论哲学与佛教大意以及美术代替宗教之利弊等问题，法师作《哲学与宗教》一文相赠。此后，往返鄂、苏、浙等地讲经、传戒、灌顶。

1931年，持松法师先后于沙市章华寺和宜昌佛教居士林讲《维摩经》和《大乘起信论》。时朱子桥居士发愿恢复西安大兴善寺密宗古道场，函电邀请法师前往，适因武汉水灾，铁路淹没，遂不果行。

1935年，持松法师随师默满法师回荆门故里。时贺龙将军率红军数度攻克沙洋，建立苏维埃政权，持松法师曾赋诗多首，予以赞扬，其中有“谁知骤雨狂风势，为迫降龙伏虎人”之句。

1936年初，持松法师第三次赴日，偕汪书城居士周游日本列岛，慨旧雨多已物化，乃采办坛场法器，夏4月回国，常住沪上圣仙寺（寺主惠宗，乃持松法弟）。从此专心著述，著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护国仁王经疏》、《因明易解》、《密教通关》、《大日经住心品

纂注》、《金刚顶大教王经疏》、《随行一尊供养私记注》、《金刚界行法记》、《胎藏界行法记》、《理趣经释》、《真言宗朝暮行法》、《三陀罗释》、《四度加行口诀》、《梵语千字文》、《悉昙入门》、《护摩行法记》、《菩提心论纂注》、《师奘文钞》等。其中《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全面解释华严教义，为近代华严宗重要著作。《密教通关》一书，乃阐述我国唐密和日本东密源流的纲要性著作。

持松学通显密，著述 20 余种。时上海李圆净居士见其著作多，恐遭散佚，于是约同道相助，分显、密两编，由哈同花园罗迦陵居士资助印行，时在 1939 年。

抗战期间，上海沦陷，1941 年，日军占领租界，日伪企图利用持松法师，曾多次派人至圣仙寺诱逼法师出任伪佛教协会会长，法师托病坚拒，表现了民族气节。

1947 年，上海佛教界公推法师为千年古刹静安寺住持，兼任静安寺佛教学院院长。次年，佛教学院创办《学僧天地》月刊，法师任名誉社长，并主讲佛教经论，传法灌顶。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其离沪赴台，法师坚留大陆，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赖。

1952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静安寺。次年，持松法师在静安寺再次建立长期苦心经营的真言宗坛场，复兴失传千载的密教。为响应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法师设坛修密，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

1953 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法师当选为常务理事。1954 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5 年，被推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1956 年，南传佛教国家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 2500 周年纪念，持松法师在静安寺主持密坛，举行讲经和修法等活动。是年冬，应尼泊尔政府邀请，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经印度、缅甸前往参加纪念大典，受到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的接见，并于欢迎大会上，向群众广

说“三皈依法”，加深了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1957年，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柬埔寨，受到国王、王后以及西哈努克亲王的接见，并与佛教各教派首领进行友好会谈、后又出访越南，受到孙德胜委员长的接见，在河内佛教徒组成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为增进中越两国佛教徒的友好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1964年，随中国宗教界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与日本宗教界，尤其是佛教界的人士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1965年，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受到热烈欢迎。同年，新《辞海》编纂工作开始，受聘编纂佛教条目，同时参加上海市社联的学术活动。

十年动乱中，静安寺也受到冲击，法师亦遭残酷迫害。1972年，圆寂于上海，临终曾作偈云：“满月皓空，星光互摄。入我我入，性空法寂。”

持松法师是我国近代佛教界著名的密教大德、爱国高僧。为学修密法先后四次东渡，两登高野山，悉心竭力，将中国失传千载的金、胎两部大法从日本取回，复兴中国唐代的密宗，为唐惠果以后五代以来所未有。他学通显密，著作甚丰，兼通日、梵文，善诗词，工书法。还自书：“信教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的条幅，悬于室内，以明心迹。

1979年，上海市佛教协会为持松法师召开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且将其骨灰移往江苏常熟虞山建塔供养。又在静安寺内恢复了密宗坛场，并辟“持松法师纪念室”，还将整理他生前遗著，陆续出版，以垂永久。

千年古刹龙华寺

明 中

龙华寺为上海地区历史最悠久、建筑最雄伟、规模最宏大的千年古刹，座落上海市区西南龙华镇。七层宝塔耸立寺前，俯瞰沪滨，遥望云间。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方丈室、藏经楼，前后相望，钟楼鼓楼，左右对峙，偏殿厢房，依序分列。而今全寺僧众，虔修佛理，广结善缘，兴五洲之道场，接世界之嘉宾。

僧会创始 塔寺千年

龙华寺始建于吴大帝孙权赤乌五年(公元242年)，距今1750多年。康僧会为龙华寺开山始祖。相传三国时代，西域有康居国，距今新疆西陲尚有数千里之遥。其丞相某的长子年十余岁丧父，即剃度为僧，虔心奉佛，法名“会”，后世称为“康僧会”。亦说康僧会祖籍康居，世居天竺，移家交趾。此人容貌俊伟，秉性刚正，志行高洁，道力弘深，“明练三藏(佛教三藏)，博览六典(儒家六经)”。他跋山涉水，横绝沙漠，历百重寒暑，经万里途程，托钵募化，来到中华，宣扬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东汉明帝年间。至三国时代，已近200年，但仅流传于中原，建寺亦囿于黄河流域，东南大地佛法尚未弘通。康僧会立志“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来到龙华寺址。当时此地沮洳泥淖，荇藻交横，人称龙华荡。康僧会于此搭设茅舍，建立佛像，讲说佛法，故后世尊之为龙华寺始祖。

康僧会立茅为寺，讲经演教，阐扬众生平等、积善去恶、因果报应之说，远近善男信女多来顶礼受教。不久，事闻于吴大帝孙权，乃召康僧会往建康（今南京）。康僧会劝孙权信奉佛法，孙权谓“佛生于西方，去世已久，难以凭信。”康僧会说：“如来入灭，虽已千年，佛骨舍利，照耀万方，可以求得。”孙权说：“如舍利可得，当为建塔。”康僧会乃加意洗心，洁斋恳求，于几案置一铜瓶，焚香礼请，经三七二十一天，瓶中现五色毫光。孙权大为欣悦，亲手执瓶，倒出佛牙舍利一粒，随即一化为二，共得十三粒，在光明中显现大莲花，照耀宫殿。孙权敬服，谓康僧会实为神僧，立即敕建 13 座宝塔，供奉 13 粒舍利，龙华塔为其中之一，受赐钱两万缗建成。现其他 12 座宝塔均无可考，惟龙华塔虽历尽沧桑，巍然独存。

综观龙华寺始祖康僧会之一生，以年代久远，传说纷纭，类多神话故事，附会之辞。然其所编译反映善恶报应思想之《六度集经》等，至今流传。

屡圮屡建 历经沧桑

龙华寺始建于吴大帝赤乌五年、康僧会立茅弘法之时，龙华塔则始建于赤乌十年，吴大帝敕建 13 宝塔之时，均属草创阶段，规模简陋。千余年来，寺与塔屡圮屡建。据清康熙、乾隆《上海县志》说：“殿宇创于唐垂拱三年”（公元 687 年），又据旧籍记载：“唐垂拱三年丁亥，赐修塔钱五千贯，钞千錠，建圆通宝殿。”垂拱乃武则天年号，她曾出家为尼，因崇信佛教，故敕修佛殿，这应是龙华寺有殿堂之始。

唐末寺毁。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 年），吴越忠懿王钱俶（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之孙，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命经管大盈庄（在大盈塘，今属青浦县）事务之部将张仁泰重建龙华

寺。“中创大雄宝殿，前普贤，左大士，右弥陀，五百罗汉、四天王皆侧殿楹居。长廊峻宇，宝塔、钟楼、山门、伽蓝之属，壮丽为诸刹冠。”这次重建，对龙华寺之传世具有关键作用。忠懿王于建寺同时，延法云普筠禅师主持寺务，赐金像观音一尊，善才龙女像各一尊，金字藏经 108 函，使古刹得以重兴。

20 年后，至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 年），赐金建殿阁廊庑 200 间。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 1064 年），御赐匾额“空相寺”（据云间、嘉禾两府志），由大智禅师任住持，并发帑金重建大佛殿和宝塔。这次重建之宝塔，高耸壮观，保存至今，以年代久远论，全国实不多见。同时还于寺西北隅建白莲禅院。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 1150 年），赐银 300 两，修理宝塔殿宇。并建观音殿，御题“圆通宝殿”匾额。另绍兴十五年（公元 1145 年），于山门前建永泰桥，亦御赐篆额。又赐金襴衣、银钵、玛瑙珠、松鹿锦幡；割浙东官田 300 亩供给僧徒。宋朝历代帝王，不断赐帑赐田，可见龙华寺已有很大规模。元灭宋，虽兵戈扰攘，也未遭破坏。元末，寺又被毁，惟宝塔独存。

明代，龙华重兴。成祖移都北京，永乐年间（公元 1403～1424 年），寺院重建，恢复“龙华寺”原名。据旧籍记载，“紺殿蕊宫，檐牙复道，近古土木所未有。”寺前还辟有放生池，建筑施食台。“隐室窈窕，林木翳瑟。”可见其建筑雄伟，规模宏大。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倭寇犯境，荼毒海疆，龙华寺复化为断井颓垣。

嗣经高僧一真、毓真、慧琳等多年重建，又具较大规模。神宗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19 年）达果禅师请得藏经。奉旨赐额“大兴国万寿慈华禅寺”，位列台宗十刹之一。

明末，寺院渐趋颓圮。清初又复兴建。其间有密照法师重修钟楼，本宁、仁如法师募修宝塔。康熙初年，寺内主要建筑计有大

雄宝殿、三大士殿、圆通宝殿、韦陀殿、天王殿、轮藏殿、千手观音殿、阿弥陀佛殿、大悲殿、舍利宝塔、大藏经阁、文昌阁、钟楼、鼓楼、方丈、东西照楼、怀香楼、塔院、承恩堂、东轩、禅堂、斋堂、祖师堂、外伽蓝殿、内伽蓝殿、三元祠、五通祠、张方伯祠、右山门、左山门，僧寮 13 所、僧房 6 所，还有龙华坊、梁公塔、普同塔、雨花台、白莲禅院、归云山房、西隐山房、迎月山房、听松山房、宣照山房等，规模之大，远超前朝。寺基一度广达 200 亩，时上机法师并倡募重修横跨龙华港南北之津梁“百步桥”以利南北行人。

岁月更迭，寺院年久又告倾圮。清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寺僧观竺募建，奉为龙华中兴之祖。观竺法嗣所澄、静再、月溪、文果等又复努力募建，计建成大悲阁、大雄宝殿、金刚殿、三圣殿、星宿殿、方丈室及楼房五楹等。光绪年间，又有志拱、援原、功极、本泉等先后募修观音殿、祖师殿、地藏殿、大佛楼、宝塔、钟鼓楼、罗汉堂（并塑像）、新三圣殿。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 1934 年）春，佛教会聘请峨眉老僧性空为龙华寺方丈。性空募款将全寺门窗重行修葺，布置一新，4 月 14 日（旧历三月初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龙华十方”匾额一方，悬于大雄宝殿。

龙华三会 弥勒道场

龙华寺自古为弥勒菩萨道场。弥勒菩萨法像，一般笑口常开，肚大能容，其实此乃布袋和尚形象。布袋和尚，明州（今浙江宁波）奉化县人，世莫详其姓氏，后梁贞明三年（公元 917 年）三月初三，圆寂于岳林寺庑下磐石上。遗一偈云：“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皆不识。”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 1104 年），岳林寺塑布袋和尚像于阁内，自此天下佛寺山门皆供布袋和尚，以其为

弥勒菩萨。这一神话故事，早流传于僧众，而笑口大肚，示佛门之广大，亦为世俗所喜。

龙华寺第二进天王殿正中，又供有天冠弥勒法像一尊，头戴五佛冠，身披缨络，左手执莲花，花顶现镜台，右手半十，目微闭，端坐莲台，法相清瘦秀逸，庄严慈悲。佛经谓此乃弥勒菩萨高坐兜率天内院之法相真身，一般寺院未尝供奉，龙华寺因是弥勒菩萨道场，故于头进山门供奉弥勒化身外，特于天王殿内，供奉天官弥勒法像真身，引导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并于弥勒菩萨圆寂之旧历三月初三，聚会僧众，举行佛事。

自龙华建寺，附近渐有居民，至五代时，已有“龙华村”。元代龙华街市初具规模，明代，已成繁华市镇。据旧志记载，有“市廛千余间”，民居尚不在内。嘉靖年间，倭寇肆虐，顷刻丘墟。然因龙华东临黄浦江，有龙华港、蒲汇塘等河流纵横，四通八达，往来舟楫多泊龙华，不久又渐恢复。诗人每以“龙华晨渡”、“龙华午泊”、“龙华夜泊”为题，赋诗记述。据明嘉靖《上海县志》所绘《上海县境图》，龙华港颇为广阔，河上“百步桥”，为南来北往必经之途。故三月初三弥勒菩萨圆寂之期，寺中大规模举行佛事之时，远近居民及往来客商多到寺焚香膜拜，顶礼皈依，于是逐渐形成庙会。起初或只设摊出卖香烛、饼馒，供香客使用。其后岁岁发展，不断扩大，至明末清初，三月龙华庙会之期，寺内寺外，香烛纸表、荤素食品、农具种籽、布匹杂货，或设摊出售，或张幕招徕，万众云集，万头攒动。百戏之徒亦乘机售艺，或演杂技，或耍猴戏，舞枪棒，卖膏药，无所不有，真所谓洋洋大观，热闹非凡。

近年，龙华庙会已经恢复，虽内容与前不同，而规模远过于昔，五金交电、呢绒服装、书籍图册、饮料酒浆，花色繁多，货源丰富。不仅本市居民，兼且国际友人，于瞻礼庙貌之余，咸愿一睹盛况，并借

机游览龙华公园，赏玩桃花。

建寺弘法 代有高僧

龙华寺千年古刹，宗风不坠，自必代有高僧。但以年代久远，劫难频繁，典籍未详，鲜为人知。据历来县志和有关记载，历代高僧不少与募款建寺有关。“佛法非僧不扬”，然佛像须有殿宇供奉，僧徒须有寮房居处，故建寺实为弘法之要务，建寺即所以弘法。始祖康僧会及有关建寺高僧，其事迹已概述如前，不再重复，现记其所未及者。

南宋末叶，有圆明普照鉴堂义大禅师，幼年出家于龙华寺。禅师俗姓金，上海浦东人，幼嶷拔，敦苦行，冬夏一裘一葛，身无长物，惟阐扬宗教，开悟后学，以天台旨要说法于诸名山。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奉敕住持杭州上天竺寺，念龙华寺（时名空相寺）为幼年出家之处，曾募化将山门廊庑再加开拓。禅师晨钟暮鼓，恪守清规，寿96岁，无疾而逝。示寂之顷，谓诸徒曰，宜以法门自重。其夕异香满室，火化舍利，炳耀山颠。其法嗣净岳法师，从师受天台教规，尽得其要。出世说法，七坐道场，所至僧俗皈向。尝取宗门要典，科分章段，卓然超出，妙绝古今。

明嘉靖年间，有拙貌和尚，通音律，善象纬岐黄之学，能妙解禅理。独居一室，不与人接。圆寂时面壁说往生偈云：“去得乾净，莫负山僧忙报信。悬崖撒手踏虚空，那有尘缘些子剩。来得好，来得好，前日是前生。今日是今生。大地一轮红日晓。和尚们，吃饱饭，休论闲是闲非，却把光阴错过了。”言毕而逝。

明神宗万历恭祝皇太后万寿，诏颁佛藏于诸名山。大椿果公（达果）法师正学法于京师。闻讯，疏请颁赐，奉准颁藏经七百一十八函。据明学者陈继儒所作《慈华禅寺募建藏经阁疏》：“上特遣中

官赵永捧救书龙藏,亲诣寺中,并赐金环紫衣护藏。达果延戒僧检藏三载,酬答殊恩,旋使弟子超远(理圆)入都。疏闻,皇太后即赐超远银环紫衣护藏如其师。又赐范金千叶、宝莲毗卢佛一尊,金彩结幡千丈,并日月锦幡二,缕铜器五件,敕赐‘大兴国慈华禅寺’匾额。”同时赐龙边中篆金印一颗,御书“承恩堂”匾额一方。自此,龙华寺岿然为海上人天之大观,云间诸古刹均难比拟。又说超远绳戒精洁,清审贞立,以慈华寺隘不能容藏,寺后尚多空地,“因募款建阁五楹,上以供经,下以迎高贤远衲。”

韬明禅师,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住持龙华寺。禅师为禅宗大德,大播宗门,常示禅理,著有《韬明禅师语录》,众称龙华寺中兴阐法开山之祖。他建韦陀殿、东西照楼,于方丈后建怀香楼,重修藏经阁。入寂后,建塔于三圣殿旁。康熙《上海县志》称:“韬明禅师住持,梵宇鼎新,复成伟刹。后法嗣大壑、澄清、古溪、霜林相继接席,宗风得以不坠。”

咸丰、同治年间,观竺法师为龙华寺住持,亦为龙华寺中兴之祖,奉为天台宗第四十祖。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募建大雄宝殿,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由部领到《藏经》一部,计七百三十函。当时“备仪仗迎之入,护从僧约百余人”。这部《藏经》,寺中至今保存。

竹禅法师,四川梁山(今梁平县)人,俗姓王,避难出家,驻锡龙华寺,能绘水墨人物树木。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龙华塔遇火,法师捐画资修补。

了昱法师,形容瘦削,诵经枯坐,不妄言笑,不坠文字禅,知者甚少。有曹雉山者,曾赠以诗云:“云房方十笏,香龕小一粟,中有苦行僧,终年一瓯粥。”老化后,满室旃檀香,三日不散。

谛闲法师,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住持本寺。乃天台宗尊

宿、近代名僧。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浙江黄岩人，24岁受具足戒于天台山国清寺，迹端法师授记付法。各地僧俗礼请讲经说法40余年。曾在龙华寺住持，还历任慈溪狮子庵、永嘉头陀寺、绍兴戒珠寺、宁波观宗寺、天台山万年寺住持。曾主办南京僧师范学堂、宁波观宗学社(后改为弘法研究社)，自任主讲。晚年应上海玉佛寺邀请，开讲《楞严经》。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示寂。僧俗弟子十余万人。著作有《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圆觉经讲义》、《金刚经新疏》等多种。后人辑有《谛闲大师全集》行世。

性空法师，原为峨眉老僧，受佛教会敦聘，自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住持本寺。他募集巨款，苦志经营，重修殿堂，装塑佛像，严整戒规，革除承袭。是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初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赠“龙华十方”匾额一方，悬大雄宝殿。为弘扬佛法，法师“择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望日为嗣法本师谛闲老和尚八十寿戒，欲令正法久住，以续僧伽命脉。次年又复传授千佛大戒，启建水陆道场，广结善缘，此次剃度受戒沙弥200人，居士求归戒者亦达百余人。性空法师手订《龙华法轮丈室传继公约》十二条，内云：“宜存心广大，作事公允，”“切不可隐萌私衷，”“大公无私四字时刻系在心头。”

春满寰宇 古寺重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名刹古寺。龙华寺于动乱期间虽遭破坏，而今春满寰宇，古寺重光，欣欣向荣，前所未有的。佛像殿宇，虽多晚清遗制，亦均装塑一新。护持古迹，谨守宝藏，并不断发展扩充。

（一）佛像和建筑

寺内佛像，或庄严慈悲，或气象威猛。龙华宝塔耸立寺前，殿宇多沿袭宋明风格，保持宋代伽蓝之七堂制，于中轴线上，从前至后，排列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方丈、藏经楼，前后六进，飞檐斗拱，灰瓦黄墙。两侧对称排列钟楼、鼓楼、两厢和偏殿。院内有牡丹园，侧门通龙华公园。

龙华塔据传原名“报恩塔”，系孙权建塔以报母养育之恩。现塔为宋代重建，砖木结构，高41.21米，七层八角，有檐有廊，外壁八角形，内室方形，底层高大，往上逐层收缩。各层四面有门，门向逐层变换。底层4门，朝向为东、南、西、北，二层则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三层又如底层，以此类推。每层均有腰檐平座，栏杆随塔身转折，重重飞檐高翘，檐下悬铜铃，每层8个，七层共56个。塔顶层有铁质覆钵、露盘及套于铁刹之七重铁环，顶端为葫芦状宝瓶，是为“七相轮”，乃镇塔之宝。

此塔重建后，曾多次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成立时，已逐渐朽坏，政府数番整修，于檐角发现宋代形式之木檐，砖拱发现宋代花纹，塔角发现宋代瓦当。据专家鉴定及有关文献记载，证明塔身和塔基仍为宋代故物，已逾千年，历史悠久，全国少见。

弥勒殿，为全寺第一殿，殿额金书“龙华寺”三字，殿正中供弥勒，袒胸露腹，笑口常开。

天王殿，正中佛龕供奉天冠弥勒一尊，修目长眉，清瘦秀逸，与躯体肥胖之相迥然不同，为一般寺庙所无。龕后为韦陀，手执降魔宝杵，为佛护法。殿侧为四大天王，或称四大金刚。

大雄宝殿，供奉“华严三圣”，中央莲台高坐者为毗卢遮那佛（意为光明普照），据《华严经》云，乃莲花藏世界（佛报身之净土）之

教主；东侧文殊师利菩萨，乘青狮；西侧普贤菩萨，骑白象。殿后为大型海岛壁塑，中立观世音菩萨，故事内容为善财童子求法，上有合掌小型善财形象多尊，以示向各方求教，即佛教中所称之“五十三参”。大雄宝殿前面两侧供奉二十诸天，乃护法天神，殿后两侧供奉十六罗汉。^①

三圣宝殿，中间供奉三尊四米多高之金身佛菩萨立像，是为“西方三圣”。正中为阿弥陀佛像，手捧镜台，乃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故又称“接引佛”。左侧为观世音菩萨，手执杨枝，一般寺院观音为女相，前述大雄宝殿背后壁塑观音亦为女相，而此则是男身。右侧为大势至菩萨，手执莲花。殿铺方砖，砖上雕莲花，取步步莲花之意。此殿址原为“三大士殿”。明万历年间一真法师发愿修建，屡毁。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任住持明旻重新修葺，1986年4月竣工，供奉“西方三圣”。据《龙华寺重塑三圣宝像功德碑记》：“清信男唐煜源、清信女项亚南，发菩提心，敬献净财，重塑西方三圣宝像壹堂及庄严法物等。比丘定因、信女邵淑英、陈萍、周惠英暨四众弟子等，欢喜赞叹，各施净财，共襄功德。”

方丈，在三圣殿后，匾额为“华林丈室”。室内布置古雅，为方丈布教说法之处，国内外佛教团体和佛教界人士、国外贵宾来访，亦于此处接待。

藏经楼，昔日建筑已经倾圮，现重新修建。

玉佛殿，在大雄宝殿西侧，内供白玉释迦牟尼佛坐像，高1.8米，面色慈祥和悦，头额和身体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为香港西方

^① 玄奘法师《法华记》云，释迦牟尼曾令十六罗汉常住人世，济度众生。至唐末张玄、贯休两僧始画十八罗汉像。

寺住持永惺法师从缅甸请得，敬献龙华寺。

观音殿，正中为香樟木雕刻、4米多高之千手观音像，壁上祥云缭绕，塑32应。

钟楼、鼓楼，均为清代重修遗物，重楼三层。钟楼悬铜钟，重1.3万斤，高达2米，对径1.3米，清光绪20年（公元1894年）造。昔年夜晚，钟声远飏，警醒迷途，人称“龙华晚钟”，底层供奉幽冥教主地藏菩萨。鼓楼架巨鼓，对径1.7米，底层供关圣帝君。

染香楼，在三圣宝殿东，上下两层，现为斋堂。

牡丹园，在染香楼前。其中一株百年牡丹，为清咸丰年间（公元咸丰1851~1861年）从杭州东莲寺移植，曾开花253朵。

（二）其他古迹

古山门和石狮，均为明代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古迹。山门在塔院东南今龙华镇老街上，系石框架，横额前有“龙华”两大字，后有“古刹”两大字，右上角有“正德”两字。山门两侧，有巨型石狮一对，状貌威武。

龙井两口，在古山门左右。据旧籍记载，一清一浊，世呼为阴阳井。大旱不涸，时有金鳗出没，故以龙名。现山门两侧已作民居，井亦圈入，不可得见。

空相寺界石，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曾赐额“空相寺”，界石即当时遗物。现存两块，一块刻有“空相寺西南角石”字样，另一块刻有“空相寺东南角石”字样，系1980年修寺时发现。现两石均移至染香楼前牡丹园内陈列。

韬明禅师塔，系其弟子等所建，塔正面刻“本山开法第一代临济卅二世韬明宗禅师之塔”，背面刻“大清康熙岁次丁未嗣法门人超济等建立”，现在牡丹园中。

(三) 寺存宝藏

龙边中篆金印一颗,文曰“钦赐承恩堂龙华讲寺之宝印”,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御赐之宝。另有明代镏金宝莲毗卢遮那佛像一尊,明版《大藏经》一部,合称“龙华三宝”,现惟金印尚存。

历代藏经:(1)《碇砂藏》,又名《平江府碇砂延圣院大藏经》,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931~1935年)。据明洪武本影印,共60函、563册(经文59函、591册,目录1函、2册)。(2)《龙藏》,又名《清藏》,清代官版藏经,共724函、1669部、7168卷,分正续两部分。其中正藏485函,续藏239函。系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观竺法师由部领得。(3)《卍续藏经》;为日本藏经书院收集中日历代未入藏之佛教典籍汇编而成。共1659部、7143卷、151函。此本流传甚少,颇为珍贵。(4)《频伽藏》,又名《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民国初年私版铅印本,共40函。(5)《大正藏》,又名《大正新修大藏经》,系日本编纂的汉文大藏经,计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共100册,收录佛经3493部、13520卷,为佛学界常用汉文大藏经版本之一。此外尚有唐人写经6卷,五代刻经1卷,明刻《大方广佛华严经》1部,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石刻《心经》残幢,为上海市区年代最远之出土文物。

明清佛像,大小共50余尊,其他各种古代佛像40余尊。其中北宋铜质旃檀佛像为印度早期佛像风格,通臂式,头发波浪形,右臂偏袒,掌心外向,示“施无畏”形,意为凡人心地正直,佛将施以无畏;左臂下垂,掌心亦向外,作“施愿”式,示佛陀将为世人拔除苦乐。制作精致,正如佛书所谓“薄衣透体”。

万历铜钟,悬于大雄宝殿左侧,高径,色泽斑斓,为明万历十四

年(公元 1586 年)铸,已有 400 年历史。

宋钟,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 1133 年)铸造,悬于三圣宝殿左侧。

清木鱼,悬于三圣宝殿右侧,形若鱼,为清代遗物。

近代名刹玉佛寺

明 中

近代名刹玉佛寺，位于上海安远路江宁路口，因寺内主要供奉玉佛而得名。又以该寺属于中国禅宗临济法系，修习禅法，所以寺额为玉佛禅寺。

一、建寺经过

清光绪八年(公元 1882 年)，普陀山慧根和尚单丁行脚，朝礼佛迹，展转而至缅甸。该地盛产美玉，又有良工巧匠，雕镂佛像，工事尤精。慧根得华侨陈君普资助，募得白金 2 万有奇，蒙缅甸国王赞赏，准为开山取玉，造成释迦佛像大小五尊，以宝石巨珠为饰，金容满月，七宝庄严。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 4 月，慧根奉玉佛回国，行抵上海，原想将玉佛送至普陀山供养，而招商局江天轮起重设备有限，其中坐卧之两尊玉佛，无法启运。时盛宣怀任铁路督办，掌管轮船招商局，举家笃信佛教，其父盛旭人及叔盛朴人以淞沪铁路两侧空地颇多，意欲在上海暂建茅篷，供奉两尊玉佛，以便上海人士瞻礼。慧根亦以上海“人民业重”，亟需大慈大悲的佛光照耀，乃奉三尊小型玉佛回普陀山，将另两尊玉佛留在上海，由盛氏亲戚庄策择地于张华滨八角亭，建茅篷以奉香火。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慧根得庄策帮助，募款建寺于江湾车站之侧，鸠工庀材，一年而毕，以寺内供奉玉佛，名为玉佛寺。据慧根当时募建玉佛寺序说：“爰自普陀，远游竺国，礼拜玉佛，供养金龕……留

在沪渎，募建招提……庶几舍卫城边，现梵天之宝相，吴淞江畔，拓佛地之宏规云耳。”此为上海玉佛寺之缘起。江湾玉佛寺基地 3 亩有零，寺屋 4 进，共 72 间，毗连余地 33 亩，颇称壮观。

不久，慧根圆寂，由法嗣本照任住持，他继承先志，躬自晋京，请得雍正年间所刻《大藏经》（即《龙藏》）一部，供养寺内。从此，玉佛寺佛、法、僧三宝俱足，略具丛林规模。

1911 年，辛亥革命时，寺屋被占（一说被毁），玉佛被移置公园，本照和尚呼号力竭，亦示寂。据远尘法师所作《可成和尚行略》云：“盛公赙续前愿，迎玉佛于其已故长公子揆臣太守麦根路遗宅，权为供奉结集之所”而《玉佛寺记》则称：“时宏法上人由天目昭明退院来沪，诸山长老推举继席。宏法上人乃与常州天宁冶开大师及香林济南长老多设方便，翊护法幢，高门悬薄，檀施翕应，遂将玉佛移至麦根路，赁屋粥鱼，斋鼓梵诵不辍。”两说于麦根路寺证来源，记载歧异，未能孰是，姑并存之。

冶开和尚道行超卓，为法门泰斗，于寺内结七，立念佛道场，“海内名流，闻风景附，坛那善信，罔不感动”，影响甚大。1917 年，冶开、宏法先后圆寂。是年秋，可成法师继宏法之后为玉佛寺住持，以原址狭小，不足容众，赁屋供佛，终非久计，乃募得槟榔路（今安远路）地基十余亩，募财庀工，绘图鸠役，自 1918 年开始，至 1928 年建成，殿宇宏伟，佛像庄严，因可成法师为禅宗临济法系，又供玉佛，因称“玉佛禅寺”。

二、寺宇布局

玉佛寺布局，山门对面为照壁，宽五间，中间一格最为高大，两侧依次低亚，格中均有圆形砖雕，中间一格砖雕为蛟龙吐水，显云水翻腾之相，相邻两格砖雕为凤凰，边部两格为白象，均极精工。

玉佛寺第一进为天王殿，正面有山门三座，高两层，悬赤地金字匾额“玉佛禅寺”。殿内当门而坐者为弥勒佛，背后对大雄宝殿者为韦驮神像，手执宝杵，为佛护法。天王殿两侧为四大天王，亦称四大金刚，像高4公尺，均气宇轩昂，威武雄壮。左侧第一尊为东方持国天王，手执琵琶；第二尊为南方增长天王，手执利剑，右侧第一尊为西方广目天王，手缠一龙；第二尊为北方多闻天王，手持宝幢。殿后悬额“庄严慈护”，以示庄严国土，慈护众生，颂扬四大天王之功德。

方二进为大雄宝殿。殿前院内安放万年宝鼎一座，由铜铁合铸而成，高4.8米，为信众所捐献，鼎上铸有功德主（捐献者）姓名。

大雄宝殿台基高1米余，围以栏楯，每根栏柱顶部均雕狮形，神态各异。大殿为2层仿宋宫殿式建筑，歇山顶，四角飞檐均悬铃铎。大殿宽7间，进深5间，宏伟壮观。中央供奉3尊大佛，均高4米余，趺坐莲台。中央一尊为释迦牟尼佛，亦称如来佛，乘如实道，来化众生；东座为药师如来佛，消灾消难，普度众生，手持法轮，喻所向无敌；西座为阿弥陀佛，手持金台，接引信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两侧为二十护法诸天。

大雄宝殿后面，为大型海岛壁塑，内容为善才童子53参，询求正教，终成正果的故事。正中是观世音菩萨，顶上塑释迦牟尼雪山苦行形象，再上为天龙八部护法神。观音菩萨下面为十八罗汉。整个壁塑，造型优美，神采奕奕，庄严生动，主从分明，互相呼应，反映了高超的佛教艺术。

第三进为玉佛楼，楼上供奉慧根和尚从缅甸请来之大型玉佛坐像。玉佛系用整块白玉雕成，玉色温润莹洁，高1.95米，重约1吨。玉佛结跏趺坐，面容清秀，眉如新月，双目微凝，两耳垂肩，慈祥悦，充分表现释迦牟尼佛宽广慈悲的胸怀。玉佛身镶红绿蓝

等色彩各异之玛瑙、翡翠、宝石，光彩夺目。所着袈裟以钻石镶边，雍容华贵，前来瞻礼的海内外信众络绎不绝，无不欢喜赞叹。

玉佛楼两侧整齐排列橱柜，内藏本业和尚晋京请得之清雍正年间雕版《大藏经》，经、律、论三藏，共 7240 册，所以玉佛楼又是藏经楼。楼左右间，还藏有影印宋《碓砂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印大藏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编印《续藏经》各一部。

楼下为方丈室，额署“般若丈室”，布置明净雅洁，为方丈讲经说法及接待内外宾客之处。此室两侧墙壁，镶嵌有董其昌的《四十二章经》和《释迦如来成道记》书法 24 石。这是玉佛寺住持真禅大和尚特聘著名刻工黄怀觉，化 3 年时间精心雕刻，于 1983 年秋完成。这 24 方刻石，重现了董其昌书法的风采，平正秀润，雅俗共赏。刻石末后，有真禅法师撰书的跋。

东庑廊下，镶嵌有 32 块观音像刻石（连文字共 35 石）。此刻石原为南通狼山旧刻，系清状元张謇（季直）先生集内宫所藏历代名画家精品，由著名刻工黄怀觉镌刻。40 余年后，旧石不存。真禅大和尚乃请黄怀觉暨子良起重新摹刻，其中已漫漶者 3 像，另选精品补足 1983 年始刻，1990 年完成，前后共历 8 年。所有观音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海内外善男信女瞻仰后，莫不留连赞叹。

玉佛楼东西两庑建筑，东部楼下有观音殿，供奉明代铸造之青铜观音坐像。还有斋室、禅堂和僧寮。楼上为上海佛学院。西庑建筑有弥陀殿、卧佛堂。弥陀殿内供明代铜铸阿弥陀佛立像，高 300 厘米。卧佛堂供奉慧根和尚从缅甸请得之玉佛卧像，长 96 厘米，比玉佛楼供奉之玉佛坐相略小，也是用整块白玉雕成，是释迦牟尼 80 岁涅槃时形像。佛教中，其他佛像均有立像或坐像，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有卧像。佛头北向，右臂曲肱枕头，这种卧式叫吉祥卧式。两眼微合，反映释迦牟尼涅槃时宁静慈祥、从容自若的

形象。卧佛堂还供奉一尊大型玉卧佛像，这是真禅大和尚于 1989 年 7 月亲赴新加坡请得。1990 年农历 4 月初八佛诞日，举行大玉卧佛开光典礼。佛像全长 4.05 米，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玉卧佛像之一。其卧式与原有的玉卧佛像基本相似，但神态则有所不同

三、历代住持

玉佛寺从慧根和尚 1882 年跋山涉水，从印度请得玉佛算起，至今 109 年历史。其间有慧根、本照、宏法、可成、远尘、寰华、止方、苇一、苇舫 9 代住持。

慧根法师从缅甸雕成玉佛，留大型座卧玉佛各一尊在上海，先在张华滨搭茅，后在江湾建寺，供奉玉佛，

本照法师为慧根嗣法弟子，晋京请得《龙藏》一部，供奉寺内。至此，玉佛寺佛、法、僧三宝具备，成丛林规模，已见前述。

宏法法师系由天目昭明退院来沪，本照示寂后，诸山长老推举为本寺住持，将玉佛移至麦根路新址，斋鼓梵诵不绝。

可成法师俗姓王，法名大呆，江苏镇江人，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生，世业耕读。父佩怀，母张氏，生子 5 人，可成最幼，读书聪慧，早怀出世之志，年 12 即投本邑鹤林寺。旋为父母领回。可成力请，终获许可，受剃于同邑灵鹫寺友仁老和尚。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于南京宝华山依浩净和尚受具足戒，时年 16。可成笃守毗尼，精研经论，在金山江天寺 5 载，历充首领各职，南京香林寺济南、弥修老和尚许为法器。1917 年秋，宏法和尚拟退休，由可成接任玉佛寺方丈，时年 28 岁。可成以为“大法垂秋，急宜唱导，况沪地业殃渊藪，尤当庄严佛土，挽救劫波”，况借屋供佛，终非长久之计，乃募得槟榔路地甚 10 余亩，即玉佛寺现址。当时此处尚属未经垦辟之灰场草茔，思欲缔构伟刹，其艰辛不言而喻。但可成

法师矢愿坚固，决心“草路蓝缕，躬营畚筑”。精诚所至，感格人天，檀越善信网不翕应，规划严密，布置周详。从1918年开始，至1928年建成，梵宫琳宇，巍然屹立，蔚成巨刹。落成之日，诸山长老、四众云集，罔不欢喜赞叹。以可成法师传承禅宗临济法脉，故寺额为“玉佛禅寺”。可成法师住持玉佛寺期间，各省有毁坏庙宇、接收庙产之议，法师与上海暨诸方长老并诸大居士发起，创立中国佛教会及上海市佛教会，团结僧信，维护寺产，擘画筹谋，不遗余力。还曾敦请谛闲法师等来寺讲经，法会之盛一时稀有。1932年，可成法师圆寂，世寿43岁。临终时，神志湛然，合掌诵佛，以寺务委其传法弟子远尘，一一指示，处分详尽。

远尘法师号乘真，江苏泰兴人，1932年继可成法师任玉佛寺住持，前后10年。其间正值国难当头，社会动荡，远尘尽力维持，寺众赖以安。法师蒿目时限，思非培植僧材，无以振衰起敝，弘宣正法，乃于寺内创立佛学院，敦聘震华法师主持院务。数年之间，门人泰半有成，受业弟子如隆根法师等至今仍弘化海外。1973年，远尘辞世，立衣钵塔、行业碑于常熟虞山兴福寺（即唐破山寺址）日照亭畔。

震华法师俗姓唐，江苏兴化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幼失怙恃，境遇悲凉。10岁，依怀莲上人披剃，赐法名乘实，字震华。他谨遵师教，口慎不妄发言，手慎不妄取财，足慎不妄行动。师见其年幼善根萌发，遣塾中就读，天资颖悟，学业过人。1926年春，其师祖镇江江天寺霜亭上人，令其从超坪寺玉山佛学社守培法师学习经教，亲炙三载，获益良深。1929年，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1930年，夹山竹林寺霭亭上人见其行解相应，才识过人，聘为竹林佛学院主讲。1932年，任竹林寺监院。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震华认为僧亦犹人，当奋起救国，撰《僧伽护国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震华发动镇江各大寺庙，组织佛教僧侣救护队，带领队员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救护伤员，实现其僧侣救国之志愿。1942年春，受上海玉佛寺住持远尘法师邀请，来玉佛寺创办上海佛学院，并接任住持。发行《妙法轮》月刊，设立佛学图书馆，附设“弘一大师纪念会”。1945年冬，震华法师卸住持任，专心撰述，所著甚丰，除《僧伽护国史》外，有《中国佛教名人大辞典》、《东渡高僧传》、《入华求法高僧传》、《续比丘尼传》等。1947年3月圆寂，世寿39岁。

1945年冬，震华法师闭门写作，由止方法师接任住持。1947年初，止方退隐，苇一法师接任玉佛寺住持，诚心任事。1949年，苇一退隐，苇舫法师继任住持。

苇舫法师法号乘愿，俗姓朱，江苏东台人，1908年生。家世奉佛，1921年在本县福慧寺出家，于宝华山受具足戒。曾受业于常熟兴福寺、北京柏林寺佛学院，后往武昌佛学院深造，编《净土宗月刊》，任汉藏教理院教导。七七事变后，主持武昌佛学院，编《海潮音》月刊。1940年曾随太虚法师访问印度、锡兰、缅甸等国。抗战胜利，奉太虚法师命，恢复武昌佛学院及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任金山江天寺监院。1949年3月，苇一退隐，由苇舫接任玉佛寺住持。建国后，曾任上海抗美援朝佛教分会主任委员。1954年参加喜饶嘉措访问团出访缅甸，先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政协委员，参加《辞海》佛教条目编写。1969年圆寂。1979年以后，真禅法师接任玉佛寺住持。

中国近代佛教改革家、法相宗太虚法师，与玉佛寺有段因缘。1945年7月，太虚法师曾在玉佛寺创设觉群社，出版发行《觉群周报》，其门人福善法师于1946年春，应震华法师邀，来玉佛寺任监

院及上海佛学院教务主任。1947年2月，福善、震华法师先后示寂，太虚法师以二人年轻有为，遽尔迁化，深为伤感，旧疾复发，于3月17日在玉佛寺直指轩圆寂。

四、文物宝藏

玉佛寺建寺迄今虽仅百年，但寺藏文物宝藏甚丰。玉佛坐像、卧佛像、明代青铜观音像、明代铜铸阿弥陀佛像立像，清版《龙藏》及多部藏经，前已介绍。其他文物宝藏，分书画、雕刻两部分介绍如后。

(一) 书 画

敦煌石室唐人写经。敦煌莫高窟为佛教伟大艺术宝库，玉佛寺所藏敦煌莫高窟石室藏经两种，均唐人手迹。其一为《千佛名经》，长42.5厘米，阔24.6厘米，计20行，275字。其二为《妙法莲华经》残卷，长111厘米，宽24.6厘米，64行，其中经文46行，除一行3字外，余均行17字，共768字。经文后为偈语，8行，每行20字，共18行、360字。卷末有9人题记，写经者不可考。

雷峰塔藏经，1924年8月，雷峰塔圮，识先(人名)得塔中藏经一卷，后又在经前配绘雷峰塔图一幅。这卷藏经，全名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简称《陀罗尼经》，北宋刻本，长212厘米，宽5.7厘米，292行，每行10字，共2920字。

金字《妙法莲华经》。系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青州圆智法师发心，由其弟子王舍参照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刻印的《法华经》原本，用金粉书写而成，楷法秀逸。扉页上有佛、菩萨、罗汉等金粉画像，共53人，甚为工致。

贯休《罗汉图》。贯休，唐末五代人，和安寺僧，俗姓姜，字德

隐，一字德远，婺州兰溪人。他书比怀素，画比阎立本。所画罗汉，总是梵相，粗眉大眼，丰颊高鼻，形容古怪。玉佛寺所藏《罗汉图》，虬髯隆准，臂夸玉饰，手执法器，着赤色僧衣，盘膝而坐，甚为生动。其传世名画相传有《十六罗汉图》，现藏日本京都高台寺。

顾闳中《忙闲图》。顾闳中为五代南唐画家，工画人物，善写神情意态。《韩熙载夜宴图》即其传世杰作。玉佛寺所藏《忙闲图》，其中人物或匆忙赶路，或悠闲对奕，形成对比效果，不仅人物传神，山水亦工致。

钱舜举《罗汉双象图》。钱舜举为宋末元初画家，湖州人。人物师法李公麟，其传世作品《柴桑翁像》，图录于《中国名画宝鉴》；《卢仝烹茶图》轴，列入《故宫名画三百种》。玉佛寺所藏《罗汉双象图》，罗汉系梵相，高踞象背，顶有圆光，袒胸赤足。双象线条圆转，形态驯顺，甚为传神。

刘珏《佛肩和尚送别图》。刘珏，明画家，长洲人。少遇太守况鍾，补生员，以才举刑部主事，工书善画。年五十归林下。传世作品《山水微茫图》轴，藏苏州博物馆，《天池图》卷藏苏州市艺术博物馆，玉佛寺所藏《佛肩和尚送别图》为其佛教绘画。

乾隆御题《万寿山五百罗汉图》（拓片）。北京万寿山有五百罗汉堂，乾隆命画师王方岳据佛经描述的罗汉境界，精绘10幅罗汉图，御制《万寿山罗汉堂记》，并为每幅罗汉图作题记，一并勒石。本寺所藏罗汉图为其拓片，图文并茂，书画俱佳。

唐《十二宫神众图》、佚名之《佛菩萨图》。画中神众、佛菩萨像，均情态端庄，绘笔线条流动，色彩金碧辉煌，反映了当时画风。

《五百罗汉图》。长441厘米，宽31厘米，人物119，动物24，年代及作者不可考，人物动作各异，笔触工致，细腻传神。

(二) 雕 刻

释迦太子铜像。铜像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释迦太子立于盛开莲花之上，形为幼儿，方脸大耳，身着兜肚，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象征“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下部为双层六角形底座。两层之间，每角均雕有金刚力士作托举状。整座铜象构思奇巧，形象浑厚。

青铜佛像。据背面铭文，此像造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已有1400年历史，功德主司马氏。像为释迦立像，修眉广目，神态安详，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背后为通身火焰纹背屏，上方有三尊浮雕坐佛像。底座方形，四足。

北朝石雕药师佛像。此像雕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为清信女张氏为其亡媳所造，叶恭绰居士赠与玉佛寺。雕像石质微黄，细腻如玉，高23.5厘米，右手屈臂上举，作施无畏印，左手掌下向，作与愿印。舟形背屏，左右两侧各有小立像。像座下部有相向面跪者二人，中间博山炉。雕像古朴，线条流动。

枣木观音像。高150厘米，按枣木弯曲原型雕刻，形象飘逸，重心稳定。

石雕观音像。藏有数尊，或立或坐，雕刻精细，形态各异。

木雕灵鹫山。数根黄杨木雕刻拼合贴金面成，高195厘米。山上怪石嶙峋，古木参差，佛菩萨、罗汉、天王等，或骑狮，或伏虎，或偃仰亭间，或展阅经卷，并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神态各异，形象生动。

另有取材于《西厢记》、《三国演义》故事的清代木雕屏风3块。

静安寺的今昔

静 华

一、历史沿革

静安寺是上海著名古刹，相传始建于三国吴大帝赤乌年间（公元 238～250 年），初名沪渎重元寺，又称沪渎重玄寺，距今已历 1600 余年。原址在吴淞江北岸，可能位于今潭子湾一带，实地已不可考。据《释迦方志》载，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 313 年）有两石像浮于吴淞江口，吴人朱膺等迎至沪渎重元寺供奉，像背题有维卫、迦叶二佛名。后六年，又有渔人获两大石钵，用以盛荤腥之物，忽有佛像显现，渔人大惊，送至沪渎重元寺，供奉于二石像前（后石像迁于吴门开元寺），足证西晋时期确有重元寺屹立于吴淞江滨。唐代，重元寺更名为永泰禅院。五代时期，沪渎隶于吴越王钱氏。据传重元寺中有吴越王瑜伽道场中毗卢遮那像，五脏皆书钱氏妃嫔姓名，可见永泰禅院深得钱王重视。宋仁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改永泰禅院为静安寺，沿用至今。

南宋宁宗嘉定九年（公元 1216 年），寺僧仲依以寺基迫于江干，涛水冲汇，有倾圮之虞，乃迁于现址。据光绪《重修静安寺记》碑云：“沪渎迤西行四五里，蔚然环村落间者，曰芦浦，有古丛林居僧焉，则静安寺也。”由这一记述可见，当南宋时，静安寺现址一带乃一片村落、田野，溪流丛莽，远非今日繁华景象。

元明以来，静安寺曾屡次修建。察寺内现存当时柱礎等遗物，确有相当规模。包括重元寺旧址及静安寺现址。有八处胜迹，名

“静安八景。”

(1) 赤乌碑。传说沪渎重元寺初创时，曾勒碑记其事，因时在赤乌年间，故称赤乌碑。南宋迁寺时，此碑未迁。不久，吴淞江改道，渐为江水所淹。另据记载，此碑宋时虽存，但碑文漫不可识，惟“赤乌”二字当依稀可辨，故名赤乌碑。

(2) 虾子潭。位于静安寺旁，相传宋时寺僧智俨曾向渔人赊虾一斗啖之，后渔人索钱，遂吐虾入潭，虾仍活，惟少芒。自此，潭中遂产无芒虾，因名虾子潭。静安寺也因此被称为“虾子道场”。1919年，旧英租界工部局开马路，虾子潭被填塞。

(3) 陈朝桧。沪渎重元寺殿堦左右两侧曾植有双桧树，时在陈后主祯明年间(公元587—589年)。后蔚成大树，根深叶茂，冠绝当时。唐代陆龟蒙、皮日休曾作双桧诗以咏之。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有媚臣朱勔将双桧绘图进献皇帝，徽宗曾遣中使来取，正欲拆毁山门外运，忽雷电大作，风雨交加，震碎其一，中使惧而停运。留存的另一株，迁寺时曾移植于沸井浜新寺内，明初当存，后不知毁于何时。

(4) 讲经台。传说南宋迁寺后，寺僧仲依即在沸井浜新寺内筑土台，聚徒讲习佛法，称讲经台，后被毁。

(5) 涌泉。在静安寺前，因泉水昼夜沸腾，故又称沸井，或称海眼。后人曾在泉水四周砌石栏，建亭其上，取名应天涌泉。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重砌石栏，加以保护，华亭胡公寿题“天下第六泉”。建国后，在60年代被填塞。

(6) 沪渎垒。距寺不远，相传东晋虞潭为防海寇而建。东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将军袁山松复加修葺，以防农民起义领袖孙恩进攻，后世遂称沪渎垒。

(7) 绿云洞。是元代静安寺方丈寿宁栖息之所，虽名为洞，实

系静室。当时曾在周围广植桧竹桐柏，层阴迭翠，袭人衣袂。元著名书法家赵孟頫、著名文学家杨维禛分别为其题额和作记。

(8) 芦子渡。位于沪淞垒旁，传说旧有东西芦子二城，渡淞江者必经此道，故名芦子渡。

清代，静安寺先后维修四次。首次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发起者为礼部侍郎麦焕。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发心重修者是歙人孙思望。当时有寺僧大海将寺内雷击焚余的银杏树干雕成十八尊罗汉像、一尊韦驮像。咸丰年间，寺毁于兵燹，仅存大殿。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住持鹤峰收拾余烬，发愿重建古刹，先后得到本地李朝覲、姚曦，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等人倡捐资助，修复山门和佛殿，此为第三次修复。次年旧历四月初八佛诞日落成，乃举行规模盛大的浴佛典礼。是日热闹异常，附近村民纷纷乘浴佛之机，群集出售土产、农具、杂物，调换耕牛，城厢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前来礼佛，趁便郊游购物。从此形成每年农历四月初七至初九日的静安寺浴佛节庙会。清王韬《瀛濡杂志》云：“每逢四月八日浴佛大会，仕女毕集，施舍无算。”当时有一首诗描述说：“仕女如云浴佛辰，静安场聚万车轮。衣香鬓影斜阳返，十里红飞马路尘。”今保存于寺内的《重修静安寺记》碑记载了当年维修的史实。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住持正生增建两虎房屋，且将全寺修葺一新，始构成静安寺今日之规模。是为第四次修复。此后一段时间里，寺内树木葱郁，院宇幽深，寺西一带，遍植奇花异草，姹紫嫣红，景色宜人，市民以乘马车至沪西静安寺游览为时尚。

1919年，沸井浜被填没，寺前筑成通衢，取名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此后，城建日益扩大，山门被商店所掩。1945年另立山门一座，并在新山门前建了一座阿育王式石幢，作为寺院标志，后被毁。

1947年，静安寺由“子孙庙”改为“十方丛林”，佛教界公推持松法师担任住持。他苦心经营，于1953年在寺内建立密宗坛场，复兴了在我国汉地绝响千载的密教。

“文革”中，大雄宝殿毁于火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静安寺又获得新生。自1984年恢复开放以来，已先后修复和重建了功德堂、天王殿、大雄宝殿，恢复了密宗坛场，重塑各殿内的佛像、菩萨像和罗汉像等。

二、主要住持和高僧

静安寺历史上有不少高僧，但由于宗派传承不甚明确，加上早先地处海滨人烟稀少，交通和文化都不发达，因此史迹记载甚少。现据有关资料，将主要住持和高僧作一概述。

仲依，南宋时静安寺僧。史载他将静安寺从吴淞江北岸迁到法华镇芦浦沸井浜边，并于寺内筑一土台，命名为“讲经台”，朝夕趺坐，长诵佛典，聚徒讲习。后示寂于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年），安葬于讲经台后，相传当时曾为之建石塔，纪念其功德。

智俨，南宋僧人，居静安寺，有道行。传说有一天，寺僧都去邻村赴会，独他留在庙内。有胥村人来寺请斋，因同舟去，途中见捕虾者，俨赊买一斗，索水啖之，谓渔者曰：‘斋回还汝钱。’至斋家，令席地吃斋而无衬钱。回后，渔人索钱，他身无分文，乃将虾吐还，虾竟活而不死，见者大惊，自此乃呼智俨为虾子和尚，静安寺亦因此称虾子道场。相传他示寂前，曾用蒲草搓绳万余条，悬于廊下，人们竞相施钱，把绳皆串满。后用这笔钱造了一座佛阁。

寿宁，元末僧人，字无为，号一庵。上海人。住持静安寺，曾邀群贤作诗，与之唱和，后编纂成《静安八咏集》，其居室名“绿云洞”，为静安八景之一。

孚庵，清代僧人，雍正年间住持静安寺。曾因寺院田产被侵，诉之官府，得以维护，并勒碑记其事，今碑存寺中。

大海，清代僧人，居静安寺。乾隆年间，寺西一株宋代银杏无故自焚，他拾取残余枝干，雕成十八罗汉及韦驮像，剩余部分用于庄严其他法相。

鹤峰，清末僧人，静安寺住持。光绪六年（公元 1880 年），他发起募捐，修复山门和佛殿。

正生，清末民初僧人，曾任职上海县僧会司。光绪九年至民国四年（1883—1915）住持静安寺。曾增建寺内两房房屋，修葺全寺，又在上海市郊南翔建立静安寺历代祖师墓一座。

常贵，近代僧人，曾任上海佛教公会会长，住南市大王庙，1916 年主持静安寺寺务。1921 年，会同沪绅数人，以寺产积资增建三圣殿，构成今日静安寺的规模。

持松（1894—1972），现代僧人，法名密林，又自号师柴沙门，学密后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剛”。俗姓张，湖北荆门人，幼承庭训，博览群籍，年 17 投荆门铁牛寺出家。后受戒于汉阳归元寺，旋入上海华严大学就读，毕业后任常熟兴福寺住持。其间两次传戒，且续办华严预备学校。1922 年，阅《法轮宝忏》，发心赴日本高野山学习密法，并得真言宗第五十一世阿闍黎位。此后于沪、宁、杭各地及辽宁省讲经传戒，修法灌顶，大弘密教，同时，专心著述。1947 年任静安寺住持，1953 年于寺内建立密宗坛场。他为学习密法，曾先后三次东渡日本，两登高野山，深得真法心传，复兴了我国自五代以来失传千载的密教。他先后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上海市人大代表等，并出访尼泊尔、缅甸、柬埔寨、越南、日本等国，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1972 年圆寂于上海。他一生学通显密，弘宗演教，不余遗力。所著显密著

作《华严教义始末记》、《密教通关》等 76 种,均已行世。

度寰(1905—1988),现代僧人,俗姓陈,安徽省安庆市人。9 岁出家,后入安庆迎江寺佛学院、厦门闽南佛学院求学,又至上海中医学院学医。年 26,于上海圣仙寺免费行医。1952 年任静安寺堂主,随持松弘扬密教。1983 年起任上海佛学院教师。1987 年任静安寺住持。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1988 年因病示寂。世寿 84,戒腊 66。撰有《唯识深密之分别执为我与楞严之真与真恐迷》、《庙产兴学运动复动》等。

应特别提出的,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宁波天童寺住持、近代中国第一个佛教团体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大和尚设佛教总会本部于静安寺。其后寄禅为维护佛教,进京要求袁世凯政府制止各地攘夺寺产,未果,愤而殉教。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达数千人。

太虚法师,寄禅和尚弟子,在寄禅追悼会上,呼吁化悲痛为力量,并提出教制、教产、教理 3 种革命说。1946 年,应邀担任静安寺佛教学学院院长。是年 4 月初八佛诞日,适逢佛教学院开学、新山门落成和阿育王式石柱竣工,太虚以三喜临门,欢喜赞叹,亲自拈香礼佛,参加者数千人,为上海佛教界一大盛事。

三、寺庙建筑

1984 年以来,静安寺经陆续修复,现主要建筑有兜率殿、大雄宝殿、圆通殿及真言宗坛场。

(1) 兜率殿,原名天王殿,正中供奉弥勒菩萨像,袒胸露乳,笑口常开。据说弥勒出生于印度,曾从佛受记(预言)将继承释迦牟尼佛而成佛。但殿内供奉的弥勒,是中国五代时一位名为契此和尚的形象。弥勒背后,是韦驮,状貌英伟,浑身盔甲,左手叉腰,右

手持金刚杵,是佛教中保护神的形象。

(2) 大雄宝殿,新建于寺内西部,正中央供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释迦牟尼成道像,此像迎请自新加坡,翠玉产地是缅甸,高达3.81米,是国内同类最大的玉佛像。佛像双耳垂肩,眉目庄严,结迦趺坐于莲座之上,左手作弥陀印,右手作接地印,显示佛所觉悟的真理,两旁供奉十八罗汉像,姿态各异。在佛教典籍中,原先只讲十六罗汉,他们是佛的弟子,遵照佛的嘱咐,不入涅槃,常住世间,受人供养,广植福田。佛教传到中国后,到宋代才逐渐演变为十八罗汉。

(3) 圆通殿,原为三圣殿,供奉汉白玉观音像和木雕海岛观音像。汉白玉观音像由山东采制的汉白玉石雕凿而成,高2.62米,亦为国内同类造像之最大者,表情慈和,左手捧净瓶,右手执柳枝,身体衣饰简单洗练,白玉观音像后有高达4米的木雕海岛观音。

(4) 密宗坛场,又称真言宗坛场,简称密坛,是密宗僧人修习密法、举行灌顶仪式的场所。此坛初建于1953年,受灌顶者不下数万人。“文革”中坛场被毁,法器荡然无存。1984年开始,重修静安寺,坛场恢复,经各有关方面努力,特别是承日本高野山朋友赠送坛场法器,使坛场颇具规模。现分五个坛,其中大坛中间供奉大日如来像,左右是不动明王像和爱染明王像,圣天坛供如意轮观音像,护摩坛供金刚萨埵像,这三个坛的东西两壁墙上悬挂密宗的18位祖师像。诸天坛供大黑天像和河利帝母像,左右两壁悬挂十二天像;孔雀坛供孔雀明王像,左右两壁悬挂密迹金刚像和密宗各流派血脉图。每个坛中都供设密宗各种法器,富丽堂皇,庄严肃穆,又富有生气。

此外,寺内还有持松法师纪念室、功德堂、厢房、僧寮和碑廊等建筑。

四、经典宝藏和其他文物

静安寺原先有不少经典、文物，“文革”中散失殆尽。恢复开放后，才陆续将散失的文物追回。目前，寺内收藏佛教经典，比较重要的，除持松法师游学日本带回的各种密宗经典和其他佛教著述外，主要有《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影印宋《碇砂版大藏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外，收藏的宝藏、文物有 300 多件。除了前面提到的清光绪九年所立的《重建静安寺记》碑外，还有《云汉昭回之阁》碑、明洪武大钟、《三希堂法帖》、各类佛像、法器、瓷器、名人字画等。

(1) 云汉昭回之阁碑。云汉昭回之阁本在芦子浦，为宋学士钱良臣于孝宗淳熙十年（公元 1183 年）所建，其额为宋光宗赵惇在东宫时亲笔所题。后阁废，碑额遂移至静安寺内。元末民初诗人王逢在《梧溪集》中有《题静安寺云汉昭回之阁》一文，文中存有一诗云：“云汉昭回夜，新登最上头。丛林几度腊，片石百年秋。爽气随天尽，疏云带月流。身今在析木，无暇顾牵手。”

(2) 明洪武大钟。上题有：“洪武二年铸，祝皇太子千秋。王逢铭”字样。此钟重 6000 斤，寺僧觉昙募铸，今仍悬于大雄宝殿内。钟上所刻铭文，已不可辨。但《梧溪集》中仍存有钟铭原文。其辞曰：“金声为物巨曰镛，深彻泉府高达穹。谷传海应流景风，顿息诸苦开群蒙。耳尘空净心观通，六窗具圆佛性同。博哉功施垂无穷！”

(3) 三希堂法帖，是持松法师遗物，为其皈依弟子所赠，拓印精美，国内罕见。

(4) 各类佛像，有木雕、铜铸、石刻、涂金、白瓷、镏金等各种类型的佛像 40 多座。其中著名的有：南北朝时期的石刻佛像，属国

家一级文物；魏晋时期的双佛座铜像，在所有的佛教造像中较为少见；还有明代的铜银丝达摩像、清代的文殊菩萨像以及日本的五彩珐琅白瓷镏金观音像等。

(5) 名人字画，有明代大画家文征明的《独乐园图跋》、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花果轴》、近代著名书画家吴昌硕的《花卉轴》、著名画家张大千的《竹木幽禽图》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他如近代佛教居士王一亭所作的《无量寿佛像》、《观世音菩萨像》和《达摩祖师像》，以及佚名的《鸠摩罗什译经图》、《观音绣像》等，也很有名。

五、下院梵王宫

梵王宫，座落宝山罗店镇，原名玉皇宫，1988年始辟为静安寺下院，是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寺庙。

相传该寺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原为道观，取名玉皇宫。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曾重修观内的真武阁。光绪初年，僧人今涌从太仓广寺来罗店，驻锡玉皇宫。后借其徒念方整修寺宇，同时在真武阁内供奉释迦牟尼佛像，至此，玉皇宫始由僧人管理而成为佛教寺庙，时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今涌圆寂后，由念方继任住持；念方以后，又由其徒起壘（成悲）接任。起壘之后为谛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谛丰离开玉皇宫，赴天台山国清寺学佛听经，寺务即由师弟谛修担任。后又有僧人心光担任当家。建国后，慧宇法师任当家，主持寺务，“文革”中僧众星散，寺院被占用，佛像悉被毁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落实，宝山县宗教局（今宝山区宗教事务处）决定恢复玉皇宫。1988年2月，经有关方面研究，开始对两座大殿进行全面修复，并更名为梵王宫，作为静安寺

下院。目前，梵王宫已修复大雄宝殿、四天王殿和功德堂。根据修复计划，近几年内还将增建念佛堂、安养院、塔院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专程前往视察，并题辞曰：“老有所终，大同理想。报众生恩，法老为上。如奉父母，如敬师长。美哉梵宫，不殊安养。”

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 佛教净业社

高 振 农

1920年前后，居士王与楫、沈辉、关纲之等发起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推选王与楫为林长，以“集在家善信，熏习佛法，力行善举，宏扬佛教，自利利他”为宗旨。嗣以上海乃华洋杂居之处，浊恶更甚于内地，非另辟念佛道场专修净业，不足以化导初机，乃于1922年商定。由沈辉、关纲之等将上海佛教居士林爱文义路林址，改组为上海佛教净业社。王与楫则与朱石僧、李经纬、曾友生、陈佐明等根据佛教“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之义，另行筹组世界佛教居士林。

一、世界佛教居士林

世界佛教居士林于1922年8月正式成立，借海宁路锡金公所作为林址。1926年，闸北新民路国庆路口新林址竣工，于当年佛诞日（农历四月初八日），举行落成典礼，恭请净土宗印光法师为大导师，名誉林董程德全、章太炎主持开幕，海上名僧居士会聚一堂，称盛一时。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日军侵犯上海，林内职员大部离散，活动停顿。未几，林所又毁于炮火，此后岁月不宁，战乱不息，林务活动奄奄一息。建国后，曾略有恢复。

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后，经过多年经营，在发展近代佛教文化

事业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略述如下:

(1) 创办小学校。世界佛教居士林于1927年春,创办第一义务小学一所,以教育启发儿童身心,培养国民道德,授以实用知能,俾得服务社会,循序升学,学杂费及书籍费全部免收。第一年招收男女学生160余人,校长为刘述庭。1930年改名为仁惠小学校,废除不收学杂费和书籍费的规定,但对孤贫无力出费而又品学兼优者,采取免费和半免费的办法。学生200人,设4个班级。校长为范古农。1933年,招收学生270余人,校长为潘人伟。1934年,学生增至331人。仁惠小学在办学过程中,学制、课程均按教育部章程办理,同时施以一定的佛化教育。由于教师教学认真,颇得社会赞赏。

(2) 出版通俗佛学书籍。为扩大弘扬佛法,曾刊印不少通俗佛学书籍。据1925年该林《出版佛典目录》所载,计有《释迦牟尼略传》、《大乘起信论解惑》等36种。1930年起,由杨欣莲任出版处主任,继续刊印《普门品讲义》等通俗佛学书籍多种。1934年出版佛学工具书《新编实用佛学辞典》。所出佛书大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颇得中下层信徒和初学佛者欢迎。

(3) 建立佛学图书馆。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后,即辟有图书室。1933年,新建的佛学图书馆落成。至1936年,除收藏多种藏经外,还藏有各省通志、《丛书集成》、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共计图书4716种,总数超过10000册。平时每天读者数十人,逢星期六、日则多至100余人,对增进佛教徒的佛学知识、提高佛学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4) 创办《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林刊》创办于1923年3月,初为季刊,后为不定期刊,最后又恢复为季刊。1937年4月停刊,前后共刊出43期。

(5) 组织佛学研究会。设研究部，1926年组织“研究唯识学会”，请太虚为导师，王少湖、李荣祥、孙志钧及满志等为指导员，每逢星期日由太虚作佛学讲演。1928年，又组织“佛学研究会”，以研究佛所说法以为修行之津筏为宗旨，指导员有太虚、兴慈、持松、常惺、王少湖、张纯一、聂云台、唐大圆等；研究学科有《大乘起信论》、《解深密经》、《入楞伽经》、《五蕴百法论》、《八识规矩颂贯珠解》、《唯识方便谈》等6种。研究方法分为研习、讨论、开示3个步骤。1931年开设“星期佛学研究会”，由范古农任指导。研究时间为星期日上午，研究经籍有《百法明门论之文学观》、《佛学概论》、《普贤行愿品》、《维摩诘经》等10余种。1928年夏季曾办有“暑期讲学会”，由唐大圆等为教授，学科有《佛学大纲》、《唯识学》、《因明学》等9科，当时有学员80名，学习时间2个月。

(6) 开展讲经活动。1924年设宣讲团，由张性人任主任，以宏扬佛法为宗旨，于每星期六、日晚上在林内讲演佛法，并规定每周外出宣讲一次。1926年，改名为“通俗宣讲团”，由嘿厂法师和尤惜阴、张敬修居士等主讲，1930年由范古农任主任，以宣扬佛法、提倡道德、改良社会、普利群生为宗旨。该团平时在林内演讲，每次听众约200余人。1933年，由朱石僧主持。1934年1至3月，共作通俗讲演24次，有52人次主讲，每次听众多则100余人，少则70余人。此外，世界佛教居士林还经常礼请知名高僧和居士到林内讲经，以弘扬佛法，扩大佛教影响，提高了中下层佛教徒的佛学水平。

世界佛教居士林除办有以上各种事业和开展各项活动外，还办有施医、施棺、放生等各种慈善福利事业。

二、上海佛教净业社

上海佛教净业社原址在爱文义路，后因信众日多，原址不足容纳，有简照南居士及其弟简玉阶将所建南园（今常德路觉园）捐献为佛教净业社社址。时由施省之、关炯之、黄涵之、狄楚青、叶誉虞、简玉阶、王一亭、江味农、聂云台、高鹤年、闻兰亭等40人发起，订定社章，以集合在家善信，宏扬佛法，精修净业为宗旨。

由于南园胜地，社宇宽敞，清净庄严，沪上佛教界常在此举行法会，国内外著名佛教界人士莅沪弘法，也常假此作为欢迎会场。如1927年成立的江浙佛化联合会曾设会址于此，1930年在此举行善导大师1250年远忌纪念会，1935年11月西藏九世班禅在此建立菩提学会，1936年4月上海佛教界在此发起丙子息灾法会，1938年4月上海佛教界在此举行九世班禅追悼会，1940年在此成立班禅纪念堂，1948年能海法师命其弟子清定在此建金刚道场。

佛教净业社经营事业及其成就，略述如下：

(1) 建立佛教图书馆。上海佛教净业社图书馆于1935年10月正式成立，开幕之日参观者达数百人。由于藏书较多，设备比较完善，开放后借阅者络绎不绝。1937年2月，又在觉园内建造新馆，取名“法宝图书馆”，内分法物部和图书部，收藏古代法器、法物及宋、元名画、佛像，还有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其中明正统年间所印的《大藏经》（原藏邳县羊山端山寺）最为珍贵。

(2) 成立净业莲池海会。净业莲池海会，由赵云韶、郑灼臣等人倡议发起，于1946年10月1日成立，开幕之日入会者即逾数百人。该会逢一、七、十五及佛诞日为活动日，会员专心念佛，此外还常举行各种法会。成立后一年，道风日著，缙素归从，会员增至1300余人。1947年10月1日，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开会庆祝，

还出版《净业莲池海会周年纪念特刊》，兴慈法师等十余人撰文作诗以资纪念。

(3) 创办佛教刊物。上海佛教净业社先后创办了几种佛教刊物。其中《净业月刊》于1926年5月创办，1928年10月停刊；《佛教英文杂志》，1931年创刊，1933年停刊。1936年11月出版《佛教新闻报》，社址也设在佛教净业社内。

(4) 成立难民收容所。难民收容所于1927年成立，当时因连年战争，江浙一带难民拥进上海，该社社员吴存甫居士等即商之于静安寺方丈谷云和尚，借得该寺屋宇十余椽，作为收容场所，三、四日间，即收容500余人。后又租屋2所，作为救济妇孺第二收容所。当时闸北火车站附近战火激烈，收容所派员于枪林弹雨中，冒险前往救出多人。

(5) 建立净业教养院。净业教养院成立于1940年5月。先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结束，留下孤儿80余人，无法遣散，于是乃有净业教养院的建立。先由关纲之任院长，关逝世后由闻兰亭继任，实际负责人是副院长赵朴初居士。到1943年止，先后收容流浪儿童240余人。院内实行工作、读书并重的原则，设有竹工、藤工、结网、成衣、养兔、皮鞋、西服等7个工场。院生每日上午上课，下午劳动，一切生活诸如买菜、烧饭、洗衣、整洁、维持秩序等，皆由儿童自理，师长仅处辅导地位。

(6) 举办慈善事业。净业社所办慈善事业主要有施诊给药、施衣、施米、施棺木以及灾民救济等。其中施诊给药，聘有中西医多人，为贫病者诊病。每年冬令施衣，向贫弱者发放棉衣裤，1926年曾发放数百套，还将200套交闸北慈善会代发。每年冬季施米，或开粥厂施粥，或发放米票，1926年冬曾备款5000元，交沪南慈善会代为购米散发，同时补助南京、苏州等地粥厂经费1600元。

(7) 启建盛大法会。净业社经常启建法会，其中有两次盛大法会，影响特大。1936年5月，在净业社内启建规模宏大的丙子息灾法会，由王一亭、太虚、圆瑛、赵朴初等229位佛教界知名人士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法会以挽回人心、潜消劫运为宗旨，由王一亭任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任副理事长，持松、荣增堪布、觉拔堪布、能海、常惺等五位大师主持法事。这次法会讲经三座，修法五坛，会期内参加缙素众多，为上海近代佛教史上空前的一次大法会。

同年11月，净业社又和菩提学会联合启建上海护国息灾法会，它以弘扬净土、劝发悲心、护国息灾为宗旨。法会共7天，于11月22日在净业社起香行课，是日参加的善男信女不下2000余人，28日圆满。整个法会活动曾由华光电台公开播放。

(8) 开展讲经活动。净业社讲经堂经常聘请一些沪上高僧大德讲经说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年至1948年，先后有兴慈、谛闲、静修、缘至、兰溪、清定、能海等法师讲经数十次，对提高居士的佛学水平有一定作用。

上海佛教净业社在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仅次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它所举办的佛教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虽不如世界佛教居士林规模巨大，入社人数也没有居士林多，但由于社址觉园，房屋宽敞，环境优美，亭榭、楼阁、假山、石池等应有尽有，不仅许多盛大法会在此举行，而且国内外知名佛教界人士来沪弘法，均以此作为欢迎场所和下榻之地，特别是在沟通汉藏佛学文化方而起有重大作用。如九世班禅生前在此作为弘法场所和栖息之地，死后在这里举行追悼大会并成立纪念堂。后又在此建立金刚道场，作为专修格鲁派密法的场所。因此，在近代上海佛教发展史上，特别是藏传佛教在上海的弘传史上，可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佛教居士团体。

藏传佛教在上海的流传

高 振 农

藏传佛教(喇嘛教)在上海的流传,首推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马(1883—1937)。1924年3月间,他来到上海讲经,传授释迦牟尼心咒,到会者达1000人,为上海传播藏密的开始。

1934年,九世班禅再次来到上海,邀请王一亭、段祺瑞、屈文六、陈元白、印光等,共同发起筹备组织菩提学会,以弘扬藏传佛教,同时拟成立蒙藏学院,以培养蒙藏青年,沟通汉藏文化。7月8日,菩提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班禅特派驻南京办事处的两位处长罗桑坚赞和李静愚代表到会参加。1935年11月,菩提学会假上海佛教净业社召开成立大会,班禅特派南京办事处朱福南处长代表参加。会上公推班禅为会长,印光为副会长,段祺瑞为理事长,王一亭、屈文六为副理事长,会址设在云南路仁济堂内。

菩提学会成立后,成为班禅在上海传播西藏佛教格鲁派密法的根本道场,并设立译经处,以译印西藏佛教经典为主要任务。在荣增堪布的主持下,先后译出宗喀巴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月宫的《菩萨戒二十颂》、安慧的《唯识论释》、《西藏文典》以及五种密乘典籍,即《大威德金刚一尊略轨》、《咕噜咕勤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加持舌法》。当时曾聘请精通汉语、藏语的程文渊和吴剑君先后担任通译,高观如为书记。后来,菩提学会译经处由亚尔培路亚尔培坊迁至上海龙华寺东首新址。

荣增堪布主持翻译藏文经典，1936年4月，上海佛教界发起丙子息灾法会时，他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法，平时即在菩提学会弘扬格鲁派密法。1937年九世班禅逝世后，在上海觉园佛教净业社成立班禅纪念堂，由他主持。从此以后，他经常在班禅纪念堂传修密法，推动格鲁派密法在上海的流传。

1940年，上海菩提学会发起建造九世班禅的铜像，于是年9月竣工，10月19日在觉园报本堂楼上举行开光大典，并于是日起，举行千灯供十天。

其后在上海传播格鲁派密法的有能海大师。1936年他在上海举行的丙子息灾法会上，宣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在上海佛教界影响甚大。同时还在上海多次设坛，广作佛事。1948年9月，应上海佛教居士黄涵之、李思浩、赵朴初、方子藩等之请，从四川来上海，在班禅纪念堂讲经。讲经结束后，赵朴初等居士又请他在上海设立金刚道场，领导佛徒，修学藏密。他即命弟子清定就佛教净业社进行筹备。该社于1949年5月正式成立，常住僧众六七十人。此后，能海大师即在金刚道场讲经弘法，先讲《比丘戒》，次讲《律海十门》及《菩提道次第论》等，每次听众都有三四百人。又曾在道场内修建大威德五部金刚大灌顶法事，开示灌顶意义，参加灌顶的四众约有数百人。能海大师历年在金刚道场讲经传法，对西藏格鲁派密法在上海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此外，白喇嘛、多杰尊者、安钦、喜饶嘉措等，也曾先后来沪说法、修法、灌顶，弘扬格鲁派密法。

西藏宁玛派密法，在近代上海也有所流传。先是诺那尊者于1933年和1935年两次来沪传法、修法，都设临时法坛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这两次弘法活动，皈依弟子受灌顶者约千余人。其后诺那的弟子们即在上海设立诺那精舍，作为弘传

西藏宁玛派密法的根本道场，除经常修持宁玛派密法外，还办有冬令赈济、施药等慈善事业。

1948年，诺那尊者有弟子莲华正觉(王家齐)在上海创立莲华精舍，作为弘传宁玛派密法的专门道场，当时共同发起的有陈其采等62人。1949年2月，莲华正觉在上海举办“莲华生大士三身心要瑜伽大法会”，曾传阿弥陀金刚法及药师七佛灌顶，并举行护摩，同时在电台播讲《中密史略》。1950年12月，又在上海莲华精舍为新旧弟子传圣救度佛母五本尊灌顶及传金刚长寿佛大灌顶，开讲莲华生大士《无上心要瑜伽广轨》，还拟定期宣讲《大乘菩萨戒》、《密部三昧耶戒》等。他在沪5个月中，还曾在印心精舍讲解《显密不二九乘次第》等。

上海藏传宁玛派密法道场——常乐精舍

常乐精舍，是藏传宁玛派密法道场，1953年根造法师和密显法师创建于上海。

根造法师初在普陀山常乐庵随了尘大师剃度，后移居祇园茅蓬学佛。1948年春，他与密显法师结伴，前往西康参学密法。临行前发大誓愿：“为佛教前途计，为普陀前途计，一心求法，不惜身命。”一路上历经“气候高寒，语言不通，经济不足”等种种困难，在“为法心急”的精神支持下，勇往直前，终于到达目的地。在西康前后近三年，得遇许多名师传授，最后获得无上大法，于1951年春天回到上海。

根造法师和密显法师回到上海后，即在上海弘传密法。初在太平寺用两间房子作为佛堂和卧室，进行修法、传法，同时翻译修持仪轨，撰写有关介绍康藏佛教的文章。1953年，在上海黄陂南路(近淮海中路)创立中国内地唯一的藏传宁玛派密法道场“常乐

精舍”。

宁玛派是我国藏传佛教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派别之一，“宁玛”二字，在藏语中就是古、旧的意思。因为它遵循着西藏前弘期所传的密法，与后弘期形成的其他宗派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区别，故用“宁玛”二字命名。宁玛派的教法，是以大圆满法为根本教法，故传此派密法的，均以大圆满法为其修习的中心。所谓大圆满法，即认为人的心体，本质是纯洁的，是“远离尘垢”的。修行者应把握好心体，听其自然，让“心”随意而往。如能在“空虚明净”中把“心”安于一“境”，即可即身成佛。

根造法师与密显法师于1953年共同于上海创建的常乐精舍，数年之中，在弘传宁玛派密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包括讲经、传法、灌顶、修持、举办讲座，出版《常乐文库》、翻译修持仪轨、交流汉藏文化等等，无一不是成绩辉煌。特别是出版的《常乐文库》一、二、三辑，内容丰富多采，有西藏佛教发展历史的论述，有藏传宁玛派理论和修持方式的介绍，还有常乐精舍成立后弘法经验的总结和学法者的亲身体会等。流通后受到广大初学密法者的欢迎。

在此期间，根造法师为了进一步深造，曾于1954年夏再次赴西康，入昂藏寺继续钻研密法，在甲色卷美多吉仁波且座下，受大圆满心髓灌顶及大圆满教授，成为该派第五十四代传人。又求得大量密教经典，满载而归，回到上海。

“十年动乱”开始，常乐精舍和其他佛寺一样，受到冲击，法器法物全部被毁，从此宁玛派密法在上海渐趋沉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造法师出任上海龙华古寺监院、被推举为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而密显法师则担任上海佛学院副院长。1985年，应美国和香港信众的礼请，根造法师和密显法师前

往传授“大圆满心髓”，弘扬宁玛派教义。1990年，美国大圆满心髓研究中心举行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仪式。从此，宁玛派密法在香港和美国得到了弘传。

上海道教的传入和发展

丁 常 云

上海道教历史悠久。相传三国时上海已有道观钦赐仰殿，乃东吴孙权为其母国太所建；又有崇福道院，乃东吴大将军陆逊为其母所建的一座孝感之庙，俗称圣堂。

唐代建皋阳庙于语儿泾东。次建石仙庙于杨思桥，相传后晋高祖及天福年间(公元 936—944 年)有道人石姓结茅于此，清宣统三年(公元 911 年)里人周彝训重修。宋代以降所建宫观日多。其中，仙鹤观系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 1161 年)处州天真观道士叶太真请建。丹凤楼在上海城墙东北角，始建于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公元 1271 年)，元末毁于兵，明万历年间重修。据《改建丹凤楼记》记载：“道士顾洪鸠工庀材，重为飭治，加缀于楹，洞三面以供瞻眺。”张弼有诗云：“扁舟北来海波渺，丹凤楼高海天下”。在上海城墙拆除以前，这座道观是上海名胜之一，也是道教正一派的主要道观之一。1913 年上海拆城后，丹凤楼也被拆除，现在新开河之南耸立在人民路上的厚德大楼，就是丹凤楼旧址，旁边一条路就叫丹凤路。

元初，多有隐居海滨的。如杨维桢，遁入道门后，曾有《丹凤楼诗》云：“十二湘帘百尺梯，飞飞丹凤与天齐。天垂紫盖东皇近，地接银河北斗低。笑靥秋空戎马阵，神灯夜烛海鸡啼。嫦娥昨夜瑶池筵，笑指蓬莱西又西”。丹凤楼上原有宋陈珩手书匾额和元赵孟頫所写的记事碑与杨维桢的诗，时称三绝。

赵孟頫信仰道家，所书《道德经》流传至今。其兄赵孟頫，曾为文天祥的军事幕府，失败之后，隐身入道，经常留连于华亭一带，为道教宫观写了不少碑额。如松江岳庙、杨思崇福道院、上海丹凤楼等都留有他的手迹。这些文人，从隐居到入道，然后到传道，对道教的兴盛起到促进作用。

明代，倭寇骚扰海疆杀人越货，上海人民多遭劫掠，决意筑城御倭。城墙建成后，在小东门外重修天后宫，以祈求神灵保佑。万历年间城墙箭台废，改建四庙，其一就是著有“大千胜境”之称的大境关帝庙，在西门箭台，供关帝，并有月下祠。崇祯七年重修，清雍乾间复修。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建三层楼，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总督陶澍题“旷观”两字额，十六年于东首建石坊，署总督陈夔龙题“大千胜境”四字。上海拆城墙改建马路，大境庙安然无恙，高高的三层楼房至今仍屹立在旧城基上，由此，也保存了上海城的最后一段十几公尺长的城墙和一座箭台，成为上海一处景观。1982年，大境庙和古城墙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中叶以后，清廷重佛抑道，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衰微，乃转向民间发展。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有道观二、三十座。开埠后，江浙一带道士随之来沪，1869年苏州道士曹瑞长首先领得上海县道会司颁发的“外方流道执照稽查”，在上海建立道观。此后上海道教发展迅速，道观纷纷建立，其中不少是外地道观的下院。解放前夕上海共有道观236座，道士、道姑3716人。

中国道教自元朝起，主要分正一和全真两大派，正一派重视符箓方术和斋醮仪式，道士可以不住宫观而有家室；全真派重视内丹修炼，道士出家茹素。上海两派都有，但正一派道士占80%以上。

上海正一派道士，从传播地域和师承关系看，可分南北两个系统，在上海南部松江、青浦、南汇、川沙一带的称南派，属松江系统，

受江西龙虎山影响较多；在上海北部嘉定、宝山一带的称北派，属苏州系统，受江苏茅山影响。从对社会影响说，南派大于北派。两派在语音、音乐和斋醮仪式方面都有差别，但由于互相融合，亦有许多共同之处，市区道士从籍贯及斋醮仪式特点，可分成 11 个“帮”，即本地帮、宁帮、苏帮、南通帮、江阴帮、湖州帮、绍兴帮、常熟帮、金坛帮、无锡帮、广东帮。本地帮又分本帮和西帮，从曹家渡以西到七宝一带是西帮，又称南翔帮，东帮是上海帮。各帮派中本地帮势力最大，其次为锡帮、宁帮、苏帮等，各帮各有特色，各有活动地盘。外地道士以锡帮影响较大，民国初年，无锡道士便来上海进行道教活动，七浦路成立无锡同乡会后，来沪的无锡道士逐渐增多，他们立足上海，发展道院。如延德道院（位于新疆路）、悟通道院（在恒丰路）、德真道院（在开封路）、云灵道院（在浙江北路）、紫微道院（在开封路）等，几乎每区都有锡帮道士所设道院，主要以做经忏为主。除观内道士外，日常客师有 70 多人，并于开封路畅苑茶楼组成仁义社，专门联系任务，多在盐铁业中打醮。其次，宁帮在解放战争时期最为兴盛，主要做课台道场；苏帮常为青楼女子打醮，南通帮主要为苏北人做道场，绍兴帮道场以唱为主。帮派之间为争地盘和接经忏往往有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1917 年各帮派自发地组成近代上海道教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组织——道教维持会，由各帮派推选代表参加，章程规定：“各帮派内部事务不得互相干涉，在相互团结的基础上发展上海道教。”但维持会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直到解放后，帮派矛盾才逐步缓解。目前，主持教务的道士绝大多数是正一派，已开放的宫观和道学院培养的青年道士，都按正一派仪规举行宗教活动。

全真派传入上海，约于元代。据《松江府志》载，娄县长春道院，建于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 1306 年）。道院名为“长春”，当是

纪念全真龙门教祖“长春演道主教真人”邱处机之意。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杨载撰《长春道院记》称:“长春道院前殿祠事老子,其外两庀,其后为堂,高下降杀,与殿相承。院之东北隅,曲径深窗,有池水眼竹之胜。道院由郑君主持。郑君,钱塘人,父为将军,戍守广陵。郑君原袭父职,但自幼学道,响往长春真人之练气养真之道,于是遁隐永嘉,师受道要,累年居于密室。父母双亡之后,远游至松江,见松江无为全真教者,遂有志结庵,买地二亩,筑室四间,度弟子朱道本等。后扩充为七亩,创建为道院。”此后500年间,不仅长春道院的兴废难以查考,有关全真派在上海的活动情况,亦载籍不详。

上海开埠以后,杭州显真观全真龙门第二十代宗师王明真来上海,在地方绅董和众善信帮助下,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在北门外新桥朝阳楼(今延安东路浙江路之间)创建了一所较小的显真道院,系杭州显真观分院,以接待天下云朋霞友,为上海首创了近代全真道院。未几,王明真羽化,其弟子徐至成遵奉师训,朝夕焚修,经过十余年的苦志修行,造次颠沛,发愿修复庙宇宫观,遂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将显真观道院翻建成一所较为完整的道教宫观,并易名为雷祖殿。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适逢拓修马路,全真道士徐至成在仁济善堂绅董们的资助下,于西门外万生桥西南首(今西林后路100弄8号)购得土地三亩余,迁建雷祖殿。后改为海上白云观,成为近代上海著名的全真道观。

随着上海道教的迅速发展,各种道教组织应运而生。1912年9月,江西龙虎山道教六十二代教主张晓初,应尚资堂李桂白邀请来沪,在豫园萃秀堂召集上海各正一庙观以及苏州、无锡、常熟、松江、嘉定、镇江、川沙等地的部分正一庙观的代表举行了“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发起人会议”,提出“昌明道教,以维世道;以道为体,以法

为用”的组织宗旨，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本部上海总机关部”。但始终没有能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总会开展活动。同年，又成立了“上海正一道教公会”，代理中华道教总会本部上海总机关部的事务。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道教总会”、“中华道教会”、“上海市道教会”等。

抗战爆发后，上海道教的宗教活动日趋萧条，时值自然灾害及霍乱猖獗，上海道教界本着济世渡人的宗旨，由桐柏宫、白云观、清虚观、黄大仙观、紫阳宫等道观联合成立了“上海道教时疫医院义务诊疗所”，院址设在白云观内，聘请国内医科大学毕业之正式医师 6 人，护士 10 余人，备有病床 100 余张，日夜义务出诊施药。

解放后，成立了上海道教全真、正一两派联合的地方性组织——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上海道教也随着国家各项建设和改造事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全真、正一两派逐渐消除门户之见，出现了彼此尊重、相互团结的局面。上海市道教协会(筹)成立后，在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文化，团结广大道教徒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现白云观、城隍庙、三元宫、钦赐仰殿(在浦东)、圣堂(在上海县三林乡)、东岳观(在南汇县郊)、龙王庙(在川沙县)等道教宫观，正常开展宗教活动。同时，为了抢救道教文化遗产，上海道协邀请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对白云观的明代铜像作了修复，举办道教知识讲座，邀请对道教有研究的学者、居士和道长发表演讲，还对丰富多彩的道教斋醮仪式和宗教音乐作了录像录音整理，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经过多年筹备，1985 年召开了上海道教第一届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上海市道教协会。1986 年 3 月又创办了上海道学班，1993 年 7 月更名为上海道学院，如今二届道学生已经毕业，共培养了 42 名具有中等专业文化水平又能主持一般宗教仪范活动和管

理道教教务的爱国爱教青年道士，为各道观和道教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1988年，又成立了道协文化研究室，创办了《上海道教》刊物，为弘扬祖国传统的道教文化做了大量工作。

著名道教学者陈撷宁

南 江 子

陈撷宁先生(1880—1969)是近代著名的道教学者,仙学大师、道教杰出领袖。原名志祥、元善,字子修,道号圆顿子,安徽怀宁人。父陈镜波为清朝举人,在家设馆讲学,叔祖是当地名医。

陈撷宁先生毕生从事道家思想和道教研究,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为宏扬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研究中医学理论,在道教界、医学界有较广泛影响。他品格高尚,爱国爱民,开创的静功疗法,使千万病人解除病苦,恢复健康,深可敬仰。

一、坎坷的经历

陈撷宁先生幼承家学,早读四书五经,稍长习诗文,兼攻八股、试帖,聪颖好学,儒学功底相当厚实。曾投考秀才,因受新思潮影响,语涉朝政,未能中式。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陈先生在家庭的督导下,终于考中秀才。但由于勤奋苦读,加之自幼体质单薄,患上痲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医生断言活不过当年,因此父亲不敢再逼他读书,便让他跟叔祖学中医。他开始拿起医书阅览,注意学习叔祖怎样给病人诊脉开方,同时燃起一线之光,希望能找到治疗自身疾病的良方。一次,他偶然接触到两本古书——《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虽似懂非懂,但领悟到是一种玄妙的修养法,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按法静坐。起初没有什么效验,但也无不良反应,就坚持

做下去,时日稍久,逐渐感到思想安定,心情舒适,身体轻松,不但活过当年,而且活得很好,恢复了健康。

20世纪初,各省开始兴办新式学校,安徽设立法政学堂,专门培养县级法政人才,先生在25岁时,考入该校。无奈入学两年,旧病复发,只得辍学回家。这时原来学习的修养法已不敷用,乃下决心外出寻访高士异人,学习研究能彻底治愈痼疾的方法。第二年,先后拜访月霞、谛闲、寄禅、冶开等和尚,但感佛法深奥,然终于病无裨。又复遍游道教名山,先后参访苏州穹窿山、句容茅山、湖北武当山、山东崂山、安徽涂山和浙江金盖山等,会见了一些当家道士,拜受了不少口诀,但治病延年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于是专心致志地读书,把浩如烟海的《道藏》从头至尾诵读一遍。1912年到上海,居住姐夫家,整整用了三年时间,专习海上白云观所藏明《正统道藏》全书,并写出《道藏目录详注》四卷。此后,又去杭州海潮寺华严大学,学习佛经,以便有所比较,择善而从。

1916年,先生与上海尚贤妇孺医院妇产科医生吴彝珠结为伉俪。吴是留美学生,但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擅书法、遍诗律,且素好仙学。陈撷宁与吴彝珠既是患难与共的夫妻,又是志同道合的道侣,虽没有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却十分和谐融洽。吴彝珠在上海民国路开设诊所,救死扶伤,陈撷宁则专心研究地元丹法,搜集了200多种地元丹经,经过四年的准备,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地元烧炼试验。后因两次战争(1924年江浙齐卢之战及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日战争),药材散失,但仍坚持内丹习炼,静功养生。

1933年7月,先生在上海创办《扬善半月刊》,以发扬中国学术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宗旨,溶儒、释、道为一体,同时辟《答读者问》专栏,解答疑难,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至1936年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道家学术专刊。一时养真之士纷纷来函,叩问道要,海内

外气功爱好者也撰稿协助，谈论心得体会，交流练功经验。于是，有人倡议开办仙学院，请陈先生讲课，得到同好赞成，上海仙学院遂于1937年3月正式开学，陈先生任教授，同年8月，日军侵沪，《扬善半月刊》被迫停刊，前后共发行99期。1939年3月，经弟子张竹铭医师等赞助，陈先生又创办《仙学月报》，共发行32期，因形势险恶，至1941年停刊，上海仙学院同时解散。1945年，夫人吴彝珠去世，从此陈先生孑然一身，居处无定，转徙于亲友、学生之家，但不放弃研究和著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生坎坷和屡遭战乱的陈撄宁先生迎来了企盼已久的光明。1953年应杭州著名针灸医生胡海牙之邀，赴杭州讲授《黄帝内经素问》及《灵枢经》，并研究经络学理。旋又应聘为杭州文史馆馆员，并在杭州屏风山疗养院授静功疗法。1956年，沈阳太清宫方丈岳崇岱等倡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陈先生被邀请为筹备委员之一，到北京与诸名山宫观代表磋商成立中国道教协事宜。第二年4月，第一届全国道教徒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先生被推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58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11月，在第二届全国道教徒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会长。1960年着手整理《道藏》，撰就《道藏书目分类》。1961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研究室，先生组织并领导研究室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编写了《中国道教史纲》、《道教起源》、《教理概论》等著述。1962年，创办不定期发行的学术性刊物《道协会刊》，至1966年仅出4期，即停刊。1980年复刊。1987年易名为《中国道教》，每季公开发行。

60年代中陈先生旧病复发，1969年5月25日，在北京仙逝，享年89岁。1989年5月先生逝世20周年，道教界在北京集会纪念，并遵照周总理的遗嘱，将先生仙蜕灵灰移八宝山革命公墓

安放。

二、思想和著述

陈撷宁先生毕生从事治学与著述，留下很多文稿和著作，除部分尚未发表的文稿及医案在十年动乱中损失外，现存者约近 60 万言，主要有《黄庭经讲义》、《道教起源》、《静功疗养法》、《仙与三教之异同》、《论白虎首经》、《女功正法》、《口诀钩玄录》等。他一生研究所得，归于“仙”、“道”两方面，现略述如下。

1. 道学思想

陈撷宁论“道”，有广义之道和狭义之道，广义之道为道家之道，狭义之道，为道教之道。有时两者不分，混而用之。

所谓广义之道即修道学仙。所修何道？陈撷宁说，老子为道家之祖，凡讲道无有过于老子者，一部《道德经》中，有讲天道的，有讲人道的，有讲王道的，至其最上一层，乃是讲道之本体。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根源，无名无形，绝对不二，圆满普遍，万古常存。广义之道，既是无所不包的精神实体，又是万事万物所由出生的根源。陈撷宁说：“天无道则不运，国无道则不治，人无道则不立，万物无道则不生，道岂可须臾离乎？”还说欲辨儒、释、道三教，须先明一道，这个道就是自轩辕黄帝而后，经过许多朝代，直到周朝李老子的道家一派，用于外可以齐家治国，用于内可以修身养性。

所谓狭义之道，陈撷宁认为，寇谦之之科诫符箓，张天师之正一派五雷法，邱长春之全真派经忏斋醮祈祷等类，都是狭义之道，即道教之道。狭义的道虽与广义的道有别，但它源出古代之道家，只是对黄老概念有不同理解。1962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

上,陈撷宁又将狭义的道区分为形式和精神两类。他认为“即如出家与在家,蓄发与剪发,吃素与吃荤,道装与便装,以及斋醮祈祷、诵经礼忏等各种科仪,这些都是道教的形式;又如气功疗病、动功健身、静功养性、药食延龄,其他高深的如内丹、外丹、老庄哲学等,这些都是道教的学术,而道教精神也就寄托在这些学术上面。形式随着时代的进化,不敢保证它永久不变,学术因为群众所需要,非但能够长远流传,而且将来还可以逐渐发展。”不论他对于形式和精神的分析是否恰当,但陈撷宁认为道教能够长远流传,而且将来还可以逐渐发展,无疑是有远见的。

2. 仙学思想

陈撷宁青年时代即淡于仕途,后潜心学道,经过长期修炼,精通道教内外丹经及丹法,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仙学”一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所说的仙学,就是古代神仙家养生学,其目的—为延年益龄,二为企求长生。他认为,仙学乃道教修炼方术之一种,是独立的专门学术。这是他研究道教文化的一大心得,不但自己研究仙学,而且还积极宣传仙学。他从当时的社会出发,认为儒家伦常道德仅能安内,而不能攘外,佛教学说不适宜衰弱之中国,《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鹭文》等劝善书,不过制造出一种极驯良极柔弱之生灵。仙学则可以补救人生之缺憾,其能力高于其他之上,所以“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在这种避世思想指导下,陈撷宁向社会公开提出仙学,并积极倡导仙学,他所创立的《仙道月报》和《扬善半月刊》,就以宣传仙学为宗旨。

陈撷宁的仙学首重长生,认为长生之说,自古有之,只是“理论虽著于篇章,而法则不详于记载”(《与朱昌亚医师论仙学书》)。他根据历代丹法和自身体验,提出“欲学长生,须要不劳心,不劳力,

无嗜好”，“初步工夫，口诀很简单，只有八个字，‘神气合一，动静自然’。”（《答复北平某君来函》）对性与命的关系，他在《辨命歌按》中称：“初学之人，性与命孰重？答曰：“命为重。”“性无命则不立，离命则不足以见性，有命而性自在其中矣。故曰命为重也。”他主张“仙道不为陋习所拘，女子亦同样易修实证。”（《江苏宝应陈悟玄女士第二次来函并问答》）他还专门编述了《孙不二女丹诗注》，以明女子内修功夫与男子不同。全国解放以后陈撷宁在杭州职工疗养院辅导静功疗养法，先后整理发表了《神经衰弱静功疗养法问答》和《静功总说》，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内修静养的道理，对于道家气功法的推广和普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海上白云观今昔

丁 常 云

海上白云观，是上海市区较为著名的道教宫观，它座落在上海老城区（今南市区西林后路100弄8号）境内，现为上海市道教协会会址。它又是近代上海全真派较有影响的一座道观，道教“十方丛林”之一，在广大道教徒和信众心目中，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其影响更是蜚声海内外。

一、白云观的前身——雷祖殿

上海开埠以后，五方杂处，市场繁荣，南来北往的道士很多。当时上海道士均为正一派，无全真道观，杭州显真观龙门第二十代宗师王明真来到上海，有志结庐，在地方绅董和众善信帮助下，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在北门外新桥朝阳楼（现在延安东路与浙江路之间）创建了一所较小的显真道院，系杭州显真观分院，以接待天下云朋霞友，为上海创立了近代全真道院。未几，王明真羽化，其弟子徐至成遵师训，朝夕焚修，十余年苦志经营，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4年），将显真道院翻建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道教宫观，并改名为雷祖殿。是为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所全真道观。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拓修马路，雷祖殿址属拆迁范围，徐至成运用宗教影响和社会关系，多方活动，在仁济善堂绅董的资助下，于西门外万生桥西南首（现西林后路地段）购得土地三亩余，将雷祖殿迁建于此。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又扩建了斗姆殿、

茅山殿、客堂和斋堂等，并初步建立了全真清规，规定雷祖殿为“十方丛林”，不准收徒。同年又以仁济善堂捐助名义，购得殿东贴邻慈云庵土地二亩余和房屋两间（后改为邱祖殿和客堂）。同时，在西门外日晖港潘家木桥南首购得土地十余亩，为十方道徒羽化莹地。至此，雷祖殿不仅成为一所较大的全真道观，而且因十方道徒来此挂单，扩大了影响，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白云观的建制和沿革

光绪十四年（公元 1888 年），徐至成进京，在清廷内官德驹和京官徐松阁（徐氏宗族）以及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峒帮助下，以改雷祖殿为“海上白云观”，作为北京白云观下院的条件，请得明版《正统道藏》8000 余卷。《道藏》由海路运送抵沪之日，上海地方官吏和绅董均集中东门外码头恭迎，道藏上覆盖黄缎，以马车送至白云观藏经阁供奉，留镇山门。徐至成即担任海上白云观第一任监院。

徐至成（公元 1834—1890），字海卿，上海嘉定县人，出身仕宦门庭，乃嘉定徐姓状元后裔，自幼聪明，秉性朴质，读书过目成诵，博览玄门要典，深得其旨，遂弃家入道，出游吴越间。至海上遇龙门第二十代律师王明真，虔请皈依，命名至成，自此修持益加诚笃。光绪七年（公元 1881），闻龙门第十九代方丈高仁峒说戒于京师白云观，便不远数千里驰往受初真、中极、天仙三大戒，加法持行，无遗妙德。方丈亲付衣钵，授经典、丹诀而归，其道益进。海上白云观在徐至成的苦心经营下，于光绪十九年（公元 1893 年）扩建了三清殿、吕祖殿、邱祖殿，使白云观成为前门在方斜路，后门在肇周路，占地 14 亩余的全真道观。

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徐至成羽化，原先准备就绪的“放

戒”活动未能进行。为了开展正常宗教活动,改变内部混乱局面,第二任监院黄至纯主持示立 15 条规范,刻成石碑,稳定了局面。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上海海关查获企图盗运出国的 7 尊明代所铸镏金铜像,经当时上海商会会长、白云观护法陈润夫以既系道教神像当由道观保管为由,请准移送白云观三清殿供奉。其中 5 尊天将为站相,高 177 公分,云带飘逸,法相威严,铸工精细;另两尊为张天师、许天师像,亦为站相,高 175 公分,仪态端庄。这 7 尊神像,至今供奉于白云观中。

1898 年至 1902 年间,第四任监院王明玉和第五任监院王理传相继主持观务,先后募建教苦殿、甲子殿,修建三清殿、吕祖殿等。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嗣来沪兼领第六任监院,由于不常住观,遂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由北京白云观委派知名执事赵秋水(至中)前来。赵在沪期间,正是清末混乱年代,白云观屡遭军阀驻军干扰,全赖赵秋水一力周旋得免于难。1915 年,赵秋水羽化以后,白云观日趋萧条。八一三事变后,邱祖殿、客厅等全部被日军烧毁,使已趋衰落的白云观雪上加霜,虽另在公共租界三马路慈和里设立分院,但仍处于极大困难之中。

建国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白云观得到保护和维修,逐步恢复道教丛林的面貌。第二十一任监院杨祥富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为使现藏的明版《正统道藏》,得到科学保存,改由上海图书馆贮藏管理。1956 年 7 月,由白云观监院杨祥富、大境关帝庙住持李锡庚、金母宫坤道院监院苏宗赋、保安司徒庙住持张源馄等发起,在上海白云观成立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推选代表参加了 1957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大会。“文革”以后,经上海市政府和各有关方面

帮助,白云观重新修复,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1985年4月,正式成立了上海市道教协会,庙观工作逐步正常。

三、白云观的主要殿堂

海上白云观经第一代监院徐至成十余年的惨淡经营和苦志修行,成为东南地区颇具威望的全真道观。其布局分前殿、后殿两部分,前殿的中殿为雷祖殿、藏经阁,东殿为客堂、邱祖殿,西殿为斋堂、斗姆殿等。自前殿西侧门转入,西偏进为后殿,中为三清大殿,南为甲子殿,北为西御殿,东为救苦殿,西为吕祖殿,以及玉皇阁、钟鼓亭等。但很多殿堂今已不复存在,现将原结构布局介绍如下。

牌楼,在山门外,又称魁星阁,建于光绪年间,正面匾额书“海上白云观”。1987年3月重建,恢复旧观。

雷祖殿,建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是白云观较早建筑之一。殿内供奉真武大帝,为明代铜像。真武大帝为道教护卫神,和青龙、白虎、朱雀合称四方神。传说黄帝时,玄武托胎净乐国善胜皇后,出生于母左胁,长而勇猛,不统王位,得玉清圣祖紫元君传授无极上道,命其赴太和山修炼,后太和山因此更名为武当山,取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意。宋真宗因避其祖赵玄朗讳,改玄武为真武,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尊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

藏经阁,专为存放明版《正统道藏》所建。

邱祖殿,建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系全真龙门派后裔奉祀邱真人的祖堂,正中为邱长春真人塑像,周围有从北京白云观复制的壁画,描绘了长春真人西游大雪山事迹。邱祖讳处机,字道密,号长春子,山东登州栖霞人,年十九在宁海昆仑山修道,后师事王重阳,入磻溪六年,龙门七载,隐居修道,功成道备,名闻于世。

公元 1219 年当宋、金末世，即受成吉思汗诏请，偕弟子 18 人西行至大雪山。成吉思汗问治国之方，答曰：“欲得天下者必止杀，民心所向，治天下之根本矣，欲修身必清心寡欲。”成吉思汗深器重之。元统一中国后，赐号“神仙”，敕金符虎印，爵大宗师，统领天下道教事，成为道教龙门派创始人。

斗姆殿，建于光绪十二年（公元 1886 年），殿内供奉女神斗姆，说是北斗众星之母。《玉清无上灵宝自然北斗本生真经》（《道藏》第 29 册）载：“斗姆原为龙汉年间周御王之妃，名紫光夫人。生九子，初生二子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后生七子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七星。”《太上玄灵斗姆大圣元君本命延生心经》（《道藏》第 341 册）载：“斗姆为北斗众星之母，斗为之魄，水为之精。”号“中天梵炁斗姆元君”，其像三目四首，左右各出四臂。

三清殿，为观内中心主殿，供奉道教最高尊神，中为玉清圣境元始天尊，左为上清真境灵宝天尊，右为太清仙境道德天尊。道教谓三清是“道”的化身，道教宇宙观的体现。

元始天尊手捧圆宝珠，象征混沌之前，道气未显之第一大世纪。道经称：元始居于三天界最高之玉清仙境，为三清之首，生于太元之先，故称“元始”。天地初开，便以秘道授诸仙，谓之开劫度人。《太上全真晚坛功课经》曰：“元始天尊在大罗天上，玉京山中，为诸天仙众，说此升天得道真经……十方得道神仙，皆从此经修行而通微奥。”《道藏华经历代纲目》载：“天书云篆，则元始天尊开其先；宝笈琼章，则道君老君继其后。”《真灵位业图》中第一中位便为元始天尊。

灵宝天尊手捧太极图，象征混沌初开、阴阳分别的第二大世纪。位在道教三清尊神之第二，据说由“亦混太无元”（宇宙未形成前从混沌状态中产生的三元气之一）所化生，居于天界之上清真

境，即三天中之“禹余天”，号灵宝君。《太上早坛功课经上清诰》曰：“祖劫化生，……而分五劫，天经地纬，造化之宗，枢阴执阳，雷霆之祖。”

道德天尊手持阴阳宝扇，象征天地之形成，万物生长的第三大世纪。居道教三清神之第三，据说由“冥寂玄通元”（宇宙形成前从混沌状态中产生的三元气之一）所化生，居天界之太清仙境，即三天中之“大赤天”，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并称为三洞教主。《太上全真早坛功课经太清诰》曰：“随方设教，历劫度人，为皇者师，帝者师，王者师，假名易号，立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隐圣显凡，……化行古今，著《道德》五千言。”

甲子殿，在观内南面，建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殿内供奉六十元辰像，为信徒向本命元辰之神祈福的殿堂。道教信奉的六十位星宿神，每位神名都是用天干和地支循环相配而得，干支顺序相配，由甲子起至癸亥止，满六十年为一周，故名六十甲子。

四御殿，在观内北面，供奉天上神界的四位大帝，中为昊天金阙玉皇上帝神位，左右为万星教主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官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地祇、南极长生大帝。道教乃多神教，梁武帝时著名的道教学者陶宏景著《真灵位业图》，把道教的神分为上界、中界、下界、四御，在三清之下，统辖神界天庭之事。玉皇执掌天上枢机总政，有如人间之皇帝，四御中勾陈上官天皇大帝协助玉帝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统御诸星，并主持人间兵革之事；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帝执掌天经地纬和日月星辰四时气候的运行；后土地祇为协助玉帝执掌阴阳生育、万物之美与山河之秀的女神；南极长生大帝，为协助玉皇统理诸天，宰制十极之中的万物生化之神，又是长寿的象征。

吕祖殿，在观内东面，建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殿内供

奉道教北五祖之一的吕纯阳祖师。吕祖，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为东平永乐镇人，唐文宗时进士，后游终南山遇钟离权度化成仙。《太上早坛功课经吕祖诰》曰：“玉清内相金阙选仙，化生为三教之师……，黄粱梦觉，忘世上之功名……，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狱道、畜生道、饿鬼道）有感必敷，无求不应，黄鹤楼头留胜迹，玉清殿内炼丹砂。”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钟鼓亭，在观内东北角，建于光绪年间，亭内悬有明代铜钟一座，重200余斤。每日凌晨开静之前，必先击钟数次。

玉皇殿，奉祀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身着九章法服，头戴十二行珠冠冕旒。宋徽宗皇帝尊玉皇大帝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是天上最高尊神，百神之君，统御主宰三界十方。道教以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为玉皇出巡之日，巡视考察众生为善作恶及祸福等，道教宫观在这一天要举行道场迎接玉帝，当天晚上子时举行接驾仪式，十分庄严隆重。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诞辰，道观要举行盛大祝寿道场，诵经礼忏，祝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门鼎盛，香火绵延，香火芬芳，道法兴隆。

四、今日的白云观

上海白云观，自徐至成创建以来，饱经风霜，历尽沧桑，百余年间，屡遭变故，原占地14亩余、规模宏伟之全真道院，现仅占地975平方米，且改建为双层钢筋水泥结构。虽然如此，但白云观在众多上海市民及广大道徒心目中，仍具有崇高地位。每逢神仙圣诞和每月朔望之期，观内香烟缭绕，进香拜神之信众川流不息，达数千人之多。

现白云观为上下两层，楼下前为灵官殿，后为玉皇殿，其后还

有道学班，左右两侧皆为客堂；楼上前为真武殿，后为老君堂，左为道教协会办公室，右为道教协会文化研究室。

灵官殿，进白云观观门前殿，可见灵官手执金鞭，左手掐诀，这就是道教所供奉的护法神。据道书记载，灵官姓王名善，宋徽宗（公元1101—1125年）时人，为某州城隍，西蜀萨守坚真人云游至此，以迅雷焚其庙，王诉于玉帝，玉帝赐以玉斧，令其相随真人伺察，如有触犯天律，得便宜行事。善随察十二载，萨真人从未触犯天律，善乃释怨皈依为弟子，守符法，愿充部下灵官，奉行法旨。因其刚直无私，被玉帝封为“都天纠察豁落先天主将”。白云观之灵官像，右手执金鞭，左手掐灵官诀，身披金甲，足踏风火轮，神武伫立，栩栩如生。与灵官背向而立者为赵公明元帅，是道教所信奉之财神，又为道教正一派守护神。相传赵公明，秦时得道于终南山，张道陵修炼仙丹，奏请守护神，玉皇遣赵公明授为“正一玄坛元帅”。据传能驱雷役电，除瘟禳灾，买卖求财，可以获利。其像黑而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法象威严。前殿两侧配有马胜，康应、温琼、岳飞四大元帅神像，手中各执法物，神态端庄。

玉皇殿，供奉教道“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殿内两面分别供奉张陵、许逊两位天师。

老君堂，原为藏经阁，专为供奉明版《正统道藏》所建。堂内供奉唐吴道子所绘石刻老君画像拓片（石刻画像保存于苏州玄庙观），像上有颜真卿所书玄宗皇帝御赞：“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相，紫炁浮天。含光默契，永劫绵绵。东训兄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则，累圣攸传。万教之主，先天地焉。函谷关右，传经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真武殿，供奉道教尊神真武大帝，系明代铜像。两侧分别供奉南极长生大帝、北极玄天上帝两尊神。四周配有六十元辰像，为信

徒向本命元辰之神祈福之殿堂。尤以南极长生大帝(俗称寿星)信众甚多。

1985年4月上海市道教协会在白云观成立,其宗旨为:“团结广大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道教研究工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6年3月,该会创办道学班,以培养和造就继承道教事业及管理道教宫观的接班人。1989年7月,首届学员毕业,在白云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1987年12月上海道教协会文化研究室成立,收集、整理和出版道教经典和有关文献,举办道教知识讲座,组成道教音乐队,出版《上海道教》刊物。因此,如今的白云观,不仅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满足了广大信众的需要,而且还成了弘扬道教文化和培养道教人才的场所。并以其独特的风貌吸引着众多的国际友人和港、台道教界人士。

近年香港道教联合会副主席赵镇东一行首次访问了上海白云观。接着,美国驻沪总领事金大友、法国著名作家萧日龙、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柯文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等,先后参访了白云观。1989年8月,台湾道教代表团一行14人访问了上海白云观,促进了两岸道教界的交流。美国亚里桑那州中孚道院住持凯蒂博士一行3人,参访了上海白云观后,还要求上海白云观与中孚道院结为兄弟观。此外,上海白云观还接待了日本、苏联、加拿大、法国、西德、印尼、朝鲜等国外宾和海外侨胞,以及大陆各地道教宫观及组团的参访,白云观在市道教协会领导下,通过这些活动,为安定团结,弘扬道教,促进祖国统一,开展国际友好交往,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上海的城隍和城隍庙

陈 耀 庭

上海道教宫观，海内外最著盛名的，首推上海城隍庙。无论国内群众、海外游子，甚至几十年前来过上海的国际友人，都熟知城隍庙神像庄严，香火旺盛，建筑恢宏，市廛繁兴，终日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为世人所留连忘返。

城隍神俗称“城隍老爷”，历来受民间敬畏。在中国宗教历史上，祭祀城隍的记载较早的有《北齐书·慕容俨传》，比之东皇太一、太上老君等，远为后出。但由于唐宋两代立庙奉祀，列入官典，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更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城隍庙，按阳司官署正衙，制定城隍等级和庙制高广，“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于是崇拜城隍之风普遍流行，无城不供奉。

一、上海城隍的由来

上海起初仅是华亭县的海口，宋末设立市舶提举司，始有上海镇。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设置上海县。因此，元以前上海并没有城隍。建县以后的城隍，起初也没有自己的庙，而是一直“借居”在淡井庙里。淡井庙原在今永嘉路上，因庙有并水味淡而不咸得名，建子宋，为松江府华亭县城隍神庙。直到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才由当时的知县张守约将建于今址的金山神庙改建为上海的城隍庙，从此上海城隍才有专祀之处。

金山神庙即金山庙，又名霍光行祠。传是三国时东吴末帝孙皓所建，祀汉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霍光事汉武帝 20 余年，受遗诏辅昭帝。据《吴越备史》称，吴王孙皓疾笃，忽有附小黄门者云：国王封界华亭谷东南，有咸塘风潮为害，非人力能防。臣汉霍光也，部党有力。立庙于咸塘，臣当统部属镇之。因立为金山神主以祠霍光。明代金山神庙改为上海的城隍庙后，霍光神像仍在庙中奉祀。

上海的城隍神为秦裕伯，字景容，号蓉卿，宋龙图阁学士秦少游七世孙，大约生于公元 1295 年，死于 1373 年。元至正间（公元 1341—1368）进士。明兴，太祖知其贤明，命中书省檄请，秦裕伯拒不应召，其弟秦亨伯代笔上书，有“承元帝爵禄二十余年，今背之而起，是不忠也。身有母丧，未及终制，忘哀而出，是不孝也”等语。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明太祖手谕：“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秦裕伯这才拜书入朝，次年为翰林院侍制。据载，明太祖登钟山，侍从应制者 8 人，秦裕伯亦在内。太祖曾与论学术。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应天首科乡试，秦裕伯为考官之一，次年又任南畿考官之一。洪武六年（公元 1373 年）歿，与夫人储氏合葬于上海。

秦裕伯何以成为上海城隍，此前谁为上海城隍，明清之际有不少人存疑。秦裕伯后裔秦温毅著《上海城隍庙说》称：“上海县置自至元中，至明嘉靖间始建城，而诰封城隍为显佑伯制辞，在洪武二年正月，碑刻可考，第未著神为何人。吾家淮海宗谱景容公（注：即秦裕伯）传曰：公卒于洪武六年，讣闻于朝，太祖震悼，曰：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着即敕封为本邑城隍神。似神之位号，前特虚设，至是始封公以实之者。……或以公之为神，名氏未见制诏为疑，夫安知非洪武六年别自有诏而世失之。”

在城隍庙里，供奉的另一神像是陈化成，也是“功施于民则祀之”的民俗神灵。陈化成是中国近代史上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民族英雄，生于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76年）。鸦片战争时，任江南提督，驻守吴淞炮台。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英军攻陷浙江乍浦后，进犯长江，企图在吴淞登陆，陈化成果断还击，击坏英军舰多艘，击毙英军300多名。在两江总督牛鉴临阵脱逃的情况下，陈化成亲自登台发炮，壮烈牺牲，忠骨在嘉定入殓时，有10000多人参加，极尽哀荣。为了纪念他，上海南市民众修建了“陈公祠”。抗战爆发后，南市被日军占领，城隍庙划在难民区内，人们就把陈公祠内的陈化成塑像搬迁至城隍庙内。于是上海城隍庙内就供奉了三个地方神，“前殿为霍，后殿为秦”，同时供陈。不过受明代敕封的“城隍”只有一个，就是秦裕伯。

二、上海城隍庙的建置和变迁

明永乐年间，上海知县张守约将金山庙改建而成的城隍庙，规模很小。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上海知县李纹重修庙宇，于殿前建亭，并将太祖诰文勒石。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改建山门，并造牌坊一座，由新任知县冯彬题“海隅保障”四字，现牌坊犹在，但已改题为“豫园商场”。其后因火灾、战争，城隍庙多次毁而重建。现存城隍庙大殿是在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7月15日和11月26日两次大火的废墟上重建的。从1926年4月开工至次年11月竣工，历时20个月，建成全部钢筋水泥的仿古大殿，辉煌壮丽，为当时上海所未有。

上海城隍庙历来由出家的正一派道士任住持管理。全盛时期包括大殿、中殿、寝宫、星宿殿、阎王殿、财神殿、文昌殿、许真君殿

和玉清宫等许多殿堂。其主要奉祀的神像，头门东面为财帛司，西面为高昌司，东西看楼下设二十四使（后移财神殿）；大殿有金山神主霍光、民族英雄陈化成、四判官、八皂役；中殿石门外有三班、二班、中军、使吏、门房等，石门内牡丹亭正殿为城隍，东西花厅为帐房间和城隍父母；内宫正殿为城隍夫人，西首使女，楼上为城隍夫人卧室；财神殿正殿为赵玄坛财神，东首为看楼下移来之二十四使，西首痘神、痧神；星宿殿正中为三皇，两侧为六十元辰，对门为许真君殿，有许真君、施相公等；文昌殿正殿为文昌帝君，楼上为斗姥阁，奉斗母元君；玉清阁又称三圣阁，楼下有东岳大帝，西首朱天君，值年太岁，东首土地财帛司，楼上正殿有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左面为关圣、文昌、太阳帝君、月下老人、王母、寿星，右面为眼光菩萨、地母元君、太阴帝君、望海观音等等；三元宝殿正殿为三官大帝，东厢为华陀仙师，西厢为姜太公；阎王殿有十殿阎王、判官鬼卒等。上海城隍庙从明初很小的规模，发展到如此庞大，供奉着所有上海民间祀奉的绝大部份神灵，反映了民众在一个庙里能拜许多神灵的心理要求。

城隍庙位于上海城中心地区，随着上海的逐渐兴盛，特别是开埠以来，城隍庙周围逐渐形成了商业区域，店铺如林，摊贩麇集。清末《沪江商业市景词》中“城隍庙”诗称：“城隍庙内去烧香，百戏纷陈在两廊。礼拜回头多买物，此来彼往掷钱忙。”浅显而真切地描述了人们来城隍庙时，烧香、看戏、买物等等结合在一起的情景。

城隍庙还有东西两个花园。东园是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由城隍庙住持道士在钱业界人士帮助下购置的，面积2.168亩，建成小花园，山石池沼，厅堂楼台，巧夺天工，称为“小灵台”，供娱神及作道场之用，由钱业负责修葺，钱业商人亦在此开设公所。清代后期，每逢重阳节，上海全县文武官吏黎明即来城隍庙，向城

隍叩拜，然后进东园，上小灵台，举目四望，城厢风光尽收眼底，远望浦江，苍茫一片。进士曹一士有诗称：“神祠北际名园辟，寝庙东偏别殿开。更拟登高望云物，人间重筑小灵台。”西园，即豫园，原主人潘允端，字仲履，号充庵，又号方伯，上海人，明嘉靖间曾任四川布政使。豫园始建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经过前后18年的经营，扩充面积达70余亩，楼台重叠，山石交错，溪水萦回，忽聚忽散，花卉珍木，洞壑滩渡，饶有江南园林情趣，完整的大假山至今保存，气势磅礴。清乾隆中叶，潘氏后裔式微，豫园逐渐荒圯，急于求售，邑绅集款以贱价购下园基，归入城隍庙作为西园，和东园同为庙产，逢年过节和初一、十五向群众开放，平时除商人活动外，官府士绅也借此宴客。嘉庆道光年间，城隍庙道士无力维修两园，于是园林逐渐为各商业公所分据。点春堂、藏宝楼、快楼同和熙堂等由糖业公所占用，三穗堂和万花楼由豆米业公所占用。

三、上海城隍庙的主要宗教节日

城隍庙的香火在上海各庙中历来最为旺盛。清末的《沪城岁事衢歌》中有诗称：“连朝庙祝霁风光，镇日喃喃奠酒浆。二百年来香火远，生恩万姓戴城隍。”每年正月初一、十五日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日，香烟缭绕，烛火辉煌，与平常更为不同。明清两代城隍庙最热闹的日子是三巡会、城隍诞辰和城隍夫人诞辰。

三巡会即城隍出巡，据传起源于明太祖时。因明太祖怒杀邑人钱鹤皋，碧血化为白色，尸体如生，太祖怕他变为厉鬼，为防患于未然，乃下令天下城隍赈济厉鬼，敕封钱鹤皋为鬼头。由于钱是上海人，因此上海城隍赈济厉鬼奉命尤谨，城隍出巡就是为了赈鬼，出巡之期为清明节、七月半和十月初一日，每年三次，故称“三巡”。

据载,出巡前三日要“排堂”,大殿中支搭临时暖阁,中设公案,会首将城隍抬出,端坐正中,一一参拜后,值堂人将“犯人名册”呈案,由传事人逐一唱名,最后颁发出巡路由,所经道路由主事人牌示。到出巡当天,城隍与各司换锦袍,上午十时,城隍出堂,经文武衙门,绕行照壁,所有马执事从东西辕门纵马疾驰,俗称“跑马”。神輿随之飞奔,俗称“抢轿”。城隍率同四司出巡赈济,设坛于东门外,第二天,由高昌司独往南坛赈济。每次出巡由未刻起程,深夜回庙。清末有人以诗描述三巡会称:“清明报赛到城关,毂击肩摩拥阘阘。五里羽仪人静肃,路由岁岁擎红班。”大约在光绪年间,三巡会的“女犯出解”等陋习开始废除,后来城隍出巡也终止了。但是,每逢三巡日,城隍庙香火仍较平时旺盛得多。

城隍诞辰为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城隍庙道士诵经礼忏一天,社会人士均来贺寿。城隍夫人诞辰为农历三月二十八日,除道士诵经礼忏外,还有一班“喜娘娘”为夫人寝宫打扫卫生,替换床上被褥,又为夫人神像换上新衣裳,供案上盛陈茶点酒肴,为之拜寿,周围商家也连续三日高悬灯彩庆贺。清末《沪城岁事衢歌》记述悬灯夜景称:“才了城东又入城,游踪逐晓到深更。映街夜色明于昼,朱户帘垂透水晶”。

虹 庙

张 源 荣

在繁荣的上海商业中心——黄浦区南京东路上，有一座占地一亩多的宗教场所，名叫“保安司徒庙”，俗称虹庙。这是一所具有500余年历史的道教庙宇。

清同治重修《上海县志》卷记述：“保安司徒庙在北门外汀沟浦上郡邑，旧志作汀沟庙，郑甯水利志作汀沟浦”。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古庙三易其名，初建立称汀沟庙，因庙前有一小河名汀沟浦，以地而名之。元代，上海由镇升格为县，庙属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五保行政区，原为瞿姓大族家庙，后变为僧人主持的一所庙宇，不久，僧人将庙产典卖与毗邻淞南道院张姓道士，张即将殿宇修葺，重塑神像改为道教庙宇，从此张姓道士后裔承袭了世代住持之职。

当时国外旅游者在报上说：“虹庙，它是上海最有名气的中国庙宇，每天有几百人去朝拜”。光绪年间报刊有诗描写虹庙“司徒庙小竟烧香，因列洋场极闹猛”，“万年香火万人钦，大士慈悲奉竹签”。

鸦片战争(1842)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上海被变为五口通商之一，南京路被辟为租界，店多成市，日趋热闹，熙熙攘攘，行人如织，虹庙香火日盛，庙门原在马路当中，因两次拓宽马路，大门逐移北首，即今之496号之地。1964年庙门又因故搬至虹庙弄(即今之石潭路)出入。

光绪年间(1875)住持张少岩、张裕堂为支持慈善事业,将庙之东侧余屋(四亩余)无偿借给保安堂(慈善团体)使用。1927年上海女子商业银行营造女子银行大楼,庙门沿街面之房屋仍归庙宇收租,议定20年后归还。女子银行行长严叔和大护法又为重建门楼。因工程设计要求,悉采用钢筋水泥结构,飞檐拱斗雕梁,五彩缤纷,古色古香门楼与房屋格局相吻,浑为一体,更显示了庙宇的特征,引人注目,古庙逢春,面貌一新。

门楼重建,庙之四周围墙遵道教传统都刷上紫红色,寓有紫气东来,吉祥如意,庙名仍以保安司徒庙称之,门楼保安司徒庙五个大字由当时著名书法家吴兴王震(一亭)题写,苍劲有力,不过人们仍从习惯上称为虹庙。关于保安司徒庙名称之由来,虽经考证,传说各异难以置信。按此处司徒本系专司管理土地、人民之神。

庙宇为三进,整个建筑都为明代所造,大殿于庚子年(1900年)失火重建。第一进为山门和前天井。二进中间为灵官殿,供奉护法神王天君。东首为城隍殿,西首是土地堂。

庙内匾额对联颇多,富有哲理高悬四壁,都出于书法家之手,如邓散木敬题“仁人神顺”;田桓“无住生心”,其他如白蕉、吴湖帆、马公愚、唐驼、谭泽恺等亲笔直挥,弥足珍贵。遍览匾额对联题字,不啻浏览书法展览,也饶有兴趣。其中悬挂于城隍殿的黄底黑字四个“你来了吗”一块,这是匾额中最老的一块,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虽已油漆如新,但视为一文物,被人注目。相传城隍神能兼司阴阳二界,善监察民之善恶,为司祸福之神灵,所以人们对城隍特别敬畏,这四个大字令人寻味,客观上劝人为善,感化育人。

二进东侧为星宿殿,中央供奉斗姆、紫微大帝,东西两侧为六十尊本命星君,也称甲子殿,每尊有一米之高,有木雕,也有泥塑,色绘多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这殿信众最感兴趣,久伫观相,喃喃

自语，各有所求，膜拜不止。有的信众为了虔求神明赐福，保佑太平，交好运发财……等愿望，为本命星君添相披红(布)戴金牌纸花，所以相传说：“虹庙烧香交好运”之说。

二进西侧为猛将殿，供奉刘猛将。上面悬挂“护我田畴”的匾额，这是农村信众所崇拜的神明，以冀风调雨顺丰收高产的心愿。这里还祀奉纯阳祖师。

三进大殿中间供奉慈航道人(观音大士)，道称“南洋阐教碧落洞天帝主圆通自在天尊”。这是信众们最景仰的神灵。东西两侧祀奉三官、财神、雷祖、朱天、妙庄王。大殿两旁分列十八般武器的锡制盔甲，大殿东侧是关帝殿供奉协天上帝，旁立关平，另有周仓手牵赤兔马侍立右侧，威严肃穆，益显神威。

大天井中央置有重达一吨半高达4.5公尺的清代铁铸大香鼎，铸刻细致，工艺价值较高。传说清末民初山东大力士马永贞来沪，进庙烧香，人们戏言是否能将鼎移动，为不甘示弱，用足功力将此搬动一下，事后被人夸大为擎举香鼎，上海社会上轰动一时，竞相进庙看香鼎，途为之塞。在天井置有锡铸方型祀件(烛台香炉)，高有2.5公尺，重计一吨多，亦是一件观赏之物，沪地实不易多见。

在香汛期，尤其在除夕至正月十五元宵节，天井两旁数台大蜡扦各点上100至200斤的大蜡烛，烛光生辉，香烟缭绕，更显示了庙堂古朴肃穆的气氛。在平时香汛慈航道人诞辰日期(2月19日、6月19日、9月19日)以及朔望，成千上万的信众扶老携幼，纷至沓来，祈祷财运亨通并要到神前酬恩完愿；命运日蹙，流年不利，竞相到神前陈诉，祈求护佑交鸿运。总的来讲，众信都有一个自求多福的心愿。

虹庙地处闹市，香火旺盛，声名大增，收入(香金、求签、写缘、

残烛等)也丰。但一般人鲜为知道的是,虹庙在租界内与其他洋教一样,租界工部局给予治外法权(见岑德彰教授所著《公共租界史》一书有较详实的记载)。

1946年住持张维新为了管理需要,重组了保安司徒庙董事会,杜月笙为董事长,王晓籁为副董事长,潘忠甲(原上海县县长),翟宝祺(原董事)、张竹铭(西医师、大护法)、张维新(住持)等9人组成。为庙务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利前提。所以虹庙有关工作在上海道教界有条不紊见称。

虹庙在慈善事业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常年发送专治痢疾的中成药痢疾散;夏令的观音六厘散和痧药水行军丹。夏令还施诊给药,在冬令施棉袄裤及施棺。按期捐款给国医平民医院和育婴堂。

1947年春,张维新羽化,嗣汉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题写“正一之英”横幅悼念。

1948年张维新之长子张源焜继任虹庙住持。1960年起成立庙管组,庙管组由住持一人、道士一人、职工三人组成,组长由住持兼任,实行民主改革,民主管理,废除陋规,在不断改革中取得了一定成绩。虹庙所处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每天进庙的香客和游客人数众多,还有路过的外国人,所以管理工作中不能有任何疏漏,造成不良影响有碍观瞻。在废除陋规方面,首先向不利于社会的开刀,如取消求签、劝阻笃荐、严禁索取小费、劝阻焚烧冥器等。在民主管理方面:一、庙务管理必须在庙管组领导下展开,重大事情须由大家讨论后决定。二、建立每星期一次的时事政策学习制度。三、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每个组员负责抓一项具体工作。四、关心职工生活,提高生活费用。五、实行医疗福利制度。六、加强财务管理,一切收入当天清帐(包括香金),就是年初一的香金也

在当天结算清楚,从不过夜。七、每月报表分日报和月表两种,分类鲜明一目了然,分报主管机关。八、规定每星期一次内外大扫除,做到人人动手,平日则分管包干落实到人,保证做到窗明几净地无纸屑,在爱国卫生工作方面,虹庙常年获得市、区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奖状。在爱国爱教、团结工作上也作出了贡献。沪剧《庵堂相会》是人们喜爱的一个戏剧。它介绍了200多年前(乾隆年间)青年寒士陈宰庭和乡绅千金金秀英在虹庙烧香邂逅,相互含情脉脉,一见钟情,金秀英为了婚姻自由,不顾家长的反对,冲破了封建婚姻束缚,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喜结良缘。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虹庙里,在民间广为传播。

虹庙于1966年夏关歇结束。

钦赐仰殿道观

张 振 国

浦东钦赐仰殿又名东岳行宫，位于上海浦东大道6号桥南面沈家弄路和源深路口，是上海地区恢复较早、影响较大的正一派道观。

钦赐仰殿相传是三国时代吴大帝孙权为其母所建。因明朝嘉靖以前的地方志均无记载，故确切兴建年代失考。据明万历《上海县志》的县境图，称为金师娘殿。《沪城备考》载：“有驱蝗神金姑娘，或称金四娘，祀于崇祯间。因田家多赛祭之，钦赐仰殿殆因是传讹，附会唐建，改奉东岳。”这是有关钦赐仰殿的最早记载，以后各朝修志均沿用这一资料。如清代嘉庆《上海县志》载东岳行宫在二十四保，名钦赐仰殿，相传唐时敕建。梁上刊“信官秦叔宝监造，宇久圯，国朝乾隆三十五年重建。”清同治《上海县志》载：“钦赐仰殿久圯，乾隆三十五年重建。”清光绪年间的《申江胜景图》中绘有该殿全景，前进为东岳庙，后进为三清大殿，左右15殿，配房20余间，占地20多亩，建筑宏伟，气势非凡。

我国农业生产历来多遭蝗灾，为求神驱蝗，先人撰有《驱蝗经》，《道藏》也搜录了相当数量的驱蝗经文，各朝均有具体的捕蝗章程。清代道光年间张集馨所著《道藏宦海见闻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扑蝗的方法。农民为了驱赶蝗虫，争取丰收，祈求神灵金姑娘显威相助，可能将“金四娘”或“金师娘”，因谐音而讹传为“钦赐仰”。

还有一种传说，谓乾隆帝下江南，借巡视之名寻找自己的生母，几经微服出访而无着落，为寄托思母之情以尽孝道，将金师改为钦赐，作为对生母的思念。这和“乾隆三十五年重建”似乎沾上了一点联系。

钦赐仰殿在民国时期遭到破坏，“文革”中几乎全部被毁坏，仅存大殿移作他用，面目全非。1982年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会收回了庙产，并着手进行修葺。如今庙门庄严，庭院宽敞，神像端庄，道教气氛浓厚，成了名副其实的道教活动场所。

现在庙殿正门题匾“钦赐仰殿”，大殿正中供奉东岳神像，东供东岳之子炳灵公，西供东岳之女碧霞君，信众尊其为送子女神。东厢房由北朝南分别供奉刘猛将、斗姥（称圆明道母天尊）、眼光圣母（说是碧霞君手下的一位神灵），最南面的是地方神。西厢房中供三官，左供八仙之一的吕纯阳，右供关帝和下界龙王。1990年6月位于东岳殿后面的三清大殿正式动工重建，建筑面积328平方米，高15米，分为上下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楼上供奉玉清、上清、太清尊神；楼下供奉勾陈大帝、北极大帝、玉皇大帝、后土皇地祇。两侧有巨型彩绘八天君画像。1994年钦赐仰殿又在山门两侧增建钟鼓楼，按“东面擂起龙凤鼓，西边叩响景阳钟”的说法，钟楼在西侧。钟重一吨。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以及其他道教节日，四乡信众、远道香客摩肩接踵，前来朝拜，香烟缭绕，钟磬齐鸣。据统计，每月朔望，礼拜信众可达3000人，正月初一可达万余人。

宗教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促进了道教文化的交流，全国各地的主要道观道院派代表相继来访，日本、美国、法国、苏联、西德、印尼、加拿大等国的宗教学者以及在沪的各国留学生经常到钦赐仰殿参观访问，港澳台同胞同道也来朝拜进香，交流道教文化，增进道谊。

钦赐仰殿道观于 1993 年买下了毗邻三清大殿的一块土地，面积为 2.6 亩，规划建设藏经阁和其他配套设施。钦赐仰殿自恢复开放以来，声誉卓著，是上海地区一个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

嘉定城隍庙

丁 常 云

嘉定城隍庙，是著名的道教宫观，位于嘉定城内。

嘉定城隍庙始建于南宋宁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年间，已有700余年历史。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由知县胡永安从南大街富安坊移建于今址。明代天顺、嘉靖、天启年间和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年间均有扩建。据《嘉定县志》记载：“康熙五十二年增扩寝宫、校籍堂及两掖楼，后又即庙之西偏构园亭。”庙内主要供奉城隍和道教“三清”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太仓、昆山、青浦、宝山等地信众常来进香朝拜，香火旺盛，每逢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及每月朔、望日，参谒者更是摩肩接踵。殿堂香烟缭绕，信众熙攘往来，戏台上演唱各类地方小戏，小商贩叫卖各种糕点小吃，甚为热闹。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有诗云：“刺眼繁花细细开，陌头女伴踏歌来。烧香才罢游园去，延绿轩前薄相(沪语，游玩之意)回”。延绿轩系嘉定城隍庙后园一景。嘉定民间还流传着“日日城隍庙，夜夜小山堂”之说，可见，城隍庙当时不仅是著名的道教宫观，而且还是嘉定广大民众游乐活动场所。

明代末年，嘉定城隍庙曾四次受灾，屡毁屡建，后来装饰均系晚清之物，但在建筑上还保持明代格局。大殿高14米，最宽处20米，深46米，与二寝宫连在一起，呈工字形，面积500多平方米。殿宇宏敞，飞檐耸脊，气度不凡。屋脊两端由名匠潘允星装塑巨龙和“八仙”，正中原有铜镜一面，现塑盘龙吐水，寓消灾之意。殿前

石狮,部分系初建时的原物,分列正门两侧,形态各异,并有百栏围护。

明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工部尚书龚弘在嘉定城隍庙侧建一私人花园(即今秋霞圃)。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龚家衰落,把此园售给徽州盐商汪伦。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汪家将园捐给城隍庙作庙园。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东侧沈氏园(万历、天启年间沈弘正所建)也由主人沈氏捐赠城隍庙,与秋霞圃合并,并添建了即山亭、迎霞阁、碧光亭、池上草堂、醉月轩、花神殿、有物皆春等建筑。至此,嘉定城隍庙范围更大。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至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太平军东征期间,嘉定经历了三次争夺战,秋霞圃被毁,城隍庙亦遭破坏。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重新修葺,并扩修了池上草堂、舟而不游轩等建筑物。

抗战时期,城隍庙为日军盘踞,改设军医院,庙园秋霞圃园景受很大摧残。建国后,1960年,嘉定县人民政府公布城隍庙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9月,又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筹划大修工程。十年动乱中,城隍庙又遭极大破坏,神像被毁,道士赶出庙门。1984年,嘉定县再次对城隍庙进行修葺,但未能恢复旧观,1987年,改为嘉定民族博览馆,至今仍被嘉定县文化馆所占。

上海伊斯兰教概况

江 宝 城

上海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回族、维吾尔、哈萨克、撒拉、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东乡、塔吉克等9个民族，人口约5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回族，占99.6%。他们分布在全市各区县，以普陀区最多，占16%，南市、杨浦两区次之。在籍贯方面，以江苏籍最多，占33%，安徽河南籍次之。^①

早在宋代，上海地区已有少数来自国外的穆斯林在当时的华亭县及青龙镇一带贸易。大批穆斯林来沪，始于元初。被元军在西亚伊斯兰教国家俘虏的一批穆斯林，从军东征来华，其中一部分在华亭定居下来，并于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建立了第一所清真寺——真教寺，即今松江清真寺。明清以来，在上海郊县定居的穆斯林逐渐增多，明代青浦、七宝均建有清真寺，惟现已湮没。

上海开埠后，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南京大水，旋太平军东下，大批南京籍穆斯林辗转来沪谋生，起初聚居南市小南门草鞋湾一带，称为南京街。随后建立了市区第一所清真寺——南门清真寺，同时在泥城桥、西张家浜（今国际饭店附近）建立市区第一个清真墓地。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发展，这批南京籍穆斯林有一部分积累资金，成为资本家。其中不少人从事珠宝玉器古玩行业。以他

^① 根据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1988年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

们为主的穆斯林上层人士陆续在南市建立了福佑路清真寺、小桃园清真寺等,并组织清真董事会,在全市穆斯林中起了领导作用。

20世纪初,湖北籍穆斯林李某,与沪西日商纱厂联系,获同意收一批农村穆斯林来沪做工,这样又有一批湖北、安徽、河南等地吸农村穆斯林来沪进纱厂做工,他们的家属兼做清真饮食摊贩。后来通过亲属关系来沪谋生的穆斯林源源而来,加上子孙繁衍,人数日益增多,因而在小沙渡建立清真寺,使普陀区成为全市穆斯林人数最多的一个区。杨浦区由于当时是租界监狱所在地,每年西牢增补华人看守时,通过穆斯林教亲关系吸收一批外地穆斯林来沪,加上为他们服务的清真饮食业人员,以及一部分工厂工人,至今穆斯林人数居全市第三位,建立了汾州路清真寺。

在穆斯林居住较集中的地方,都兴建清真寺。目前已知的清真寺,从元代以来共有23座(包括清真女学),到解放初尚存19所。其中著名的有元代建筑的松江寺,我国古典庙宇式建筑的福佑路寺,阿拉伯式建筑的小桃园寺,还有由印度人(今巴基斯坦人)出资建造的浙江路寺(俗称外国寺)等。至1959年,合并为9所,文革后恢复了6所,即小桃园寺、福佑路寺、浦东寺、景星街寺、松江寺以及重建的普陀区药水弄寺。清真寺有依玛目(教长)和专职阿訇,领导本坊开展各项宗教活动,研究宗教经典,率领穆斯林完成礼拜功课,处理有关本坊的宗教事务。

上海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学习,历来传统方式为口传心记和照手抄本经典背诵。19世纪以后,上海伊斯兰教存在两种不同宗教教育制度,一种是经堂教育制度,在寺内招收海里法(寺院学生),由阿訇传授经典、圣训、教律等,为了认识经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是他们的必修课。另一种是经过改革宗教教育制度建立的伊斯兰师范学校,该校建立于1929年,目的是培养具有一

定水平兼通阿拉伯文与汉文的阿訇、留校师资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人才。在课程设置方面不限于传授经文，而且进行普通文化知识教学，打破了过去经堂教学只重阿拉伯文不重汉文的局限性，并曾派遣十余名毕业生赴埃及深造，因之造就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宗教学术人才。

为了扭转过去穆斯林大众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自1909年起，上海穆斯林先后创办了清真二等学堂、清真国民小学、敦化小学、伊光一小、伊光二小、崇本小学、云生小学、敦化中学等普通学校，使穆斯林子女能受到初级和中等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上海伊斯兰教社团组织，在管理机构方面，解放前有务本堂、清真董事会、上海回教堂理事会、上海回教教务会等，解放后有上海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在文化团体方面，有中国回教学会、回教青年研究社、回教文化协进会、回教宣传所等，其中以中国回教学会最著名，开展了翻译古兰经、出版会刊、创办学校、设置奖学金基金等工作，成为20世纪前期全国影响较大的伊斯兰教学术团体之一。在妇女团体方面，有回教妇女协会，回教坤宁同德会等。此外还有全国性宗教团体在沪的分支机构，如中国回教俱进会沪支部、中国回教公会上海分会、中国回教协会上海分会等。

随着上海穆斯林宗教文化的革新和发展，上海先后翻印了多种伊斯兰教经书，编著了有关宗教史书，开展了学术研究，其中有买俊三阿訇所著的《阿文标准音读本》、《中阿文会话》，传统史教授的《中国回教史》、《追求中的真宰》。同一时期，上海穆斯林还创刊发行了《中国回教学会月刊》、《人道》、《绿旗》等近10种杂志，使伊斯兰教文化研究日趋活跃。

上海清真董事会

金幼云 改柏年

上海福佑路清真寺在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建立以后,因其地处旧城厢的北面,紧靠旧租界,市面繁荣,交通便利,再因聚居在城厢北面九亩地一带的穆斯林占全市回民的最多数,因此当时每日进福佑路清真寺礼拜的乡老甚多,每逢星期五“主麻日”以及开斋节、古尔邦节、“圣忌”日等来寺聚会的穆斯林为数尤多。平日为了宗教生活、教育、喜庆、纷争、坟地、安葬、施布、施椁等问题,需要清真寺帮助解决的穆斯林也不乏其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清真寺必须组织起来,建立一个为全市穆斯林服务的社团。

清末民初处于半殖民地前哨的上海,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官僚买办、军阀政客巧取豪夺,给上海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畸形虚假的繁荣。而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罪恶,又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当时上海各行业、各阶层为了“生存竞争”,不得不“合团体创公会”,否则,无组织必然被“天演公例”所淘汰。当时,福佑路清真寺有识乡老有鉴于斯,遂仿效各行各业以及同乡共学者组织同乡会、同业公会等形式,在宣统元年倡议投票选举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会成立时,诚如总协董所谓“际此艰难时局……兴学校,培丧葬、整教规……此吾上海清真董事会所以有选举董事、成立董事会之举也。”故上海清真董事会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形势的要求而产生的,可谓时代的产物。

一、组织沿革

上海市福佑路清真寺建立之初，全市穆斯林尚未组织起来，许多公益事务，如清真寺的管理，穆斯林婚丧喜庆、生活上的需要等等，都乏人过问。其时诚然“势如散沙情同异域”。1905年遂由石子藩等热心公益的乡老组织务本堂，推举德高望重的乡老，辅佐教长主持其事。这是上海清真董事会的前身。

务本堂成立不久，来沪定居的穆斯林日益众多，生齿日益繁衍，事务日益繁忙。务本堂成立之初，本已因陋就简，杂乱无章，远不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要求。1909年经上海县田知事的批准，以南京籍穆斯林为主的上海清真董事会诞生了，通过投票选举管韦钧和兵轮花翎都司衔补用守备马廷树（榕轩）为总董，议叙八品候选从九品金彭庚及五品封典哈少夫为协董，以主持日常事务。董事会除总协董外，还敦请素孚众望的乡老，担任筹建特别名誉议董和特别筹议董事，辅佐总协董，当时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德高望重的乡老，如蒋星阶、石子藩、杨子芬、金子云、马子卿、马维楨、马乙棠、金恒义、蒋星吾等，被延聘为董事会各方面的领导成员，并义务分管一部或数部的具体任务。清真董事会下设书记、学务、财务、工程，椁木，施布，施椁公莹，走公坟招待等部门，教长由董事会聘任。

上海清真董事会自1909年成立后，经过累年的经营，为上海穆斯林做了大量工作，为伊斯兰教在上海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清真董事会的元老如哈少夫、金子云、蒋星阶、马乙棠、马维楨、金恒义等相继谢世，随后就进行了更新换代。当时在上海的伊斯兰教经营古玩玉器珠宝业的南京穆斯林的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他们掌握了福佑路清真寺

的理管实权，如方子杰、金从仁、马晋卿、刘正琳、马心田、陈春芝、宗棣棠等，他们除了从事古玩、珠宝、玉器经营外，有的还经营洋广百货等，上升为回族商业资本家。在1936年11月，他们仿照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组织，草拟规章条例，并接管改组了上海清真董事会。由上海清真董事会硕果仅存的董事石子藩将董事会的全部财产清册、档案，移交给福佑路回教堂代表会执行委员方子杰接收。他们按照有无纳捐或捐助多寡的标准和其他必须具备的条件，选举纳捐人代表，由140名各方面穆斯林纳捐人代表，正式组成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代表任期三年，连选得连任。纳捐人代表会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财务、墓碣及宣传四股，纳捐人代表会有权聘请教长和职工，纳捐人代表会分管福佑路、日晖港清真寺，清真女学。小桃园清真寺则由金子云乡老的后裔直接管理。

上海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成立不久，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进展受阻。为了尽快改变停滞的局面，重建社团，遂由福佑路、小桃园清真寺乡老代表马心团、金幼云、何星武、李庆忠、王治平、李鹄成等进行协商研究，经两堂几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回教堂理事会，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合力办理教务和慈善事宜。理事会有权聘请教长和职工。当时理事会下管辖福佑路寺，小桃园寺，清真第一、第二别墅，高墩路女学，西仓桥女学，还兼管浦东清真寺。理事会的组织比较健全，其下设有：

总务股：收发、缮拟文书，人事管理和调派，财务及修缮，采办用品及其他不属各股之事（下设各堂堂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管理清真寺日常事务）。

财务股：收支登册，编制经济报告、预算，筹捐经费，计划调整财务。

保管股:造具财产保管目录,查核产业状况,完纳捐税,办理财权事项。

墓椁股:购备材料坟地,售卖椁地,整理墓地,办理殡仪,筹办新公墓(下设殡仪组。这是为穆斯林殡葬服务的。为了既符合伊斯兰教教义,又便于丧家,曾将经师组织起来,依次排列治丧,提供丧家方便)。

福利股:救济贫苦教友,办理施葬,冬令救济,小本借贷,奖学金基金,以及其他福利。

第一届上海回教堂理事会由理事 35 人,后补理事 10 人,监事 5 人,后补监事 5 人组成。理监事都是当时上海回族中的知名人士。为了较好地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每届理事会皆成立常务理事会。先后担任常务理事的有马心田、金幼云、宗棣棠、杨稼山、王治平、李鹤成、马受百、刘凤高、李云甫、答容川、石象玲、许晓初、常子春等人。

上海清真董事会自 1905 年的务本堂起,到 1909 年清真董事会正式成立,1942 年改组为上海福佑路纳捐人代表会,后改组为上海市回教堂理事会(上海市回教堂理事会于 1958 年由于历史任务完成而停止活动),一直到 1949 年解放。历尽沧桑,三易其名,它为上海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开拓等,都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

二、制度的形成

清真董事会作为上海穆斯林的一种宗教组织,它的形成必然有它与之相适应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经济条件和社会根源。

上海市区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先后由全国各地陆续迁来的。中国的回回民族自元明以来,就是通过“大

分散,小集中”而形成的,有着集聚定居的传统。当19世纪20年代南京大水,60年代太平军兴,以及清末民初以后的战火连绵,江苏及南京籍的穆斯林为了逃避灾乱,来沪者激增,先后都聚居在上海南门沪军营(迄今仍有一条南京街)及北城厢九亩地一带。上海旧租界辟有跑马厅(现今人民广场)后,来自东北等地贩马的穆斯林多聚居在跑马厅附近,内地来自豫、皖、苏北等地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因天灾人祸,农村破产、背井离乡,被迫来沪流亡,他们大多数集中在沪西沪东的工厂区。

“回回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他们走到那里,便在那里建筑清真寺”。所以定居各区的穆斯林,为了过宗教生活,就在所集居之地建筑清真寺及清真女学。如草鞋湾清真寺(俗称南寺),福佑路清真寺(俗称北寺),小沙渡清真寺,高墩路女学等。建造了清真寺,还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当时福佑路清真寺有它的特殊条件,就产生了董事会制的宗教团体。

伊斯兰教构成了回回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上海的回民也都崇信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他们严守五功——念、礼、斋、课、朝,在这种宗教思想的指导下,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与之相适应所产生的宗教组织形式——清真董事会,在回民的心田中有着迫切的要求,从而受到广泛的支持,故清真董事会制在上海的回民中是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的。

19世纪后半叶,正是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正急步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中国的回回民族由于过去历代遭到民族的歧视,本来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都很低下,来沪定居的穆斯林当然逃不了被剥削欺凌的厄运。

当时上海的回民中小商小贩占较大的比重，他们的经济极不稳定，生活艰困，也有不少定居后经过董事会和“教亲”的关系，介绍到纱厂、电影院、商店、巡捕房及公共汽车、电车任驾驶员或售票员等等。还有一些情况略好的穆斯林开设了鸡鸭店、大饼油条店，他们的经济情况，不过是城市中的小贫民，多数的小商小贩只是挣扎在生活水平线下的所谓“穷回回”，这些经济收入低，文化水平不高的回民宗教观念却很深，他们“勤五功，念根本”，以冀振兴图存，实质为解脱当时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穷困或不安，而将希望寄托于真主，其感情也就倾注在宗教活动上。董事会的成立，当然得到了他们的有力支持；反过来他们期待董事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宗教活动能给予组织保障，所以清真董事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上海市福佑路清真寺在其创建之初及董事会、纳捐人代表会理事会期间，其经济来源，全凭自力更生，通过广大乡老们“纳天课”、“筹募捐输”、“举意”、“圣忌”、“斋日捐”、“月捐”、“包贴”各种渠道，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而集聚资金以支持清真董事会等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如福佑路清真寺的殿堂修饰和建筑，清真第一别墅的扩建，公莖市房等产业，均系乡老们累年募化捐献的成果。通过各种渠道集聚资金，是董事会等机构重要的经济来源。兹略举具体事例：如福佑路清真寺大殿、二殿龙爪油漆，由郑春廷独助。大殿上春冬两季所用的骆驼绒毯，系蒋星阶独助。冷热水龙头管系马榕轩独捐。副水房由金子云独修。为开办公立清真两等学校，1909—1912年前后三年，集资5644元中，蒋森书独认1200元。福佑路清真寺三层建筑，系上海清真董事会于1930年建造的。清真第一别墅的扩大翻建，是金子云首倡，自捐1000元，哈少夫捐助500元，以及马廷树等人集资500元，合成2千元，送请蒋星阶凑足

3000元建造完成的。日晖港清真公苑忠字地围墙是以哈少夫、马少臣为首的乡老捐助建成的。20年代建造的小桃园清真寺，宏伟壮丽，溶合中阿建筑艺术的风格于一炉，可谓独步江南，该寺就是由金子云乡老躬亲设计并自助巨款在海内外穆斯林捐助支持下建成的。真如清真第二别墅，在抗战期被炮火毁坏，抗战胜利后，是由理事会的负责人等捐助修复的。再如金陵蒋门金氏（蒋三太太）曾将自有的褚家桥三层住宅捐助给小桃园清真寺，作市房收益之用等等。

回回民族本来富有经商识宝的传统，其中有的上升为资本家。如金子云，马乙棠、马晋卿、方子杰等等，这些经商致富的回族士绅，宗教信仰甚笃，伊斯兰教义指导着他们的世界观。他们为了感谢真主赐予的恩典，就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办善举，倡公益，以期贻德于后。象金子云就是从利润中按天课规定比例抽成输捐。

“清真寺是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中心……只要有回回人聚居，总会有少数富绅闻人发起筹募捐献款项，建造清真寺”。上海福佑路清真寺都是富绅闻人发起建造的，富裕乡老们慷慨捐输，为上海清真寺的创建，清真董事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经济条件，成为清真董事会的主要经济基础。

五口通商后的上海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竞争日益加剧，表现在各行各业为了生存发展，纷纷“合团体创公会”，当时的工商界同乡会都采用董事会制，如上海旧租界的工部局也是董事会制的组织机构，这种外来的组织形式需要雄厚的资金和具有魄力的干才，方可以显示实力，纵横捭阖。资金和干材是董事会制必须具备的条件。

上海市清真董事会是上海回民的宗教团体，本可采用回回民族传统的组织形式——教坊制度，可是上海不是以自然经济为主，

而是以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为主的通商口岸，畸形发展的商业经济，为上海回民产生了少数富商，锻炼了一些学识才干出众的士绅。又有外来引进的董事会制这种强有力的组织形式，这就为上海清真董事会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时福佑路清真寺面对人杂事繁，为了“资金宜如何广筹，寺规宜如何整顿，教育宜如何普及……”感到“不有董事联络何能挈领提纲，此中外所以重团体也”，且“无领袖不足维系人心”；于是在适应当时上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带有上海特征以南京籍穆斯林为主体的上海清真董事会。不过它明显地具有商业同业公会与同乡会的性质，纳捐人代表会时代的名称、内容。更刻上了殖民地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印记。

根据上海的特殊条件，也只能采取董事会制。上海清真董事会要管辖福佑路、小桃园、日晖港、高墩路女学等清真寺，还要管理公立清真二等小学，清真公墓以及市房等，只有董事会制才能适应人什事繁、机构庞大，需要加强管理的要求，所以上海清真董事会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回回民族另一类型式的宗教管理制度，它为上海回民宗教信仰的传播和发展起过历史性的作用。

三、成就和影响

上海市清真董事会自1909年成立以后，1936年，董事会移交给福佑路回教堂代表会。经过几年的酝酿，于1942年改组为上海市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1944年又改组为上海回教堂理事会（该会于1958年停止活动），到解放止共经历了四十个春秋，几乎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教务的整顿，伊斯兰教的传播，学校的举办，人才的培养，公墓的兴辟，丧葬的管理等等，都是在董事会等组织管理下，为上海地区的穆斯林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它

的历史性使命的成就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可为他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回民族史提供参考。现将董事会等组织的成就及其作用和影响列举如下：

1. 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

福佑路、小桃园、日晖港、墩基弄女学等清真寺，在董事会等组织领导下，历年聘请了品学兼优的杨大坪、许瑞臣、李仁山、马徽吾、达浦生、韩礼堂等阿訇为教长，教务在他们的领导下，日常的“五功”、“主麻日”、“斋月”、“开斋节”、“古尔邦节”、“圣忌”、“走公坟”等的宗教活动，都是正常的进行着，其它如宰牲，嫁娶、丧葬、纠纷、甚至接受外地清真寺房地契的保管，都在清真寺举办，或要董事会帮助解决。清真寺遂成宗教社会的集团，上海回回民族的小天地。自清真董事会加强寺院的管理后，乡老来寺者诚如董事会志所云“自设热自来水后捷便非常，既能勤于沐浴，故礼拜寺日渐增多，兼装设电灯、电扇，礼拜者尤为拥挤”。当时每逢“主麻日”，各寺都有数百人参加聚礼，斋月聚礼的老少穆斯林有上千人之多，教长在聚礼时宣讲教义，扩大影响，为伊斯兰教传播作了不少有益的贡献。在董事会、代表会、理事会时代，每逢农历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天雨顺延）的上午，上海穆斯林自动聚集在清真第一、第二别墅（肇嘉浜路及真如），在教长率领下，前往清真公茔扫墓。先由教长在每块坟地举行总的“都阿”，然后分块接都阿。最后由每个穆斯林请阿訇（经师）为他们亡故的长辈亲友祈祷，这种聚会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所以上海回回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就得到组织的保障。

伊斯兰教义通过教长阿訇们的传播，上海回民的宗教信仰加强了，思想意识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穆斯林有了共同的语言，容易产生相互融合的感情，进而促进共同的心理状态，维系着

本民族的团结。

董事会推行宗教传统的“捐献”、“天课”等制度，培养了穆斯林愿为伊斯兰而“献身”的精神，清真董事会赞马春山乡老谓“寒素之士勉竭绵力资助公益，则尤难能可贵！”对富有的乡老董事会也均有赞词。“‘天课’‘纳捐’实为伊斯兰的赋税”，在当时董事会的号召下，莫不根据经济条件，慷慨捐输，愿为“伊斯兰的昌盛”而“献身”，此风绵延迄今，每届节日、斋月“主麻日”，穆斯林都仍承袭古风不辍，这显然是与伊斯兰教义的传播有关。

当时上海五洋杂处，新旧思想交织，西风东渐频仍，上海的回民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思潮所包围，然而穆斯林坚定的“信主”“信圣”，千百年遗留的风俗习惯，不为外来影响所感染，仍禁食猪肉、血、自死物和无刀口的牲物；不与异教通婚，除非受礼进教；婚娶时由教长，阿訇证婚，出生小孩请阿訇取回回名，稍大后即行割礼；穆斯林亡故后请阿訇洗礼和站“则那者”，主持殡葬仪式。这些回回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如不是教长的传播，清真社团组织的推动，是难以设想不受外界思想的影响。

平时穆斯林互道平安，称谓出“色兰”，相互言谈时渗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如小净谓“阿布德斯”，忏悔谓“讨白”，宣讲教义谓“瓦尔祖”，信仰谓“伊玛尼”，乞丐谓“撒以勒”等等。这些回回民族的词汇，能引起民族的感情，自元明以来，仍然保存沿用。这固然是民族性的表现，但宗教的活动，教义的宣讲，组织的推动，是其重要因素。

组织保障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共同语言词汇，促进了上海地区的回民进一步地溶合起来。“纳捐”、“天课”聚礼等等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活动促进上海地区的回民在董事会范围内形成一个小社会的缩影，这就导致上海回回民族进一步的团

结，对董事会也怀有比较深切的感情，遇到外力干扰必然群起抵御。如 30 年代北新书局出版的“小猪八戒”事件，上海穆斯林群情激昂，都愿为董事会的后盾。当时董事会的影响诚然起了上海地区回回民族凝聚力催化剂的作用。

2. 办学育才

清末民初列强环逼，利益均沾，国势日颓。有识之士，为了救国图存，力倡兴学育才。董事会顺应形势，为了“上为国家培育菁英，下为回教谋发达”，遂劝捐兴学。1910—1912 年前后三次集资 5644 元办起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校址在福佑路清真寺三殿，议订学校规章十章二十节及课堂规则九条。学校宗旨“注重回民教育，兼重天方教经文教育”，分初高二级，各四年毕业。学科有回文（指阿拉伯文，因为伊斯兰教经典是阿拉伯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图画、体操、乐歌、读经、讲经。贫寒子弟免费。从其学科种类可以看到比务本堂时代的教育是个飞跃，该校在沙善余、伍特公等老师的谆谆教导下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义、杨稼山、马功甫、陈叔平、张福成等都成为上海回民中的著名人士。两等小学的人才辈出，公认这是清真董事会的骄傲。30 年代后期，清真董事会部分成员及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回民教育、伊斯兰教育非常重要，遂成立上海市中国回教学会创办的敦化中小学，伊斯兰师范学校。上海回教堂理事会时代在小桃园清真寺办有崇本小学。他们为民族教育、伊斯兰教育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3. 建立公茔

回回民族继承伊斯兰的传统，人亡故后以入土为安。自前清咸丰年间，来沪的穆斯林日益众多，定居后生齿繁衍更多，亡人也相对增加。福佑路清真寺乡老为了满足广大穆斯林要求，陆续购置了日晖港坟地。1909 年，清真董事会成立时，立即丈量了茔地

共计六处,合计 29 亩 9 分 5 厘 2 毫,时约价值 1.5 万元之谱。经过董事会、代表会、理事会的 40 余年经营,日晖港两岸共拥有基地 72 亩零 6 分 3 毫,在真如拥有基地 80 亩。董事会等还制定坟茔规则,加强管理,聘请专职董事(委员或理事)负责管理。另外雇用人员看管公墓。多数的坟地围以砖墙。在董事会时代坟地分甲、乙、丙三级,甲级地每年捐洋 6 元(当时币值),乙级地每年捐洋 4 元,丙级地免捐。以后年代,则免除因地捐款,改成随意乐捐。墓穴均按次编号注册。董事会等机构慈善为怀,备有施布给困难回民免费丧葬之用,据 1911 年统计共施椁 14 具施布 37 丈,以后每年皆有椁地布施给贫困的穆斯林。对穆斯林中有影响的人士,如情况需要,也给帮助。例 1948 年复旦大学著名的回族教授马宗融,因淮海战役大捷,兴奋过度,患中风身亡。由于马教授的夫人在台湾执教,子女尚幼,所以他的友好巴金、张志让、章靳以、贾开基等人,将马宗融的遗体送往当时大众殡仪馆准备大殓。金幼云得悉,急电苏州文通书局马教授的亲戚马继皋,要他来沪共商按伊斯兰教殡仪进行殡葬。遂由上海回教堂理事会出面,将其安葬在肇嘉浜路清真公墓忠字地上,其所使用的土地、四寸木椁、身布,都是由理事会赠送的。又据 1950 年 12 月 20 日上海回教堂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第三册记录,原嵩山路培福会沈凌霄(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钧培里委福利会负责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口皆碑,他在一次上海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发言时,由于激动过度,不幸中风逝世。上海回教堂理事会赠与肇嘉浜路南岸七家坟墓地一穴,四寸木椁一具,布 1.7 丈以资慰念。

4. 清真董事会支持辛亥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回民青年本着“伊斯兰教扶持正义尚武精神”,在回民底奇峰烈士支持引导下,组织清真商团。团长沙善余

(董事会学务董事)副团长伍特公，营部设在福佑路清真寺。该商团以“回汉民族相关，患难与共”的宗旨，响应孙中山先生“联合国内各族人民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号召，在1911年11月，上海清真商团协同各友军、友团先后光复了上海南京，转战大江南北，历时十月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辛亥革命中的清真商团虽然历史短暂，但在各族人民共同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过程中，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同时，我们也感到有这些凌云壮志的回族青年，令人怀有民族的自豪感，董事会能为辛亥革命输送力量有不胜光荣感。

5. 其它

上海清真董事会等机构除了以上业绩外，还为贫寒穆斯林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诸如给予低息贷款，慢饼业的小商小贩、古玩市场珠玉公所附近的小摊贩，差不多都受惠接济。年轻力壮的回族青年在董事会和乡老的帮助下，进入电车汽车公司任售票员、驾驶员，有的进入租界巡捕房任巡捕。在北新书局事件中，愤怒回民的过激行为，就受到回民巡捕的暗中保护。清真董事会每年冬季发放平民食米以济贫寒，发给总数约计一百余担。1945年1月，上海回教堂理事会因食米购备不易，改为发放现款，这次冬赈救济，经募捐发放707户3000口，赠款达当时纸币1,282,300元，董事会本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慈善为怀，以惠寒黎”的宗旨，一年一度冬赈救济，诚然是遵循圣训的体现，当然得到广大回民广泛支持和拥护。

辛亥革命与反袁斗争中的上海穆斯林

江 宝 城

鉴于清代历次回民起义的失败，回族先辈悟出在黑暗腐朽的暴政下，回汉各族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回民要求新生，必须与汉民一道，共谋救亡图存大业，辛亥革命就是近代回汉联合斗争的重大事件。在辛亥年前，全国各地已有不少回民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辛亥年初，成都有清真保路同志会组织，回民与汉民一道，进行了反对清政府将铁道转让帝国主义的斗争，揭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武昌首义，新军中有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穆斯林战士，其中马骥云、沙全海等人都是革命团体中的重要人物，有一些还任重要职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各省起义浪潮中，西安一地就有 1000 余回民拿起武器，参加了光复战役；宁夏有穆斯林马曰虎、哈明等人，积极参与光复宁夏的战斗；上海有清真商团等组织，直接参与光复上海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一） 清真商团参与光复上海

清末朝政腐败，国势垂危，有识之士咸感非推翻清朝专制，中华民族不能转弱为强。在辛亥年前上海各行各业已出现商团、体育会、商余学会等组织，名为“锻炼体魄，保卫阊阖，”实质上准备一旦革命爆发，起而响应。各商团等又联合成立商团公会，统一指

挥。商团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治安的实事，如出巡放哨，防止盗窃、禁烟禁赌等，并获得官厅信任，发给枪枝，供出防之用。

初起回民已有参加商余学会的。未几，不少回民青年感到本着穆斯林伸张正义、崇尚武术的精神，建议自行组织商团，定名清真，得到大家赞同。适值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青年们无不义愤填膺，从而加速了清真商团的筹组。辛亥年旧历四月，上海清真商团成立，公推教育界人士沙善余为团长，报界人士伍特公为副团长。同盟会会员回民底奇峰参加了成立大会，在会上痛陈国事日非，人民极应奋发图强，暗示非革命不能图存，慷慨激昂，听者动容。说罢便脱下他穿的湖色熟罗长衫，连同袋中的数枚银元和表链等，一并捐赠作开办费，与会者纷纷响应，情绪高涨。

上海清真商团成立后，加入了上海商团公会，初借清真寺北寺（今福佑路清真寺）为临时办事处，后迁至方浜路广福寺，营部仍在清真寺北寺。以九亩地隙地为操场，每日清晨操练，教练员为出身军校的回民马伦山，教练认真。团长以身作则，参与受训，团员精神饱满，坚持出操，并在晚间参加听课，由教练员讲解操法，或由团长演讲国内外形势，有时邀请外界专家讲课，灌输革命思想。这样早晚训练，既丰富了穆斯林青年的业余生活，又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锻炼，深得穆斯林青年的欢迎，因而团员人数由初建时的48人逐步增加到120人，其中有手工艺者和艺徒，也有医生、教员。团员自备服装，认交团费，自力更生，不受捐款。

清真商团成立甫经四月，旧历8月19日（公历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上海各商团为了统一指挥，互相策应，于旧历9月8日在九亩地举行总检阅，并推临时总司令。12日各商团负责人开会，主席李平书宣布商团6000余人，应作好准备，如次日听到救

火会钟楼先响 9 下, 继响 13 下, 全体团员应立即出发, 分赴各指定地点布防, 与会耆闻主席布置, 已悟到上海决定于 9 月 13 日起义, 会后加紧布置。清真商团当即召开团员会议, 传达任务, 是夜全体团员均住宿于清真寺北寺待命。

13 日午前钟声响后, 闸北首先发动。时城内清廷官吏闻变, 仓皇遁入租界, 官署遂被起义军占领。主持起义的陈其美, 午后率敢死队和商团团员等抵达江南制造局, 以《民立报》记者身份偕数人进制造局见总办劝降, 总办不但不允, 且把陈等扣留。敢死队员见事急, 乃向局门进攻, 守者顽抗, 攻者略有死伤。留驻在南市的商团, 闻讯立即集队往援, 仍不得入。乃逾后墙入内, 放火烧屋, 总办见火起, 惊惶失措, 乘小轮逃脱, 守者遂无斗志, 黎明时起义者攻入, 占领全局, 陈得以脱险。清真商团和其他商团, 乃从局中分取枪械弹药, 加强武装, 高唱凯歌而还。

13 日夜清真商团负责在西北城一带巡逻, 如九亩地、改过所、火药局等皆为要地, 责任甚重。是夜与平日无异, 地方安堵。市民一觉醒来, 方知上海已胜利光复, 鸡犬不惊, 无不喜形于色, 互相祝贺。

上海光复后, 清真商团担任火车站的检查工作。同年民军进攻南京受阻, 电沪求援, 清真商团曾奉派随军赴宁, 参加攻击天堡城之役。部份团员随火车解运餉糈赴宁, 到达下关, 因无清真食品供应, 曾以山芋充饥数日。南京光复后, 清真商团又在下关担任兵站工作。次年, 底奇峰传达陈其美都督命令, 要清真商团派员赴浦口, 办理北伐军大本营运输军需兵站及军报工作, 于是团中派出团员 30 人先赴浦口, 驻清真寺内, 继而随北伐军到徐州, 历时三月。回沪时因不受薪酬, 曾得到皖省都督柏文蔚嘉奖, 沪军都督陈其美给团员们颁发了中华民国光复奖章。

（二） 反对袁世凯称帝

辛亥革命胜利，清帝退位，结束了延续 2000 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被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1913 年革命军在沪发动“二次革命”，清真商团仍在西北城出防，直至革命失败，才忍痛撤防。不久袁氏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宣布解散商团，清真商团仅交出枪械，而将所有子弹和在天堡城战役中缴获清军的炮弹壳，投入小河滨中，以免被袁军利用。

清真商团结束后，所有团员都回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陈其美曾邀清团长沙善余出任政府官职，为沙氏谢绝，仍回教育界工作。

1915 年袁氏称帝心切，不惜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廿一条卖国条约，以冀日人支持帝制。为了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特成立御用劝进机构筹安会。筹安会盗用北京中国回教俱进会名义，将拟好的“劝进书”稿邮寄上海，嘱立即盖章缮发，并来电催办。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代表上海穆斯林，复电拒绝。电文曰：“闻电敬悉。事关政体，恪守会章，不敢妄议。”并将电稿分送上海各报发表，以示抗议。其时原上海清真商团团长沙善余在济南任山东高等学堂教育长兼代校长，袁氏称帝后，下诏封沙实授校长，晋秩三品，沙拒受伪职，愤而弃职来沪，从事新闻工作。

早在 1912 年，袁氏野心即日益暴露，各报驻京记者拟发出电讯予以披露，均被电报局扣留不发。时上海新闻界商请英商路透社，以英文拍发北京政治暗流讯息，路透社为统一电报文稿起见，特聘原上海清真商团副团长伍特公为英文译员，每日将有关袁氏动向的新闻译好，分送中国各报馆，即时登载，使袁氏野心公布于世，从而推动反袁斗争。

（三） 刺杀郑汝成

在反袁斗争中，值得记述的还有回民尹神武刺杀袁氏爪牙郑汝成事。尹神武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在各个时期发起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等，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5年由日本回沪。孙中山令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尹神武任总部实行部负责人，共同商讨反袁斗争。

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拥有重兵，扼守长江咽喉，控制海军，袁氏依为东南屏障。革命党人认为如不除郑，则反袁形势不利。1915年11月10日，正值日本强迫中国接受廿一条卖国条约仅仅半年之际，郑汝成恬不知耻地赴日驻沪总领馆祝贺日皇加冕典礼，更引起上海人民的愤怒。革命党人获悉此讯后，由陈其美、尹神武布置刺郑任务，决定派王小峰、王铭山两人执行，携带手榴弹2枚，手枪2支。郑于当日上午10时许赴日领馆，当他的汽车开至白渡桥礼查饭店门口时，王铭山投出手榴弹2枚，将汽车玻璃击碎，司机受伤，汽车停驶，王小峰即时飞身跳上汽车，对准郑头部，连发10余弹，郑当即毙命。二王当场被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刺郑后袁氏大为惊恐，日领馆的庆祝活动亦因之黯然失色。尹事后匿居法租界，对王氏家属进行安抚。当年12月15日革命党人又相继发动和领导肇和兵舰起义和炮轰制造局的重大行动，惜事机不密，未获成功，是役尹率领同志参加战斗。

1916年初，袁氏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下，在云南起义军勇猛攻击下，被迫取消帝制，于是年6月6日暴毙，刺郑案了结。但北洋军阀政府并未放松对尹的追查，1917年11月28日由于党内叛徒告密，尹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各受酷刑，坚贞不屈，未泄露党内机密。革命党人及孙中山先生营救未果，遂于1918年5月11日

上午 10 时半在龙华大操场英勇就义，年仅 28 岁。刑前留下就义诗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神武骨血留江南。时人不识余心乐，留下英名万古传。”

据《新申报》报导：“尹受刑时含笑自若，毫无惧色，简直是一健儿。”尹就义后，遗体由回教堂收殓，按照伊斯兰教礼俗办理丧葬，安葬于日晖港清真公墓。在沪回民多往吊唁，为之祈祷。料理尹遗体的两位阿訇王鸿祥、李永清曾透露，尹尸体青肿，系生前受刑所致。淞沪警察厅获悉后，认为有损官厅声誉，将两位阿訇拘押候讯，经上海清真董事会出面保释，警察厅令两位阿訇声明并无此事，正是欲盖弥彰。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尹神武为革命烈士，颁发了证书。

上海穆斯林在辛亥革命及反袁斗争中的贡献，给革命的影响甚大。孙中山先生说：“总而言之，中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成功。打倒帝国主义工作，非有回族人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

辛亥革命及反袁斗争，虽未能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在革命征途中迈进了一大步，在嗣后的革命斗争中，上海回民一如既往，与汉民共同奋斗，迎来了全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 1855 年和 1856 年在福州英华书院和通州潞河书院先后成立的两个学生青年会。

1890 年中国基督教宣教大会在上海举行。这个主要由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宣教大会邀请北美青年协会派人来中国开展青年会工作。1895 年北美协会派美国干事来会理 (Lyons) 来中国, 他在 1896 年协助成立天津青年会, 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这时全国已有学校青年会 27 处。1896 年 11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学校青年会全国大会, 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委会, 这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前身。

1898 年北美协会派美国干事路义思来上海筹办青年会。1900 年 1 月 6 日, 由 35 位基督教青年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皇家亚洲学会”召开“上海基督教中国青年会”成立大会。会章的宗旨是“提倡德、智、体三育和‘非以役人, 乃役于人’的精神以改造社会, 造就青年”; 其活动是“利用公余时间, 提倡教品辅仁的团契和高尚娱乐以及补习教育等”。主要参加者有张振声、宋耀如、颜惠庆、曹雪廉、黄佐庭、颜德庆等人, 由张振声任会长、路义思任总干事。这年冬天路义思去北方任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随军牧师, 由曹雪廉继任总干事。

上海青年会成立后, 募得捐款 85 元在北苏州路 17 号(河南路与四川路之间)租屋二间作为临时会所, 内设阅览室、课室和办公室。同年 10 月搬到南京路 194 号(现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旧地)。1903 年 7 月 2 日又搬到北京路 15 号 B(在江西路转角), 会所比前扩大, 除原有课室、阅览室、办公室外, 还有一个不大的礼堂, 并设简易宿舍。在此期间, 上海青年会董事部有黄佐庭、颜惠庆、

织的元始，亦是金子云先生为伊斯兰教奉献一生的开始。

务本堂成立后，金子云先生协同 12 位热心人士创立务本学堂，培植回族子弟。1906 年复随同哈少夫、石子藩等热心人士发起扩建穿心街清真寺大殿，以满足伊斯兰教友宗教活动的需要。1909 年教务迅猛发展，务本堂的组织机构不能适应形势要求，金子云与 94 位穿心街清真寺乡彦发起，推选社会名流马榕轩为总董，哈少夫、金星伯为协董，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这是上海伊斯兰教近百年史上划时代的社团，对上海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巩固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对国内各地伊斯兰团体的勃兴也有重大影响。在该会成立的第一年中，金子云等 14 人积极工作，打开局面，受到董事会的书面嘉奖。他在董事会担任经理银钱董事，会同石子藩做好计划安排，开源节流，按月公布收支情况，按年编造征信录。还担任经理，施布、施椽董事，办事公正，按期公布工作情况，其务实精神得到群众普遍赞扬。

按照伊斯兰教传统习俗，在每年春节伊始，举行一次全面的“走公坟”扫墓活动。这与教外一家一户各扫自家坟墓的习俗完全不同，显示了穆斯林不分中外、不分肤色人种、生前死后休戚相关，皆为兄弟的团结精神。清真董事会成立后，走公坟活动由董事领先，邀请全市清真寺教长莅临，为亡故教友祈祷，并视察各墓是否有损坏情况。1910 年，走公坟队伍在肇嘉浜路清真别墅集合整队时、以人数众多，别墅不能容纳，金子云先生乃提议扩建清真别墅，并带头认捐银元 1000 元，当场得到多数人赞助，推蒋星阶先生负责，完成扩建大业。

金子云一生为伊斯兰教所作的贡献，难以殚述。除以上诸端外，还有最主要的三项，一是独力捐献小桃园为清真寺，二是办学校，办孤儿教养所；三是为朝觐做了大量工作。

1917年，他为了振兴伊斯兰教，立志建寺传教，独资购入西仓街117号，占地2.4亩的小桃园花园住宅，奉献作清真寺，邀请清真董事会哈少夫到寺作证，舍产入公，勒石为碑，声明今后金氏子孙放弃对财产权利的主张。1925年，他认为花园住宅的建筑不符合清真寺要求，希望把小桃园清真寺改造成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一流清真寺，又献出银元一万元，附建筑设计图，送请清真董事会协助办理。他愿望受到上海市内外广大穆斯林的赞助和拥护，劝募集资开展顺利，施工三年告成，建筑费用共银十万两，捐款收支两抵，尚缺银一万两，复由金子云认交补足。施工期中、金先生不辞酷热严寒，监督施工，以保证建筑质量。小桃园清真寺的建筑规格、风貌和沐浴室设备、经堂大殿布置，为本市各清真寺之冠，聘请的教长道德学识均属上乘。这里的一切，无不凝聚着金先生对宗教的虔诚信念和对真主的尊重敬畏。他虽已离开我们数十年，但他的精神长留在人们心中。

清末民初，中国人民身受半封建半殖民地压迫，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还多一层宗教压迫和民族压迫，以致贫穷困苦，文化落后，有“穷回回”之称。回族有识之士，千方百计，利用仅有的微薄力量，开展启蒙教育，让无力上学的贫寒子弟，能够享受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利。金子云把小桃园清真寺房屋交给清真董事会办学，为国家培植人材，为回族子弟传授生产技能，学生达200余人。学校因故停办后，金老又接办孤儿教养所，招收8至16岁孤儿约50名，免费供给衣食，还聘请3位教师，负责教养，授以文化知识和初等阿拉伯文古兰经课程，一切费用概由金子云个人供给。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大功修之一，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思想上占居崇高的位置。《古兰经》规定，能自己筹措到去麦加的盘缠，身体无病能耐长途跋涉，思想上敬畏真主的人，才有朝觐的义

务，到麦加受戒，求真主宽恕过去的罪过，归来后犹如初生的婴儿，心灵纯洁。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朝觐，谁朝觐归来，亲友万人空巷欢迎祝贺。

金子云先生一生勤奋至诚，履行五大功修，对朝觐和其他功修同样重视。他在新建的小桃园清真寺设计中，特意为接待朝觐教友造了一栋楼房。当时经海路去麦加的穆斯林大都由上海启程，先达香港住回教博爱社，由博爱社接待，代购去新加坡船票；到新加坡住三卡夫清真寺；再乘船至沙特阿拉伯红海港口吉大港，登岸搭汽车至麦加。旅程中转船、等船，费用大，人辛苦、时间长。1929年金子云与肇嘉浜清真寺教长韩礼堂、金耀祖阿訇、达静轩等人赴麦加朝觐归国途中，遇大风大浪达18昼夜，晕船呕吐，坐卧不宁，饮食不进，疲惫不堪。到达新加坡后，金先生与新加坡宗教界名人、三卡夫清真寺教长会见，情谊异常融洽，谈及旅途遭遇风浪，希望为中国穆斯林朝觐提供方便，每年定期自上海至吉大港放直达专轮。这一愿望得到三卡夫清真寺教长的积极支持，旋即与新加坡英商蓝烟囱公司挂钩。金回上海又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附设的中国旅行社和上海太古轮船公司磋商，终于达成协议，自1930年起，由蓝烟囱轮船公司特放直达专轮，各方教友、齐集上海出发，旅费既省，又免转船之苦。金子云为教友们完成朝觐功课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朝觐的人数大量增多，国内各地朝觐旅客，主要是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穆斯林，住在小桃园清真寺（当时称西寺），金先生特意为他们提供膳宿便利，替他们办理出国护照，由元利商号作担保，向海关请准出国免检手续，预定舱位船票，联系海关检疫所派医生到西寺检查体格、种牛痘、打防疫针，并且顺从穆斯林习惯，派来男女医生分别为男女旅客服务。朝觐人员在西寺等船期间，如同在家一样，住宿、做功课、沐浴净身都非常便利，

办理出国手续也不因从内地初次来沪而感到困难。开船之日，西寺派车送他们登轮，握手告别。如此接待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达 1000 余人次，所以西北诸省穆斯林对金子云先生留有深刻印象。

金子云的一生，是为伊斯兰奉献的一生，其光辉事迹犹如一根纽带，把西北的穆斯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上海穆斯林联系起来，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金子云先生于 1937 年逝世。伊斯兰习俗，逝世后行殡葬礼时，如有刚从麦加归来，尚未到家的人迳来参加殡礼祈祷仪式，最能蒙受真主恩准宽恕。当时适有一外轮载自麦加返回的朝觐旅客在途，金氏家属通过中国旅行社协助，急电外轮船长加快船速，急返上海。朝觐教民全体下船后，直奔现场，参加金老丧礼，做祈祷仪式，使金氏家属和伊斯兰教全体教友深受感动。

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哈德成教长

金 贵 南

哈德成(1888年—1943年)又名国桢,经名希拉伦丁,陕西省南郑县人,出身于宗教家庭。幼时曾入私塾,稍长,到河南、镇江等地清真寺当“海利法”学经。

1910年前后,上海伊斯兰教热心宗教事业的老先生,如马晋卿、刘彬如、杨福洲等,为了和海外伊斯兰教国家交流宗教文化,在上海创办协兴公司。哈德成时年20余岁,为协兴公司的成员,曾长期居住在科伦坡(今斯里兰卡首都),还先后赴埃及、香港、新加坡等地拜访硕彦名宿,研究学问,并对这些国家的宗教、教育、文化事业进行考察研究,丰富了宗教知识。同时,他还学习掌握了印度、波斯、乌尔多等多种语言。

1924年,哈德成36岁,自海外归国,受聘为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教长。

一、创办中国回教学会,从事译经工作

哈德成教长在海外旅居多年,视野开阔,归来后,目睹国内教务日颓,认为必须团结热心人士,共同努力,通过提高宗教教育水平,开展宗教宣传,进行伊斯兰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改革,才能改变国内伊斯兰教现状。于是,联合上海伊斯兰教知名人士刘彬如、马刚侯、伍特公、马晋卿、杨稼山等结成团体,以后又得到哈少夫、马乙棠、金子云等赞助,于1925年6月,创立了中国回教学会,马

刚侯当选为干事长，哈德成当选为副干事长。学会的宗旨是阐明伊斯兰教教义，举办教育事业，联络中外同教情谊，扶助公益事业。该会章程指出，“本会之唯一希望，在联合吾教优秀人材，研究精湛之学理，发挥固有之本能，以笔墨司喉舌，以导物为职志，戮力同心，分途并进，祛深闭固拒之习，收集思广益之功。这个学会是 20 世纪上半期我国影响较大的伊斯兰学术团体，在近代中国伊斯兰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回教学会成立后，哈德成殚精竭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翻译《古兰经》的工作，成就很大。《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举凡伊斯兰教的一切教义、法律、史实，无不包罗其中，研究伊斯兰教义，不能不研究《古兰经》。但其文法古朴，义理深奥。中国回教学会成立后，将翻译《古兰经》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公推哈德成和沙善余、伍特公主持，由德成教长就阿拉伯原文逐段讲解，特公先生笔录，进而参考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修改成初稿，再与沙善余先生一起商榷校正，一字一句，反复斟酌，最后再由德成教长审定。当时共译就三卷，因故中辍。已译出的三卷陆续在《中国回教学会月刊》上发表，刊出后，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被公认为是汉译《古兰经》(文言文)的最佳之作。哈教长立志完成这项工作，1939 年马坚由埃及学成归国，哈教长便与马晋卿、伍特公、沙善余、杨福洲等先生商议，要重整旗鼓，完成大业。马晋卿先生慨然捐赠房产作为译经基金，于是德成教长亲去香港邀请马坚到上海参加译经工作。经过 14 个月的努力，译成了十五卷。以后上海的环境日趋恶劣，马坚返回云南省沙甸故乡，译经工作不得不暂告停顿。

1942 年 3 月，德成教长离开上海到了重庆，仍念念不忘译经工作，终于转道云南，到沙甸参与校订马坚所译的译稿，直至逝

世。德成教长毕生的志愿是翻译《古兰经》，虽临终还没有看到《古兰经》翻译工作的完成，然而他一生为翻译《古兰经》呕心沥血，为以后汉译《古兰经》的问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发起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

为了培养伊斯兰教优秀人才，1928年德成教长和达浦生阿訇共同发起，并得到中国回教学会热心教育同道的支持，创办了伊斯兰师范学校，为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宗教学术研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参加翻译《古兰经》、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的马坚等人，就是该校毕业生。同时，改革中国伊斯兰教育的传统办学方式，在中国教育史和宗教史上的贡献是较大的。

伊斯兰教国家有着悠久的宗教教育传统，即是在清真寺内进行宗教教育，中国伊斯兰教也继承了这样的教育传统。先知穆罕默德教导说：“求学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德成教长觉得要培养一批能适应社会需要，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优秀人才，必须革新宗教教育，创办新式学校。为此在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改革的尝试。

伊斯兰师范学校成立后，达浦生阿訇为校长，哈德成为教务主任，亲自兼课，自编教材，认真讲授。过去许多阿訇不论传教还是讲学，往往墨守成规，德成教长认为伊斯兰教的精神在于通达，应顺应潮流，随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例如有人问德成教长：“猪油做的肥皂能不能用？”他答道：“你叫它猪油，还是叫它肥皂？猪油经过化学作用，成为一个新的东西，已是肥皂了，怎么不能用呢？”德成教长用这种新的教学思想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受到很大的教益。在教学方法上，德成教长不是沿袭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方法，而是以实际知识诱导学生讨论、辨析，以真正理解知识的

方法进行教学，这在过去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家中是少见的。

三、热爱国家，热爱宗教

先知穆罕默德说：“爱国属于伊玛尼。”哈德成教长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长，严格地遵循圣谕，热爱祖国。他经常在宣讲教义中，强调伊斯兰教徒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强调维护正义是每个教徒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德行。他在宣讲教义中曾说：“真正的伊斯兰精神包含了……遇到维护正义的当儿，我应该把一切都牺牲掉，却不能为了保全这一切，而牺牲正义，违背真理。”当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时，德成教长认为这是非正义的违背真理的暴行，因而始终反对日寇侵华，主张坚决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德成教长以上海租界为屏障，领导上海伊斯兰教胞从事救国工作，经常向教胞宣讲抗日救国的意义。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军民奋起抵抗，成千上万百姓扶老携幼，从战区避居租界，无处安身。德成教长四出奔走，在穆斯林士绅支持下，成立了上海浙江路回教堂难民收容所。后又以太仓路清真寺设立第二所回教难民收容所，使难民们得到安顿。同时，努力为难民筹募口粮、被服及其他生活用品，以解决难民的生活困难。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入租界，魔掌控制了整个上海，情况愈益严重。这时德成教长受到日特的监视，浙江路清真寺每天总有几名日本特务前来，注视着清真寺的一切活动。德成教长的处境日益危险，曾对马晋卿先生说：“万一日本特务拉下脸来，就不好办了。”这时传来消息，日寇知道哈教长在上海伊斯兰教徒中的声望和地位，特聘请他担任回教联合总会的顾问。哈教长听到风声，更坚定了离开上海的决心，于是改名马国成，悄悄弃家离开上海，表现了决不屈从敌人的民族气节。

哈教长离开上海后，到了西安、重庆等地，在这些地方，多次应邀发表演说和广播讲话，揭发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残暴罪行。同时，号召教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为激励群众，奋起抗日作出了贡献。

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哈德成教长自幼失学，从未进过专门学校，常常引为憾事。他深知要造福于国家、社会和宗教，没有丰富的知识是不行的，因此刻苦自学，不仅精通汉文，还学会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印度文和马来亚文等多种文字，在我国伊斯兰教学者中实属罕见。他要求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则是诲人不倦。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对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白寿彝先生在一篇怀念哈德成教长的文章中說：“我曾经作了一篇关于基本信仰的文章，虔敬地请阿訇给我一些指正。第二天，他就告诉我说：‘你那篇文章很好，但是有些地方是译错了，拉了字母的对音也有一点不合惯例。’于是他就把文章的错误一一指给我瞧，并随手用笔修正。他对于一个后辈的作品，详阅得这样迅速而精细，这真使我惊异。但更使我惊异的是三天以后，阿訇居然把我这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了，并对我用以经注经的学习办法，给予肯定。这对我是一个绝大的鼓励。”直到1942年，就是哈德成教长去世的前一年，他在重庆时，还对白寿彝说：“我们需要一个大学校，我们可以在这里培植我们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我们现在就要着手联络同志不能再晚了。”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宏愿。德成教长这种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我们后学者永远应该学习的。

哈德成教长身处旧社会十里洋场、人欲横流的上海，但不为物移，洁身自好，靠自己的工作维持生计，而不愿去诵经吃“海底”。

他对穷苦的教胞，总是十分体恤，给予接济，只要有贫苦教胞去找他，总是有求必应，不使他们空手而返。对待教友，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毫不怠慢，对待青年爱护备至，情同父子。对于学生的态度，总是和蔼可亲，从来没有摆过严师的架子，在学业上循循善诱，在生活上关怀备至，深得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

哈德成教长积劳成疾，于1943年10月25日病逝，享年56岁。广大穆斯林都为过早地失去一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平易近人的一代宗师，感到深切的怀念和追思。为缅怀哈教长诞生100周年、归真45周年，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和云南个旧市沙甸村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上海市伊协于1988年12月23日在小桃园清真寺举行诵经纪念活动，本市其他5座清真寺也分别举办纪念活动。云南省个旧市沙甸村穆斯林于1988年1月26日至28日以“品德兼优的伊斯兰教育家哈德成永远活在沙甸穆斯林心中”的缅怀之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为其莹墓立碑。80高龄的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于1988年12月19日亲笔撰写了“哈德成阿洪墓表”。

哈少夫生平及其对上海 伊斯兰教的贡献

马 维 寿

哈少夫(少甫)先生字馨,别号观津老人,源出西域,1856年生于江苏江宁,1934年逝世,终年79岁,他自幼孝顺双亲,友于兄弟。以家道贫寒,乃弃学经商,从事古玩行业。勤奋好学,多方请益,逐步掌握了金石、书画鉴别技术。其后,为经营古玩遍游全国各地,见多识广,鉴别益精。

先生曾两度赴日本,广交日本朝野名流和文人雅士,为日本首相犬养毅所推崇。回国后,犬养毅于1929年来华,专诚回访,交谈极欢。先生以珍藏宝贵铁砚出示,犬养毅赏玩不释手,作赞留念,又书赠“铁庐”匾额一方。1931年日军犯境,蹂躏上海闸北,哈爱国忧民悲愤不可终日。当时日本执政者仍为犬养毅,乃急电警告其悬崖勒马。旋闻犬养毅遭主战派狙击丧生。

1915年先生将经营古玩数十年来收藏的精品参加美国在巴拿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展出,荣获美国及我国工商部奖章。1929年,上海举行中国美术艺术展览会,聘为理事。他收藏的文物中,以宋赵忠毅铁砚、苏东坡铁如意为盖世奇珍,因以铁庐名其寓。先生擅长金石书画鉴别之术,且品德高尚,信誉卓著。日本人士以文物有无“观津鉴定之章”,而定其真伪,决定取舍。晚年为振兴宗教,开办启蒙教育,尽出生平收藏珍贵文物,集款办学。

先生为江宁世家,笃信伊斯兰教。认为振兴宗教,必须办教

育,教胞有文化知识,生活才有保障,宗教始能保持永久,并主张办教育不应离开宗教根本,经堂教育与一般文化教育应当并重。他认为兴宗教必须重伦理道德,以挽颓风。认为兴宗教必须结团体,整顿教规,扩建清真寺。先生一生节俭,力斥奢侈之风,对宗教事业献万金无吝色,凡兴办各项公益善举,历来本人先认捐巨款,才向社会动员劝募。他常说:“留财给儿孙,不如留德给儿孙。子孙贤,财多反堕其志;子孙劣,财多适长其骄奢之心。”他治理一生积蓄,确如斯言,生前即将文物财款捐助宗教慈善事业,身后除遗留住房一所别无长物。

先生坚信汉民回民均系真主所造,故对国内水旱兵灾,救济不遗余力,从未因宗教信仰不同,而有轻重之分。

先生生平事迹,择其要者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 扩建穿心街清真寺

哈少夫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毕生致力建设清真寺。上海穿心街清真寺始建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占地6分,对日益增多的乡老宗教活动不能容纳。1900年,哈少夫与蒋星阶等22位乡老发起集资扩建两进大殿。1905年又与金子云、蒋星阶、石子藩等31位乡老发起扩建三进大殿,寺容日益庄严,寺址日益宽畅,宗教活动蒸蒸日上。在此期间,他还殚精竭力,为穿心街清真寺做了几件大事。

1. 整顿教务。哈少夫尊重教长,配合教长做好宣教工作,为教长扫除宣教中遭遇到的障碍。穿心街清真寺曾发生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有一位富乡老,雪茄不离口,上殿不熄烟,教长指责其对真主大不敬。该乡老恼羞成怒,反唇相讥,使教长很难堪。哈少甫为此专门召开全寺乡老大会,从教务大局出发,对吸烟者进行严肃的

说理批评，支持教长工作。1927年大掌教王裕三因众阿訇排挤，提出辞职，哈少甫、马乙棠向教友解释后，由清真董事会作出决议并通告：“大掌教系众乡老所公聘主持教务。苟有不服从者，尽可赴他寺。如借端捣乱，即视为公敌。”从而维护了大掌教的权威，使教务工作正常进行。

2. 修建回民公墓围墙和清真别墅，董理各项殡葬事宜。哈少甫带头认捐，并积极动员劝募，修筑回民公墓围墙和清真别墅。在他的倡议下，清真董事会派专职董事负责殡葬事宜，为回民、教友解决殡葬困难。

3. 翻造三层楼房和沐浴室。穿心街清真寺正面房屋陈旧，水房简陋狭窄，用木吊桶盛水洗浴，多有不便。哈少甫发起翻造三层楼房，新建水房，以改善洗浴条件，深得全体乡老拥护。全部工程用款1.8万元，哈少甫先自认捐6000元，并以侯家浜哈世德堂房地产捐助清真寺。1934年哈少甫以79岁归主，弥留之际，昏迷醒来，第一句话，问水房水管接通否？可见他临终尚萦萦不忘教友福利。

哈少甫致力于宗教事业，对小桃园清真寺、草鞋湾南寺、小沙渡清真寺、松江寺等均有奉献，不及细载。

1924年5月21日广东博爱社以粤当道有变卖广州流花桥外先贤宛葛师墓及桂花岗回教坟场之举，请求上海清真董事会支援。哈少甫以其对宗教的虔诚和在教内外的声望，主持董事会议，决议先电孙中山及粤省长，力争取消变卖的决定，并联络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镇江、杭州、扬州各地联合行动。6月26日接广州怀圣寺、香港博爱社函，谓已经市政厅同意，撤消拆墓原案，并准将桂花岗地保留为回教公有坟场，会同回教长勘定界址，详细绘图，依界勒石。由此可见哈少甫对伊斯兰教所作的贡献，已超越上海范围，

并为外地所信赖。

（二） 办学兴教

哈少夫发起募捐，兴办二等小学，遴选优秀教师授课，任命学董专职督导，以提高教学质量。学制分高初二等。高班除一般课程外，加设英文课，宗教课有读经与讲经。数年后，学校人才辈出，如王义、杨稼山、马功甫、陈叔平等均品学兼优，毕业后能为宗教出力；在社会上亦有建树。

教友马晋卿献出青莲街福田庵土地办学兴教，哈少夫乃利用土地建造房屋，将生平珍藏文物展览义卖得价 2.3 万元，复募集十余万元，建造中国回教学会会址，由学会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和敦化小学。两校人才辈出，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如伊斯兰师范学校高材生马坚留学埃及，以毕生精力完成汉译古兰经大业。敦化小学聘请哈少夫为校董会首席校董。回教同人为纪念哈少夫，将中国回教学会会址旁的市房取名观津里，房租收入拨作学会开展活动、发动奖学金、以及两校经费。

（三） 领导护教斗争

1932 年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曾仲鸣主编的《南华文艺》刊载《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一文，北新书店出版《小猪八戒》一书，污蔑伊斯兰教，贬低穆斯林人格地位。上海穆斯林群情激愤，全国各地穆斯林亦奋起声援。哈少夫领导斗争，在各个关键时刻。正确决策，防止偏差，对争取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当此事发生之初，穆斯林们有洗好大净（沐浴）准备取舍希德（殉教）者，有建议通报西北陕甘宁青各省求援者，也有建议通电上土耳其回教总部，吁请国际伊斯兰声援者，思想较乱。哈少夫即在

穿心街清真寺召开回教代表大会，主持会议、研究行动步骤。他珍惜穆斯林的热情，关注穆斯林的安全，劝慰大家切莫盲动，要鼓声势，讲策略，夺取胜利。他以垂暮之年，躬亲出动，并由傅统先、马达五辅佐，向南华文艺社抗议。经过一场激烈争论，南华文艺社承认错误，愿立悔过书，原文撰写人也于民国 32 年（公元 1943 年）9 月 28 日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上登启事道歉。但《南华文艺》对上海清真董事会的驳斥文章拒绝刊登，同时又发生北新书店事件，群情犹如火上泼油，克制不住，少数人击碎北新书店玻璃柜及店面玻璃。哈少夫认为此种暴力行为，可能造成流血伤人，主张合法斗争，急请金煦生、王义劝阻，请穆斯林兄弟克制忍耐，同时请律师交涉，无结果，乃进京请愿。

请愿代表携行政院命令和批文返沪，上海市政府拒不执行，护教斗争仍无结果。哈少夫又亲自出马，由达浦生教长和王义、伍咏霞陪同，向市政府请愿，市长避而不见。最后，哈少夫请律师与租界磋商，由租界对北新书店强制执行停业三天，三天后改名“百新”复业，使纠纷胜利解决。在这场护教斗争中，由于哈少夫以 76 岁高龄，虽体衰力竭但引导有方，幸未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发生流血伤人情况。

（四） 与基督教尚贤堂的关系

尚贤堂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李佳白创办的宗教研究单位。李佳白与哈少夫遵循各自的宗教教义，在探求哲理劝人行善等方面有共同认识，故相交颇深，哈少夫被聘为尚贤堂董事。他借此利用基督教讲坛阐扬伊斯兰教哲理，消除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的隔阂和误解，提高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起了清真寺讲坛所起不到的作用。

1909年尚贤堂请哈少夫演讲，阐明伊斯兰教义，他不卑不亢，列举事实，同时指出，外国基督教士来中国传教，道德高尚者固占多数，但亦有挟恃国势，偏袒教友，激成事端的，欲使民教相安，必须整顿教规，遵循礼法。又如天津报社刊文侮辱回教，报社经理仗势拒不认错，激成众怒，双方动武。哈少夫以舆论声援天津穆斯林，并就商于李佳白，指出今天伊斯兰教受侮辱，明天可能基督教也会受辱。因此李佳白同意以尚贤堂名义召开宗教联合会，请哈德成教长做报告，对天津事件发表意见。哈教长在会上从伊斯兰爱和平、顺天命、敬言爱人谈起，批评天津日报，受到全体听讲者支持。

哈少夫还与尚贤堂达成协议，不定期邀请伊斯兰教长到尚贤堂宣讲。为集资兴学，他在尚贤堂陈设文物展览，李佳白亦提供方便。

（五）艺苑冶情

哈少夫中年丧偶，立志不续弦，清静超脱地除献身宗教、兴办学校外，无家室之累。胸怀江山秀色，以丹青点染再现尺素为乐，与艺苑名流切磋十余载，艺乃大进。他擅松石，朴雅有致，得者如获至宝；尤为东邻国际友人所推崇。所寓铁庐设桐荫读画楼，时与三五知己研讨文墨，展览佳品。1930年，时年73，作墨梅册页，被辑入《一百名家画梅集》。

1910年，上海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发起成立上海书画研究会，会址在上海小花园商余雅集楼上，随时晤对，互相考证，公举李平书为总理，哈少夫、毛子坚为协理，赵云舫、倪墨耕、庞莱臣、何诗荪、狄楚青、蒲作英、胡二梅、陆廉夫等为会董。他与杭州西泠印社有密切关系，吴昌硕歿后，哈少夫继任西泠印社社长。

蒋国榜撰《哈观津先生家传》云：“早岁与同社创上海题襟馆，壬子（1912年）复集资建馆于西湖孤山之巔。先是吴缶庐先生为社长，迨归道山，众推先生为祭酒。”关于题襟馆在孤山西冷印社建馆，据乙卯夏4月吴昌硕撰《隐闲楼记》云：“余近岁卜居于海上，四方避地之士亦于其时来集于此，于是有题襟馆书画会。会以书画名，仅尊其癖嗜相与讨论而已。然僦数椽之屋，俯四达之衢市，声如沸，嚣且尘，余虽老而聋，颇厌苦之。既而西冷印社落成于杭之西湖，其四照阁之隅有隙地，爰商于社中，筑斯楼，鸠工庀材之费则题襟馆书画会任之。”又云：“为力尤勤者哈君少孚（夫）、胡君二梅、王君一亭、毛君子坚、吴君石潜。吴与余皆署名于印社，复推予为祭酒。斯楼既成，则书画会与印社可并峙于湖山。盖书画与治印，直文人之余事，今合并而佳得地，分任其筑构，不谓今之世无之，即礼前哲而告之，诚将引以为快也。”

乙卯秋隐闲楼落成、哈少夫撰联，清道人书。其联云：“梅鹤为邻，小坐依然图画；尊鲈下酒，故乡无此湖山。”十年以后，癸亥间，题襟馆残破飘摇，哈少夫又捐款修理。

（六） 处理珠玉汇市讼案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市面兴隆，珠玉业乃假上海邑庙罗神殿为茶会。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京、苏珠玉业同人于侯家浜设汇市，购地盖屋，设摊营业。光绪十年、十一年两度扩展。一应费用，苏帮捐款2050元、京帮捐款计1008元，曾勒石立碑。此后苏帮扬言苏帮出资七成，各帮三成，京帮原捐造费只百分之一，为数甚少，其他款项乃属厢抬押款。适汇市司帐金理国病故，京帮要求查帐，苏帮竟以将于会址办学为由，停业闭市。光绪十六年京苏两帮开始结讼。京帮多为南京籍回民，以此董事沙云程、金吉云、严文

治、金子云具状辩诉,认为断无关闭同业千余人谋生之源而办学之理,愿另行觅地办学,一应费用由京苏两帮分摊。苏帮挟其优越之财势,讼案累年不休,历经县、府、道、两江总督直至京都两宫,延至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发回苏松太兵备道断案,拖延达 19 年之久。

当诉讼后期,京帮代表多已年迈衰颓,并有亡故者,于是京帮回民公请哈少夫肩此重任。哈少夫信誉素著,吁诸社会主持正义,逐步打开被动局面。哈少夫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恪遵教规,只拜真主,不拜其他,乃捐五品官职,免除诉讼中上堂跪拜之礼。鉴于官府以高压之势,迫令京帮就范,京帮乃广泛散发“被屈冤单”,并登各大报,使社会了解讼案真相。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官方公正代表、上海商会会长李平书奉上海关道命,召集京帮代表金琴荪、苏帮代表余之芹进行调处。李素仰哈为人正直,乃假本城公益研究会发表演说,主张凡同业者皆为一体,不得再称某帮某帮,分立门户,面生意见,并代拟珠玉公所章程 20 条。同年九月断案,京苏两帮各立市场,苏帮将公所暂借与京帮贸易,限期五年。

公所复业五年后,哈少夫与同人洽议,成立振兴实业公司,发行股票,集资建立振兴汇市,1915 年建成。振兴公司总理哈鏊(哈少夫)、协理迷祥生、马鹤年。合计集资银 1.1 万两、每股 50 两。民国二十二年(公元 1933 年)哈少夫、金子云、蒋星阶、金元记均各认股 800 两,并放弃股权,股票交上海市振兴珠玉业回教同人保管委员会,此后放弃股权者还有多人。哈少夫本业古玩书画,与珠玉业向无渊源,其所以积年累月全力而谋者,乃为维持千余回民之生计。

(七) 支持全国各地教灾公益活动

辛亥以后数十年间、国家多难,天灾频仍,人民颠沛于死亡线

上。1913年军阀混战，江宁吃紧，伤兵灾民数千人，生命垂危。哈少夫为红十字会董事，与蒋星阶联合吁请盛宣怀租赁大通轮驶江宁救返。同年，浙江温州遭灾，帮助马榕轩前往赈济。1920年河南省旱灾，省府请哈少夫任赈务会副会长，负责全省救灾工作。1921年社会贤达冯梦华、孙慕韩、李伯行等，请哈少夫任山东、湖南、河南诸省义赈会董事，负责救灾工作。1931年陕西省府朱子桥成立陕灾急赈会，推哈少夫为执行委员。同年秋江苏南北涝灾严重，灾区面广，哈少夫会同南京魏梅村等组织江宁水灾急赈会，募赈款近20万元；上海各界人士并公推哈少夫任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执行委员兼审核组委员，哈少夫鉴于灾情严重，当场认捐达10余万元。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哈少夫参加战区难民临时救济，并任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董事、筹募河南、安徽、湖北临时义赈会监察。1933年6月参加北平回教难民救济；9月参加赈济黄河水灾急赈。还历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妇孺救济会、时疫医院董事、红十字会会长、南京金陵送诊给药所总董。1923年4月当时的大总统令给三等嘉禾章嘉奖，1924年3月又颁“乐善好施”匾额予以嘉奖，哈老辞谢政府表彰的荣典，表示行善为其毕生志愿，行之乃求心之所安，并非图名。

金世和先生(柳穆)以“四好”，好善、好学、好友、好古，概括哈老生平。时人誉之为文物鉴赏家、宗教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哈老临终前曾自挽一联，以明其志：

“自壮年往游东海，金石书画薄负收藏虚名。幸荷士大夫折节下交，道德有人，文章有人，每过从清谈，得助我生平智识，

惜垂老未朝天方，水旱兵灾空抱慈祥志愿。端赖诸贤达集资兴学，宗教为重，蒙养为重，庶维持悠久，更慰予死后心期。”

小桃园清真寺

金 幼 云

小桃园清真寺座落在上海复兴东路近河南南路口小桃园街。这座清真寺不仅是上海穆斯林礼拜场所，也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兄弟民族和海外各国的穆斯林。

(一)

上海从 1842 年辟为商埠后，对外贸易渐趋发展，市场经济日益繁华，来沪定居的穆斯林逐年增多。1917 年 12 月，上海清真董事会金子云董事（经名“汉志尔俩纹底里”），以其所购的西仓桥街 117 号、占地 2.4 亩的花园住宅，捐献作为清真西寺。

1925 年（伊斯兰教历 1343 年）金子云董事鉴于清真西寺房屋结构不尽符合清真寺的使用要求，建议重新翻造。他自己率先捐献，清真董事会也向国内外穆斯林劝募了不少捐款，着手翻建，历时两年余，建造成具有伊斯兰特色、拥有四座圆顶的大殿主楼，大门则改设在小桃园街。相传寺院附近原有一座小型花园，遍植桃树，极为雅致，名小桃园。由于岁月变迁，这座名噪一时的园林终于湮没无闻，而小桃园之名都留传下来用作街名，这座清真西寺也就称为小桃园清真寺。

1931 年国民党政府强令上海所有清真寺一律更名为回教堂，这座清真寺一度称为上海西城回教堂。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原住在该寺附近的穆斯林不甘忍受日本侵略者欺压，纷纷转移内

地或迁居租界，寺院冷落，缺乏维修，致逐渐损坏。1945年抗战胜利后，依靠上海穆斯林的微量捐助，只能作一些小修，维持宗教生活，始终没有力量彻底修缮，故寺院面貌仍然破落。

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亲赴小桃园清真寺视察。为了落实宗教政策，保护清真寺文物，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帮助进行大修，使这座寺院焕然一新。从此，来沪参观的国内各民族中的穆斯林及路经上海的国外各界人士，都闻名要到小桃园清真寺瞻仰寺容、访问或礼拜，使国际友人我国的宗教政策加深认识。

“文革”期间，小桃园清真寺所有珍藏的伊斯兰教各种经典、伊斯兰教书籍、名贵的字画珍品，尤其具有伊斯兰教特色的文物，被破坏殆尽。将这座驰名中外、肃穆整洁的寺院，糟蹋得面目全非。幸赖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才使小桃园清真寺免遭彻底毁灭。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恢复，政府又拨款为小桃园清真寺修缮，恢复了雄伟壮观的寺容。

(二)

小桃园清真寺是一座中国和阿拉伯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穆斯林活动场所。拥有钢筋混凝土三层楼房建筑，气势雄伟。寺院大门上方，有金光闪闪的“清真寺”三个大字，笔势飞腾，刚劲有力。大字下边有一排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文，其意为“真主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大门上首有伊斯兰教历1343年的字样，标志着小桃园清真寺翻建的起始年份。

清真寺的主要建筑物是礼拜大殿。大殿坐西朝东，钢骨水泥结构，面积约500平方米，成正方形，上下两层。底层大殿外上方悬有匾额，写有“显扬正教”四个金色大字。大殿顶部用25块乳白大方格石板嵌砌，每格装一圆灯，正中挂有吊灯，灯光映辉着洁白

独特的大殿,显得格外圣洁和静谧。殿内右上方有一座五阶的“闵白楼”(伊斯兰教教长在聚礼时登闵白楼,用阿拉伯文宣讲教义)。大殿正门,中间镶有红木的阿拉伯文对联,南北边门都用柚木制成。二楼大殿上端砌有匾额,写着一段古兰经文,意为:“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顶部呈圆形,正中上方呈拱形,饰有钢窗。屋顶为平台,四角为阿拉伯式的圆形建筑,其中东部两个圆顶是扶梯间,西部两个圆顶内各有石制方台,四条长凳,供穆斯林诵念《古兰经》之用。平台中央建有别致的四角“望月亭”,亭顶竖着高耸云霄的“星月杆”,这是伊斯兰教的标志。

礼拜大殿后壁悬挂楠木屏八幅,上面铭刻蒋国榜叙记创寺经过的《上海清真寺西寺记》,以及募集捐款的征信录,长达万余字,由回族书画家宗士福楷书。

礼拜大殿东边,间隔着洁净的大院子,建有朴素大方的中国式三层楼房一幢,底层为讲经堂,穆斯林在此学习《古兰经》和研究宗教教义。内部置有中国古老红木太师椅和大茶几,安放在东、北、南的墙壁处,西向是一排带有东方情调的朱红色落地长窗,一具红木玻璃架上放置两个小巧玲珑、洁白如玉的珊瑚,这是朝觐者于20年代由麦加朝觐带回的纪念物。还有两个小橱中,珍藏各种版本的《古兰经》,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木刻版本《古兰经》,有乌尔都文注释的印度版本《古兰经》,还有解放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的线装《古兰经》等。壁上挂着阿拉伯经文的中堂和条幅,这样的布置陈设,更加增添宗教肃穆气氛。二楼、三楼是藏书室和会议室。

礼拜大殿南首,有一座三层楼水泥钢骨的沐浴室楼,装有礼拜前洗大小净设备。沐浴室楼外墙竖有三块石碑,其中大石碑为“金

君子云积善碑”，哈蹇撰文何维朴书，惜该碑在文革中被铲毁，字迹已平。第二块碑为金子云捐出清真寺寺产函，申明该寺产今后为伊斯兰教产为穆斯林共有，与金氏子孙无涉。第三块碑为纪念孙绳武捐助机器提供自流井水的碑文。沐浴室楼东首，有一排五开间的两层建筑，原为我国穆斯林出国朝觐、途经上海的休息室，现底层为接待室和教长室。

（三）

小桃园清真寺南首西仓桥街 117 号，有一片平房，清真寺创立之初，曾在此创办过务本小学，后改为清真国民小学，学生绝大多数是回族子弟，授以普通教育、回族子弟兼学经文。敦化小学建立后该校停办，原址作明诚小学，1959 年由房管部门包租。

1986 年，为了发展需要，在市有关部门支持帮助下，区房管部门将西仓桥街 117 号已经包租的房屋归还给小桃园清真寺。1989 年市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小桃园清真寺，将该处危房翻修，拨款拆建成阿拉伯式两层楼房一座，现为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办公之用。

1928 年建立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初期在小桃园清真寺开学上课。此后曾开办过上海回教孤儿教养所，最多时招收 50 名孤儿学生，由教师授以汉文、阿拉伯文及经典。1937 年八一三抗战开始，上海回教孤儿教养所停办。1947 年又在此建崇本小学。1956 年该校更名为蓬莱区回民小学，迁往文庙路 89 号，现名南市区回民第二小学。

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我国穆斯林去圣地麦加朝觐，往往经上海放洋前往，下榻在福佑路清真寺。1917 年小桃园清真寺创立后，朝觐者遂寄居于此，并提供伙食上的方便。朝觐者的出国签证和买船票等事务，由小桃园清真寺统一委托中国旅行社办理。金子

云以其独资企业“元利商号”为出国朝觐者进出上海港口时，向海关申请免检的保证。朝觐者由上海乘船至香港，经新加坡至红海，再去麦加。这样辗转换船，时间长，费用大，有时拖至4个月始能到达麦加。当时小桃园清真寺鉴于朝觐者越来越多，商诸英商蓝烟囱公司，希望每年在伊斯兰教古尔邦节前1个月，派专轮来上海，将中国朝觐者直接送往麦加。待朝觐完毕，再派专轮接返。这个打算经过数度交涉，在国外穆斯林支持下，终于1931年第一次由蓝烟囱公司派轮来沪，承担了接送中国朝觐者往返的任务。这项活动直至八一三抗战发生后停止。通过每年的朝觐活动，增加了中国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在宗教、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交往。

解放后，在党的宗教政策光辉照耀下，来上海访问的穆斯林，除了国内民族聚居区和散居各地区穆斯林空前地增加外，国外穆斯林特别是第三世界穆斯林途径上海，来小桃园清真寺访问和礼拜的人数逐年增多，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国家总统、总理、议长、部长、将军、社会知名人士以及来沪旅游的各国穆斯林，年达2000人次，以上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增进了国际穆斯林的交往和友谊。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江 宝 城

上海市著名阿訇达浦生自海外考察伊斯兰教教务多年，1927年，回归祖国，寄寓于浙江路回教堂，与该堂教长哈德成阿訇朝夕相处，谈及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日颓，文化衰落，共商挽救之道。他们认为，“舍教育则无以挽回既倒，舍宗教教育则无以启发愚蒙。”于是立志办学兴教。适甘肃马云亭来沪，愿大力赞助。时哈德成任中国回教学会副干事长，乃由他邀请学会乡耆马晋卿、刘彬如、沙善余、伍特公、杨稼山、马子清暨上海清真董事会哈少夫、马乙棠、金子云、石子藩、伍咏霞等，在中国回教学会召开筹备会议，商定办学细则，确定校名，组织校董会，推选达浦生为校长，哈德成为教务主任。同时劝募办学基金，上述耆老士绅，多热情踊跃捐助。在新校址未建以前，先在小桃园清真西寺东楼创校，于1928年春招生开学。增聘宗棣棠为学监（后改称事务主任），聘请买俊三、李先慈、马敬吾等阿訇教阿拉伯文和经学，沙善余教英文，伍特公教国文，杨稼山教史地，并按传统先教哲学。学监和教师绝大多数均系义务职，不取报酬。

第一届招收学生45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的从甘肃、云南慕名远道来沪投学。学校不仅免费，且供膳宿，发给书簿文具。学制原定6年制，后因新生程度参差不齐，半年后另设速成班，3年结业。1930年中国回教学会建造的青莲街222号会址落成，学校迁入该址三楼上课。

我国伊斯兰教教育史上,早在明代晚期即出现经堂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经堂教育着重在清真寺内讲授经典,课程偏重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宗教经典诵读,而忽视中文和其他文化知识,使受学者的知识领域受到局限,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伊斯兰师范学校创立后,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学校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开设课程、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不同于经堂教育,使宗教教育得到新的发展。在培养目标方面,不仅培养阿訇,而且培养办学师资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人才。在教学内容方面,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同时并授,以阿文而言,不仅借阿文学习经典圣谕以及宗教礼仪用语,还学习一般生活会话语言知识。在开设课程方面,除经学圣谕外,增设教育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哲学等。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采取分班授课形式,这在当时是较先进的。在教学方法上,不沿袭过去只许学生死记硬背而对教师所讲内容不进行钻研思考的方法,采取以实际知识诱导学生讨论,经过辨析达到真正理解。通过以上这些改革,教学活跃,学业提高。此外,学校还陆续聘请了中外著名学者来校授课或讲学,如新闻报快活林副刊编辑金煦生(柳篛)讲四书五经,桐城派古文家叶浦荪讲古文,埃及学者卡米莱教授阿文,印度学者都令拉教授阿文口语,李绩川教授讲易经,等等。

学校经常费用一向由中国回教学会负担,1935年,老一辈乡耆相继辞世后,学校经费拮据,多亏马晋卿、李云生等按月捐输巨款,使学校得以维持。事务主任宗棣棠热心校务,整日与学生同吃同住,又捐献中华书局出版的《回部备要》一套,供学生阅览。

学校于1931年起创办《伊斯兰学生杂志》,自1931年至1935年共出版5期,免费赠送给全国有关学校和团体,旨在宣传教义,也给学生一个练习写作的园地。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南市沦陷，学校被迫停办。自1928年创校至1937年结束，将近10年间，共培养了3届毕业生，成绩斐然。其中由中国回教学会选派出国深造的先后有马坚、金志晏、定中明、胡恩钧、马有连、林兴智等，造就了一批伊斯兰教人才。马坚曾参加翻译《古兰经》，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定中明为台湾大阿訇，胡恩钧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母校任教。

上海天主教简史

范良佐

天主教传入上海，已有 387 年历史(1603—1990)。现分 5 个阶段叙述它的起始和发展变化。

一、上海天主教的初兴阶段(1603—1717)

要讲上海天主教的历史，应从徐光启(1562—1633)开始。他是上海人(归居在上海南门乔家浜九间楼)，明代末期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者，官至礼部尚书，先后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1603 年在南京由葡籍教士罗如望领洗入天主教，教名保禄。入教后，他信仰虔诚，积极劝促自己的家属、亲友、学生及乡邻等信奉天主教。1607 年因父丧还家守制，路过南京时，邀请意籍教士郭居静(1560—1640)到上海开教。郭氏是来上海开教的第一个外国传教士，于 1608 年冬到上海，先住在徐宅，光启特在宅旁建造了一所小教堂，作为举行宗教仪式和祈祷的场所，后迁居南门外徐光启的试验田双园。郭在上海两年间，入教者 200 余人，奠定了上海天主教的基础。

徐光启逝世后，他的儿子徐冀和 4 个孙女，自幼受徐光启的宗教教育，信仰都很虔诚，积极帮助传教士开展传教工作。特别是徐光启的第二个孙女，教名甘弟大，嫁给松江许姓大族，曾捐助巨款供给教士传教、建堂和生活等经费。在她的资助下，江西、河南、四川，特别在上海周围和松江等地，建造不少教堂。还有徐光启的第

四个孙女，教名玛尔底纳，嫁给城内潘姓大族，曾帮助当时在上海传教的意籍教士潘国光（1607—1671），购买了安仁里潘家的世春堂，该堂于1640年改建成天主堂，取名“敬一堂”（即今所称老天主堂，在城隍庙东侧的梧桐街上）。

两年后郭居静离开上海去杭州开教，杭州和南京的传教士每年也到上海来看望亲友。自1627年起，上海又开始有常驻的传教士，驻得最久的是潘国光，前后共28年（1637—1665）。时上海天主教徒年有增加，1639年1124人，1640年1240人，1644—1648年3000多人。1661年潘国光曾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每年上海入教的新教友约有二百多名。”可见当时上海天主教的发展相当顺利。

上海天主教的另一个发端地是嘉定，创办人是举人孙元化（1581—1633）。他是徐光启的学生，向徐光启学习数学和火炮，被徐光启劝化于1621年在北京领洗入教，教名依纳爵。1622年还乡，至杭州邀请郭居静和谢务禄（即鲁德昭1585—1658）两位传教士到嘉定开教，并捐助巨资购地建堂，还造了10余间教士住房。以后郭、谢两人即常驻嘉定，到1623年有教友400人，信仰都很虔诚。谢务禄曾寄信西洋说：“嘉定教友，男女老幼俱极热心，日与弥撒，喜听道理，勤领圣事，即西洋热心的教友区也不过这样。”嘉定开教之始，非常顺利，但孙元化于1633年殉职后，受到影响，传教士离去，教务默默无闻。

上海另一个开教较早的地区是崇明岛。有一天潘国光到宝山，遥见长江边隐约有一个长岛，就萌发出往该岛传教之愿。适有崇明新开河素信佛教的医生徐启元，闻其友王君方从上海到崇明相告，上海徐光启请西教士来沪开教建堂，常驻有教士。徐启元听了，便到上海访问潘国光，潘国光给他讲了天主教的要理，并提供

天主教书籍,让他阅读。徐洞明天主教的教理后,于1638年由潘国光领洗进教,成为崇明岛的第一个天主教徒。1639年徐启元曾邀潘国光到崇明岛开教,在徐宅创立了一个会口,徐启元率领合家及亲友40余人领洗入教,奠定了崇明天主教的基础。

在初兴阶段,上海天主教的发展是相当顺利的。据1664年(清康熙三年)教务统计,上海有天主教友4200人(又说50000人);教堂在城内的有九间楼1所、九间楼附近1所,还有1所老天主堂,在郊县的有66所。松江有教友2000人,教堂好几所;嘉定有教友400人,教堂1所;崇明有住院1所,小堂10所,教友5000人。

二、上海天主教的衰落阶段(1714—1846)

上海天主教的衰落,同全国天主教一样,主要是由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争夺。本来意籍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尊重中国古老文化,允许中国教友尊孔祭祖,因而传教活动获得皇室和社会的相应尊重。利玛窦去世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对“利氏规矩”提出异议,挑起所谓“中国礼仪之争”(实质上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扩张殖民势力之争),在尊孔祭祖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加上罗马教廷对我国内政和风俗民情进行干涉,便引起中国皇帝的强烈不满,发出了禁教令。这个禁教令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4月16日开始,历经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2月20日,方才废除,前后历时129年。在这期间,外国传教士,除了在朝廷供职者之外,都被驱逐出境,不准再在中国传教。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潜入内地,但只能隐居在教徒家中,昼伏夜出,暗中进行传教,一被抓获,即处极刑。

本来康熙帝对天主教很尊重,对传教士很宽容,允许他们在中

国内地自由建堂传教,还写了“万有真原”和“敬天”的匾额,给悬挂在天主堂内。那时初入中国传教的是属葡萄牙势力范围的耶稣会教士,他们继承利玛窦的规矩,容许天主教徒参与和举行尊孔祭祖的礼仪,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民间礼俗,并无宗教性质。但属西班牙势力范围的多明我会教士,于1631年从菲律宾进入福建省传教后,见耶稣会士允许教徒们参与和举行尊孔祭祖礼仪,认为是允许异端便上告于教皇,引起了轩然大波,争吵不休。康熙帝曾于1700年宣布尊孔祭祖是中国的礼俗,与宗教无关。本来争论可以到此结束,但多明我会教士认为,外教皇帝的声明不足为凭,继续争论,罗马教皇也严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和举行尊孔祭祖礼仪,并两次派使节朝见康熙,企图说服康熙按罗马教廷的禁令办理。康熙认为这些传教士不懂中国文,不识中国字,站在中国大门外干涉中国大门内的事,当然不准所请,并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于是禁教开始,教士被逐,教堂被毁或改作他用,教产没收充公。上海的老天主堂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被改为关帝庙,老天主堂的教士住院被改作中江书院,后又改名为敬业书院。从此全国天主教徒从30余万人下降到20余万人,上海天主教徒从4万余人,下降到3万余人。因为凡是欲入仕途的,由于必须向孔子像行礼就不入教了;许多平民百姓认为不准祭祖有碍孝行,也不进教,已经入教的有的自动退教,或被迫退教。坚持信仰的教友苦于不能领到圣事,还有被处刑的危险,大都消沉观望。由于这种种原因,上海的天主教衰落了100多年。

三、上海天主教的特殊阶段(1846—1949)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清政府被迫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

有保护传教士、准许传教士自由传道、购地建堂、保护入教的天主教徒，以及发还被没收的教产等条款。尽管在西方教会和西方传教士中不乏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和旨在传播福音的人士，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和西方教会中殖民势力的政策决定了中国教会的殖民化地位。他们依赖强加于中国不平等条约及其保教权的庇护，在中国各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分别隶属于并绝对听命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机构，被中国人民称为“洋教”。

道光二十六年旧历正月 25 日(公元 1846 年 2 月 22 日)颁布的上谕说：“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图像，诵经开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的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有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上海从 1842 年起，就有大批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法国巴黎省耶稣会教士，陆续来到上海，逐渐掌握了上海天主教会的大权。1846 年后，他们根据道光皇帝的上谕，要求发还上海的教产和城内的老天主堂。清政府发还了南门外的圣墓堂和墓地，但已被改为关帝庙的老天主堂不在发还之例。另拨给小南门外的董家渡、新北门外的洋泾浜和城厢的肖皮弄 3 块地皮作为补偿。1847 年冬，上海天主教会在董家渡建造了主教大堂，并准备建造主教公署。1860 年又建造了洋泾浜天主堂，城内的老天主堂也于 1861 年被法国驻在上海的远征军总司令强行索回，还给上海天主教会，清政府只得把关帝像用红纸蒙住眼睛，移到老西门，老天主堂重新恢复了天主堂的面貌，取名为“无原罪始胎堂”。

这个阶段，由于来了大批外国传教士，并在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保护下，创办了不少事业，上海天主教人为发展。这些传教士一

方面宣传宗教,恢复或建造教堂,重振教徒们的宗教生活;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建立学校,创办医院和修道院,开办科学、文化和社会福利等事业。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天主教会约有教徒14万人,大小教堂384所,大小修院和神学院各1所,男女大学各1所,男女中学20余所,医院10所,社会福利院10余所,还有天文台、博物院、印刷所、出版书刊等机构。这时的上海天主教,表面看来似乎发展很快,盛极一时,但事实上依附于殖民势力,蒙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教会的大权,不论教权和经济权,都掌握在外籍教士手中,本籍教士只当他们的助手和差役。帝国主义者常利用教会扩大它们的殖民势力,某些传教士也凭籍帝国主义强权,为非作歹,引起中国人民的憎恨,甚至酿成教案,损害了天主教的形象,使中国教友感到屈辱和愤慨。

四、上海天主教的反帝爱国斗争阶段(1949—1960)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人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庆祝新生。但上海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却加紧策划,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们经常散布谣言,制造“教难”空气,煽动教徒们的宗教感情,反对和破坏国家的政策和法令。他们还以“有神无神势不两立”为籍口,发出许多禁令,不许教徒参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不许教徒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甚至少先队组织,不准看共产党出版的书刊等等,以致上海的许多天主教徒沉浸在恐怖和疑虑之中。虽然宗教活动仍照常进行,而且还比解放前更加频繁,可是帝国主义者仍利用宗教名义,披着宗教外衣,挑起一个又一个的反动事端。

针对上述情况,天主教徒中的先进分子开展了义正词严的反帝爱国斗争。1951年政府驱逐了在中国大陆上对中国天主教徒发

号施令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1953年又逮捕、驱逐了一批帝国主义分子；1955年进行肃反，进一步清除了混在宗教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许多被蒙蔽和受欺骗的教徒，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觉醒过来，认识到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可信任的，爱教和爱国是一致的，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于是上海天主教徒，为了祖国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积极整顿组织，排除干扰，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做出了可喜的成绩。1956年3月初，上海教区咨议会按教会法推选张士琅神父为上海教区的代理主教，管理上海的天主教会，虽仍受到罗马教廷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但张老神父和广大教友理直气壮地坚持下来，得到了全国天主教神长和教友们的支持，取得了反帝爱国斗争的胜利。

五、上海天主教的自主自办阶段(1960年以后)

经过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复较量，上海的天主教会终于摆脱了殖民势力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60年4月，张家树神父当选为上海教区的正权主教，同时成立了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但从1964年起，受“左”倾思潮的干扰，正常的宗教活动遭到种种限制，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所有天主堂全被摧毁或改作他用，神职人员全部集中劳动，宗教活动完全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上海天主教徒的爱国精神得到发扬，纷纷要求有自己的教堂，有培养神职人员接班人的修道院，有培养修女接班人的修女院，有教会的书刊和教会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张家树、金鲁贤和李思德等主教勇挑重担，肩负起重振上海天主教的使命，努力办好种种实事，步步落实教友们的心愿。1979年开始，相继修复、开放了徐家汇、余

山、朱家角、唐墓桥、邱家湾等教堂，到目前为止，已在上海城乡修复开放了 65 座教堂，基本上可以满足教徒们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

1982 年开办了培养教职人员接班人的佘山修院；1983 年开办了出版教会书刊的光启社；1985 年修建了新的修女院和教徒的骨灰安置堂；1988 年在佘山中山修建了老年康复院；1989 年在上海县的南张开设了安老院。

佘山已成为国内外教徒们的朝圣地，每年来此朝圣的，约有 5 万至 6 万人，上海的天主教徒们，既能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也能发挥工作上的积极性，为国家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取得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尊重，为自主自办教会赢得了荣誉，也为祖国争光，获得了国际友好人士的赞赏。上海天主教自主自办教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六、上海教区组织的变化

上文所述，只是在目前上海教区范围内的一些情况。所谓“教区”就是指教会的行政地区。按照天主教常例，每个主教都有属于他管理范围的教会行政地区。目前上海教区的范围，与上海市的行政管辖区域相同，但上海教区这个名称的产生，要比上海开始有天主教的时候晚得多，到现在还只有 57 年的历史。

明清间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并没有固定的传教地区，他们看到哪里需要传教或有条件可以传教，或是哪里有人邀请他们去传教，就在哪里活动。如意籍教士罗明坚(1543—1607)，曾到广州、肇庆、桂林、绍兴等地传教；意籍教士利玛窦(1552—1610)，到了肇庆，又到南雄、南昌、南京、北京等地；郭居静接受徐光启、孙元化邀请，到上海和嘉定传教；艾儒略(1582—1649)受瞿太素之子瞿式穀

的邀请,到常熟传教,后来又 到陕西、山西、河南、浙江、福建等地传教,其他许多传教士也都是这样。

1690年,中国成立了澳门、南京、北京三个“圣统制”教区,都隶属于果阿的总主教区。“圣统制”教区,不属于罗马教廷传信部(现称“万民福音传布部”)的管辖,用“代牧”的名义和传信部所委任的权力管理这地区的教会,而是由本地区的正权主教,用本地区主教自己的名义和自己的权力管理这地区的教会。当时南京正权主教区管辖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上海的天主教也属于这个正权主教区。这时驻南京的中国天主教的第一个中国籍主教罗文藻(1616—1691),曾由他祝圣的墨井道人吴渔山神父陪着,在1688年到嘉定、上海、浦东、浦西等地巡视教务。

吴渔山(1632—1718),名历,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清初六大名画家之一,工诗善书法,1673年左右入天主教。其妻亡故后,于1681年辞别两子,随比籍教士柏应理(1624—1692)到澳门,准备赴西洋。事未成,翌年即在澳门入耶稣会,攻读拉丁文和神哲学。1688年和刘蕴德,万其渊同被罗文藻主教祝圣为神父,传教于嘉定、上海、浦东、浦西等地凡30年,卒于上海,葬在上海南门外圣墓堂墓地。

1856年,南京的正权主教区被罗马教廷撤销,改为江南代牧区,管辖江苏和安徽两省,上海天主教也隶属于江南代牧区。1921年,江南代牧区又划分为江苏和安徽两个代牧区,上海的天主教会隶属于江苏代牧区。1926年江苏代牧区改名为南京代牧区,上海的天主教会隶属于南京代牧区。1931年,南京代牧区又划出徐州代牧区,1933年又成立南京本地的国籍代牧区,到这时候才出现了上海代牧区,上海的天主教会隶属于上海代牧区。这时的上海代牧区包括上海、苏州、扬州和海州等地。

1946年，中国天主教会成立为“半圣统制”教会，即名义上废除了各代牧主教区，成为正权主教区，把中国天主教分作20个教省，有25个总主教区，上海教区隶属于南京总主教区，但实际上仍受传信部的管辖，所以叫半圣统制。1948年原来的上海教区划分为上海、苏州、扬州、海州4个教区，就形成了目前包括市内12个区和市郊9个县的上海教区。

1840年后，上海天主教会所属教区的名义和范围，虽有很多变化，但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变化过，就是上海天主教的权力中心始终在上海，掌握教会大权的人始终是外国人。特别是在1856年后，当上海天主教会的主教和副主教会长的，始终是法国巴黎省耶稣会的法国人，别处的天主教会可以一块一块的出让，成立别的教区，但上海的天主教会，却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肯放手。直到1949年解放后，才不得不物色一个中国人出台，自己躲在幕后操纵。只有到1955年肃反后，特别是1960年自选自圣主教后，上海的天主教会才真正改变了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面目，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天主教历史人物小传

沈 毓 元

徐光启(1562—1633)

明末科学家，我国历史上四大农学家之一，天主教徒。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家贫，授馆糊口。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设馆赵凤宇家，后随赵赴广西，途遇郭居静，初闻天主教义及西方科学。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三年后，赴京应试，途径南京结识了利玛窦，进一步了解天主教教义。再过三年领洗入教。万历三十二年举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在京从利玛窦等西方教士研习欧洲近代科学，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军事、测量和水利等，曾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又编译《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用以改善水利、屯田以及军器制造等。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徐奔父丧回乡，过南京时邀郭居静至上海开教，建教堂一所于住宅之西。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上《辨学章疏》，为教会及教士辩护。在京官员如李之藻、孙元化等受其影响也领洗入教，并邀教士至各地开教。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至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为击退后金进攻，曾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保卫京师。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升礼部右侍郎。两年后因受宦官魏忠贤排挤，罢官回乡。自此精心收集、研究各地农业经验，撰《农政全书》六十卷。是我国农学遗产中彪炳史册的巨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天主教召开嘉定会议时，曾列席讨论有关“天主”、“上帝”的译名问题。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官复礼部左侍

郎，旋升礼部尚书。经明思宗朱由俭批准，设历局，任监督，李之藻为副，起用西方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推算历法，主持编纂《崇祯历书》，制造天文仪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要。翌年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卒于北京，赠少保，谥文定，葬上海徐家汇，墓存今南丹公园（按：现改名光启公园，在南丹路）。主要著作尚有《历书》七十四卷、《徐氏扈言》五卷等。曾笔录教士毕方济口授之《灵言蠡勺》二卷，后由李之藻收入所辑《天学初函》，并由清人收入《四库全书》，乃有关灵魂教义之专书。又曾翻译教士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录自《宗教词典》徐光启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孙元化（1581—1632）

字初阳，号火东，嘉定人；生于宝山高桥（本嘉定县地）。早年从徐光启习火器与数学，曾助光启撰《勾股义》，光启称之为：“门人孙初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28岁时，自纂《几何用法》一书，序中言：“予先师受几何于利西泰（利玛窦），自丙午始也。”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是年光启译《几何原本》，此书距《几何原本》只两年。后与光启同官于北京，过从甚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受光启影响，在京入天主教，取教名依纳爵。此前，当礼部侍郎沈灌在南京排斥天主教时，在嘉定本宅藏匿传教士毕方济等人。既入教，沈灌事已息，乃亲赴杭州杨廷筠家邀教士郭居静、曾德昭去本乡嘉定开教，自出巨资建造教堂及教士住所。时上海城内虽有教堂，而教士仅一两年到一次，并不常住，嘉定堂内却常驻教士，并称总堂。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一月，在此举行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有名的嘉定会议，讨论有关“天主”、“上帝”等译名问题，孙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一同列席。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

朝议复设登莱巡抚，徐光启奏疏：“速召孙元化、王徵（也是天主教徒）于登州。”以应急，乃受命为右金都御史，驻登州。时清兵日逼，时任山东按察使金事的王徵及副总兵张焘也去登州，还有葡萄牙将领公沙的西劳（天主教徒）率西洋炮手助阵。光启在奏疏内称：“齐众若一者，非孙元化不可也。”明史孙元化传中则称他“善西洋炮法，盖得之于徐光启。”时辽民在登莱有十余万人，相互仇忌，加以军饷无着，士气不振，原有志匡助袁崇焕（时任辽东经略使）画策，至此遂无能为力。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正月初三夜，辽人内应，登州城陷，与王徵、张焘同被执，葡军全部死难。次年，官军复登州，与张同解京师论死，王徵削职。临刑前，传教士汤若望乔装炭商入狱，为之备领宗教圣事。孙自叹：“一片痴肠，终成大梦，潦倒诏狱，卧废已死。”语至悲切。

孙元化在我国数学史上有值得重视的地位。除上述的《几何用法》（上海东方图书馆曾有收藏）外，尚有《几何体论》一卷、《泰西算要》一卷。宗教著作有为传教士高一志（原名王丰肃）所著《则圣十篇》所作的序，

陈于阶（1595—1645）

字瞻一，号仲台，上海人。祖父官至邵武府拿口驿丞，父官浙江衢州府仓使，死于江中盗手，母为徐光启女兄。幼从光启学天文算数，后向传教士汤若望学制铎，兼向传教士毕方济学神学。崇祯二年（公元1624年）佐光启修历。六年光启病笃，上疏荐之朝廷。次年，奉李天经命测验月食，事竣回京复命，逢清兵至宣府，京师戒严，乃告归，日与西士讲求制造火器。居家松江，助当地知府岳贡修堤、开河、盖粮仓。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史可法荐授钦天

监博士,实为教练火营。时岳贡官东阁大学士,常与议事。次年,北京城陷,福王去南京,可法复荐升兵部司务,仍督练火器。同年,上疏力言欲安内攘外,必先廉政爱民,兼言用兵之术。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3月,升本监中官正,可法赠以银带。4月,清兵陷扬州,可法身亡。5月,福王出走,清兵入南京,拒不迎降,沐浴后赴天主堂祈祷毕,从容就义于鸡鸣山之观象台。一仆为之斂葬于南京雨花台,复自尽于墓侧。遗著有崇祯十七年4月奏疏。

徐启元(1608—1676)

教名若望,崇明新开河人。原信佛教,业医,常为贫病者施诊给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在上海由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付洗入教,为崇明最早的天主教徒。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邀潘国光去崇明开教,在新河镇徐家宅设立传教据点,合家40余人皆入教。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因杨光先在京掀起历狱,传教士不得公开活动,崇明传教事业一度中断,惟仍秘密发展教徒达200余人。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杨被革职治罪,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复受重用,恢复钦天监职位。得法籍传教士刘迪我去崇明定居,又得徐光启孙女之助,在新河镇起造诸圣堂。康熙十五年病逝,葬于此。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教中人为之立碑,并修墓志。年久荒芜,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重立。

吴历(1631—1718)

原名启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教名西满·沙勿略,江苏常熟人,后半生定居上海。幼年丧父,随江苏太仓王时敏学画,并常与苏州兴福寺默容和尚等僧人结交,精于诗书琴画,善画竹,尤善山水,以画换银供养老母。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默容和

尚圆寂，始与天主教中人来往，中有嘉定孙元化之外孙侯大年及孙致弥等人。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入天主教。次年识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鲁日满，从学教义，乃与佛教中人疏远。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去欧，至澳门而未能成行（柏本人启程至罗马，后于返华途中死于意外），乃寓澳门三巴堂，隐而不出。次年，入耶稣会修道，按当时风俗取葡萄牙姓名雅古纳，习拉丁文、哲学、神学，得闲常吟诗寄托乡思，偶尔作画。是年夏返江南，世人有不知其行迹者，称其不知去向。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在南京由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1617—1691，福建省福安县人）祝圣为神父。后传教于上海（包括浦东一带）、嘉定、常熟、苏州等地，常独自一人来回奔走。1699年至1701年定居嘉定，但常赴沪作客，其后即轮番往来于两地之间。1718年卒于上海，葬南门外圣墓堂。遗著有《续口铎日钞》、《三余集》。后人并编有《墨井诗钞》二卷，《三巴集》一卷、《墨井画跋》一卷，皆在其卒后一年问世。清末教内文人李杖编有《墨井集》六卷，内除前述各卷外，并附《口铎》一卷及宗教诗钞一卷，1909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画卷有：为默容和尚作《卧雪图》、为鲁日满神父作《湖天春色图》、《涧壑苍松图》等。晚年曾自焚画稿，故传世无多，有正书局出版影印本《吴山水合册》，内载其在澳门所作《溢浦图》。

李杖（1840—1911）

原名浩然，字问渔，号大木斋主，生于上海川沙县。少时入徐汇公学读书，1862年毕业，入耶稣会，1869年升神父，先后去松江、南汇、青浦等地传教，最后在修院内教拉丁文。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3月在上海创办《益闻录》报纸，自任主编。1898年8月

与《格致新报》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介绍西方科学；1907年改称《时事科学汇报》，次年简称《汇报》，1910年8月停刊。其间于1887年创办《圣心报》，被称为中国第一家白话文报纸。1906年兼上海震旦学院校长，并教授哲学。1911年卒于上海，葬南门外圣墓堂。生平著作甚多，计创作17种，翻译39种，編集4种，曾自称“无年无书”。较著者有：《徐文定公集》四卷、《墨井集》六卷、《新经译义》、《拳祸记》、《哲学提纲》、《天演论驳义》等。

马相伯(1840—1939)

原名建常，改名良，又名志德、钦善，字相伯，又作湘伯、芑伯，学名斯臧，教名若瑟，别署求在我者，晚年号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生于丹徒。世代奉天主教。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入上海徐汇公学读书，攻拉丁文与法文。19岁时，上海法国领事欲聘为秘书，拒之，谓：“我习法文，为祖国用也。”20岁学希腊文。1862年在沪入耶稣会，研习文学、哲学、神学、算学与天文学，著有《度数大全》呈教会付梓，未如愿。1870年升神父，传教于安徽宣城及江苏徐州、南京一带。1872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兼耶稣会编撰。因遭会内外国教士猜忌，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出会还俗，由任湘军粮台之兄建勋荐于李鸿章，入山东潘司余紫垣幕，旋任职沂口机器局，并在山东调查矿务。1881年任驻日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返国后于1882年赴朝鲜襄政，1885年去台湾任巡抚幕僚。后受李鸿章命赴美借款，得5亿美元，朝议以起，事败经英法等国而返。1892年赴日，任驻长崎及横滨领事，使馆参赞。1893年与弟建忠（字眉叔，掌招商局）居上海，结交梁启超，曾邀梁同设译学馆于上海，请教士相助，因戊戌政变而未遂。1890年助教中人英敛之创《大公报》。1902年在沪授蔡元培等人拉丁文，次

年创震旦学院于徐家汇老天文台，后因校政为传教士霸持，1905年得严复等相助，另创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取意“复我震旦”，自任校长，校址设在吴淞营地，由两江总督周馥拨给，经费自负。1907年参加梁启超的政闻社，年底赴日演讲君主立宪。次年1月政闻社自东京迁上海，被推为社长，7月解散。1910年任江苏省諮议局议员，是年复旦公学迁徐家汇李公祠(今复旦中学所在)。1911年辛亥革命起，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外交部长，并代江宁都督。民国元年4月任南京留守府政务处处长，8月北上任总统府高等顾问，10月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2月辞职；助英敛之创辅仁社(辅仁大学前身)于香山。1920年冬南归，退隐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时年已81岁，犹撰文斥军阀，促民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实施民治，发起中国民治促进会和国难会等。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乃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次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时年已95岁，仍发表文章与演讲，勉励国人共赴国难，人称爱国老人。1936年赴南京，次年3月任国民政府委员。七七事变后，应李宗仁之请去桂林，居风洞山。1938年应于右任(震旦学生，曾因诋犯清廷托庇于先生，投为门人)之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卧病不起，次年寿终，享年100岁。临终时犹不忘国事，最后一语为：“消息，消息……”。当其百龄大庆时，中共中央曾贺电称之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党政府对他颁褒奖令，称为“民族之英，国家之瑞”当噩耗传出，举国哀悼。1952年灵柩运回上海，葬西郊教会公墓，1984年重建于宋庆龄陵园。先生生前著译甚多，有《拉丁文通》、《致知浅说》、《尺算征用》、《法文关键》、《新史合编直讲》(圣经《新约》之译义)等，另有大量宣传文章及演讲稿、书札、文件，后人编有

《马相伯先生文集》及国难言论集等。

朱志尧(1863—1955)

字宠德,号开甲,教名尼各老,祖籍青浦,生于南市董家渡。世代信天主教,父业商,营沙船贩运及钱庄业,母系马相伯胞妹。幼从舅就读于徐汇公学,以青浦文生应试,八次皆落第。1887年因舅马建忠关系进招商局,先后担任江天轮及江裕轮买办。1895年中秀才。后立志经商,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利用招商局督办盛宣怀所营织布局积压之大量棉籽为原料,自制机器,并改造洋设备,开设大德油厂(1897年),获利丰厚。与弟云佐(号开弟,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第一任买办)合创《格致新报》,传播西洋科学;又办中西书室,经售法文书籍。1901年辛丑条约后,蓄志振兴实业以挽回利权。就教于马相伯,决心自造机器。1904年在南黄浦一带购地,独资兴办机器厂,取名“求新”,制造轮船、船用机械,并制桥梁与码头。次年,又设同昌油厂,自任经理。至1911年,求新厂已造有大小轮船40艘,蒸汽引擎5000匹马力,榨油机200台、大小桥梁40座等。对同行多予支持,曾任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厂、申大面粉厂等董事。1912年办宝兴铁矿公司,开采安徽当涂铁矿,又办长兴煤矿。1913年曾偕马相伯赴京见袁世凯,请为所欠洋人之债务作保。次年欧战爆发,求新厂连受亏损,被迫于1917年售予法商,后改为合办。1923年与人合办大通仁记航业公司,拟与外人竞争。1926年赴美借款未成,1930年将求新厂股份作价了结,其间得国人支持,仍被推选为上海机器公会名誉会长。1937年沪战爆发,所办事业大半毁于战火,乃居家从事宗教潜修。平生对慈善事业颇多赞助,曾任上海天主教公教进行会副会长,得过教廷勋章。抗战胜利后,一度欲东山再起,卒未如愿,上海解放

前夕，已濒临破产。解放后寓于沪上，1955年病逝。

陆徵祥(1871--1949)

字子欣，或子兴，晚年号慎独老人，上海人。8岁丧母，父曾在伦敦基督教传教会工作，幼年随父奉基督教。13岁入上海广方言馆学法文，师从法国人阿尔方斯·博多(Alphonse Bottu)，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毕业后，赴北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设同文馆，继续学法文，并攻读外交学。1892年毕业，由总理衙门指派，以传译生名义随许景澄出使俄、德、奥。次年，改为四等翻译，于公余习俄文、英文及欧洲外交史。1895年升三等翻译，又升为使馆秘书。在许公使外出时，权充驻圣彼得堡使馆代办。1896年春，李鸿章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赴俄时，任秘书，参与中俄会议，并在密约上签字。是年，杨儒继任驻俄钦使，仍任其秘书。1899年，随杨儒出席第一次国际海牙会议；是年2月与比利时籍培德·鲍维女士(Berthe Bovy)结婚，培德信天主教，又为外人，国内舆论对此有非议。次年，义和团运动起，在俄任使馆代办，对帝俄在满洲迟不撤兵事担任交涉。1902年升三等参赞，是年将发辫剃去。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任驻荷兰公使，多次代表清廷与荷兰谈判设领事馆事，1911年谈判成功，旋调任驻俄公使。是年10月入天主教。

辛亥革命后，联合驻外使节通电响应，劝清帝退位。1912年3月，被袁世凯任命为民国外交总长，5月回国就职。6月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职，乃奉命继任并组阁，所提人选被国会否决，并受弹劾。数月后，任赵秉钧内阁外交总长，参与袁世凯大借款交涉，又与俄使议订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协定，因被参院否决，退出内阁，改任袁的外交顾问。1915年1月再任外长，不久出访瑞士，4月初回

国,和次长曹汝霖一起与日使日置益谈判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5月奉命签字,被迫除第五款外全部接受。10月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徐世昌出走,陆继徐任国务卿兼外长,惟日后曾声明不赞成袁世凯的作为。袁死,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多年,因与黎元洪总统意见不合而引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主张对德宣战;1919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任首席代表,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遭会议拒绝,激起国人之“五四”运动,由是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0年辞外长职,任全国赈灾督办;次年夫人病重,同赴瑞士休养,奉派为驻瑞士公使,其间曾以北京政府代表身份多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1926年丧妻。次年辞退公职,进比利时布鲁日(Bruges)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肋修道院当隐修士,在院时攻习拉丁文和神学。1933年,用法文发表小册子《根据迈尔西爱红衣主教著作评满洲之被侵占》,反对日本占领东三省。1935年晋升神父,电告全国同胞为祖国祈祷,并望世界和平。1946年由教廷授予比利时根特城(Gant)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衔,领主教品位,为国人在外任修院院长及主教职之第一人。1949年1月15日病逝于布鲁日之圣安德肋修道院。遗著有修道日记、回忆录、中文本《本笃会史略》(1935年出版)、英文本《孔子与基督之道》(Ways of Confucius and of Christ)及抗战时期用法文发表的论国难宣传文字多篇。

陆伯鸿(1875—1937)

教名若瑟,上海人,生于南市董家渡。祖上于明末由徐光启劝入天主教,世代从事丝及棉纺织业,曾祖曾捐资建造董家渡天主堂。自幼受教会教育,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中秀才,后向教士学法文。1894年任上海法租界律师秘书,后改营实业,1911

年任上海南市华商电气公司总经理，获英、日贷款，复得教会资助。同年接管上海南门外普育堂，用拆除上海城墙所得城砖修建堂屋，加以扩充，当地人称为“叫化医院”。1913年起改称新普育堂，内设医院、育婴堂、养老院、残疾人收养所等，年收老弱贫病二三千人。由此以慈善家负名于社会，被举为上海市议员，教内推为全国与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

1914年创办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又创大通航业公司，自任总经理。欧战爆发，钢材来源紧张，与人合办沪兴钢铁厂（今上钢三厂前身）。1923年在黄浦江边建和兴码头堆栈公司。次年接管闸北水电公司。1928年任南市内地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越一年又创大成内河轮船公司。

与此同时，不断以教会名义，集资兴办医院、学校及社会福利事业。1916年在杨树浦工人居住区设施诊所，1923年扩充为圣心医院（今杨浦区中心医院），设有上海最早之放射科治疗所，后迁入法租界，称中比镭锭医院（受中比庚子赔款委员会协助，镭锭治疗设备从法国进口），1917年在松江城内设若瑟医院；1934年在北桥设全国最大之精神病院，名为普慈疗养院（今上海市精神病院），并在南市设时疫医院。所办学校计有小学11所、初级中学1所、女子职业学校2所、护士学校1所。

一生中获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授二等宝光嘉禾勋章（1924年）、法国荣誉勋位勋章（1927年）、意大利政府都骑尉勋章（1935年）、罗马教廷都骑尉勋章（1924年）和袍剑爵士（伯爵）荣衔。1937年底遇刺于上海。生前曾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多年，法租界公董局追赠荣誉金质奖章（1938年），奖励其对租界繁荣之贡献。

胡文耀（1885—1966）

浙江宁波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格致书院，后在震旦学院理工科毕业。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浙江省招考留学生赴欧美深造，与同窗翁文灏（宁波人）、孙文耀（嘉兴人）应试，俱列前茅，时有“震旦三文”之称。是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获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1913年归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参加创建北大理工科。1921年迁居上海，任中法国立工专代理校长。193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首任国籍校长。1942年入天主教，教名奥斯定。解放后，继续担任震旦大学校长。政府接管震旦后，留任上海市第二医学院副院长。生前曾任上海市天主教抗美援朝支会主任、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并连任多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卒于上海。

徐宗泽（1886—1947）

字润农，教名若瑟，徐光启第十二世孙，生于青浦县蟠龙镇。世代信天主教。19岁中秀才，后进徐汇公学读书，1907年入耶稣会，两年后被派去欧美深造，得博士学位。1920年在英国升神父，其间曾回国，任教于母校。1921年学成归国，传教于南汇。两年后调徐家汇，主编《圣教杂志》，担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藏书楼创办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藏有中文书籍约20万册，西文书籍约8万册，不少系善版珍本。任期内接待各地学者，广结文友；又大力收集各省、州、县、乡志，多达2700余种，一度冠于全国，后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1938年代理《圣心报》主编。在教内关心女子教育，曾任徐汇女中及启明女中（解放后改为上海市第四女中）校务指导。病逝于徐家汇，葬南门外圣墓堂。遗著有所编六卷本《增订徐文定公集》、《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

杨士达(1903—1963)

广东大埔县人，1912年随家到上海。自幼有志医学，曾从父习《本草纲目》。1914年入上海中法学堂(今光明中学)，1919年参加上海五四学生运动，被开除。离校时作诗：“五四运动受校黜，身虽遭击志犹雄，反帝爱国乃天职，国耻不雪不罢休。”次年改名返校，并入天主教，教名若翰(约翰)。后入震旦大学学医，毕业时获奖学金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与法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杭州仁爱医院工作。1937年在杭组织第十六伤兵医院。次年任教于震旦大学医学院。上海解放后，于1952年随国际科委赴朝调查美帝细菌战，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颁发的荣誉奖状和奖章。曾以全部积蓄购买建设公债。1955年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次年赴北京参加中国教育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在京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起人会议，受周恩来总理接见。1957年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1960年当选为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3年后病逝于上海。生前曾连任上海市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自1959年起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

张家树(1893—1988)

原名端六，字庭桂，圣名类思，祖籍上海南汇县西八灶，生于上海城内。世代信奉天主教。1907年进徐汇公学求学，旋决心弃俗修道，1910年入耶稣会，次年去英国泽西岛攻读神学，1923年晋铎。1924年去法国，在华侨与留学生中开展牧灵工作。1925年回国，在浦东傅家天主堂任副本堂。1926年起先后担任徐汇中学监学、教导主任、校长等职。1943年至1955年先后任张家楼总铎区总铎，国籍“主母会”神师，虹口圣心堂院长神父。1955年11月与

上海教区张士琅、徐之荣、李思德等 75 位神父联名发表《上海教区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这标志着上海教区神长教友开始摆脱教会内敌对势力的支配，走上爱国爱教相一致、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1956 年张家树被邀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同年 7 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委会发起人会议。1957 年担任重庆南路天主堂院长神父兼徐家汇总修院代理院长。1960 年 4 月，被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推选为上海教区正权主教，4 月 27 日在徐汇大堂由皮漱石总主教主礼祝圣。自此张家树主教肩负重任，主持上海教区教务。1966 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教会造成了巨大灾难，张家树主教亦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申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张主教虽以八七高龄，仍老当益壮，不辞辛劳地投入从速恢复教务，重振上海教区的各项工作，首先修复开放了徐家汇天主堂、佘山天主堂等一批教堂，满足教友们过宗教生活；接着筹办培养神职人员接班人事宜，1982 年 10 月开办了四省一市联办的佘山修院（次年扩大为华东六省一市联办）；1985 年 5 月开办了圣母献堂会修女院。还开办了教会出版机构——光启社等其他事业，成效卓著。

1980 年 5 月，中国天主教举行第三届代表会议，成立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张家树当选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1984 年 12 月，张主教从教区教务发展的需要，举行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一届六次会议，亲自提名，选举李思德、金鲁贤神父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1985 年 1 月，九三高龄的张主教亲自参加祝圣典礼。张主教历任全国政协三届至六届委员，五、六届政协

常委，参与商讨国家大事和有关宗教政策的落实。1988年2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张家树主教生前一贯晓谕：我们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和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并身体力行，一生敬主爱人，爱国爱教。深受神长教友的爱戴和社会各界的敬重。

上海主要天主教堂的 历史与现状

顾 连 群

天主教传入上海,已有 300 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随着天主教在上海的发展,一座座不同风格的教堂出现在城市和乡村。教堂的规模和数量往往反映了一个地区天主教传播与发展的状况。上海曾建有大小教堂数百座,其中颇具规模的不下数十座。现就我所知略作介绍。

一、徐家汇天主堂

漕溪北路旁边的蒲西路上,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在远处就可看到高高耸立的两座钟楼上的十字架,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徐家汇天主堂。此堂于 1906 年破土动工,1910 年竣工,9 月 20 日由姚宗李主教(Prosper paris,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900—1931 年任江南教区主教)主持落成典礼。徐汇大堂钟楼尖顶高 57 米,堂脊高 27 米,长 83 米,宽 30 米,堂内大小石柱 64 根,设祭台 19 座,可容纳 3000 余人,其宏伟庄严,堪称中国教堂中最华丽的建筑之一。

徐家汇曾是上海天主教的中心。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 年)耶稣会士重来江南后,于 1847 年在徐家汇购地兴建会院。咸丰元年(公元 1851 年)建造天主堂,奉圣依纳爵为主保,是徐家汇第一座教堂,但规模不大,可容纳 400 人左右。咸丰六年(公元

1856年)江南教区由耶稣会士掌权后,徐家汇逐渐成为教区的中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天主教的宗教事业和科学、文化、教育、出版、慈善等事业先后在徐家汇创立。其中较著名的有徐家汇修道院(1843年创立于张朴桥,几次迁移,于1878年设在徐家汇)、徐汇公学(1850年创立,现为徐汇中学)、徐汇女中(原名崇德女校、1867年创立)、启明女中(1904年创立,现为上海市第四中学)、汇师中学(原名徐汇师范,1920年创立)、震旦学院(1903年由马相伯创办,1908年迁至卢家湾吕班路)、徐家汇藏书楼(1847年创办)、博物院(1867年创办,1930年迁卢家湾)、圣母院(1855年创始于横塘,1869年迁至徐家汇)、天文台(1873年创办)、土山湾孤儿院(1864年创办),还发行有《圣心报》、《圣教杂志》等。徐家汇天主堂即建造于这些事业日臻完善时期,当时,周围教友已发展到万人以上。

1960年,张家树神父当选为上海教区第一任自选自圣的正权主教,4月27日在徐家汇大堂举行隆重的祝圣主教大典。经教区决定将徐汇大堂定为主教座堂,并将依纳爵堂改名为圣母主堂,为天主之母堂,同时将徐家汇蒲西路120号作为主教府。

徐家汇天主堂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破坏,两座钟楼十字架被拆毁,四周花玻璃窗全部被砸,后由上海果品公司用作仓库,堆放货物。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后,大堂归还教区,整修后于当年11月恢复宗教活动,由张家树主教主持复堂大礼。1982年修复钟楼尖顶,于圣诞节前竣工。中断16年之久的宏亮钟声重新敲响,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友仰望重新矗立的十字架,激动不已,同声感谢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保障教徒过好正常的宗教生活。

徐家汇天主堂虽然经过历史的变迁,但今天仍是上海天主教的中心,是上海教区主教府所在地。近年来,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各

界人士慕名前来参观徐汇大堂的为数众多。对外开放以来，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天主教徒来徐汇大堂过宗教生活或参观访问。

天主教上海教区原有的各项事业，近年在徐家汇也相继恢复。1984年重新建立了作为教区学术研究出版机构的光启社，1985年开办圣母献堂会、修女初学院，同时恢复了土山湾工艺品厂。

二、佘山天主堂

佘山又名西霞山，坐落松江县境，距徐家汇36公里，海拔100米，周围9公里，为松江“云间九峰”之首，分东西两山，以竹林茂密著称。相传古代有佘姓者隐居于此，故名。山上现存宋代所建砖塔一座，名“秀道者塔”。据《松江府志》载，清康熙帝于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南巡到松江时，松江官员以佘山竹笋奉饷，康熙以为有兰花香味，特赐名“兰笋山”。

1863年江南教区会长鄂尔壁神父（Gonnet Joseph，法籍耶稣会士，1862—1866年任会长）购买佘山山顶及南坡土地，建造了神父住院。1867年松江总铎杜若兰神父（Desjencques Marin，法籍耶稣会士）在山顶建六角亭供圣母像，附近教友自发上六角亭念经拜圣母，开始了佘山朝圣的萌芽。1868年3月1日，郎怀仁主教（Languillat Aarien，法籍耶稣会士，1865—1878年任江南区主教）亲往佘山祝圣六角亭和圣母像。此像由中国修士陆省三绘制，定名“进教之佑圣母像”，奉为佘山主保。“佘山圣母，进教之佑”之称由此而来，佘山朝圣也逐渐在上海及江南地区教徒中传开。

1871年在山顶建造教堂，1873年落成。是年5月1日和24日，郎怀仁主教到佘山主持大礼，整个5月份朝圣教友成千上万，陆绎不绝，形成了佘山历史上第一个圣母月。1874年，教皇庇护九世颁赐5月来佘山朝圣者可得一次全大赦，于是，佘山成为全国

著名的天主教朝圣之地。

中山教堂建于 1894 年，正门两侧有对联一副，上联“小堂筑山腰，目憩片刻，修孝子礼”，下联“大殿临峰顶，再登几级，求慈母恩。”中山堂场前方建有圣母亭、若瑟亭、耶稣圣心亭，简称“三圣亭”，为教徒念经祈祷之处。山脚下入门处建有中国式石碑坊，上书“进教之佑”横额。自此循石级登上山腰，经中山教堂再拾级而上，有耶稣山园祈祷像，建于 1907 年，为拜苦路之起点，拜苦路共 7 折（原有 14 折，天文台筑路时被斩断），称经折路，分列 14 处苦路亭，内设苦路像。教友沿途拜苦路上山，追忆耶稣受难事迹。

山顶的圣母大堂于 1921 年拆除，1925 年在原址上扩大地基建造新大堂，工程艰巨，1935 年落成。为举世著名的教堂建筑之一，也是当时最新式的教堂建筑。工程设计师、建筑师为葡萄牙籍神父叶肇昌(Diniz)。堂向西，东西长 50 米，南北宽 25 米，最宽处为 35 米，脊高 17 米，塔楼高 38 米，呈十字形。堂内结构以石柱为主，石柱接榫斗拱，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天神像和神致的花卉图案。堂外砌以红砖，顶面铺碧色琉璃瓦，四周原镶彩色花玻璃窗。此华丽典雅的大堂，1943 年被定为“宗座乙级圣殿”，是当时远东第一座圣殿。1947 年 5 月举行了隆重的佘山圣母加冕典礼，因此有“佘山圣母大殿”之称。

十年动乱期间，佘山山顶大堂，中山教堂、三圣亭、经折路、苦路像等均遭到严重破坏。1981 年 3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把佘山天主堂及附属场所归还上海教区。教区立即进行修复，先修复了中山教堂，当年 5 月恢复了佘山朝圣。三圣亭、经折路、苦路亭、山园祈祷像等陆续修建，山顶大堂于 1984 年底修缮一新，红砖碧瓦衬以蓝天，与绿色山林相映，光彩夺目，朝圣活动恢复后，到佘山拜圣母的教徒逐年增加，1989 年多达 60000 人次以上，不仅有全国

各地的教友,还有来自港澳台同胞及国外的天主教徒。

1982年10月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在佘山联办天主教修院(次年改为华东6省1市合办),由后来任上海教区主教的金鲁贤任院长。修生人数逐年增多,1985年5月上海教区张家树主教(1988年2月病逝)为佘山西南麓建造修院新院舍,并主持奠基典礼,1986年9月新院舍落成。现在一所具有现代化教育设施的新修院错落有致地排列在翠竹绿林中,为佘山增添了新的光彩。近年来,到佘山修院、佘山大堂参观者甚多。佘山修院和佘山天主堂成为上海天主教与国际天主教交往、使世界各国了解上海天主教现状的一个窗口。

三、董家渡天主堂

董家渡天主堂,坐落在上海南市区董家渡路,濒临黄浦江边,于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奠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落成,是年4月4日正式开堂,取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以纪念那位向往来中国传教未能如愿,死于中国沿海小岛的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1552年去世,被列入圣品)。这所教堂是中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天主堂,也是上海第一座主教座堂。当时南京教区(时上海属南京教区)主教罗伯济(Lonisde Bési,意大利人,1839年来华)为其继承人选定董家渡兴建主教公署和主教大堂,1847年11月21日放上大堂第一块基石后即返回欧洲。西班牙人范佐廷修士(Ferrer Joan)设计。在建造期间,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最后在原稿式样的三分之二高度封顶。

董家渡天主堂成为上海天主教的活动中心。1851年在董家渡主教公署举行了中华全国主教会议。开堂以后,陆续开办了天主教学校。19世纪中叶的教区修院就设在董家渡。著名天主教徒

陆伯鸿、朱志尧等在该堂区陆续开展慈善事业，创办了当时著名的慈善机构新普育堂、安老院、一心教养院等。1935年召开的全国公教进行会代表会议，会址就设在新普育堂。

董家渡大堂周围居住了许多世代信奉天主教的教徒，其中有在明代就信仰天主教的上海第一代教友陆家、艾家等。该堂也吸引了四方教友，不少以沙船业为生的教友迁居于此，其中许多人后来生意兴旺，经济富裕，大多信仰虔诚，热心于教会事业。董家渡堂口教友人数最多时达6000以上。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董家渡教徒大多迁往租界，以后有的陆续回来，但大多数在其他地方定居，因此抗战以后，董家渡堂口教徒人数大为减少。

解放以后，董家渡大堂宗教活动正常开展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止。十年动乱期间，大堂被占用。宗教政策落实后，董家渡于1981年在临时教堂恢复宗教活动。1983年12月占用单位归还大堂时已百孔千疮，但建筑结构基本保持原貌。经过一年多整修，于1985年11月17日复堂，当年已是93岁高龄的张家树主教亲临董家渡，主持复堂大礼弥撒，董家渡及远近教友有1500多人参加。隆重的复堂大典开始了董家渡大堂历史新的一页，修复一新的古老大堂焕发出蓬勃生机。

四、梧桐街天主堂

梧桐街天主堂建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由在上海传教28年之久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潘国光(Brancati)发起创建，潘国光得徐光启第四孙女玛尔第纳之助，把北城安仁里明代所建的世春堂改建为天主堂。这是一座中国庙宇式的天主堂，堂高4.6丈，阔4.8丈，进深3.6丈，取名“敬一堂”，奉耶稣救世主为主保。堂旁为司铎住舍，潘国光曾于其中筑观星台，研究天文。

这座天主堂建成距今已 350 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建成后 100 年间,是这一地区天主教徒宗教活动的中心。清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因雍正禁天主教,敬一堂被没收了改建为关帝庙,原堂西房屋于乾隆十三年(公元 1748 年)设置申江书院,天文台被废。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5 年),天主教弛禁,法国传教士即向上海道台索回天主堂等产业。因上谕明文规定已改为庙宇民居的教堂毋庸查办,敬一堂已改为关帝庙,不属于发还之例,但经过外国传教士交涉,上海道台便将董家渡、洋泾浜等 3 块,每块约 1 公顷面积的土地交与法国传教士,作为抵偿。

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法国传教士以中法签订的附加条约为依据,索回已改为关帝庙的天主堂以及申江书院(时已改名为敬业书院)。次年(同治元年),敬业书院迁址,关帝庙重新改建为天主堂,并将原书院房屋改作伯尔各满学堂,招收天主教徒子女。光绪元年(公元 1875 年)建造新校舍,同时创办慈善机构,有男女安老院各 1 所,贫民院 1 所。

1940 年,梧桐街天主堂创建 300 周年,由本堂神父范嘉义,带领教友举行庆祝。解放后,该堂仍举行宗教活动,直至 50 年代末停止。现在作为南市区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明代建筑的外形仍保持原貌,内部几经变化已面目全非。

五、洋泾浜天主堂

坐落在黄浦江畔的洋泾浜天主堂,亦称四川南路天主堂,是上海历史悠久的著名教堂之一,也是当时租界上的第一座天主堂。咸丰十年(公元 1860 年)4 月 15 日举行奠基礼,次年 6 月 29 日,在即将竣工之前,举行了第一台弥撒,奉圣若瑟为主保。建筑风格为

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混合体,可容纳 1000 人。当时洋泾浜堂口教徒流动性较大,欧洲籍教徒居多。光绪八年(公元 1882 年)教徒有 1200 多人,其中欧洲籍 750 人。该堂很快成为教区中心之一。倪怀纶(Garnier valqntinus, 法籍耶稣会士)担任江南教区主教期间(1879—1888),将主教公署设在洋泾浜天主堂,直到 1960 年徐家汇作为主教公署。1866—1967 年度,教区帐房从董家渡迁至洋泾浜,当时许多重大的宗教庆典,大多在洋泾浜天主堂举行。

洋泾浜教堂建立不久,其他事业迅速开展。1871 年,拯亡会两名修女定居若瑟堂对面,开始教学工作,1875 年开办上智小学,以后发展为晓明女中(上海市第六中学的前身)。1874 年 9 月开办圣方济学堂,10 年之后迁至虹口。1863 年开始办医院,由仁爱会修女管理,只收欧美籍病人,时称法国医院,1877 年,该院迁至苏州河北岸,取名公济医院。

解放初期,龚品梅任上海教区主教,居住洋泾浜天主堂,执行罗马教廷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将上海天主教会引向歧途,上海天主教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56 年选出张士琅神父担任上海教区代理主教,隆重的就职典礼在洋泾浜天主堂举行。

十年动乱期间,洋泾浜天主堂及原主教公署等房屋被占用。1981 年 12 月,占用单位将教堂等房屋归还,上海教区立即着手恢复工作,在未修复教堂之前先恢复宗教活动,当年圣诞节举行复堂典礼,由李思德(1985 年 1 月祝圣为主教)主持大礼弥撒,1982 年开始了教堂修复工程,是年 12 月竣工,以新的面貌迎接广大教友欢度圣诞瞻礼。

六、虹口天主堂

虹口天主堂地处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区南浔路上。清道光二十

二年(公元 1842 年)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纷纷涌入,英租界逐渐容纳不下,咸丰十年(公元 1860 年)以后,英、法、美、西、葡等国籍的外侨,在虹口定居的渐多,且大多是天主教徒,需要到教堂过宗教生活。开始时借了一处民房作临时教堂,数年后,教区在苏州河北岸建造起中式房屋 1 幢,中间 3 间作为教堂,每逢星期天由洋泾浜堂口派一位神父去做弥撒。

虹口天主堂于同治十三年(公元 1874 年)11 月 29 日奠基兴建,两年后竣工。1876 年 6 月 1 日举行开堂弥撒,奉耶稣圣心为主保,可容纳 800 人。光绪 6 年(公元 1880 年)教友人数约 500 人,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堂口,到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教友发展为 2200 人,其中也有不少是迁居到虹口的中国居民。

在兴建虹口天主堂的前后,传教事业及其他事业均有发展,成为教区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初,公济医院(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由洋泾浜迁至苏州河边的新院舍,当时由仁爱会修女管理该医院。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圣方济学堂由洋泾浜迁至虹口圣心堂边兴建的新校舍(现北虹中学)。光绪十九年(公元 1893 年)拯亡会在虹口昆山路百官街建立会院,取名“圣家院”,堂边辟出几间房屋,作为葡萄牙青年的活动场所,成立了天主教俱乐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 1897 年)俱乐部礼堂落成。

解放以后,虹口圣心堂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上海教区张家树主教在 1949 年至 1956 年间,担任该堂院长神父,现任上海教区顾问李思德主教于 1956 年至 1966 年任虹口院长神父。

十年动乱期间,虹口天主堂及附属房屋被占用,1979 年被折毁。宗教政策落实后,1982 年归还原天主教俱乐部及礼堂等房屋,作为虹口区教友开展活动的场所。教区将礼堂改建成现在的

虹口圣心堂，1982年12月25日（圣诞瞻礼）虹口圣心堂举行复堂大礼弥撒。改建后的圣心堂比原来小了许多，只能容纳200多人。

七、傅家天主堂

浦东傅家天主堂位于浦东大道1115号，临近郊区。这一地区天主教传入较早，清乾隆嘉庆年间，曾在赵家宅建一所小堂，因周围多傅姓教友，故名傅家天主堂，后被毁。光绪初年，负责该堂口的康福民神父（外国传教士）把原来简陋的小堂改建成较大的教堂，奉玫瑰圣母为主保，教友逐渐增多。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龚古愚神父（外国传教士）添建了西式门面钟楼，面貌焕然一新，教务日渐发展。

现在的傅家玫瑰圣母堂，建于民国9年（公元1920年），建筑精致华丽，钟楼矗立，可容纳700人。堂前有假山，山洞中供一座圣母像，每逢玫瑰月（10月），鲜花盛开，迎来四方教友，成为上海教友朝拜圣母的圣地之一。

十年动乱中，傅家天主堂被其他单位占用，钟楼尖顶被折毁。宗教政策落实后，于1983年恢复宗教活动。1984年重建钟楼，教堂修缮一新。近年来，上海及郊县教友在玫瑰月纷纷前往傅家堂朝拜圣母，并接待了一批批前来参观的外宾，增进了上海与海内外天主教友之间的友谊。

八、唐墓桥天主堂

唐墓桥天主堂地处川沙县唐镇乡（原名唐墓桥乡），是天主教传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1842年耶稣会教士即把唐墓桥作为浦东地区传教的中心，19世纪中叶，唐墓桥堂周围6公里，已有教

友四五千，但还没有一座较大的教堂足够容纳，也无法发展与传教事业相应的其他事业，所以建造大堂十分必要。后来负责该堂区的法国籍神父鄂劳(J. M. Gourand)将他母亲遗赠的一笔巨款捐献。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4月破土动工，兴建大堂，1897年初竣工。1898年1月2日祝圣开堂，奉露德圣母为主保。

该堂建筑式样为西欧哥特式，呈十字形，长60米，宽17米，最宽处46米，脊高19米，钟楼高45米，可西望上海，东眺大海，能容纳3000人，是上海郊区一座最宏伟华丽的教堂，也是上海第二座规模巨大的教堂。

唐墓桥大堂建成后，即成为浦东及四方教友的朝圣地，每年5月，远近教友来朝圣者甚众。1903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世宣布，凡来此朝圣且告解领圣体者，可得一次全大赦。1915年，南侧建筑假山一座，山洞中供露德圣母像。

1874年教区建立总铎区体制后，唐墓桥大堂即为浦东总铎区座堂。据1948年统计，浦东总铎区属下有10个本堂区，共85个会口，教友人数达22300人以上。该教堂开堂不久，即开办了达义公学，分男校和女校。1931年起办成中小学，1951年政府接办后改为唐镇中学。

1964年唐墓桥天主堂宗教活动停止。十年动乱中，被当地铸钢厂作为厂房使用。1988年归还，大堂已面目全非，破烂不堪。近年，金鲁贤主教向全市教友发出恢复唐墓桥天主堂的呼吁，并成立了唐墓桥天主堂复堂委员会，发动全市教友为该堂修复捐款出力。修复工程即将开始，不久，这座古老的大堂，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教友们的到来。

九、张家楼天主堂

张家楼天主堂地处浦东，原属川沙县，1984年划归黄浦区。该堂历史悠久，距今已有240多年，是上海古老天主教堂之一。据资料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北京张姓由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引归天主教，1607年随徐光启迁沪，旋至浦东为徐掌管田租，名其地为张家湾。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张氏后裔张景乔率三子移居吴家堰西北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700年）吴家堰张姓有筑楼而居者，张家楼从此得名。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张景乔的玄孙张宇敬建造教堂，取名“寻获十字架天主堂”。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汤方济司铎任第一任本堂堂长。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教堂扩建，1849年本堂司铎徐类思升任主教，在该堂举行祝圣主教典礼，主教公署亦设在该堂。一年后修道院从横塘迁入，1862年育婴堂亦迁入于此。

现存的张家楼教堂建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取名耶稣圣心堂，可容六七百人。1896年添造两耳，使堂呈十字形，可容纳近千人。以后又建造园顶钟楼，增色不少。据资料统计，张家楼教友人数1875年已超过千人，以后几十年间保持在1300人左右。该堂原属唐墓桥总铎区，1932年浦东另设张家堂总铎区，张家楼堂为总铎座堂。

张家楼天主堂古老悠久，教徒世代相传，并以男女青年教徒修道人数多而著称上海教区。据资料统计，自1925年至1935年的10年中，张家楼男女修道人数有28名，在此以前的几十年间，修道人数也有数十名。其中著名的有张士琅神父，他于1910年晋升司铎，先后传教于马桥、亭林、青浦、苏州、董家渡、曹家渡、傅家、陆家嘴、胶州路等地，几十年如一日。解放初，由于当时上海教区领

导,执行罗马教廷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将上海天主教引向歧途。张士琅神父较早站出来,参加天主教界反帝爱国运动。1956年3月16日,上海教区咨议会根据教会法典,投票选举教区代理主教,张神父以多数票当选。在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这是上海天主教界的光荣,也是张家楼天主教徒的光荣。

张家楼天主堂的宗教活动,在解放以后仍正常进行,直至十年动乱前停止。1985年11月29日正式恢复开放,有近1000名教友闻讯前来参与弥撒圣祭。许多老教友激动万分,感谢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保障教友宗教信仰自由,表示要把堂口管理好,为办好教会、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十、横塘天主堂

横塘天主堂地处上海郊区和佘山之间、约距市区20公里,离佘山10公里,交通便利,今属松江县泗联乡。

横塘在140多年前就有教堂、修道院和孤儿院,被称为上海教区修道院的摇篮。据史式徽所著《江南传教史》记载,1842年耶稣会传教士重返江南后不久,就决定创办修道院,1843年2月3日初创于佘山脚下的张朴桥,是年7月迁到横塘,当地教友纷纷捐款、建造了一所新屋作修院,1850年迁往张家楼。当初耶稣会会院设在横塘,1847年7月徐家汇会院落成后,从横塘迁往徐家汇。横塘修道院的神父、修士还为教区的慈善事业奠定了基础,他们收养弃婴、孤儿、创办了横塘孤儿院,这是上海教区最初创办的孤儿院,后迁至青浦蔡家湾。横塘周围教友分渔民和农民两部分,据资料统计,解放前夕,渔、农教友各为400人左右,共计800多人。

现堂建成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距今有100多年历

史。外形结构虽老式，但仍属坚固。1953年底举行过建堂80周年庆祝活动。其后宗教活动停止，教堂及周围建筑办大队幼儿园数年，后又为治疗吸血虫病的医院。

重新落实宗教政策后，横塘天主堂归还上海教区。教区领导应教友要求，将该堂修缮，并建造一幢二层楼房，供神长教友安放骨灰之用，名为“息安骨灰堂”。1986年5月29日，举行了隆重的开放仪式，首批安放了已故5位神父、24位修女的骨灰盒。骨灰堂分设4个厅，共有4000个格位。目前新的变化，昔日的横塘天主堂，今天的息安骨灰堂，周围环境清静幽美，绿树成荫，深受教友赞誉。近年有不少港澳台同胞和外宾到骨灰堂参观。目前堂内格位已基本定满，骨灰堂的扩建工程又将开始，以满足广大教友的需求。

十一、崇明大公所天主堂

崇明县的天主教历史，至今已有350多年。崇明天主教原属江南教区，1926年海门教区成立，崇明天主堂属海门教区管辖。1958年崇明县划归上海市后，隶属上海教区。

崇明县天主教是由意籍耶稣会传教士潘国光和邑人徐启元开创的。潘国光在上海传教28年，为上海天主教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徐启元是崇明新河镇人，系当地医生，1637年领洗，为崇明第一位天主教徒。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潘国光到崇明，在新河镇徐家宅创立了第一个会口，发展了第一批教友。

大公所天主堂长期是崇明县境内天主教的中心堂口，位于仙景沙港沿镇西，是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于1677年至1680年间，将周围的徐家会、许家会、袁家会、沈家会等4个会口合并创建的。在此之前，1671年法籍耶稣会士列迪我来崇明传教，在城内

购屋一所，改建住院，并在新河镇西苏家宅首建教堂诸圣堂。这两位传教士在崇明的传教事业，均得到徐光启孙女许太夫人的资助。18世纪初，崇明已有小教堂10所，教友5000余人。1711年，江南教区派法籍耶稣会士彭加德常驻崇明，成为第一个常驻崇明的外国传教士。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相继来到崇明兴建教堂。1845年，崇明有堂口45所，教友8000人。大公所等教堂于清雍正、乾隆时一度中断教务。1843年，当地教徒许懋谦集资重建大公所。1845年至1849年，法籍耶稣会士葛必达等受江南教区派遣到崇明，在大公所重振教务。1900年全县堂口有61所，教友上万人。崇明当时属江南教区，并与海门组成总铎区，并曾三度自成总铎区。

现存的大公所天主堂，于1910年前后由美国籍神父苗仰山主持重新建造。该堂规模大大超过以往。该建筑是1座7间13梁的大堂，堂前有钟楼1座，高27米，鸣钟时10里可闻。大堂能容纳1000人，仍奉耶稣圣心为主保。

1926年8月，崇明教务划归新成立的海门教区管辖。朱开敏（1868—1960，原籍青浦诸巷，后迁董家渡，世代教友家庭，其母为马相伯的胞姊，首批6位中国籍主教之一）任海门教区首任主教，中国籍黄崇烈神父任崇明总铎，结束了由外国传教士管理崇明教务的局面。

大公所办的学校和慈善事业等较为发达。育婴堂创办于1844年，上智孤儿院创办于1855年。1928年朱开敏主教创立婴德会，专门培养襄助传教的修女，并先后成立了公教进行会、青年会、圣母会等教友组织。1928年兴办民新小学、闺训女中。1935年创办广仁养老院。以上这些机构大都于1953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解放后,大公所仍是崇明县天主教的中心,圣心堂的宗教活动直至“文革”开始后被迫停止。十年动乱中,教堂钟楼等建筑被毁坏,大堂改为公社礼堂。宗教政策重新得到落实后,1981年7月26日,大公所圣心堂举行复堂弥撒。1983年,整修教堂并重建钟楼。目前,除大公所外,崇明陆续修复开放了新河镇保禄堂、草棚镇十字架堂和下沙高宅蔡区千多禄茂堂共4所教堂,基本满足崇明1.6万多教友过好宗教生活的需要。

上海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变化

马 蹄

上海天主教会从被殖民主义者控制到独立自主自办，是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也是上海的神长教友与殖民主义者长时期反复较量的伟大胜利。我是这个历史性变化的过来人和见证人，现在凭我回忆所及，把我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略述于后。

一、我是殖民主义者控制教会的见证人

1917年2月，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天主教徒的农民家庭。我的邻里和亲戚，都是天主教徒。我从幼年时代起，就深受天主教会的熏陶。1927年，我年方10岁，就去离家24华里的天主教学校住读。从此，我由小学，中学，修院，大学，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都受着天主教会的熏陶和教育。那时教会领导都是外籍神父，绝对服从是第一要义，因为我们被教育说他们是天主在世的代表。祖国的观念很淡薄，更谈不上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只有爱教的观念。我记得很清楚：当我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头脑里还没有什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概念，但我看到两件事，使我心中深感不平，第一件事：有个姓陈的小同学，在教堂里做了一些小动作，就被当时的法籍总本堂神父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抓到堂门外，从五级高的石阶上，掷到石铺的平地上，不管他是否跌痛或跌伤？这时候我就想：一个满口讲爱主爱人的神父，为什

么竟这样凶狠地对待一个小孩子？第二件事：有位姓张的老师，在教堂里教我们唱：“打倒列强”的歌，正当我们唱得起劲的时候，住在洋房里的法籍本堂神父，怒气冲冲地跑进教室来，喝令我们不许唱！当时在我小脑袋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唱“打倒列强”，关你什么事？现在我明白，原来他本身就是列强的代表，他是带着列强者的感情和心理来看待我们的；所以我们高唱“打倒列强”，在他看来，似乎就是打倒他自己。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为此群情激愤，在他离去后，就把这间教室兼作自修室和临时礼堂里悬挂的万国旗中的法国旗撕了下来，以宣泄胸中的怒火。但到后来，由于逐步接受了奴化教育，使我们心底里本来存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慢慢地被压抑下去。直到解放后，亲眼目睹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具体的事实，对待我们宗教界和宗教活动的态度，并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特别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认识有所提高，分清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和在这两方面我们应负的职责，才纠正了错误的想法，投入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行列。

二、上海天主教会的应变措施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上海天主教会的当权者大肆散播共产党来了要“仇教，灭教”的谣言，已造成了教徒的恐怖心理，再加上北方有一大批神父、修女，教徒逃到上海，散居在教堂里或教徒家中，名曰“逃解放”，他（她）们的言行增加了上海天主教徒们恐共、仇共、反共的心理。特别是从1949年春天起，上海天主教会当局，把修士修女们的大撤退大转移到国外或香港、澳门，更增加了上海天主教的不安与恐慌。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上海解放在即，在上海天主教，按照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长的指令，也

积极采取一整套的应变措施。

首先是把徐家汇耶稣会的初学院，文学院，和哲学院的修士，由山宗泰、王昌祉，黄振国三人带领，于1949年2月12日，乘美琪号轮，撤往菲律宾的马尼拉，预备将来如有可能，重新把他们派遣回来。据说山宗泰还把佘山山顶大堂内的圣母像和小耶稣像头上的嵌宝的纯金嵌也带走了。个别留在上海的作为维持传教的资本。至于徐家汇大修院的哲学班修士和神学班一二年级的修士，共18人，由蔡忠贤带领，于1949年4月下旬，乘轮撤往香港华南总修院。还有主母会教师修士11人，于同年5月3日，乘轮撤往澳门。走的走了，留下来的神父怎么办？教会中的帝国主义者要大家考虑考虑，如何应付解放后的局面？当时上海耶稣会的一个核心人物，提出要“化整为零，打入地下”，在这个“指导方针”的指引下，各人都想方设法，暗中同教友联系，交流情况，进行活动。1949年7月，上海解放后两个月，当教区神父们正在董家渡天主堂歇夏（避暑）的时候，姚缙唐来到董家渡，他当时是上海教区的代理主教，发给每个神父一本是由黎培里署名的搞地下活动的规范书。总之，在人们的头脑里，好像上海天主教会马上要大难临头似的。但事实证明，解放后上海天主教会的宗教活动，完全照常，教徒们仍可自由参加，他们的种种设想和打算，毫无根据，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

三、反帝爱国运动的掀起与开展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不但上海各教堂的大门依然敞开着，而且对外籍传教士也没有任何触动，宗教活动完全照常。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本不来干涉我们的宗教信仰活动。解放前在上海散播的一切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帝国主义分子和那些同帝

国主义分子沆瀣一气的反共“健将”们，不肯就此罢休，不但没有反悔，反而更加嚣张，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反共浪潮，他们针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和运动，费尽心机，密谋策划，进行疯狂的破坏。

1949年10月，当时我在浦东张家楼震新中学当校长，一天下午，张家楼总铎区的徐总铎，召集本总铎区的神父开会，他拿出一张由前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公使黎培里署名的指令：不许教徒参军参干，也不许教徒去参加由共产党控制的任何组织，如青年团、工会、民主妇联和民主青联等，还不许阅读共产党的刊物；并且布置要把这些指令由神父们口传给教徒们，要教徒们对政府采取不合作的全面对抗态度。我想张家楼总铎区是这样，别的总铎区也是这样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号召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可是这些破坏者们又说：“我们教友，不能捐献飞机大炮；因为这是杀人的东西，要犯天主诫命的”。吓唬教徒不敢捐献。可是当美国兵在仁川登陆时，这些日夜希望变天的人，包括龚品梅在内，都额手称庆，认为美国人快要打过来了，国民党快要反攻大陆了，共产党快要垮台了。还敢造谣说什么“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所以美国“必胜”，共党“必败”。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的幻梦不久就破灭了，当“三八”线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后，这些人又失望，懊丧地说：“为什么美国人不打下去呢？”

1950年的冬天，上海郊县，正在准备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格寿平以龚品梅神学顾问的身份，乘上海教区神父们集中在董家渡天主堂做“避静”的时候，来发布指令说：“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是不公道的，是犯天主第七诫的；因此教友不能去参加这个运动，也没有名份接受分到的土地；即使分到了土地，也只可暂时保

留,到可以归还的时候,就当全部归还给地主,因为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他的。”神父们又把这个指令口传给教徒,所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不敢积极地投入这个运动,也不敢接受分到手的土地,破坏了土地改革。

1951年春,当学校里要签订爱国公约的时候,主教府秘书召集几个校长神父,到四川南路主教府开会,传达龚品梅的指令说:“在爱国公约中,有拥护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这两条我们天主教徒是不能签约的;因为有神的不能拥护无神的,也不能拥护无神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其实并不要求我们宗教信仰者在意识形态上去拥护无神主义,而只要求我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也并不牵涉到宗教信仰,所谓“有神,无神”只不过是假借宗教的名义而已。因此在我们学校中签订爱国公约时,都加上了括号“不包括拥护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有的单位极本搞不起来,完全被破坏了。

1953年,龚品梅把这年定为圣母年,用两个法蒂玛圣母的雕像,要在市区和郊县,各校大的堂口里,同时进行“迎圣母”的活动,从这堂口迎到那堂口,特别是在农村里,沿途还要燃放鞭炮,吹鼓作乐。教徒们跟着圣母像,从这堂口拥到那堂口,日夜不断地念“玫瑰经”陪圣母;甚至还发展到教友们家庭和家之间的迎圣母活动。虔诚的教徒,只知道敬礼圣母,求免“教难”,但上海天主教会上层的策划者,却另有其丑恶目的,他们借“迎圣母”活动为名,制造气氛,煽动教友的对立情绪。他们还在上海几个大堂口里,轮流演讲所谓“大道理”,在学校和单位里,组织“教理小组”,公然散播“教难”空气,刺激宗教感情,传布种种反动谬论,说什么“有神无神势不两立”;什么“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丢”;什么“宁愿坐牢,不可反对或承认我们教会中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等等。

上海天主教会内出现的这种反常现象，曾一度蒙蔽和欺骗了不少教徒，但物极必反，这种明目张胆利用宗教信仰对抗党和政府的行径，反使越来越多的教徒擦亮了眼睛，清醒了过来。于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势不可挡的反帝爱国运动。

开始时，教会中一些先进者于1951年组建了上海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组织教徒们进行反帝爱国的学习，引导教徒投入爱国行列。虽然他们受到教会当局的无理打击和不明真相的人的谩骂，但他们忍辱负重，坚持不懈，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1953年的夏天，上海的反帝运动进一步掀起，人民政府逮捕了格寿平，才尔孟，翟光华等，揭露了他们的破坏罪行，教育了更多的教徒群众，提高了觉悟。原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竟做出了假借宗教进行破坏的勾当。特别是向被人称为“格圣人”的格寿平，他写下了坦白认罪书，承认了种种反共反中国人民的罪行。他的供词，教育了很多受骗的教徒，使他们觉醒起来，进而认识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

反帝运动后，虽有不少教徒觉醒起来，投入反帝斗争的队伍中；但仍有少数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坚持与人民政府为敌，特别是教区当时的领导人龚品梅，顽固地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破坏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污蔑过渡时期总路线为“猫狗路线”，以“天国路线”来对抗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许多教徒对这种赤裸裸的反动语言十分反感。龚品梅于1950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兼苏州教区主教。他一到上海，就由格寿平领着去拜见上海的法国领事，但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国庆节和“五一”节，曾多次邀请他上观礼台观礼，他却拒绝了。

嚣张的反动气焰，疯狂的破坏活动，迷惑了人民的思想，搞乱了社会的秩序。人民政府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建立良好的社会

秩序,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55年9月8日,开展了肃清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斗争。经过了这场斗争和广泛深入的学习,教育了多数的群众,打击了嚣张的邪气,申张了爱国爱教的正气。正如张士琅老神父在全国政协会上所说的:“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搬掉了,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虑地爱国爱教了”。于是上海的天主教会,开始进入一个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新阶段。

四、上海天主教会掀开新的一页

经过1955年的肃反斗争和学习,上海的天主教会起了质的变化,极大多数的神父教友,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懂得: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不论是谁,包括教会内的主教神父,只要他们搞违反国法,颠覆人民政权,破坏政府的政策法令,危害祖国安全的,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谁也回避不了,否定不了的。而且认识到“肃反”根本不是反宗教,因为事实上,教堂的门仍是数开着,纯正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着,教徒们仍可自由参与宗教生活。同时还看到天主的诫命,圣经上耶稣基督的榜样和宗徒们的教训,都是叫我们要爱护祖国,遵纪守法,服从政府的政府法令。因为我们教徒唯一的要求,只要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以感到在“九·八”肃反之前,龚品梅领导的一切措施,非但违反了国法,而且也是违背了教规教义,其结果是害了国家,也害了教会,败坏了天主教的声誉,还使不少人蒙受株连。”正如龚品梅于1985年7月获假释后,在蒲西路120号主教府里,向神父们说的,“我是一条害人虫,害了你们不少人吃苦”。因此,我们要热爱教会,保护教会,必须要改弦易辙,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因为爱国爱教,服是一致的。过去所说的爱国爱教有矛盾,甚至爱国有罪论,

都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犯所制造的谬论，致使许多人迷失了方向，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1956年3月初，张士琅神父被上海教区咨议会议员，按教会法典，在董家渡小圣堂内的圣体台前，投票选举为上海教区的代理主教。消息传出，受到广大神父教友的欢迎，当时张士琅虽是年逾古稀，但精神健爽，他为办好教会，安排教区的教务工作，筹划教区的经济来源，任劳任怨，尽心尽责，使“肃反”后陷入瘫痪的上海教区，焕发生机，走上正轨。可是当时我们还很天真，以为代理主教选出后，还必须上报罗马教廷；于是在1956年4月，发电报给罗马教廷：“龚品梅主教，因叛国罪，被政府依法逮捕，现在我们按教会法，选举张方济神父（即张士琅）为上海教区的代理主教”。罗马回电否决，还称龚品梅是“最称职的主教”。于是国内外一切敌对分子，就大肆宣传：张代理主教被罗马否定了，连避居在香港的某教友，也以过去张代理主教老教友的名义写信来劝他辞职让位。一时又把上海教区搞得混乱不堪。1957年3月，徐元荣神父，以上海教区咨议会议长的名义，请周士良神父起草，写了一封长信，向罗马教廷详细报告了选举张方济神父为代理主教的经过，并恳求罗马教廷，如果不要张当代理主教的话，那么请他指定一人。岂知到1957年6月底，罗马回信来了，仍然否定张士琅当代理主教。企图进一步搞乱上海的天主教会，搞垮上海教区。罗马教廷的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正在北京开会的神长教友们的义愤，进而向罗马教廷提出了抗议，此一义举引起了全国广大神长教友们的响应。张士琅代理主教，坚信自己是合法选出的，是有职有权的代理主教，坚定地站稳立场，抵制一切的干扰和破坏，力尽其职，办好上海的天主教会，直到1960年4月，上海教区自选自圣了正权主教后，他才把主教的职权交给了新主教，自己退隐下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教廷为了配合和适应帝国主义世界战略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措施，把天主教会作为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解放初期的中国天主教会，特别是上海天主教会内颇为流行着的一句口号：“全国看上海，上海看震旦。”因为上海最忠实地执行着它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其结果，既害了国，又害了教，也害了很多天主教徒。这个沉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天主教徒，岂能再盲目地跟着罗马教廷的政治路线走？新中国成立，我们应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实行爱国爱教；否则，如果仍然受制于人，顽固地坚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那么我们天主教徒和我们的教会现在势必要走进死胡同。如今我们终于自己作主，自选自圣了主教，在政治路线上，实行独立自主。同时在纯宗教的信仰上，我们仍然保持传统，上海教区于1960年4月27日，由上海教区的神长，修女，教友，选出了张家树神父为上海教区的正权主教。次日由皮漱石总主教在徐家汇大堂举行了祝圣礼。德高望重的张家树主教，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带领上海天主教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五、独立自主办教会新气象

1964年，正当张家树主教擘划经营，发展上海天主教会的时候，却遇上了当时“左”的错误政策，这不但限制了教会的发展，而且还关闭了好多教堂，停止了这些教堂的宗教活动。尤其是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天主教会，所有的教堂全被封闭，或被移作他用，宗教活动全部停止，所有的神职人员全部当作“牛鬼蛇神”，集中劳动。天主教会受到惨重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恢复了，这

时已是 87 岁高龄的张家树主教，极为兴奋，力展宏图，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重整旗鼓，迅速复兴上海的天主教会，恢复教徒们的宗教生活。但谈何容易，所有教堂都被占用，且都被弄得残破不堪，由于张主教的强烈要求，政府的大力支持，爱国会工作人员的竭力协助，逐步收回了一些教堂，又化大力气进行修理，修复一个，开放一个，甚至还没有完全修复，先开放举行宗教活动，以满足教友们宗教生活的需要，如徐汇大堂和佘山山顶大堂都是如此。今天，上海教区已陆续开放了四十多座教堂，即使在穷乡僻壤，有些教堂也修复开放，满足了教徒需要。1980 年张主教决定修复佘山教堂，恢复朝圣活动。可是佘山圣地，除山顶大堂的建筑尚存外，其它一切宗教设施，都被破坏得几成废墟，三圣亭、苦路亭，耶稣山园祈祷像，都已荡然无存，中山小圣堂，也已开了大天窗。1981 年 5 月，当佘山的中山圣堂初步修复时，朝圣活动就恢复了。经过四、五年的修建，今天的佘山圣地，显得比过去更形美丽，来朝圣的教徒，也愈来愈多，现在每逢阳历 5 月（圣母月），国内外来朝圣的教徒，人数在四、五万左右。

1982 年张主教已是 90 岁，但他高瞻达瞩，看到上海教区的神职人员平均年令已在 70 岁以上，有青黄不接之感，必须从速培养接班人。于是便邀请金鲁贤神父回来，筹办佘山修院。是年 10 月，举行开学典礼，本来只是三省（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上海市）的联合修院，1983 年，扩大为六省一市（即又加上了福建，江西，山东三省）的联合修院。因人数激增，故于 1985 年 5 月，在佘山脚下起造了新院舍，现在已有修生 130 多人，还在青浦县、江苏苏州教区，以及浙江宁波教区，山东济南教区等地办起了分院。张主教考虑到修女的接班人，于 1985 年 5 月，创办献堂会修女院。

1984 年冬，张主教鉴于教区教务发展的需要和自己年事已

高，便亲自提名并经教务委员会选举李思德副主教和金鲁贤院长神父为助理主教。1985年1月27日，93岁的张主教，亲自参与了祝圣两位助理主教的隆重大礼。

张家树主教，不但为上海天主教会的前途和教友的宗教生活着想，也为全国天主教会的前途和教友的宗教生活打算，从1980年5月起，他被选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首任团长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务委员，参与商讨国家大事，并积极提出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的提案。他还尽力做好人民外交工作，接待过很多教会中的高级神职人员，如法国的枢机主教，马尼拉的枢机主教，英国圣公会伦西大主教，南非的图图大主教等。

1988年张家树主教逝世，金鲁贤主教被上海教区教务委员会选举为上海教区的正权主教，李思德主教被委任为教区顾问，继续管理教区教务。他们两位主教，都继承了张家树主教的遗愿，高举了爱国爱教的旗帜，带领上海的天主教徒，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爱国爱教的道路。

上海天主教会所办文化 及社会福利事业

顾 连 群

上海天主教会在近代办有不少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文化社会福利事业，作为传教和扩大影响的手段，目的是为宗教事业服务。但客观上对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培养各类人才及治病救人，收贫助困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统计，1949年上海天主教会办有各类学校共计500余所，其中大学2所、中学20余所、专业学校4所，其余为小学（含农村读经学校）；办有医院11所、施诊所60余所，并办土山湾孤儿院、新普育堂等一批慈善机构。现将其中较著名的略作介绍。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原名震旦学院，创办于1903年，校址在徐家汇老天文台内。由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将其家产3000亩良田捐献办学，称“毁家兴学”。马公倡导“教育救国”，以自由研究为办学方针，重文艺、尚科学、行军训，实施学生自治，具有民主办学思想，创办之初为一所新型学校，蜚声全国。但不久法国耶稣会士南从周欲夺校政，与学生发生冲突。1905年，学生退学，马相伯离去，另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同年8月，震旦学院重新开办，由神父李问渔任校长，南从周任总教习，首批学生50余人。1908年，震旦大学迁至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完备

的正规大学。

震旦大学初办时仅设哲学与数理两科。1911年增设法科，1912年设立医科，以介绍西医学为特色，自成一派，是日后震旦各院系中最具代表性与知名度的。1932年设政治经济系，1933年又设牙医系。震旦大学1949年有学生1100余人，其中天主教徒学生为320人。该校的教育质量和设施在当时沪上大学可称一流，培养了大批医学及各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收回教育主权，1951年初，政府接收震旦大学。1952年，该校的文学院和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理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医学院则有其他两所医学院并入，改名上海第二医学院（今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天主教所办的唯一的一所女子大学。1937年9月开学，由1926年来沪的美国圣心会修女主办，行政属震旦大学，校址在淮海中路（今上海社会科学院部分和向明中学）。办学宗旨主要是“为天主教会女子中学培养教员及校长人才”。

该校分文学院和理学院，前者设中、英、法等国文学系、教育学系、经济学系、艺术学系；后者设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地理系，此外附有政治系、社会学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等。该校1949年有学生368人，其中94人为天主教徒。该校面向社会上层，学费昂贵，十分贵族化与美国化，毕业生自费或由教会奖学金留学美国的人数较多。

1951年，学校由政府接管后，并入震旦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随震旦大学各院并入复旦大学与交通大学。

徐 汇 中 学

徐汇中学，原名徐汇公学，又名依纳爵公学。1850年由法籍耶稣会士晁德莅创办于徐家汇，初时校舍简陋，学生仅12人。以后学生逐年增加，1855年为55人，1859年有91人，渐具规模。1878年建成一幢三层楼校舍，后称老校舍，1918年一幢四层楼新校舍又落成。

该校初期以学国文为主，兼学数学等其他课程。1900年课程作较大更动，除学国文外，将法文及数学、物理、史地等加入。1904年，该校学生可在英、法两文中选择一种来学习其他课程，即接受外语授课。1931年学校组织校董会，办理立案，学制改为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后，正式定名徐汇中学。神父张家树（1960年任上海教区主教，1980年任中国主教团团长，1988年病故）任徐汇中学第一任校长。张家树于1918年至1943年期间在徐汇中学任职19年，先后担任教师、教导主任、校长，建树颇多，曾制定学生品德分数评定及学生奖励办法，拟定校历、课表，办《汇学杂志》，扩建西校舍等。

徐汇中学历史悠久，从1850年创办以来的100年中，历任校长均由耶稣会任命。该校注重对学生的宗教教育，在非教徒生中发展教徒，对教徒学生则培养修道者生源。1934年该校设立备修院，毕业后进入修道院。历史上，上海天主教神职人员皆毕业于该校。此外，徐汇中学以教育质量高，管理严格著称，外语教育和足球运动为其特色。

1951年政府接收徐汇中学，委派震旦大学杨士达教授担任校长。1953年由国家接办，改为公立学校。

广慈医院

广慈医院，1904年开始筹建，由上海天主教会与旧上海法租界当局合作创办。1907年10月举行落成典礼，委托法国仁爱会修女管理，该医院法文名为圣玛利亚医院。

该医院开办之初仅设内、外两科，病床50张。1914年震旦大学开设医科，成为其实习医院。1916年法国医学博士薛佩礼应聘来震旦任教，兼广慈医院内科，使该医院内科有了名气。但以后一段时间应聘者大多为法国海军医学院毕业的军医等，业务水平一般。此间院舍与医疗设备逐步增加。1932年，建院二十五周年时，病床增至500张，其中300张为普通病人，设立内科、外科、产科、电疗科、眼科、皮肤科等。1935年有病床650张，1942年超过800张。而且医疗水平已有提高，1935年留法医师邝安坤担任震旦大学内科教授，40年代由他培养出一批内科优秀人才，其中不少到广慈从医，使该医院内科进入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外科专家徐宝彝学成回国，聘任震旦大学外科教授，经几年努力，使广慈外科水平提高。1946年傅培彬从比利时留学回国，聘任广慈特约外科医师，他医术与医德高超，1949年起任外科教授兼外科主任，在他精心指导下，广慈外科人才辈出。其他各科水平亦有提高。1937年，广慈医院又开办了高级护士学校，定名为“震旦大学附设高级护士学校”，培育出一代优秀护士，使病房护理大为改善。从三十年代末广慈医院在全国天主教会医院中首屈一指，名扬全国。

在旧中国缺医少药的环境下，广慈医院曾为众多中国病人提供医疗。据1948年度统计，该院共收治病人10662人，手术5467人，助产1042例，门诊近14万人次。同时，担任该医院护理的修女，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在施诊给药及护理中对病人宣传教义，力

劝入教,还对病危者给予“临终传洗”。医院内设有教堂,宗教气氛较浓。

该医院领导权由法国传教士掌有,日常事务则由法国修女主持。1951年10月,政府接管广慈医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1972年更名为瑞金医院。

公济医院

公济医院创办于1864年1月,地处外滩附近。该医院的前身为1856年至1862年的一所法国军人医院,为在沪的欧洲人服务,设在洋泾浜教堂对面的拯亡会修女院内。不久,洋泾浜本堂神父杜若兰(法国传教士)从外商那里获得准备开办医院的资金,并争取到医院管理权。1863年底,法国仁爱会修女到上海,公济医院开业后,由仁爱会修女负责管理。

公济医院系由股东集资所办,医院行政由股东会委聘管理。后来行政由托管委员会——董事会管理,成员由英国工部局和法国公董局的总董等数人组成。

1871年初,该医院原院舍不够使用,迁至苏州河北岸新建的院舍中。1884年开设了隔离病房,1890年扩建了新病房。该医院迁至苏州河北岸后,仁爱会修女在附近开设了一所专为中国人治病的免费医院,因公济医院专收欧美病人,除施诊给药外,另有100张病床。1909年,仁爱会会院迁至吕班路(今重庆南路),1913年将该医院转交方济各会修女管理。1920年又建成一座新式大楼,时医院内方济各会修女人数达50人。仁爱会、方济各会修女除负责医院的护理工作外,同时要向病人传教,以发展教徒。

1927年后该医院开始收中国病人,时有病床500多张,病房

分等级, 医疗设施较完备。

公济医院院务自 1877 年移交董事会后, 由历届董事会全权处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医院被日军占用。抗战胜利后, 由国民政府卫生局接管。上海解放后, 军管会于 1949 年 6 月接管公济医院。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 慈 疗 养 院

普慈疗养院, 1935 年创办于上海市南郊的北桥, 由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陆伯鸿筹办创立, 该院专收精神病患者, 是上海第一所精神病医院。开办经费主要靠社会募捐的基金和当时政府和英法租界当局的支助。

该医院由天主教会负责管理, 分男女两部。男部由卢森堡的德籍修士管理, 女部开始由美国玛利诺令修女, 1938 年底转由卢森堡方济各会修女管理, 有医生数名, 另有上海国立医学院的毕业生参加护理工作, 该校以此为实习医院。

普慈疗养院具有相当规模, 占地 100 余亩, 建有楼房 20 余幢, 可收病人 600 人。医院内还建有可容纳 1500 余人的一座教堂。自创办到 1937 年底, 共收精神病者 953 人, 其中 651 人治愈或好转后出院。

八一三事变期间, 日机轰炸北桥, 因该医院教堂悬挂法国国旗未遭轰炸。抗战期间该院收治伤兵数百人与收容难民数千人。仍收治精神病人。1944 年统计, 收治病人 400 余人, 共有 22 个国籍, 大多为中国病人。上海解放前夕, 医院遭国民党军队破坏, 教堂和水塔被炸毁, 损失严重。

上海解放后, 政府接管该医院, 改名为上海市北桥精神病医院。

土山湾孤儿院

土山湾孤儿院，1849年初创于松江横塘，时耶稣会会院设于此，江南遭水灾，灾民中有大批孤儿和弃儿，耶稣会传教士施于民见此情景开设了孤儿院，次年迁至青浦蔡家湾，1860年迁往南市董家渡，1864年迁定徐家汇，从此称土山湾孤儿院。

土山湾地处肇嘉浜北向西转弯口，原前有河，因疏浚河道，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以得名，教会在此建孤儿院，将土山削平。孤儿一般自6岁至10岁左右入院（也有不少因家境贫寒，托养在此），由孤儿院教以手艺，习艺期为六年，满师后或留院工作，或出外谋生；艺徒需学习教义，同时接受初等教育。孤儿院内设有小学，名慈云小学。据统计，孤儿院1867年，收养孤儿342人，其中133人分配在各个工场，80人从事农业，20人从事园艺，其余年龄小而留在小学读书读经。1875年到1885年的10年中，共收孤儿681人，受洗入教者456人。

孤儿学习的主要手艺有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纺织以及农田耕作等。土山湾孤儿院设有绘画馆和印书馆，绘画馆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曾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绘画、雕塑人才。印书馆是上海最早采用石印技术的印书馆，1874年引进活体铅字印刷，20世纪初能浇铸铅字，以后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机械设备，规模逐步扩大。30年代，每年平均出版外文书刊50余种，75000册；中文书刊60余种，350000册，主要是教会方面书籍。

土山湾孤儿院创办以来近百年中，收养孤儿数千人。孤儿学习学徒期满后，大多留在院内各工场做工，工资较低，并由教会为之择偶，配偶多为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出身的孤女。他们生了孩

子后，往往仍送到孤儿院，称“堂国”。

上海解放后，土山湾孤儿院的孤儿和工人受到政府关怀，1953年，孤儿院由市民政局接管，开始分批遣散孤儿，安置出路，对工人也作了妥善安排，仍保留了部分工场。1956年各工场归并到各行各业，1958年后印书馆已无业务，不久也关闭。

新普育堂

新普育堂创办于1912年，当初由市议会公推陆伯鸿主持创建。在旧城大南门外原有普育堂，收养残废贫病，俗称“叫化病院”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工程，辟地百余亩，建造新院（今普育西路、普育东路之间，面向国货路），取名新普育堂。

新普育堂为上海天主教会所办的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初创时建有5幢二层楼房，以后不断扩建，1949年时有楼房20余幢。堂务由上海公教进行会委托法国仁爱会修女管理。内分男女贫病院、男女老人院、男女残废院、男女贫儿院、男女疯人院、男病犯室、女寄养所、育婴所、传染病院、施诊所，并附设小学校、习艺所等。收容定额1500人，实际收容数在3000左右。据统计，1913至1914年度共收容6021人，其中死亡1258人。自开办至1937年，共计收容老幼贫病残等12000余人。

新普育堂常年经费需20万元，由地方政府、教会及社会各界的捐助，陆伯鸿所办的公司企业资助不少。上海公教进行会将该院作为重要的传教场所，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不仅向老幼贫病者宣讲教义，还向犯人传教，成效显著。据1926至1927年度统计，共计收容4200余人，受洗入教者2260余人。

上海解放后，由市民政局接管了新普育堂，改名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基督教初传上海简述

姚 民 权

在我国,基督教通常是指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也有人称之为耶稣教。18 世纪后期开始,欧美基督教各宗派先后成立差会,致力于向海外传教。这时期的传教运动同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是分不开的。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一般认为是 1807 年 9 月抵达澳门的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由于清政府坚持海禁,因此他只能藉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名义在广州澳门一带活动。传教士中第一个涉足上海的,是普鲁士人郭士立(KARLFRIEDRICH A. GUTZLAFF)。1831 年起郭士立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身份,七次沿中国大陆航行考察,其中至少有三次到上海。他写报告说,上海是(清)帝国的主要商业城市,是东亚的门户。他还详细记载了上海的战船和要塞情况。他曾有一次在天后宫门口散发传教书,但甚少接受者。上海官兵一发觉,立即劝他们离岸返航,他们未能正式传教。

鸦片战争后,上海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传教大门遂被打开,各宗派纷纷派人来沪。

一、伦 敦 会

1843 年底,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偕同从事医药工作的洛魏林(WILLIAM LOCKHART)两人来

上海定居。麦都恩曾于八年前和一名美国传教士从广州航行北上，中途在上海逗留。洛魏林在鸦片战争中曾随英军进驻舟山，一度在定海开设眼科诊所。两人抵沪后，洛魏林在南门租一民房创办诊所，同时向病人布道。

1846年至1948年，伦敦会又陆续派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艾约瑟(JOSEPHEDKINS)来上海协助开展伦敦会的工作。后来伟烈亚力主持该会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 PRESS)，艾约瑟担任伦敦会驻华代理人。

1846年洛魏林诊所扩建，迁山东路，改称仁济医院，麦都恩先在那里占据了大片土地，作为伦敦会的在华总部，1864年还在那里建立了伦敦会在沪的第一所正式教堂，取名天安堂。麦都恩占有的这一大圈土地，就是由上海有名的“麦家圈”，英文名称意为“麦都恩家的墙圈”。

当初设于南门的诊所在星期日兼作小礼拜堂，凡非英国国教会的外国侨民多在此礼拜。不久，它被称为联合小教堂，后来该堂发展成为南苏州路的新天安堂。

麦都恩在上海还从事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此外又著有《汉英字典》及解经和传道用的小书五十多种。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成立后，麦都恩被聘为第一任董事。1857年麦都恩病逝于英国。四十年后伦敦会为追念他的功绩，将原设在麦家圈内的华英书院改名为麦伦书院。又过了五年，伦敦会在书院隔壁兴建了天乐堂。它是伦敦会在上海的第二所教堂。

伦敦会早期来华的传教士除布道外，他们也介绍了某些西方科学知识。例如慕维廉译述了《地理全志》、《大英国志》；艾约瑟翻译了论机械原理的《重学》；医生韩德森(JAMES HENDERSON)

曾著有《上海卫生学》等；伟烈亚力则编撰《六合丛谈》，这是上海最早的期刊之一，水准较高，日本知识界还每期重刻翻印。

基督教在上海的第一个教案青浦教案是麦都思、洛魏林和慕维廉引起的。1848年3月5日清早三人雇了船去青浦，在城隍庙前散发布道“善书”，招来一批漕船水兵围观。洛魏林又嫌拥挤，在挥舞手杖驱赶群众时打伤了乡民。于是有些船夫持篙前来评理。争执中传教士也“受有轻伤”。县令闻讯后急忙派人备轿护送传教士回上海，同时向他们指出，三人的行动有违《上海租地章程》的规定。但是英国领事阿礼国反要求惩凶，竟下令不准英商纳税，调集英舰封锁进京的漕船，还派副领事乘兵船赴江宁恫吓两江总督李星沅。在这种武力要挟下，青浦县逮捕了十名群众，经麦都思等传教士指认为凶手后，这十人在新江海关门前被戴枷示众，阿礼国又根据传教士提出的“失物单”，向地方政府索取了300银两赔款。青浦县令和上海道台都在这次教案中丢了官，至5月中旬，这次事件总算结束。

二、英国安立甘会

安立甘会（ANGLICAN）是英国国教会。其差会在中国被称为行教会，也称为规矩会。1844年他们派传教士四美（GEORGE SMITH）和麦克开拉启（THOMAS McCLATCHIE）二人来华调查适宜设传教点的城镇。1846年四美因病回国，三年后他升任首任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常驻香港，主管中国及日本的传教活动。麦克开拉启在1845年接办了领事馆内的安立甘宗崇拜，同时在马路（今南京东路）开设布道所，后来因为租界开展市政建设，房屋被拆，麦克开拉启则在石皮弄重设布道所。

上海英领事馆内的崇拜活动促使江西路九江路口圣三一堂的

建成。该堂于1847年4月10日举行献堂礼。教堂上地是英商贝尔以公司的名义捐赠的。1893年增建尖塔型钟楼。全堂外形壮观,堂内有欧洲大教堂装备的管风琴,是当年远东最高级的哥德式教堂。九江路也因而被称为教堂街。

继麦克开拉启之后,行教会又先后派遣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和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来上海,但这两人来沪时间都不满十年,他们和麦克开拉启合作完成了该宗派崇拜专用的《公祷书》的翻译工作。

按四美当初设想,他们的传教中心将设在宁波,所以安立甘会早期专在杭州、绍兴一线发展,对上海的中国人布道工作发展较慢。到1902年,石皮弄布道所经过三次迁徙扩大,最终于1924年建造该宗派在沪的第二座教堂,即在宝昌路严家阁路的圣保罗堂,该堂信徒多为浙江籍人,本归浙江教区领导,1909年英美差会达成协议,才划归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圣保罗堂毁于炮火。

1860年,安立甘会曾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开设英华学校,这是一所专向上层社会招生的男童学校,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它培养了王正廷等一批信教知识分子。

三、美国圣公会

美国的安立甘宗教会在中国译称美国圣公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该会于1844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以后,是年年底差派原在南洋的文惠廉主教(WILLIAM JONES BOONE)带着九名同行来上海开辟宣教工作。这批美国人同多数外侨一样,住在上海城内(今南市区),1850年初,一名美国商人向他们捐赠了虹桥附近的一幢民

宅，他们将这第一所礼拜堂命名为基督堂。与文惠廉同来的女传教士左埃玛(EMMA JONES)则在虹口开设了文纪女校。

文惠廉发现苏州河北岸的虹口一带地价极廉，所以从 1845 年开始，他们就在旧称头坝的芦苇塘岸租地造屋进行布道。1848 年文惠廉胁迫原在美商洋行当买办的新任道台吴健彰，将苏州河以北的一片土地辟为美国租界。1854 年美国首任驻沪领事到任，在美租界内升旗，实在是文惠廉早已创下了基业。此后租界又不断向东、西扩展。其中从虹口港至天妃宫桥(今河南路桥)一段，人称为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就是以文惠廉姓氏命名的(监师意即主教)，因文氏之姓音译为蓬，故此路又名蓬路。1853 年，圣公会第一座教堂在蓬路百老汇路口落成，名为救主堂，它也是苏州河以北最早的教堂。

圣公会在上海立足后，积极以上海为基地向外扩展。1859 年差会从上海调遣两名传教士去日本布道，成立中国——日本布道区。文惠廉则在长江三角洲发展教会，在嘉定、青浦、苏州、无锡等地先后建堂。1864 年文惠廉去世后，继任主教即为当年去日本传道的韦廉臣(CHANNING MOORS WILLIAMS)。他亲率传教士继续溯长江而上，经安庆、九江直抵汉口、武昌。因武汉三镇位居当时中国版图的中央，韦廉臣确定以武昌为圣公会在华事业之中心，在那里开办了圣公会第一所医院，并开设纪念文惠廉的文华学校，该校后来即为武昌文华大学。

圣公会在上海的传教活动静寂了一段时期，1877 年施约瑟(SAMUEL I. JOSEPH SCHERESCHEWSKY)任主教。施约瑟是出生于立陶宛的美籍犹太人，对发展教育更有兴趣，任职后第二年，他在梵皇渡(今万航渡路底)购置 80 余亩土地，在此兴办圣约翰书院，此即圣约翰大学的前身。他还计划在那里办圣玛利亚女

校，育婴堂及男、女学道院，拟使该地区成为圣公会事业的总汇。后来江苏教区的主教座堂和主教住宅也座落在那里。

传教工作方面，在这段时期内增添了两座市区教堂。一为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圣彼得堂，另一为城内的天恩堂。

圣彼得堂肇始于 1857 年设立在新闻桥一带的布道所。那时此地尚不属租界范围，全是茭白田，人烟稀少。1888 年传教士汤葛礼(ELLIOT H. THOMSON)在北泥城桥(今西藏路桥)东堍，租民房三间成立显主堂。两年后，该堂迁至新闻路。又过了八年，美国一位主教之遗孀捐赠 5000 美元，差会又拨款，建成之新堂更名为圣彼得堂。

天恩堂则是当年的虹桥基督堂发展而来。汤葛礼受文惠廉任命主持上海教务后，嫌虹桥地处市廛，不宜为礼拜场所，乃于 1899 年将安立甘会设在城内石皮弄的布道所作价购下，稍加修缮后改名为天恩堂。后来设在松雪街的天恩堂是因为旧堂破败不堪，差会于 1933 年拨款重新扩建的。

1912 年安立甘宗的英、美、加拿大差会决定将在华教会联合成中华圣公会。此后上海圣公会就包括了该宗派在沪各堂。但圣三一堂仍不属中华圣公会。

四、美国长老会

美国北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最早来沪的传教士是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他出身于美国国会一参议员家庭，曾担任差会干事，1847 年在杭州湾遇海盗，落水溺死。

1854 年他的弟弟娄理仁(REUBEN LOWRIE)受派携妻来上海，在陆家浜找到一片土地，在此居住和传道。三年后，差会增

派梅理士(CHARLES K. MILLES)和甘撒母耳(SAMUEL R. GAYLEY)两对夫妇前来。1860年上海成立长老会第一会堂(后来又称为清心堂),由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主持。上海的清心女中,就是为纪念范约翰夫妻而开设的。

范约翰来沪的另一任务是建立长老会的美华印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它最初设于小东门,先迁北京路,再迁四川北路,是上海有规模的印书馆之一,技术上也领先于同业。其部分职工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或技术骨干。

当美华印书馆设于北京路时,传教士为向职工传教,在馆内建思娄堂。印书馆迁四川北路后,该堂改称沪北堂,为上海长老会第二会堂。

1888年秋,范约翰在靶子路(今武进路)住宅内进行传道,他聘第一会堂长老陈芷谷及第二会堂长老吴子翔为助手。礼拜信徒多为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及其家属。未几,两名中国助手在虹口中虹桥另租民房为传道场所,平日还作学校用。后经几次迁移,最终择址宝山路宝通路,正式取名为闸北堂,也称上海长老会第三会堂。现今的闸北堂是原堂两次遭战火焚毁后于1947年重建的。

闸北堂在中国牧师俞国楨倡导下,于1905年宣告不接受差会津贴而经济自养。后来俞国楨商开闸北堂,专事提倡教会自立。他所手创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得到全国性的响应,终于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创自立的一大派别。而长老会除这三个大堂外,也续有发展,特别是1927年南、北长老会和伦敦会等联合成中华基督教会后,这个宗派拥有的教堂数目居上海各派之首。

五、美国浸礼宗的三支差会

浸礼宗(BAPTIST)同基督教其它宗派的最大区别是，他们坚持信徒受洗必须全身浸入水中。该宗派盛行于美国南方，宗派内部派别纷呈。1847年来上海开拓传教的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属浸信会差会。虽然晏玛太之后差会又派了六、七名传教士到上海，但他们有的转赴山东有的因病回国，唯晏玛太在沪历四十余年，其事迹也多。后来差会在上海、苏州办的一些设施，都以他名字命名。

晏玛太视力不佳，他到沪后出入于酒肆茶馆，从中学习沪语并趁机传教。当年11月，他们在老北门成立第一浸会堂。主要成员是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或随从。

19世纪50年代上海小刀会起义时，老北门浸会堂是最靠近县城的欧美人居住点。晏玛太每天收集城内小刀会的情况，有时报告给美国领事，有时在《北华捷报》上披露，他目睹了起义武装的68次战斗。不管交火如何激烈，他始终不肯撤离教堂。清政府道台吴健彰被俘于城里时，晏玛太参与了营救工作，先将吴窝藏堂内，后又备轿送吴入租界庇护。两年后当清军勾结法国殖民军镇压小刀会时，晏玛太将教堂楼房供反动军队筑垒架炮。凭这些“功劳”，晏玛太向清政府诈得一笔巨款，除用于修复教堂外还有余款上缴差会。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差会经费中断，晏玛太就在工部局、领事馆这些机构供职，并利用职权自己经营地产买卖，因此他后来很富有。晚年他又去欧洲游历又向社会团体赠款，扬名社交界。无怪浸信会差会一位司库曾说，“从差会看来，晏氏不仅是传教士，他还是一位政治家，他若在美国，干任何一行都能飞黄腾达”。晏玛太生前还将浸会的传教事业扩展到镇江、扬州一带。

1883年和1902年，南浸信会差会继续派万应远(ROBERT T. BRYAN)和乐灵生(FRANK J. RAWLINSON)先后来华。1892年万应远奉调老北门浸会堂。他接任后首先卖掉浸会堂原屋，在附近重建四层楼的浸会堂，又增设有寄宿设备的男、女学塾。乐灵生抵沪后，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底的靶子场购地建屋创办明强学校(后称明强中学)，并在那里成立第二浸会堂。1910年万应远在那里再扩大范围，将先前设在老北门的桂秀女塾更名晏摩氏女中，迁来此地。第二浸会堂正式起名怀恩堂，信徒多为两校师生。

怀恩堂初创于虹口，后来因为靶子场的浸会基业全部搬迁北宝兴路，又因战乱不靖，屡次更换礼拜场所。现在位于北京西路陕西西北路的怀恩堂是1942年建成的。

浸礼宗中另一支较大的传教组织为浸礼会真神堂，在中国习称浸礼会，1902年，成立真神堂于塘沽路。后来浸会南、北差会合办沪江大学后，浸礼会在上海又发展了二、三所教堂。此时，南浸会的教堂也增添了怀施堂、怀本堂等。

浸礼宗中还有一支称安息日浸礼会差会，它虽成立较晚势力不大，但也于1847年4月差遣贾本德(SOLOMAN CARPENTER)和华德内(NATHAN WARDNER)两对夫妇来沪，因为该会礼拜的日子是星期六，所以在传教工作开始前先要翻译他们特有的《安息日期表》和有关戒律，直至三年后才在城内彩衣街盖起他们自己的礼拜堂。但不久因小刀会起义和美国内战等原因，贾、华两人都离职回国。1880年差会重派台佛史(D. H. DAVIS)来沪恢复工作，在南市斜桥建造了惠中堂。

六、美国监理会

监理会差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SOUTH)是美国循道宗(METHODIST)的南方一支,1848年4月,秦佑(BENJAMIN JENKINS)和戴乐(CHARLES TAYLOR)两对夫妇首途来华。起初在城内王家码头赁屋居住。1850年1月,在郑家木桥(今福建路延安东路)建立的福音堂正式开堂。但数年后这两对夫妇都因妻子患病分别回国。此时,差会即派耿惠廉(WILLIAM G. E. CUNNYNGHAM)夫妇来沪接替,他们用沪语编印了一些赞美诗和传道小册子,效果较显著,于是在城内虹桥南首建造了监理会的第二座教堂,名曰化善堂。

1854年春秦佑第二次来上海,还有三对监理会传教士同来,其中两对不久即返美,秦佑也于1862年出任美驻沪领事,离开传教岗位,唯有蓝柏(JAMES WILLIAM LAMBUTH)在华传教32年之久。他将郑家木桥福音堂改名为圣诞堂。其子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在苏州创立博习医院。1886年蓝氏父子同时去日本,蓝柏出任监理会日本传教团团长。中国的工作由林乐知继任。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60年来上海后不久,美国发生内战,差会中断接济,林乐知乃转业担任清政府办的广方言馆英文教习,同时还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内译书。18年间他译了十多项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著作。1868年他还自费办《教会新报》,这是当年教内唯一兼载社会时政新闻的周报,后来改名《万国公报》,满汉朝野人士订阅者甚众,康、梁维新派还以此为鼓吹变法的张本。《万国公报》后虽由广学会接办,林乐知仍为主笔,并兼任广学会编译。清政府也很器重他,曾钦赐五品进士衔,又赏

以蓝呢乘舆一顶 美国政府则把他视为“中国通”。

1881年林乐知回到监理会任中国传教团团长。他向差会提出办报、办大学、办印书馆三大建议，差会都采纳。因此监理会在华有自己的刊物《教保》，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华美书坊，有自己的最高学府东吴大学。

这段时期内监理会在上海的传教工作也有发展，在松江开辟新传道区。1879年在西新桥兴建了三一堂，它与郑家木桥教堂合为一个牧区。1887年差会得到一位名慕尔的信徒之巨额捐款，乃在云南路汉口路兴建监理会堂，并将三一堂归并其内。1932年监理会堂重行拆建，此即闻名远东的慕尔堂（今称沐恩堂）。

1882年林乐知将他原设在八仙桥的学塾迁往虹口昆山路，定名为中西书院，这就是东吴大学前身之一。林乐知在该地区大兴土木，建造传教士住宅、印书馆、还有专供出租的公寓洋房。那里也成立一个牧区，在中西书院内礼拜。林乐知去世后，1922年，监理会在东吴师生的捐助下正式兴建了景林堂（今称景灵堂）。在相当长时期内，监理会在上海市区仅有景林堂、慕尔堂两座教堂。

20世纪之前来上海传教的，除上述几个大宗派外，公理会、内地会、信义会等也曾有传教士驻沪，但他们活动的重点都在外省，在上海并没有正式建堂。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俎上之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更是长驱直入，上海不仅添了许多中小宗派，而且逐渐成为全国基督教的中心地，它的传教活动情况愈发繁杂，自然不属本文叙述初传情况的范围了。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片段

罗 冠 宗

基督教青年会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青年会 (Y M C A), 1844年由美国人乔治威廉 (George Williams) 在伦敦创立。他同 12 位店员组织了一个以查经为主的小团体, 宗旨是“追求基督教道德精神, 避免城市青年的堕落”。这类组织发展很快, 不仅在英伦三岛, 而且发展到欧洲大陆。1851 年青年会被介绍到美国后, 逐渐从一种以宗教活动为主发展到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多样化活动, 以《圣经》“非以役人, 乃役于人”的教导为会训, 提倡为社会服务的团体。由于它的活动方式适应了青年和社会的需要, 此后青年会在美国发展更快。1855 年欧美各国青年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国际会议, 通过了《巴黎本旨》即“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 在联合那些依圣经的指示, 信奉耶稣基督为其上帝及教主, 并愿在教义上及生活上作其从者的青年, 彼此合作, 以推广上帝的国于一般青年之间。”会上组成“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 (World Alliance of the Y M C A.), 于 1878 年在瑞士日内瓦设立办事机构。1889 年美国 and 加拿大青年会联合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 (International Commiffee of the Y M C A.)。”青年会运动由于得到美国资本集团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 “世界协会”的总干事长期由美国人担任。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推广青年会工作, 主要是由“北美协会”出钱出人。

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 1855 年和 1856 年在福州英华书院和通州潞河书院先后成立的两个学生青年会。

1890 年中国基督教宣教大会在上海举行。这个主要由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宣教大会邀请北美青年协会派人来中国开展青年会工作。1895 年北美协会派美国干事来会理 (Lyons) 来中国, 他在 1896 年协助成立天津青年会, 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这时全国已有学校青年会 27 处。1896 年 11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学校青年会全国大会, 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会, 这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前身。

1898 年北美协会派美国干事路义思来上海筹办青年会。1900 年 1 月 6 日, 由 35 位基督教青年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皇家亚洲学会”召开“上海基督教中国青年会”成立大会。会章的宗旨是“提倡德、智、体三育和‘非以役人, 乃役于人’的精神以改造社会, 造就青年”; 其活动是“利用公余时间, 提倡教品辅仁的团契和高尚娱乐以及补习教育等”。主要参加者有张振声、宋耀如、颜惠庆、曹雪麋、黄佐庭、颜德庆等人, 由张振声任会长、路义思任总干事。这年冬天路义思去北方任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随军牧师, 由曹雪麋继任总干事。

上海青年会成立后, 募得捐款 85 元在北苏州路 17 号(河南路与四川路之间)租屋二间作为临时会所, 内设阅览室、课室和办公室。同年 10 月搬到南京路 194 号(现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旧地)。1903 年 7 月 2 日又搬到北京路 15 号 B(在江西路转角), 会所比前扩大, 除原有课室、阅览室、办公室外, 还有一个不大的礼堂, 并设简易宿舍。在此期间, 上海青年会董事部有黄佐庭、颜惠庆、

唐介臣、王君阁、韩玉麟、宋耀如、吴清泰、夏粹芳、高凤池等人，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基督教徒。

在青年会会员发展到 350 人，会务初具规模后，青年会开始筹建会所，由上海绅商各界捐银 55000 两，另由路义思返美捐款 5 万美元，于 1905 年 10 月在四川（中）路 599 号奠基，1907 年 11 月举行落成典礼，由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将该会所信托文契交给会长王阁臣，这个由中国会员自筹经费，美国捐赠部分资金建成的会所，就此变成了由美国授予上海青年会的产业。会所内部设备完善，有大礼堂、会议堂、课堂、游戏室、弹子房、健身房、浴室、宿舍和办公室等。大礼堂取名“殉道堂”，礼堂四周镶嵌了刻有在八国联军入侵前后死亡的中国教徒名字的铜牌，这同曹雪庚、路义思二人曾去北方调查义和团事件中死难教友以及路义思充当八国联军随军牧师事有关。

1909 年上海青年会又筹募捐款白银 6 万两，另由美国友人捐款 5 万美元，在会所后面购地建筑童子部，1915 年 9 月建成，那时少年会友已有 120 人。该会所底层建有室内游泳池，以后在该会所开办青年会中学、夜校、贫民学校等。

由于事工日益发展，四川路会所已不敷应用，上海青年会又筹款在旧法租界敏体尼荫路（即现西藏南路 123 号）购置地皮，在 1929 年 10 月 19 日奠基，1931 年 9 月建成九层楼的新会所，作为上海青年会总会，四川路会所为分会，作为少年活动中心。总会所建筑耗资 100 万元，除北美协会捐助 10 万美元外，其余全部由上海青年会募捐筹措。一直沿用至今。

当时上海是一个不足 3 万人口的城市，风气闭塞，社会团体很少，青少年没有什么社会活动。青年会成立后，开始时只有读报听讲、研讨圣经、讨论宗教，有时组织自行车郊游等活动。在会所搬

到北京路后，活动有所增加，德育工作主要是查经班、宗教演讲等；智育工作除办日夜补习学校、英文、打字班外，还有各种演讲会、辩论会，有些是配合幻灯演讲，1904年2月曾免费试演“电光影戏”，介绍电影；演讲、辩论的内容介绍知识性的较多，如各国历史、宪法、政治等。在事工中有些是为殖民主义侵略作宣传的内容，如1904年4月《会务纪闻》中专门介绍青年会的“英雄”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首先登上北京城的美国安南波立司青年会会友、军人第邱；在辩论会中竟有以“日俄战争日胜有益于中国”为题。这些都说明，当时上海青年会的事工，既有介绍当代文化知识的一面，又有为殖民主义侵略宣传的一面。

二

从1905年四川路会所奠基到1932年八仙桥会所落成，上海青年会会务有很大发展。青年会工作主要是围绕德、智、体、群四育进行，具体事工虽各有偏重，但又互相渗透。并根据当时社会需要开展各项新的工作，参加对象不限于基督徒。在此期间，上海青年会的工作主要是：

德育工作，主要是进行基督教教育以及一般的伦理道德教育。如中、英文查经班、介绍基督教的各种演讲会，还有伦理道德、人格修养等演讲。

智育工作，重点是日、夜学校，课程有英文、国文、商业知识、美术等，实际上是职业教育，同时又有德育、体育和社交活动。许多青年在学习后有一技之长，容易谋得职业，很受欢迎。1920年学生达1437人。夜校中有300多人是商店学徒，根据职业需要，为谋求一技之长而来学习的。由于在学校中受到服务社会的教育，这一年夜校学生还在闸北自办义务学校，由学生义务任教，使失学

儿童得受教育。此外还设有阅报室、知识演讲,内容有天文、地理、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主要视当时社会需要而定。

体育工作;当时正是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之后,各校课程中虽设有体育课,但尚无专业教育教员,一般都是请军人教些旧式兵操,又无体育设备,不能引起青年的兴趣。青年会在北四川路底购置农地设运动场(在现山阴路上),每星期六下午组织会友到那里举行竞走、跳高、撑杆跳高、跳远、网球、足球、掷锤、赛跑、拔河等运动。当时各教会学校经外国传教士介绍,也开始有体育运动。1906年6月青年会举办运动大会,参加比赛的有南洋高等实业学堂、圣约翰书院、私立中学、中西书院、澄衷中学、华童公学、青年会中学等;以后又于10月举行秋季运动大会。

1907年四川路会所落成,内设我国第一个健身房;1913年增建的童子部下面设有室内游泳池,体育设备日臻完善。

1908年北美协会派专职体育干事爱克斯南(Exner)来上海,由中国干事协助成立体育部。随后在培养体育人才、发起、推进和协助全国运动会方面都作出成绩。

1909年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举行,由爱克斯南负责筹备工作,全运会的裁判、管理等都由青年会负责。1912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北平天坛举行,虽改由北平体育协会主办,但大会秘书长仍由青年会的霍葛兰(Hoagland)担任。1918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请青年会干事葛雷(Gray)为技术顾问。可见我国最初几届全国运动会同青年会的提倡协助分不开。

1913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大运动会”(即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是由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青年会联合发起举办的。当时我国运动员主要由各地青年会选派。直至1927年在上海举办第八届远

东运动会时才由中华全国体育协会负责办理。

从1912年起上海青年会先后办了三次体育训练班，每次十余人，为各地青年会和学校培养了不少体育人才。

1920年上海青年会发起“上海乒乓联合会”，参加的有东吴第二中学、普益社、怀恩堂夜校、澄衷中学、青年会日夜学校等。1926年2月5日由上海青年会主办上海乒乓联合大比赛。

由于青年会有健身房、游泳池、淋浴等体育设备，开办体操班、各种球类比赛和游泳训练等。开社会风气之先，受到青年和各界人士的欢迎。

少年工作：1915年童子部建成后，活动内容主要有体育、乒乓、奕棋、拾球、游戏、玩具等。1916年参加的少年会员有1213人，是当时世界各国青年会少年会员人数最多的。

学生工作：上海青年会从1914年开始进行基督教学生工作，主要是联系各校学生青年会。1915年举行“学塾青年会联合会”有沪江大学、圣约翰书院、明强学校、麦伦书院、哈佛医学馆、惠中书院、清心中学、伦敦会学堂、浸会医学院9个学生青年会共440人参加。直到1920年上海青年会才正式成立学生部。

留学生部：1914年开始设立，负责辅导出国留学学生选择学校，申请护照，介绍到外国就读城市的青年会，并对回国的留学生进行招待等，由此青年会得到不少有社会地位的会友。

劳工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派工人去欧洲战场，上海青年会派了陈维新等三位干事去欧洲为华工服务。1920年陈维新回国后，在上海为归国华工服务，上海青年会同时设立职工部。1921年在浦东设职工服务所，举办演讲会、阅报室、义务诊所，并为职工代写书信等活动。

群育工作：设交际部，专门组织同乐会、旅游、参观等活动，还

设立过“职业介绍部”。

另外针对当时社会需要也举行过一些其他大型活动，如“禁毒(或禁烟)”宣传大会，为国内水、旱灾害地区捐款和募集衣服、粮食以及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等活动。

关于会员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发展经过。开始时上海青年会新会员是由会员介绍入会的，从1905年到1907年会员从314人发展到360人。1908年上海青年会开始采取征募会办法，在征募新会友的同时捐募经费。为了取得最大效果，征募会采取分小队进行竞赛，以捐款包括会费数字多少来决定名次，这固然有刺激作用，使青年会在一段时期内会员增加较多，但竞争只讲金钱数字，有时对会友的质量注意不够，为了竞赛，各小队都请一些有社会影响的人担任队长。自从用征募会办法后，1909年会友数达966人，1915年达1377人，1920年达2238人。

由于会员众多，而且大多数是非基督徒，为保持青年会的基督教性质，青年会仍由基督徒会员选举产生领导全会的董事会。以后基督徒会员人数增加，乃由会方邀请部分有社会地位的基督徒任“基本会员”，每年举行一次“基本会员年会”，听取总干事的会务报告，选举董事。从1921年起董事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这样既可不断更新董事又可保持董事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董事会任命总干事，由总干事负责全会工作，并任命副总干事、各部门主任干事和干事。担任青年会干事的条件规定是大学毕业的基督教徒、他们大都在学校时已参加学校青年会或基督教团契活动，同青年会学生干事有较长时期的接触。在志愿参加青年会并得到同意后，一般要经过一年的干事训练班，学习世界青年会历史，中国青年会历史、宗教修养和青年会各种事工等理论课。以后到指定部门实习，同时也要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一年后

才由青年会领导决定是否聘任。这些都是为了保证青年会的基督教本质、人格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联系的需要。

曹雪麋总干事到 1924 年因病辞职，以后由郝伯阳、陈立廷、汤仁熙先后任总干事，1933 年起由陆干臣任总干事直到上海解放。

三

1931 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东北三省，1932 年一二八，日军又进攻上海，遭到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由于闸北等地战区难胞纷纷逃入租界，上海青年会立即将四川路会所和刚建成的八仙桥会所同时开放收容难民，并商借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房屋另设一难民收容所。上海青年会干事和许多会友积极参加难民服务工作。此外，上海青年会还组织战地救护队到战区救护尚未逃出的难胞。又协助学生组织国难急救会；并设学生救济会，筹款补助学费，使受战争影响的学生不至中途失学。

淞沪战争后，上海青年会逐步恢复原来的经常事工。此时，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活动日益高涨，而蒋介石政府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投降政策，两种主张在上海青年会工作中均有反映。

当时上海一些爱国人士王任叔、李公朴、陈望道、章乃器等先后组织过“东北社”、“时社”、“战时工作研究会”等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各种座谈会，男、女青年会董事、干事参加的有吴耀宗、陈巳生、沈体兰、李登辉、阎宝航、应书贵、杨怀僧、丁贵堂、蔡葵、管梅璠、邓裕志、杨素兰等。

与此同时，青年会全国协会却在 1932 年请美国著名布道家艾迪到各地演讲，主题是《中日问题》，鼓吹“目前中国之大患在于赤

化势力蔓延与军阀割据。当前国难紧急时期，全国人士应速谋团结御侮，拥护中枢，更应尽力防止赤化之蔓延……”。完全是利用基督教为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作宣传。

1934年9月，青年协会又请艾迪到上海等21个城市演讲《中国的危机》，他竟说“中国现在外来的侵略是个警告，也许是要亡，也许是联合起来整顿起来。我们看到朝鲜也是有了这种侵略而亡国的，给它的警告它没有接受，农民不受教育，贪赃增加了，县官抢县里的财产，省长抢省里的财产，侵略者将他们所有的权利及国土都抢去了。现在朝鲜贪赃的事情没有了，农民也都受了教育。”演讲中还大捧蒋介石，肆意攻击共产党，对当时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他竟编造一套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残酷殖民统治的鬼话，妄图欺骗中国人民甘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顺民。

1935年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撼了全国人民，12月20日，上海一些著名的基督徒、男女青年会的董事和干事刘湛恩、刘立明、梁小初、颜福庆、李登辉、吴耀宗、杨素兰、刘良模、陈维姜、邓裕志、沈体兰、江文汉、陈铁生、应书贵、丁佐成、徐松石、陆干臣、诸培恩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指出“‘九一八’以后的忍辱、妥协、谦让，不特没有满足侵略者无餍之求，并且快要把我们的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主张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对于分裂领土的企图，对于欺骗麻醉的手段，对于一切威胁与压迫，坚决地作勇敢的反抗。”“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表达了对救亡运动的呼应，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支持。

当时许多救亡团体借上海青年会会所进行活动；在年青会本身事工中也有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但由于当时蒋介石政府

和租界帝国主义的限制，这些活动常常遭到不同程度的阻挠。

如 1935 年青年会智育部原拟组织一次纪念“九一八”东北问题的系统演讲，竟遭到租界当局的无理禁止。

1936 年 1 月上海青年会请李公朴演讲，他在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后认为，“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民族生存，抵抗侵略。最近各地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大规模请愿游行（即一二九运动），他们挨饿挨打，受到各方面的阻挠，但绝不气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民众非但没有死，并有伟大的潜伏力量。我们希望这种运动要持久，要从学生群众推进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使整个民族的救亡运动随着这种呼号爆发起来。”演讲铿锵有力，喊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心声。

与此同时，青年会在别的演讲中，却有人在大喊“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由此可见，在青年会讲台上也反映出两条路线尖锐的斗争。

就在这个时候，智育部要举办一个“民族解放系列讲座”，由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吴耀宗、沈体兰、王造时、柳湜、彭文应等分题演讲。可是，这个系统演讲又被法租界捕房阻挠，经青年会干事数次交涉，总算讲了六讲。

此外，有些比较进步的演讲竟被取代了，如 1936 年 5 月原定由救国会领袖刘湛恩演讲“如何爱国？”后竟改由国民党市党部头子潘公展演讲。4 月间原定智育系统演讲主题是“时代的认识”，讲员有钱亦石、章乃器等一批救国会领袖，后来被改由一个在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协助蒋介石在那里搞“农村复兴”的外国传教士牧恩波演讲。

然而抗日救亡运动毕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国民党压不下去的，青年会中的进步力量也在这当中逐步发展。同年 6 月

“基督将军”冯玉祥到青年会演讲，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有四亿五千万同胞，而被六千万人口的国家欺压得连头都抬不起来，这不是奇耻大辱吗？亲爱的姊妹兄弟们，飞机大炮虽然利害，但只要我们勇于牺牲，团结一致，定得最后的胜利。”这又是一次有力的抗日救亡号召。

在救亡运动方面，上海青年会另一个突出的活动是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刘良模从1934年冬开始在上海青年会四川路会所办起民众歌咏会，教唱爱国歌曲，开头是刘自编的《救中国》、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和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出来后，他们很快就唱起来。民众歌咏会对参加者一律不收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学会了要再教别人。由于这些歌曲喊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参加者很快增加到300余人，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以后他们又在八仙桥青年会办起民众歌咏会，人数不断增加。冼星海、吕骥等同志都在里面参加过工作，培养骨干。跟着上海许多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歌咏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声迅速传向四面八方。1936年6月7日上午，民众歌咏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歌咏大会，歌咏会本身有1000人，在刘良模指挥下，从“大路歌”、“开路先锋”开始，带动了围观群众变成5000人的大合唱，慷慨激昂的歌声，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人们的血在沸腾。国民党政府派了武装警察想来阻止，但他们却在“义勇军进行曲”等洪亮歌声感染下跟着唱了起来。特别是在高唱“打回老家去”时，几个东北籍的警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刘良模从上海青年会开始的民众歌咏一直唱到抗战爆发，成为鼓舞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有力武器。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在浙江金华见到刘良模，鼓励他坚决把抗日救亡歌咏搞下去，给刘良模以极大的勇

气和力量。

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抗日高潮。当时，上海青年会已在会友中发动为战争服务的“义务员登记”工作。数日内即收到485份志愿书，多数是18至25岁的男女青年。青年会从中选出127人组成“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在执行委员会下设伤兵服务、难民收容、总务、宣传、劝募、训练等部，为战时服务作准备工作。

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上海青年会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淞沪抗战阶段。八一三战争爆发，上海青年会全体干事、职员和许多会友，激于抗日救亡义愤，同全市人民一起积极投入伤兵服务和难民救济工作。

1. 伤兵服务。青年会派出61人前往胶州路、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麦特赫斯特路（今泰兴路）、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一路）以及当时的第8、19、23伤兵医院参加服务工作，进行病室慰问、教唱救亡歌曲、演讲时事、分送慰劳品、代写书信等。以后又集中力量在第23救护医院，参加服务的先后有51人。除上述工作外，青年会还根据传统活动方法为伤兵组织俱乐部，并向社会募集留声机、图书、报纸杂志、乒乓、棋类、积木和乐器等，并教伤兵吹奏。

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后，留在租界的伤兵医院也随之撤离，伤兵服务工作告一段落。但由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八百孤军撤退到租界后被关禁在胶州公园“孤军营”内。1938年3月起青年会派干事前往“孤军营”服务，内容有识字班、口琴班、放电影、体育锻炼

和学习生产手艺等。

2. 难民救济。战争爆发后有几十万难民涌进租界，各慈善服务机构纷纷成立难民收容所。由青年会负责的有七处，收容难民13,000余人。

(二)“孤岛”时期。初期，租界内仍可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此时上海青年会工作照常进行外，比较突出的是：

1. 上海联，即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由大中学校的学生青年会和基督教团契联合组成。八一三后，上海联积极动员各校学生投入支援抗战工作。在“孤岛”时期，它在团结教育同学，认识基督，认识时代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它锻炼了学生领袖，培养了许多人才，不仅在基督教里面有，在其他各条战线都有。

2. 学生救济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学生流亡上海，生活非常困难。上海青年会董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和青年协会学生干事江文汉建议，由男、女青年会联合发起组织学生救济委员会。他们致电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国际学生服务社和英美等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组织。请求援助。这是学生救济工作的开始。以后学济会的经费，除国内募集部分外，主要由上述几个国际性学生组织向外国学生进行劝募。这一工作，既帮助了国内清贫学生，又宣传了我国人民英勇抗战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上海学济会最初的工作是补助清寒学生学费和旅费；接受部分生活费补助的学生在课余须担任一些服务工作，1939年1月学济会借福州路河南路口的五洲大厦办起学生经济宿舍，可容纳男女生60人，这不仅解决了部分学生的住宿读书问题，而且在学生中开展德智体群四育活动，使学生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身心受到很大教益。1941年9月学济会在四川路青年会开办学生食堂，给清寒学生供应廉价午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济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断绝,但仍利用所存余款继续维持工作,直到1943年春停止。

3. 中青剧社,由一批爱好戏剧的男女青年组成,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以发展戏剧运动和为社会服务为宗旨。演出主要为筹募难民卫生、学生经济宿舍、平民教育、苦儿同乐会等捐款。先后演出过《狄四娘》、《寄生草》、《闺怨》、《压迫》、《都会一角》、《被迫害者》、《黎明》、《多瑙河边》等十几个剧本共31场。它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作为当时“孤岛”剧运的一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影剧界培养了一些人才。

4. 星二座谈会。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当时留沪的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王任叔、张宗麟、沈休兰、吴耀宗等发起了一个“星二聚餐会”。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餐厅。参加的人有郑振铎、许广平、梅益、姚惠泉、顾执中、严景耀、吴承禧、王纪华、杨廷修、赵朴初、李文杰、黄定慧等,还有男女青年会的董事、干事刘湛恩、刘立明、陆高谊、陈巳生、陈鹤琴、孙瑞璜、王国秀、江文汉、蔡葵、杨怀僧、肖元恩、诸培恩、杨素兰等,都是当时上海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工商、金融和宗教界的上层人士。每次开会由各人汇报各方面抗日活动情况,通常由韦瑟作国内外形势分析、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爱德加·斯诺都去作过演讲。这实际上是当时“孤岛”上各界上层人士以抗日活动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组织,许多工作是通过这个“聚餐会”讨论后由参加者到各界贯彻执行。其中几次影响较大的活动有:1939年两次发动全市人民拒挂汉奸政府的伪旗而悬挂国旗;通过青年会团体和个人关系开展国际宣传工作;1939年发动寒衣捐,捐款交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聚餐会曾募集龙头细布7千匹、胶鞋4万双由上海地方协会组织上海民众慰问团于1938年12月和1939年上半年两次

前往皖南慰问新四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愈之在斯诺家里看到他的新著《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后,立即拿到“星二座谈会”上介绍,并建议翻译出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这第一本真实报导红军长征和陕北苏区情况的报告文学,就是在“星二聚餐会”的支持下出版的,这本书在广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星二聚餐会”还捐款支持出版《鲁迅全集》和进步报刊《上海周报》、《译报》等。1940年,由于环境日趋恶化,许多人先后离开上海,聚餐会停止活动。

(三)上海完全沦陷阶段。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完全占领“租界”,所有学生组织、团体活动都被迫停止。上海青年会许多活动也被迫停止,但宗教、图书馆、体育以及某些班级工作仍照常进行。这阶段比较突出的工作有:

1.青年国语礼拜,1936年冬成立。在每星期日下午举行。它的唱诗班团结了一批爱好音乐的青年,其中有些后来成为著名的音乐家。唱诗班和团契为青年们提供了活动条件。

2.学生礼拜堂,成立于1943年5月初,这方面的情况,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八十年》陈善祥的文章中已述及,应该补充的是,学生礼拜堂的活动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多当时参加过学生礼拜堂的朋友,至今仍带着深挚的感情缅怀在当时敌伪残酷统治的艰难岁月中,学生礼拜堂的团契生活给予自己的鼓励和帮助。

3.救济失学义卖市场。1945年初抗战胜利前夕上海男、女青年会和《申报》、《新闻报》社会服务栏联合举办的,陈文中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现在回顾,在当时敌伪残酷统治下,我们举办这个大规模的义卖市场,不仅解决了部分清寒学生的学费困难,更重要的是它动员了许多青年学生投入这一活动,使他们得到锻炼,并在学校中开创了各种服务同学的福利工作,从而打破了敌伪不

准学生组织活动的禁锢。

4. 大学校友集谊会。1944年一群大学毕业的职业青年在上海青年会干事李寿葆、罗冠宗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大学校友茶聚会，开头是每月集会一次，内容有演讲、讨论、游艺等，由于它适应了当时职业青年的需要，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学校友集谊会”，后改名“友集”(U.G.)，大家都约而同地怀着一个迎接胜利的心情参加活动，加强联系。

这段时期，面对恶劣环境，青年会的经常工作虽照样进行，但内容不得不有所调整，如增加了音乐工作，除经常举办音乐会外，还办各种音乐训练班，智育方面偏重于职业技术班级和农业知识演讲等，体育工作，除各种训练班外，也搞了些新项目，如1944年6月举行“民族健康运动周”，其间并举办“上海健美男子比赛”，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特别是按当时社会需要，几次捐募寒衣分送贫民，每年圣诞节举行苦儿同乐会等。还有是学生部举办的“暑期学会”，请名教授、专家讲授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青年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读，对培养和启发青年学术研究的兴趣很有帮助。在少年工作方面，四青团契有20个左右，在敌伪严厉禁止校内学生活动的的环境下，为中學生提供了课外活动的条件。

五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中国青年会各地市会事工得到恢复和发展。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青年会董事会主要董事有洪士豪、颜福庆、黎照寰、陈已生、孙瑞璜、陆梅僧、丁佐成、徐国懋等；总干事仍是陆干臣，副总干事是杨怀生、肖元恩。为适应

工作需要,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改为青年组(包括职业青年、学生和学济会)由罗冠宗任主任,少年组由李明任主任,成年组杨怀生兼主任,体育部梁兆安任主任,国际部肖元恩兼主任。

这段时期上海青年会的事工有很大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1. 基督教学生工作。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干事是郑建业、李良牧和女青年会杨寿宁、沈佩容等。上海联在沦陷期间活动一度停止,但学生部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举办学生礼拜堂,胜利前夕又举办了“救济失学义卖市场”,从而同基督教学生仍保持联系。在胜利后两个星期,上海男女青年会学生部立即帮助恢复上海联,并发动“义卖助学章”运动,帮助三千多同学解决学费问题。此后学生部致力于帮助约翰、沪江、复旦、震旦男女、大同等大学,约翰附中、青年会中学、南洋模范、上海中学、清心女中、启秀女中等建立学生团契;交通大学、青伦中学、沪江附中、清心男中、惠中中学等建立青年会;加上学生礼拜堂,联合组成上海联。男女青年会学生干事除协助各校会组织活动外,还举行校际活动,以交流经验,促进合作精神。为1946年7月在沪江大学举行夏令营,有232位学生参加,活动有灵修、演讲、讨论、交谊等,还举行“国际友谊日”,邀请外国朋友近百人参加。在每年的“世界学生公祷日”举行联合崇拜。1946年响应日内瓦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的号召,发动各校会组织在圣诞节捐款法币200万元帮助欧洲贫病学生。上海联还经常接待来访的外国学生领袖,发动同学同外国学生通讯,开展国际联谊活动,并派代表参加国际性基督教学生会议等。

2. 学生救济委员会。胜利后在1945年11月7日恢复。1946年下半年起由罗冠宗和杨寿宁任执行干事,干事有陈中浩、周少春、方家荫等。主要工作有:①工作自助,接受帮助的学生须每周工作六小时,如协助经济食堂、图书馆、实验室、自修室等管理工

作,还有电话代传,义务学校、贫民诊疗所等。此外还办“暑期工作自助奖学金”,每日工作6小时,可得到相当于平时一星期的补助,有94位同学参加。学济会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捐助面粉、奶粉和罐头等食品,无偿供给交大、同济、暨南、复旦、商学院、幼师,大同、光华、大夏、美专、南通、约翰、沪江、震旦等14所大专院校举办学生经济食堂,每天用餐学生有2,500余人,从而帮助部分清寒学生解决了一些生活所需。在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支持下,学济会联系几家医院有12张病床可供贫病学生治疗,如1948年帮助了270位学生治病。此外还请澄衷医院为学生进行X光检查,发放鱼肝油等营养品。

1947年暑假,由于国民党当局禁止市学联举行助学运动,我们以学济会名义向市防痨协会吴绍青医师建议联合发动“义卖防痨助学章”,此举不仅吴同意,并得到学济会主席黎照寰、陆梅僧、王国秀和男女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杨怀生、陈善祥等支持,并请了颜惠庆出任劝募委员会主任,使国民党当局无法阻止。6月29日全市有12000多大中学生上街义卖,共得捐款6.4亿多元,既宣传、支持了防痨工作,又帮助了清寒学生读书。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勒令解散九所国立大学,使外地在沪读书的学生无家可归。学济会立即给予临时救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学济会本青年会服务社会和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清寒学生,他们大多是品学兼优、有理想、有抱负、思想进步、热心服务得到同学们信赖的青年,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常常指责学济会帮助“有问题”(即进步)学生,对学济会施加压力,但学济会工作始终得到男女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杨怀生、陈善祥和学济会主席黎照寰、王国秀等的维护和支持。1948年世界学济会3位代表访问我国,全国学济会主席徐国懋在家中招待。在谈到学济工作受到国民党政

府的压力时，徐国懋、陆梅僧都说，“政府说我们学济会老是帮助反政府的学生。其实道理简单，我们救济的都是清寒学生，那一个贫穷的学生会对现状满意？这我们有什么办法？”学济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除了学生们的参与，男女青年会学生干部的努力，和男女青年会上层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3. 职业青年工作。青年组干事罗冠宗、沈德溶、许果复、杨今豪同女青年会职业妇女部干事徐学海、钟国英、张明华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使胜利后的职业青年工作发展很快。这方面情况陈文已有阐述。由于职业青年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对当时社会黑暗、腐败都有切身体会。通过职青活动，使他们有健康的业余社交生活，逐步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并进一步认识到个人贫困痛苦的根源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新社会，并积极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活动。

4. 国际联谊会。由男女青年会干事梁子翰和邢泽共同负责。其情况陈文已阐述，不再赘。

5. 少年民主共和实验国。当时少年部干事是李明、顾先扬。为使少年们能受到民主政治的锻炼，决定创立“少年民主共和实验国”，原有各少年团契改为“省”的组织。1946年11月举行少年国议员竞选大会，有47位12至18岁的候选人登台各作三分钟竞选演说，内容丰富多采，各有特色，有的说要建立图书馆，有的说要办一所完全公费的大学，省得大家去要求助学金等等。后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20位国会议员，气氛庄严、认真，完全出乎大人的意料。议员产生后举行第一届国会，从中选出9人组成中央行政委员会，由年仅17岁的顾海清任主席，另设副主席兼外交、内务、财政、教育、社会、实业、交通等部，又选了一位16岁的基督徒吴善康

任议长。

会后上海各报都用特写报导这一消息，全国各地见报后纷纷来信询问情况，有些少年来信要求参加少年国。参加过大会的董事陈巳生说，“没有参加少年国竞选大会是大人们的损失，它用事实说明什么是民主的选举和怎样才能推行公民训练。”这项活动使少年事工除四育活动外，又增加了民主政治锻炼，这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少年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6. 报童学校。1948年3月由少年部张家昌负责筹备，他请了五六位高中毕业同学担任义务老师。他们白手起家，先到报馆、马路报童集中的地方进行调查，了解报童的生活情况；以后又到棚户区进行家访，动员报童来读书。由于报童清晨和黄昏要卖报，上课时间定在每天上午10至12时，分初、中、高三班，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唱歌等，三个月一期，到1949年2月共24期，先后有644人参加。由于报童家境贫困，从小没有机会受教育，多少受到旧社会的不良影响。几位老师针对报童的特点专门为他们编写教材，上课用心讲解，下课同报童一起活动、游戏；学校没有经费，老师们和报童一起扎纸花，到马路上义卖来筹集经费。由于老师们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很快赢得了报童的信赖，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认识都有提高。上海解放前夕，报童在老师的领导下，利用他们的工作条件为迎接解放做了一些工作。

7. 体育工作。这段时期体育部同工有梁兆安、周士彬、陈宝林、吴成美、胡寿澄等。体育活动项目很多，发展很快，参加体育活动1946年有15万人次，1947年20余万人次，1948年近26万人次。其中比较突出的工作有：①晨友团，由1937年八仙桥会所健身房落成后参加晨操班的会友组成，其活动从未停止过，胜利后发展到一百余人，其活动主要是晨操和篮球，他们所组织的“晨友杯篮球

赛”，实际上就是上海市的篮球联赛。②拳击，每周参加练习有三四十人，1947年全国运动会上海拳击选手7人，其中来自青年会的有周士彬等5人；在比赛中几乎包揽了各级冠亚军，获得全运会锦标，③中青游泳团成立于1936年，胜利后成绩斐然，在上海各次比赛中均获胜，在全运会中上海游泳选手均出自中青。该团团长是温敬令，副团长是徐亨。

8. 劳工工作。青年会原在浦东新村和沪西公社两处开展劳工工作。抗战时期浦东新村房屋全部被毁，胜利后重建几幢房屋开办了一所小学。沪西公社在沦陷期间停止了劳工工作，只办一所小学。1947年暑假学济会派工作自助的学生到沪西公社开办工人暑期学习班，招收工人及失业青年入学。跟着由小学教师单意基、赵秋之、杨志清、曹居廉等开办了沪西公社工人业余补习夜校，设初中、高三班，每班30人，每期三个月，并开展了其他课余活动，成为该地区团结教育青年工人的活动中心之一。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

其他经常事工不再赘述。此外，上海青年会领导人和有干事参加的一些主要社会活动有：

1. 中国基督徒民主研究会。1946年由吴耀宗、涂羽卿、陆干臣、陈巳生、沈体兰、孙瑞璜、王国秀、杨怀生、丁光训等男女青年会董事、干事发起，由罗冠宗任执行干事，参加者主要是基督教上层人士。经常请阎宝航、杨卫玉等一些进步人士演讲，每次有百余人参加。1947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不再请人公开演讲，由上述数人组成的理事会每月轮流在各人家中聚餐，讨论时事形势，请过黄炎培、章伯钧等民主人士谈他们参加旧政协和蒋介石撕毁协议的经过。

2. 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1949年4月上海面临解放。赵朴

初同陆干臣联系，建议由各宗教和慈善团体联合举办救济工作以应付时局的变化。陆对此很赞成，在筹备中提出应参加的基督教团体有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上海男女青年会、学济会等。4月25日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公推颜惠庆任主任，李思浩、笈延芳为副主任，委员中基督教人士有陆干臣、徐国懋、陈巳生、陈善祥、杨怀生、吴高梓等。男女青干事罗冠宗、李明、徐学海和学济会干事陈中浩、方家荫等均参加了具体工作，直到上海市解放。

六

解放初期上海青年会工作的重点是开展对新社会的宣传，从1949年7月到10月先后举办过“新时代系统演讲”，请吴耀宗、林汉达、胡子婴等传达新政协的精神和共同纲领，讲世界和平大会、知识分子道路等，介绍东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建设情况；“世界和平问题演讲”，请周而复、姜椿芳等介绍苏联、国际形势等。参加听众很多。年底又举办“新文化学习班”，学习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国近百年史、新民主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方法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等，参加的青年有170余人。

由于形势的变化，青年会事工除宗教、体育、成年、少年工作外，有些工作有较大改变，如学生救济工作已无必要；职青联中许多青年走上新的革命岗位或参加南下工作团，人数大量减少，以十几个团体合成一个团体；工商经济研究会以中小工商业者为对象，每星期五晚上在青年会举行聚餐会，请党政领导干部和工商界政协委员报告党的工商政策和时事形势，参加人数很多，对团结教育广大中小工商业者起了很好的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在北平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男女

青年会是该会的团体会员。上海解放后，6月1日上海市青年代表会议在交通大学举行，陈毅市长讲话，会上成立了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男女青年会干事江文汉、罗冠宗、徐学海被推选为委员。同年8月和12月举行上海市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海青年会董事黎照寰、陈已生、颜福庆和干事陆干臣、梁兆安、罗冠宗等分别被推选为各界人民代表。这些情况说明男女青年会在解放后是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这又是同男女青年会一些董事和干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进步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5月同吴耀宗等基督教人士的谈话，既指出近百年来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侵略有联系，又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基督教进步人士同情并参加了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

1949年8月11日董必武同志在华北区青年会会议演讲中指出，“青年会所做的许多事情，是符合中共政策的，也是适合当前社会需要的。……青年会对社会所做的许多有益工作，人民政府是不会歧视的。建国的事业不能单靠一个革命的政党，而是要大家共同努力。青年会是信奉基督教的，但只要基本的政治立场相同，信仰不同没有妨碍。信仰是各人的事，政府不能下令来禁止。希望青年会的朋友能明白今天的基本形势，工作方面尽量与青年团、民主青联和学联合会合作，共同促进新中国社会的实现。”与此同时，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来上海，同青年协会总干事涂羽卿、江文汉、

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等几位同工谈话，阐明党中央对青年会的政策。这对团结青年会上层，鼓励和支持青年会本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为建设新社会服务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后，青年协会号召全国青年会推进四大教育，即：①人格教育，②生产教育，③民众教育，④娱乐健康教育。上海青年会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提出主要工作方向是：①在青年中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②广泛传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知识及人民政府为建设新中国所发出的一切号召；③介绍新的人民文化艺术；④增进国际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进国际人民民主与持久和平；⑤发展人民体育，培养体育干部；⑥提倡生产技术教育；⑦服务社会。

青年会的许多工作不仅靠董事和干事，主要依靠广大热心于青年会工作的会友义务参加。为了贯彻上述工作方向，上海青年会在1949年11月6日假中西女中举行“义务工作人员会议”，有200余位会友参加，围绕“青年会与建设新上海”这个主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了152条意见与建议。这是解放以后上海青年会一个比较大的研讨会，对其后青年会工作发展帮助很大。

1950年9月23日吴耀宗等40位基督教领袖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号召广大信徒认清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促进教会自给自养自传，为实现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而努力。宣言发表后，上海青年会同工同全国信徒一样纷纷签名表示拥护，并积极投入三自爱国运动。

1951年4月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上”，许多基督教领袖揭发控诉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

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上海青年会罗冠宗、沈德溶被选为常务委员。以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揭发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罪行的高潮，并进行深入的以反帝爱国为内容的学习。上海青年会也开展了控诉与学习，全体同工在反帝爱国的认识上有所提高，特别是在青年协会同工揭发帝国主义利用青年会进行侵略的材料，给大家的教育更深刻。如1910年10月20日美国青年会在白宫举行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向全世界扩展的计划会议”，会上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 Taft）在演说中公然声称：“一个先进的国家总是要做生意的。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有利可图，我们就要派商人到那里去。我们做生意的原则是：最有利可图的交易，就是我们用最低的价格买得我们所要的东西，然后又用最高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卖出去。换句话说，我们从落后国家人民的手中无偿地得到东西，等于我们和落后国家人民玩了一个 Bunco（诈骗）游戏。因此，我们在许多东方国家中，很不受任何具有是非感的人民的欢迎。当我们和这些国家做生意的时候，我们的商业道德比在本国的商业道德更加低劣。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发展贸易，另一方面也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就是派遣一些宗教团体到那些国家去宣传我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文明，使那些国家的人看清楚我们也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我们希望通过基督教使他们接受这个标准。”他还说：“通过我们的国务院，我们对其他所有国家在道德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常表示同情和关怀。不过国务院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事情受到了限制，而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像基督教青年会这类运动就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侵略领土或干涉国家内政的野心的。但是有些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能够在他们本国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

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获得重要地位。通过这些人，我们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最后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根据美国总统的自供，联系青年会的实际，使我们看到美帝国主义利用青年会进行文化侵略的实质，看到历史上不少原青年会董事、干事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重要官员或“无冕大使”，他们在促使蒋介石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控诉与学习又使我们看到蒋介石政府也在利用青年会来维护他的反动统治。如蒋介石为转移人民抗日情绪，在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搬出“礼义廉耻”等旧礼教加上“服从领袖”等口号，用以束缚人民思想，维护反动政权。蒋指出：“推广新生活运动的时候，凡有青年会者与青年会联络，无青年会者，与教会联络……如不加以利用，损失颇大”。又如1947年7月蒋介石政府颁布“勘乱动员令”后，在上海就有人就拉了20余位基督教领袖去南京谒见蒋介石，实际上是表示基督教对蒋介石“勘乱”的支持。帝国主义利用青年会进行侵略活动和蒋介石政府利用青年会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我们也看到，青年会干事中有不少爱国的、有正义感的、追求进步的人，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革命的工作。这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无法阻挡的。

解放后青年会的工作对象和事工有了很大的变化。从1952年底到1954年上海青年会的主要事工是：

①积极投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方面使青年会同教会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三自爱国工作，特别是反帝爱国学习，都是男女青年会干事和教牧同工一起进行的。对基督教青年工作也是如此，如每年圣诞节、复活节都举行联合的音乐崇拜，参加献唱的青年有300余人；每年还在市青联的支持下举办夏令营，有200余青年参加。

②大力开展文教活动,为图书馆添置了许多新书,扩大对社会开放。在市青联的合作支持下,为各界青年举办文娱干部训练班,传授唱歌、舞蹈、游戏、实用美术技能。开办旅行活动,特别是到江、浙的短途旅行最受欢迎。举办各种音乐班,尤以不定期的儿童音乐演奏会,很受家长们欢迎,每次表演,大礼堂座无虚席。每周一次的大象棋比赛,参加观看的人很多。

③体育活动。主要是举办篮球、排球、羽毛球、健力、举重、技巧、拳击、柔道、武术、摔跤、裁判、游泳等训练班级,1953年全年到会参加体育活动的近12万人次,每天经常到会锻炼的有1300余人次。其中以游泳最为突出,特别是可以六次学会的初级班最受欢迎;还培养了一批游泳选手、救生员和指导员。

④会友工作,每晚在交谊厅、文娱厅有奕棋、桥牌、康乐球、乒乓、桌上足球等活动,每天参加的有七八十人。在夏天还举办浦江夜游、纳凉晚会等。

1954年12月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并交流了建国以来各地青年会的工作经验,明确青年会的方针任务是:“除了继续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外,应努力开展有益于人民的事工,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以便更好地为基督教青年、社会青年及其他对青年会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服务。”

由于方针任务明确,1955年上海青年会的事工有了新的发展。

①基督教青年工作,除原有圣诞节、复活节联合音乐崇拜,夏令营、冬令会等活动人数有所增加外,还针对基青对音乐的爱好,在教牧同工的协助下,同女青年会合作,全年举办音乐会10次,还有唱片音乐会和音乐欣赏会,每次参加者有400余人。

②文教工作。旅行全年举行96次,有3,065人参加;大象棋

比赛60次,有 16,153 人次参加;开办青年美术班绘画科,三月一期共三期,450 人参加;美术字科二期共 2,476 人参加;组织了三个合唱团。为社会青年举办 17 个舞蹈班,学员 1,078 人;并在其中挑选一些社青成立舞蹈队,他们一方面辅导班的工作,还到外面演出过 29 场,观众 4,000 余人;又为社青举办 10 个歌唱班,有 4556 人参加;此外还为社青组织各种联欢会。

体育、图书馆和老朋友(即会友)工作都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

1956 年青年会全国协会趁各地青年会总干事参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之便,在北京举行青年会事工座谈会,进一步明确方针任务,交流了各地工作经验。使上海青年会的事工继续稳步发展。

7. 1952 年原总干事陆干臣因病辞职,由杨怀生继任总干事,副总干事除肖元恩外,提升梁兆安、罗冠宗任副总干事。1957 年 6 月杨怀生退休,由罗冠宗继任总干事。

8. 1958 年上海各教堂实行联合礼拜。1959 年男女青年协会和上海男女青年会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在八仙桥青年会联合办公,这既可以充分发挥干事的优势,而且也符合基督教青年、社会青年和老朋友们的要求,工作有分有合,相互帮助,相互促进,以促使男女青年会事工进一步发展。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八十年

陈善祥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国际性的基督教妇女社会团体，英文名称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 YWCA)。它的国际性组织是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女青年会是 19 世纪末由美国传入的。在人事和经济上都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女青年会的支持。其全国性机构即全国协会设在上海，在一些大中城市建有市会。上海女青年会是最早的一个市会，成立于 1908 年，第一任总干事是北美女青年会派来的顾恩慈 (G. Coppock)。

上海女青年会组织分董事会和干事会，前者是决策机构，后者负责各项工作的开展。成员分工作人员及会员。董事会以及各部委员会的成员，一般是义务性的。她们大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和知名人士或他们的家属。干事大多从教会大学毕业生中招聘。会员主要是家庭妇女、女学生、职业妇女和女工。会员并不限于教徒，但必须赞成女青年会的会训“尔识真理，真理释尔”和宗旨“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达，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一、初创时期

女青年会刚成立时，前来参加活动的大多是晚清官僚、买办和教会领袖的家属，活动内容主要是查经、讲道、办主日学等。五四

运动后，社会上要求实现改革，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空气日浓，女青年会在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缠足、纳妾、蓄婢、禁烟、讲究妇婴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女青年会一开始就着眼于增强妇女体魄，提倡体育运动不遗余力。中国第一所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就是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于1914年创办的，附设在上海女青年会内。它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女子体育师资人才。年逾九旬的我国第一位留美体育女博士张汇兰教授就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为了帮助妇女学习文化、技术，谋取经济自立和解决单身居住的困难，上海女青年会还办起妇女半日学校、打字班、缝纫班、烹饪班、救护班和职业妇女寄宿舍等等，这些活动可说是开社会风气之先，对于当时的妇女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在1923年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发表感想时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各地渐渐产生了妇女团体，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单就上海说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是可惜太缺乏了实质，从现状上比较起来，有组织而能活动的，女青年会要算是首屈一指了。”

女青年会根据不同对象的会员，组织各项活动。早期的家庭妇女活动，围绕“改良家庭，造就模范主妇”为中心，如1925年曾举办每周一次的德育演讲会，内容都是关于家庭的改良和妇女对家庭的责任。1928年举办儿童卫生演讲班、儿童心理研究班及母亲会。1929年女青年会成立家庭妇女部，设立家庭研究会，研究儿童教育方法、儿童疾病预防、急救等。又曾与男青年会合办卫生运动大会。

1924年，女青年会在职业妇女会员中组织“职业妇女四修会”，即德、智、体、群四育，以更好服务社会。1928年，“四修会”改为职业妇女团。女青年会认为妇女教育与妇女职业是妇女谋求

解放的根本。1927年，上海女青年会开始办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除举办女子理发速成班外，还开办了中文、英文、卫生、美容术、装饰学、商业常识、简易商业簿记、打字等班级，为妇女求职提供条件。

女青年会还有学校女青年会(简称“校会”)，学校女青年的宗旨是“发展女学生的基督徒生活，培养她们的自治能力和同情心”。辛亥革命以后，教会学校的女学生逐渐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改造，特别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学校女青年会经常探讨“人生的责任”、“基督教救国”等课题。“五卅”惨案以后，教会学校女学生已不满足于原有的宗教信仰，进而以“新时代的信仰”、“我们的责任”、“到民间去”等题目开展讨论。校会办佣工夜校、开设家事讲习班、组织职业演讲团、训练夏令儿童学校的教师，藉以引导并提高女学生对服务社会的兴趣和能力。女青年会又在中小学里组织虹霓团和前导团。其口号是：“德行、知识、服务、卫生”。1924年，有前导团7个，团员百余人。这一年举行冬令会，围绕“我与世界”之主题开展演讲、讨论，并有文娱、游戏等活动。1927年少女部聘请薛正、俞大钧等担任前导团辅导。1929年，前导团发展至11个，分布在启英、启秀、新民、育群等学校。

上海工厂密集，女工、童工为数不少，她们的劳动条件极差，生活十分凄惨。这引起了女青年会的重视，曾试图在租界内通过法律禁止使用童工，没有被采纳。“五卅”惨案以后，女青年会的劳工工作转向以工人教育为主。在丝厂林立的闸北设立劳工服务处、平民教育班，学生大都是工厂女工。1928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派劳工干事邓裕志到上海女青年会，负责浦东的平民学校工作。在课堂教学以外增加了讲时事、唱歌、游戏、春游等课外活动。来校读书的女工很多，于是女青年会又在浦东新村租了一处房子，供

教师办公、住宿和同学活动之用，这就是女青年会第一所女工夜校的雏型。

二、30年代的活动

上海女青年会经过初创时期的实践，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于各部会员活动的内容和方法，会务日益扩大。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群众活动受到压制，不少群众团体包括许多工人夜校被迫停办，到女青年会来参加活动人员却增多了。一年一次的征求会员和募捐运动，总是超额完成目标。30年代初，上海女青年会已具有相当规模，会所不敷需要，经数次迁移，1935年，租到了地点比较适中的静安寺路999号（今南京西路上海工商银行静安区办事处），内有大礼堂、会议活动室、运动场地及宿舍等。

这个时期，上海女青年会各部工作有很大发展。成人教育部为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办了许多学习班，如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中外烹饪、手工、缝纫、刺绣、救护、保姆训练、打字、速写、钢琴、小提琴、舞蹈、剑术等。又根据会员的兴趣，组织专题讨论小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儿童教育、家庭布置、宗教生活等。文体活动也丰富多采。会所里专辟阅览室，后面设有网球、排球等运动场地，并与有关单位的游泳池挂钩，提供各种体育锻炼的机会。此外，还有会员自行组织的参观、旅游、音乐会、联欢会以及相互调剂生活用品的物品交卖会等等。据1936年统计，经常参加女青年会成人教育部活动的会员有700余人；一年中前来求职登记的妇女有1458人，获得职业的有220人。

1930年，少女部的前导团改称华光团，通过讨论、辩论、游戏、参观、旅行、唱歌、演戏、开联欢会等健全身心的活动，开拓了少女的境界，养成勤劳互助的习惯。由于活动适合少女的特点，参加的

学生相当踊跃。大学生方面，上海女青年会学生部与男青年会学生部曾联合组织过一个工作委员会，研究新时代学生的要求，提倡统一的基督教学生运动，鼓励男女学生联合起来，又恢复了“上海联”（即1920年上海男女青年会联合组织的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活动，“上海联”的宗旨是使基督教学生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使对时代、对基督教有更深入的认识，发扬集体生活互助互学精神。

1930年，劳工部所属平民学校一律改称为女工夜校。是年，沪西小沙渡路三和里（今西康路910弄21—23号）女工夜校成立，全国协会以此作为全国各地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示范点。为了便于接触工人，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钟韶琴、白美丽（M. Bagwell）、张淑仪，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夏秀兰（L. K. Hoass）、邓裕志和协会学生部干事耿丽淑（T. Gerlach）都先后在那里住过。著名女医师王淑贞、邝翠娥等定期到三和里为女工检查体格和治病。1932年“一二八”以后，很多女工因受战事影响失业。劳工部依靠女工同学的关系，将500余名失业女工介绍入厂。这件事影响很大，许多女工到三和里女工夜校报名入学。随着求学女工的日益增加，劳工部又陆续开办了一些夜校，至抗战前夕，分布在沪东、沪西、闸北、虹口等工厂密集地区的女工夜校有八所，得到许多进步人士、文化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陶行知、邹韬奋、李公朴、罗叔章等曾来校，讲时事，洗星海、吕骥、麦新、孟波、崔嵬、陈波儿、姚时晓等都曾来校指导歌咏戏剧。国内外关心劳工教育的人士也常来参观，其中包括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等，他们将了解到的情况写了报告传到国外。

女子寄宿也是女青年会首创的妇女福利事业。早在1920年，女青年会鉴于一些单身青年妇女从外地来上海工作，不仅食宿等

生活费用昂贵，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于是在会所办了一个能容 30 人的宿舍，附设食堂，收费低廉，深受单身妇女欢迎。申请住宿者终年不断。1936 年，女青年会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威海卫路、愚园路、圆明园路等增设女子宿舍多处。

上海有些外侨妇女，特别是葡萄牙人、白俄、犹太人。她们一般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情况较差。女青年会将她们吸引到国际支部（International Branch），为她们办打字训练班，帮助她们介绍职业。并搞些参观活动，使她们了解中国、了解上海。1933 年至 1936 年间国际支部有会员 300 余人，包括 27 个国籍。

“九一八”事变以后，女青年会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开展救亡活动，淞沪战争开始时，在何香凝主持的爱国妇女会领导下，女青年会联合有关团体举办难民收容所，组织救护队，为前线健儿缝制丝棉背心数千件，支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 年为慰劳华北抗日军队，女青年会组织会员、华光团团员、缝制棉背心 1400 余件支援前线。1935 年，北平学生举行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同年 12 月 21 日，由沈兹九、史良、胡子婴等发起组织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邓裕志、陈维姜和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谢祖仪都是发起人，女青年会不少会员和女工夜校师生也参加了成立大会和会后的示威游行。此后妇女救国会组织纪念“三八”、“五卅”、“九一八”等集会、游行都有女青年会会员参加，有些座谈会、报告会以及歌咏等就是在女青年会会所举行，女青年会成了爱国救亡宣传的重要阵地。

1936 年底，发生闻名中外的全市日商纱厂四万余工人大罢工，罢工先从沪东开始，女青年会杨树浦女工夜校的不少同学都是罢工运动的骨干。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和教师运用各种方式支援

罢工,她们募集捐款、粮食、物资等,通过夜校同学分送给罢工工人及其家属,接济罢工期间的生活。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女青年会工作转入为抗战服务。

由于战区扩大,上海近郊以及沪西、南市、浦东等地的难民纷纷拥进租界,他们举目无亲,贫病交加。女青年会的难民救济工作由总务干事张志学总负责,和全国协会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原中西女中附小合办一个收容200余难民的收容所,又在愚园路和圣约翰大学合办了两个难民收容所,分别由劳工部干事张淑仪和协会干事陈善祥、高毓馨负责。北平流亡来沪的大学生龚维航(即龚澎)、梁思懿等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教会学校大中學生都动员起来,到难民收容所参加疾病防治工作,协助组织难民生产自救,进行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女青年会在会员中募集捐款买来布匹,缝制衣服、编织绒线背心送往前线。许多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也跑到女青年会来参加工作。

全国妇女抗敌慰劳总会何香凝派人与女青年会联系,发起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女工夜校同学踊跃报名。第一批被批准的有11人,由女作家胡兰畦任团长,10名团员中9名都是女工夜校的同学,一名是夜校老师,她们干得很出色,被誉为“战地上的一朵红花”。后来部队转移,大多数团员辗转参加了新四军。有好几位同学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

孤岛时期,在上海读书的学生很苦闷,又缺乏活动的场所。“上海联”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要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当时“上海联”办公机构就设在女青年会会所,借用男女青年会的大

礼堂、会议室、操场、健身房等场地举行讲演会、讨论会、歌咏班、球类比赛等等，组织访问工厂、工人宿舍、贫民窟以及跳舞厅、赌场、大世界等娱乐场所，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又举办“社会发展史报告会”和“自然科学讲座”，请进步人士、专家教授严景跃、吴大琨、吴耀宗、涂羽卿、余日宣和国际友好人士文幼章、耿丽淑等前来讲课，传播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暑假时举行夏令营，内容既有兴趣性的文娱活动，又有青年们关心的国家前途、人生观等问题的讨论。夏令营不仅吸引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也吸引了非教会大学如交大、复旦等校的学生。

鉴于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困难。1937和1939年，“上海联”先后在女青年会举办过两次大规模的义卖市场，各校学生把自制的文具物品及向工商界募集商品进行义卖，得款悉数捐助给流亡同学和难胞。1940年又创办“上海联学生生活互助社”，收购同学们不用的书籍、文具、衣服、被褥等等，低价出售给贫苦同学。

“上海联”还开展了国际学生青年友谊和宣传活动。1938年底，“上海联”发动各校学生给外国青年组织或个人写信，把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种种情况，告诉友好国家的青年，争取他们对我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援。1939年6月，首届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举行，上海女青年会学生干事龚普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揭露了日本侵略暴行，宣传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并散发了“上海联”的机关刊物《联声》和介绍我国青年战时生活的小册子以及有关照片，与会者反应强烈。

“七七”事变后，有一部分学生从北平、天津流亡到上海，他们的吃、住、生活都成问题。在上海青年会董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倡议下，上海男、女青年会学生即于1937年秋联合组成“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从事救助因受战事影响的大中学生的的工作，并

负责接受和分配国内外的援助。上海学济会的工作，首先是发放助学金。先后接受补助的有 1200 余人。其次，为要到内地就学的学生提供旅费等；为贫病学生发给医药补助费和鱼肝油等实物。第三，办学生经济宿舍，解决家在战区单身来沪就学的学生住宿困难。

许多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在战火纷飞中参加了女青年会所组织的爱国支前活动。劳工部女工夜校逐渐恢复，共有女工学生 600 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了统治和掠夺，广大市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女青年会所属团体如“上海联”、“华光团”、“友光团”等被迫停止活动。在这困难时期，代总干事张志学和干事吴元淑、甘贤贞、徐学海、陈善明等深信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她们艰苦踏实，坚持把女青年会的工作办下去。重点放在儿童教育和服务性事业上。首先，根据社会需要，试办了一个职业妇女托儿所，开了上海职业妇女托儿所之先声。在日寇统治下，公开向社会募捐已不可能，于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亲友募集经费，师资缺少就靠能者为师来解决。保健工作由苏祖斐、苏曾祥、金尚均、章德馨等儿科医生、专家义务承担，她们定期到托儿所来为儿童检查体格、预防接种并治疗疾病，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直至抗战胜利。这个由简陋的花棚改建的托儿所，由仅能容纳六个幼儿发展到百余名。同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托儿所工作人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女青年会所属各区女工夜校陆续停办，最后只剩下小沙渡路三和里一所。在艰难恐怖的日子里，尽管敌人频繁的戒严、灯火管制、断电，困难重重，女工们仍冒着危险来校读书。钱琴、黄纫秋等老师全力以赴，只要有学生来，蒙着用黑布缝

制的防空窗帘，点着油灯、蜡烛也坚持给学生上课。人们回忆当时情景，不无自豪地说：这是上海女工夜校在寒夜中一支不灭的烛光。

有些中学的女学生，在窒息的环境中感到苦闷，她们有时跑到女青年会来聊天说地。当时负责学生、少女工作的干事徐学海因势利导，利用女青年会入门处旁的一间小房间，办了个图书馆，使她们在此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后来又在读者中组织读书会，讨论交流学习心得。这个小小的图书馆团结了一批同学。不少悲观失望的女孩子，就在经常跑图书馆看书和探讨问题中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到女青年会来活动的少女渐渐多起来了，女青年会又根据她们的兴趣办起歌咏、舞蹈、戏剧、文学小组和讲座等活动，聘请专家来作辅导。如请杨嘉仁主讲音乐欣赏，介绍世界著名音乐家作品，还经常举办文学座谈，讨论鲁迅、巴金、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这些活动不但培养了青少年对文学、音乐、戏剧的爱好，而且使不少人的思想开了窍，从而对生活、对人生、对国家……都有了新的认识。

1942年夏，女青年会曾与《申报》社会服务部联合举办“小学教师暑假进修讲座”。结束后，参加讲座的教师缪廉等发起在女青年会下面组织“小教团契”，活动内容适合教师特点，有教育业务研究，也有参观访问和文娱活动。参加者有数十人，多时有数百人。1944年，“小教团契”改为“小学教师歌咏班”，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上海全面沦陷后，各大中学校的一切集会活动都遭禁止，为了满足基督教学生的需要，1943年上海男、女青年会和国际礼拜堂联合举办学生礼拜。宗旨是引导学生认识基督，认识真理，认识

时代,立志献身。礼拜后有小团契活动,内容有灵修、查经、唱诗、宗教生活座谈会等;同时也有读书、出墙报、体育、交友、旅游等活动。每到圣诞节、复活节,学生礼拜堂常举行较大规模的音乐崇拜、烛光礼拜,团契又分别举行联欢、聚餐等活动,暑假寒假期间,还举行夏令营、冬令会等。学生们通过做礼拜和团契生活后,感到从苦闷中得到温暖和安慰,既有灵性修养,又懂得怎样处理好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开始关心和注意周围以至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当他们体会到学生礼拜对自己有帮助后,往往将自己学校里的好朋友也带去,因此参加学生礼拜的学生愈来愈多。

在日寇统治下,学生生活困难,失学问题严重。男、女青年会的学生救济工作因经济来源断绝,早已停顿。当时,只有《申报》、《新闻报》附设的“社会服务栏”向社会募捐“助学金”和“贷学金”,但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45年1月,上海男女青年会同申、新两报“社会服务栏”发起联合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沪江、大夏、大同、圣约翰、交大、复旦、青年会中学、清心、崇德、南洋、启秀等39所大中学校1000多位同学参加了这个义卖活动。共得捐款2681万元(伪钞),除开支等外,捐给申新两报“助学金”、“贷学金”各500万元,《申报》“社会服务栏”、“义学金”100万元,男女青年会救济失学工作补助费各300万元,余款及全部剩余物品均捐赠给男女青年会作为举办学生福利事业之用。男女青年会又利用这批物品举办了一个“廉价市场”,以所得作为基金,成立“工读贷金委员会”,分别贷款给各校,支持学生开展校内学生福利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上海女青年会也终于渡过了艰难时期。战时留在上海并一贯支持女青年会工作的许广平先生,曾在《妇女》杂志撰文《话旧谋新》中,热情赞扬沦陷时期女青年会的工作。她说:“……大约

回溯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时候吧,上海被人们称它是‘孤岛’,……一切公开的团体都随着国军西去而撤退或消散了,唯一团结一大批人士的是男女青年会,他们以友邦英美的关系得以做若干完全中国人民所不能也不便做的社会事业。……尤其被敌人占领上海那些时期中,她们委曲地忍耐地、困苦地做那敌人所难以藉口的艰难工作,是值得尊崇的。上海女青年会,在我被日人拘捕的时候,曾经再三被追问过。……敌人所忌恨的,就是我们所宝爱的。过去,女青年会拿她的事工,招致了敌人的忌恨,正是今天庆祝胜利时候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优秀领导和团结全上海妇女的先进集体!”

四、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

抗战胜利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派高君哲任上海女青年会代理总干事,主持恢复会务工作。可是时隔不久,内战爆发,人民向往的和平民主、安居乐业的生活又成泡影。客观形势教育了女青年会的会员和上层领导。女青年会的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形势与实际,并积极投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人民群众运动中去。

1946年3月8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全市三万妇女在上海妇女联谊会的领导下,以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集会游行示威来纪念自己的节日。上海女青年会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女青年会大多数会员和女工夜校的学生直接参加了集会游行。晚上,上海女青年会又在黄金大戏院举行了同样性质的纪念“三八”文艺晚会,并有国际人士参加。

由于上海女青年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的群众基础,会务很快恢复并有所发展。先后增聘了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新干事充实各个部门。1945年11月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征

求会员运动,会员激增至 5000 人。会所亦由威海卫路 638 号迁到比较宽敞的江宁路 495 号。1947 年初,协会派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陈善祥担任总干事。

这一时期,女青年会的职业妇女工作,大多是和上海男青年会合作的。从 1945—1949 年,先后建立了“友集”、“原子”、“约友”、“职友”、“职光”、“医药”、“医护”等十几个职业青年团契。每个团契拥有契友数十人至百余人,他们根据类同的职业或兴趣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如“友集”参加者多数是教会大学校友、工程技术人员、洋行银行高级职员等;“职友”、“职光”多数是店员、公务员、小职员等;“医药”、“医护”多数是医务工作者,他们开展了各自爱好的活动。各团契普遍举办跳舞、歌咏、音乐欣赏、下棋、桥牌、郊游、读书会、座谈会、妇女知识、职业辅导、学术修养等讲座,除了各自的活动外,还常常举行联合活动。1948 年 1 月,男女青年会下面的青年组织联合建立了“职业青年团体联合会”(简称“职青联”)。夏天,他们借沪江大学举行了两天夏令会,参加者 500 余人。解放前,有这样多职业青年集中在一起活动当属首次。冬天,“职青联”也组织劝募与发放寒衣活动,发动各职青团体成员四出捐募衣、款,经收集和整理,到棚户区挨家挨户访问和分发。

二次大战后,各国驻沪机构恢复正常关系,各种国际团体也纷纷在上海成立分支机构。上海的外国人渐渐多起来。上海男女青年会组织了一些英语水平较高的青年于 1947 年元旦成立了一个以开展国际友谊为宗旨的“国际联谊会”(简称 ICSS)。会员主要是圣约翰、沪江、东吴、之江和雷士德工专等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国际友人,活动多种多样,并为一些关心形势的外国朋友组织各种座谈会。针对当时发生的社会问题,邀请民主人士和学生领袖参加座谈,还出版英文期刊《今日中国》,帮助国际友人了解中国。参加国

际联谊会的会员，不断扩大，从开始时六、七十人发展到三百多人。通过活动，和许多国际友人建立了友谊，使国际友人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培养了一批从事国际工作的人才。

原来的“学生礼拜堂”又有了发展。礼拜堂组织了圣乐团契、真理团契、博爱团契、圣音团契、自由团契、晨钟团契、圣钟团契等，除了宗教活动外，又有活泼丰富的团契生活，吸引了不少寻求安慰、爱好音乐的青年。在发扬爱主爱人的精神教育下，他们多次参加社会上捐募寒衣运动、义卖助学章运动、义卖防痨章运动等。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外货充斥市场，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学生礼拜堂的青年学生和其他青年一样，关心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许多团契举行时事讲座、青年理想讨论会、辩论会。

以女中学生为对象的华光团，于抗战胜利后也陆续恢复和建立起来。首先成立华光团的是允中女中，取名青年华光团，随后市一、爱国、智仁勇、上海、道中、锡珍、南屏、务本、正行等女中都建立华光团。当时上海共有女中 41 所，参加女青年会组织华光团的女中达三分之一，团员约 1000 余人。她们是经常到女青年会活动中的一支最年轻最活泼的队伍。

抗战胜利后，原迁徙内地的大专院校都迁回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大专院校有 33 所，学生 5 万余人。家庭经济困难渴望社会救济的有万余人。男女青年会于 1945 年 11 月恢复了学生救济会的工作。办起了学生经济食堂、组织工作自助及暑期劳动服务，及医药救济等。

劳工工作也有了发展，女工夜校增加到六所，又编写了一套六册、供三年制女工夜校使用的《女工读本》。女青年会托儿所除了供幼师等校同学作实习基地外，并举办了保育人员训练班，为统益

纱厂、实验民校等新办托儿所输送保育人才。1947年在杨树浦榆林路东晋成里办了一个简易的劳工托儿所，填补了沪东地区的空白。招收的对象全是附近工厂女工的孩子。

《妇女》月刊是上海女青年会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的，读者以各阶层知识妇女为主。目的是反映抗战胜利后各阶层妇女的要求；探讨在反帝、反封建、争民主的斗争中以及为实现妇女自身彻底解放中所应该迫切了解的问题和所担负的责任。同时，也经常报导上海女青年会的一些活动，俾使更多的妇女认识了解女青年会，参加到女青年会活动中来。

《妇女》从1945年10月创刊至1949年6月，经历了三年半的艰难历程，共计出版40期。每期发行量约二、三千份，是当时上海除《现代妇女》外，较有影响的妇女刊物。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女青年会

解放以后，女青年会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各项工作中，最突出的是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解放前，帝国主义曾利用基督教对我进行侵略。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1950年，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号召中国基督教会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女青年会全体董事、干事立即响应，积极投入“三自”爱国运动。

上海解放后，女青年会大多数会员，都按照各自组织到工会、学联等去活动。根据市民主妇联关于妇女团体分工的建议，女青年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尚未组织起来的家庭妇女身上。

首先是举办形势学习讲座，内容有介绍《共同纲领》、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和经济、苏联介绍及妇女问题以及时事政策等，学员们通过学习，认识都有所提高。接着因陋就简，办起了妇女消费合作社，供应价格公道的煤、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给会所附近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许多家庭妇女向往经济独立，在新社会中，她们更有自食其力、参加劳动生产的要求。1949年6月，女青年会开办缝纫裁剪班和学习讲座，不仅吸引了大量妇女会员，家庭妇女闻讯前来报名的也不少。1951年又成立生产教育部，将缝纫班改为缝纫裁剪学校。又以消费合作社为基础，创办会计班。当时，全市的缝纫裁剪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前来邀请女青年会的毕业生去授课。

1955年，女青年会全国会议上，全国妇联提出女青年会的工作对象，以中上层知识妇女和工商界人士的家属为主。这些妇女多数毕业于教会学校，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经济条件也好，她们散居在各区的花园洋房和高级公寓中，缺乏集体概念，不习惯参加里弄工作。针对这一情况，女青年会先后成立了五个学习小组。学习地点，就在她们的家里。大家在一起，活泼自然，无拘无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通过学习，会员们对新社会逐步有所认识——从不同程度的怀疑到相信。有些大学毕业的会员，通过女青年会介绍，走上了工作岗位，有几位当上了人民教师。

在抗美援朝高潮中，女青年会以实际行动表现爱国热忱，许多会员捐献实物或现钞，生产前线需要的军服、子弹袋，积极支援前线战士。工商界家属爱国不后人，她们捐献衣物及珍藏的首饰，并亲自动手缝制工艺品，于1951年国庆前夕在锦江饭店举行义卖，售得的款项及入场券收入，全部捐献抗美援朝总会，用以购置“上海妇女号”飞机之用。

1953年，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约300余人，组成大型圣乐团，连续举行三次圣乐崇拜，听众有4500多人。通过各项活动，女青年会又增加了新的对象——各教会的牧师夫人及女传道、女信徒。她们爱国爱教，成了女青年会会员中的活跃分子。

1958年7月，上海男、女青年会，全国男女青年协会四会实行联合办公。上海女青年会分工负责基督教妇女、工商业者家属和女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四会总干事和主要干部前后参加了两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是在1960年召开的“神仙会”，为期一个月。通过学习，各地教牧人员对当前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另一次是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男女青年会事工座谈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明确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男女青年会对自己联系的老朋友可以开展多样化活动，发挥填空补缺的作用，同样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上海基督教妇女团契每月举行一次团契聚会，对象多为各礼拜堂的女同工及各堂堂委和上层知识妇女，有灵修、漫谈和茶聚等，我们也曾组织前教会中学、小学老校长聚会，如清心的张蓉真、禪文的王佩贞、景海的江贵云，中西及圣玛利亚的薛正等，还有南洋女中的吴若安，虹口区景林堂附小的俞秀乐等校长。每次聚会亦以茶叙漫谈为主，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

随着妇女就业人数剧增，托儿所成了社会的需要。女青年会办托儿所，已积有丰富经验，此时又继续发挥她的优势。女青年会会员王明霞让出大半住房，拿出私蓄，购置用具和玩具，办起了一个可容纳30多个孩子的里弄托儿站。

女青年会还举办过两次义卖活动。义卖的物品全由会员亲自制作，吃的方面就有中西点、蛋糕、粽子、饼干等；用品有靠垫、围裙、拎包等，还有会员捐赠的字画。二次义卖，情况都很热烈，所得

款子悉数捐赠上海儿童福利基金会。这种义卖方式，既锻炼了会员姐妹，又使她们增强了自信心。“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族是一场灾难。女青年会更是在劫难逃。所有活动被迫停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女青年会的工作始告恢复。

在复会过程中，女青年会除了开展小型活动外，并积极致力于领导班子的建设。当时除年事较高的董事会会长荣漱仁外，先后又增添了四位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荣漱仁逝世后，由上海灯泡厂高级工程师王菊珍为会长。

1980年以来，女青年会根据这阶段的方针任务，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并配合青联、妇联，为宗教、华侨、民族、工商、台胞和待业青年妇女，以及过去与青年会长期有联系的各界人士，开展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国际友好活动。

几年来，女青年会积极发展新会员，到目前为止，已发展有600多位会员，同时，恢复和加强了文革前的学习小组，每周一、二、五开展活动。周一小组以文教、医务、科技、财贸、“三胞”和高知家属为主；周五小组以教会妇女为主；周二小组以年老体弱的会员为主。各小组不论酷暑严寒，从不中断，积极性很高。

复会后，女青年会有部分工作是与男青年会联合举办的，如节假日为少年儿童开办的“儿童音乐会”、“中外少年儿童联欢会”、“庆祝儿童节联欢会”，又如举办各类班级如科技英语班、日语口语班、标准舞培训班、音乐之友社、英语俱乐部、画展等。

1988年10月19日，上海女青年会举行了八十周年庆祝大会，热烈又隆重。国内外许多朋友均来电祝贺。这时逝美国旧金山华埠女青年会访问团来沪访问，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时刻。

八十年来，女青年会本着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的发展，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做了不少工作。从长期实践中，探索到一条为妇女群众所乐于接受的形式，即“寓教于乐”。这成了女青年会多少年来工作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类型开展文化教育兴趣娱乐等活动，特点是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寓教于乐”的形式，鼓励了许多妇女积极向上，热爱祖国，热爱生活。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女青年会的工作必须要有更大的提高。如何根据社会需要和老年、青年、儿童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高质量活动，以期更广泛地为社会服务，这是女青年会努力的方向。

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 运动发起经过

沈 德 溶

—

基督教(指新教)是在19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由于它的传入同欧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因此,被中国人民看为是“洋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一个不光彩的形象。当时,在中国基督教内也有少数先进的爱国人士看到这一点而发出“中国教会应该自立”的呼声,如1907年上海的俞国楨牧师为了脱离英美等国教会的控制,发起创办“耶稣教自立会”。这一壮举得到全国许多地方的教会的响应,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的基督教会要真正自立,不受英美等国教会的控制是不可能的。上述的自立会在旧中国挣扎了几十年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剩余物资,从而背离了它发起时的初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被奴役状态的前景。人民大众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而对于不少基督教信徒来说,却感到徬徨和苦闷,他们不知道基督教在新中国究竟会面临一个什么前途。

早在1948年春天,基督教著名民主人士吴耀宗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基督教的时代悲剧》的文章,指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着”,“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但它还

不甘放弃“它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与利益”。吴耀宗接着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提出他的下列见解：“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两种表现。宗教革命产生了基督新教，工业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基督(新)教和资本主义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演变的产物。因此，它们不只是息息相关、相依为命，而且几乎是一对孪生的弟兄。”在谈到中国的基督教时，吴耀宗认为它的传统“主要是英美基督教的传统”，“宣教师多数是从美国来的，领袖人才多数是在美国训练的，许多重要组织与事业是由美国教会资助的，信仰与思想几乎就是美国式基督教的翻版”。“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有史以来的最大转变”，“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时代是要进展的，如果我们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到那时候，如果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是背负了耶稣的十字架，那就更可悲哀了”。

吴耀宗在1948年写这篇文章时，固然没有提出中国基督教要实现“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口号，但他那种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保持一致的思想跃然纸上，这样的远见令人可敬，真可说是一位基督教所称的“先知”。

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基督教被邀参加会议的有吴耀宗、邓裕志、赵紫宸、刘良模、张雪岩五人。会议结束后，为了传达人民政协的经过与成就，以及政府有关宗教工作的政策，由人民政协基督教代表，发起组织一个基督教访问团，拟先后访问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华南五个大区。11月下旬，吴

耀宗、刘良模等自上海出发，先后访问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开封后回到上海。他们在各地了解到解放后不少地方的基督教会都遭遇到许多困难，有些地方的教堂被借用或征用，有些地方的圣经被没收，教会的工作受到阻碍。此外，吴耀宗在上海时，也接到不少信徒来信，呼吁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类似困难。1950年4月，吴耀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吴高梓等五人又组织一个华北访问团，去北方各地访问。到达北京后，北京市基督教各教派、团体举行座谈会，欢迎华北访问团，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来自华北其他省、市的一些基督教工作人员。会上各地来人又报告了不少他们在当地所遭遇到的困难。吴耀宗当时的思想认为这些困难的发生，是由于基层干部不懂得宗教政策，因此未能很好地执行。因此，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请中央人民政府出一个通告，表明政府保护基督教会的活动，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各地基督教所碰到的困难。他要求见周恩来总理，向周总理面陈意见和要求。

4月30日晚上，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在北京饭店会见了吴耀宗，在座的还有访问团的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等（吴高梓因事已先期返回上海）以及北京基督教的负责人王梓仲、赵紫宸、赵复三。

5月2日下午，周总理在政务院接见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崔宪详、涂羽卿及江长川、王梓仲，谈基督教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同志在座。吴耀宗详细汇报了基督教的一般情况以及所面临的困难后，周总理简要地指出，中国基督教应清算内部的帝国主义力量，应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谈话从下午一时进行到五时半，周总理提出改日约时间再谈。

5月3日到6日的四天内，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涂羽卿、崔宪详等同在北京的基督教人士先后进行了多次谈话，酝酿及商

量如何在下次谈话时向周总理提出具体意见的问题。5月4日,吴耀宗受众人委托草拟了一份《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后来又经多次修改后,大家同意《初步意见》应包括下列一些内容: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力量,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发还被借用的宗教房产,建立基督教新的全国性机构等。

5月6日下午3时,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基督教人士,基督教方面参加者除上次的七人外,加上了艾年三、凌贤扬、赵复三、杨肖彭和凌俞秀霭,共十四人。政府方面参加的有陈其瑗副部长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十余人。谈话历时三小时,主要内容为讨论吴耀宗等所草拟的《初步意见》,未得结论,认为需再作研究。

5月7日后,吴耀宗等就《初步意见》又多次讨论修改补充,有时也同教外朋友们商谈有关问题。5月10日晚上,全国政协宗教事务组开会,基督教方面参加者十六人,宗教事务组其他成员参加者也有十余人。其他宗教的朋友们对基督教亦颇关怀,大家一起讨论,发言十分踊跃,一致认为目前基督教最重要的任务应是肃清内部的帝国主义力量,改变人民对她的印象,这样的话,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这些讨论对吴耀宗等很有启发,改变了他们原来到北京来是想向中央人民政府“告状”,并要求政府出布告保护基督教的想法。5月11日,经过多次讨论后,吴耀宗拟出《初步意见》修正稿,共十条,并起名为《中国基督教会今后努力的途径》。

5月13日晚11时,周总理约见作第三次谈话。此次基督教方面参加者又较第二次多了赵紫宸、陆志韦、高凤山、庞辉亭(之焜)、陈文润、刘维城、霍培修等七人,会上,吴耀宗提出了《中国基督教会今后努力的途径》,内容有:拥护共同纲领,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力量,实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经济、人材以不用外国的为原则,地方上教会发生的困难报告政府处理。周总理对基督

教人士的这些意见表示支持，并勉励有加。吴耀宗在当天他记的日记中写道：“周总理态度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此次谈话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

5月15日，吴耀宗、刘良模、涂羽卿、艾年三四人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吴耀宗又将《中国基督教会今后努力的途径》再作修改。

在西安，吴耀宗在西北五省基督教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时，指出：对西北各地基督教所面临的困难，解决问题者不是访问团，也不是政府，而是基督教自己。从此可以见到吴耀宗的思想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5月29日吴耀宗等回到上海。吴耀宗又为文件的修改与当时基督教一些教派、团体的好些负责人分头交换并征求意见。

6月7日，吴耀宗离沪去北京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6月10日，他同北京基督教负责人江长川、王梓仲、赵复三等讨论了文件的第八次修改稿，亦即最后一次修改稿。6月18日，吴耀宗去政务院见周总理，向周总理介绍了文件多次修改的经过。

6月21日下午，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大会。会议休息时，吴耀宗遇见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说：“听说你们将发表一个宣言，文章写得很有力，应该多征求人签名，不过一定会有人反对的。”

7月1日，吴耀宗回到上海后同华北访问团的其他成员邓裕志、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讨论如何进行征求赞成文件的人签名的办法，并把文件更名为《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

7月6日，吴耀宗、邓裕志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行政人

员会议上提出这个文件。参加人中有赞成者，但表示怀疑者也不少，并有人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修改意见中最主要的为，要求取消文件中“……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这一段话。吴耀宗和邓裕志两人对有些意见作了解释，但对有关过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这段话决定不作修改。

7月28日，由吴耀宗等40位基督教各方面知名人士起草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文件，寄发给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团体，征求赞成的人签名。

征求签名的信件发出后，响应者十分踊跃，因为这个文件给解放后正在彷徨中的基督教人士指出了前进方向，因此，在短短的十天里，签名拥护这一文件的就有400多人，到8月31日为止，签名者已达1527人。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全文，四十位发起人的姓名以及第一批1527人签名人的名单，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以后，9月23日这一天就被基督教界定为“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纪念日”。

正如毛主席所预见到的，这个文件在基督教内引起了广泛的热烈反响，拥护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对活动。个别人甚至提出要另发表一个宣言来同这个文件唱对台戏。但是，由于三自革新(爱国)运动是符合全国基督教徒的愿望，代表全国基督教徒的利益，因此，这些反对的企图都一一先后破产，到1952年止，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文件上签名表示拥护的基督教徒已达33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国基督教徒的一半。

1954年,为了团结更多的基督教徒,也为了避免有些人把“三自革新”误解为宗教改革,“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吴耀宗生平纪略

边 文

吴耀宗，广东顺德县人，1893年11月4日出生。父亲吴逢敬在广州永兴街开设一家木材店，但经营不善。

吴耀宗少年时在广州就读于英人开办的育才书舍，成绩优异，屡获奖学金。1908年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于1913年1月毕业。同年3月派到广州海关供职。翌年冬调往辽宁牛庄海关。1917年8月调任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汉文案副税务司帮办。

他接触基督教始于1911年。是年农历六月，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夏令营听了有关基督教的演说后，改变了原先对基督教的看法。他写道：“余前时未尝研究耶教，不过以迷信二字撰之而已。今听诸氏之演说，乃知耶教实有可信之理。”1918年6月2日在北京公理会领洗入教。受洗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前种种忧虑、畏惧、悲观之心，如日光下之雪，几尽溶化”，“今觉前途无限光明，无限快乐，盖得我基督耶稣为暗世之光，为迷途之导”，“谓此为余一生转机之年可也。”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负责人、美籍干事柴约翰很看重他的人品和才干，希望他到青年会工作。当时海关待遇优厚，被称之为“金饭碗”，他的月薪合银元180元，如去青年会，所得薪水仅约半数。但他决志进入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宗旨的青年会工作，并说服了家人，于1920年9月向海关提出辞职，同年11月1日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担任干事，主要工作是指导和帮助

一些大中学校青年会展开活动，并经常向青年学生演讲。

1921年8月25日，他与基督徒杨素兰女士举行婚礼。

1922年2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通过决议，请吴耀宗担任学生部主任干事，在此期间，他和宝广林、胡笃生、张志新等创办了评论教会及时事等问题的《真理周刊》（1923年4月1日创刊，后改为半月刊）。

1924年5月，青年会全国协会送吴耀宗去美国留学，进纽约协和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选读课程。留美期间，他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活动，与诚质怡、熊佛西等交往密切；经常参加教会活动，常被长老会的一些教堂请去讲道或介绍中国的宗教、文化、新思潮、学生、妇女等情况，也曾参加美以美会等教会组织对有关传教事业的讨论会，他主张中国教会应实行自养，外国应停止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而改为交换教师等。

1927年5月，吴耀宗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8月与夫人一起回国，9月抵上海。10月到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校会组干事，主要任务是指导各基督教大中学校的青年会工作。

当时，他受基督教教义“爱人如己”和国际上唯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宗教思想上热衷于唯爱主义。他在国内发起组织“唯爱社”，并担任该社主席，还于1931年接编该社季报《唯爱》（中文版），并改为双月刊。唯爱社参加者多为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主张非暴力主义，认为只有用爱心才能感化人类、改造社会，使社会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对外退让、对内剿共的时局，却使他深感苦闷。

“九一八”事变，他邀集男女青年会干事商讨抗日办法，发起对日不合作运动，并亲自草拟了一封致基督徒学生团体的公函，主张：（一）用非武力的运动来对付日军的侵略；（二）对日经济绝交；

(三) 除两国人民谋根本解决问题应有之关系外，断绝其它一切关系。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和夫人一方面积极投入难民救济工作，另一方面分别写信给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主席米勒和英、美、日等国的基督教学生运动组织，吁请他们“为中日问题主张正义，共同奋斗。”并开始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李公朴、黄炎培、邹韬奋、杨卫玉、毕云程等有了接触，商讨救亡问题。

1933年6月22日，他和阎宝航、李公朴、沈体兰等在上海青年会成立了东北社，旨在为收复东北尽力。这一活动持续到1934年。1935年，吴耀宗参加了救国会和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投入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他的唯爱主义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从原来的不区别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不同性质、绝对不参加一切战争的态度，转变为主张抗日；从不主张武装抗日，转变为向武力抗日“表示同情与敬意”。他痛感唯爱主义救不了中国，便辞去了唯爱社主席职务。

1936年12月，他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及太平洋宗教学会之邀，再度赴美进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七七”事变后，他在美国为《中国基督徒学生》月刊撰写《一个中国人的中日战争观》，希望国际社会干涉日本侵华。

1938年2月，他完成协和神学院考试论文，于3月13日回国抵上海。回国后，他改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第一件工作就提出编辑一套“非常时期丛书”的计划，分为国难、基督徒信仰与生活、基督教思想潮流三大类。同时，他和沈体兰、孙瑞璜等参加了由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等组织的复社。该社社员每人出资50元，出版了《鲁迅全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籍，对传播进步

文化和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同年5月，他在访问内地基督教青年会期间，先后在长沙会晤了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在汉口会晤了周恩来、吴玉章，谈话内容涉及宗教、共产主义、抗战、国共合作、中国革命诸问题，他认为谈话“颇有意味”。

同年11月，他去印度出席国际宣教协会会议。会后，他先后访晤了圣雄甘地、诗人泰戈尔和尼赫鲁。

1939年10月至12月和1941年8月，他去内地访问，向大学生讲道，主领学生们的礼拜，向学生讲述时事，与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如何为抗战出力。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他改变从重庆经香港回上海的计划，在成都住了下来。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他以较多时间从事写作和翻译国外的基督教著作，阐述基督教教义。在他的发起、推动下，成都的基督教出版单位于1942年9月达成协议，组织基督教联合出版社，他被推为该社主席。该社先后创办了《天风周刊》、《基督教丛刊》。在此期间，他在重庆曾家岩访问周恩来、董必武，畅谈时局；向青年学生报告国际形势，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支持冯玉祥主持的基督教献金运动；支持成都青年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他被誉为民主教授，他的住所被称为民主之家。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学生游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发生了昆明惨案。成都学生于12月9日集会游行，吴耀宗被邀演讲，并参加了游行。他的反蒋民主活动，遭到一些反动分子的忌恨，他们对他造谣中伤，大肆攻讦，张贴诬蔑性大幅标语，他在进步学生的保护下得免于难。

1946年5月，他从成都回到上海，继续投身于民主运动。作为宗教界代表，他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组织的11人去南京请愿

代表团,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并为代表团起草了致美国大使马歇尔的《备忘录》。他还参加了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福利会,经常为《民主周刊》撰稿,参加中国基督徒民主研究会活动,去各大学演讲,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

1947年7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挪威召开世界青年大会,吴耀宗作为中国基督教23人代表团的顾问出席大会。会后,去英国爱丁堡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大会。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的形势下,他在《天风》1948年复活节号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着”,“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大转变”,“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时代是要进展的,如果我们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文章发表后,某些外国传教士大为不满,对他严厉指责。在压力之下,他被迫于1948年5月19日辞去天风社社长职务。同时,他因参加反蒋民主运动,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有时不得不避居于友人家中。

1948年12月,他和江文汉等应邀出席在锡兰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袖会议。翌年1月,他回上海参加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问题。会后,即飞回香港。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包括吴耀宗在内的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事。吴耀宗接受邀请,于1949年2月16日秘密离开香港,于3月9日抵达北平。

1949年4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宗教界唯一代表),参

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随着北平、上海等城市的解放，基督教人士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基督教将怎么办？1949年6月17日的上海《大公报》刊出了五个基督徒《基督教徒的觉醒》的来信，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这封信。引起热烈反应，不少读者投书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大公报》请吴耀宗就此问题作一总结，他就写了《基督教的改造》（载7月16日《大公报》），首先指出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事实。他认为中国解放以后，中国基督教首先“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其次，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再其次，“必须认识现在的时代和它自己过去的历史。”最后，“基督徒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建设新中国。”可见，在1950年发起三自革新运动之前，他就已提出中国基督教实现三自的主张。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他作为宗教界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他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先后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和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大代表，还曾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等职务，积极参加各项政治、社会活动。他还担任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多年，多次出席各种有关的国际和平会议，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以及各国教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1950年5月，他和刘良模、邓裕志、赵紫宸等基督教领袖，率

领基督教访问团到北京见周恩来,经过三次恳谈,由他起草并经其他基督教领袖多次修改而成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出现了。宣言主要内容为:“拥护《共同纲领》,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实行三自,经济、人才以不用外国的为原则,各地教会如遇困难随时报请政府解决等。“三自宣言”签名运动发起后,很快得到全国广大基督教徒和教会领袖的拥护和支持。同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一宣言,用三个版面刊登了全部签名者名单,还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至1951年3月底,全国各地、各民族基督教徒在宣言上签名的达18万多人。

1951年4月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京召开有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151名代表参加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吴耀宗在会上作了《八个月来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的发言。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团体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这是中国基督教徒走上三自道路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也是一次空前广泛的大团结会议。会上,他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提出三自革新以来的主要成就是:人事、行政、经费等方面,基本上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初步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他还强调:爱国与爱教没有矛盾。会议决定将“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并选举吴耀宗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执委们一致推举他为总会会长,接替已逝世的邹秉彝牧师。

1956年3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

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吴耀宗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基督徒应该在新时代所做的三个见证和十件重要工作:即实现中国教会三自的见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见证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团结,对组织机构、人事安排、事工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整顿,成立一个中国教会自养促进委员会,全面考虑中国教会自养需要,交流、分享自传工作的经验,大力鼓励著作,有计划地就神学、教会历史、教会事工等方面进行研究,有计划地为中国教会培养更多的人才,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国际友谊合作,推动爱国主义学习。

以后,在“左”的路线下,他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为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面继续努力。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贯彻和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多次建议有关领导干部读圣经,研究基督教。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教堂被封闭,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会所也受到冲击,吴耀宗被勒令写思想检查,接受批判。“四人帮”垮台后,他带病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1978年2月的第五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就“四人帮”横行时期制定的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提出修改意见。

1979年9月17日凌晨,吴耀宗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

刘良模纪略

文 思

刘良模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一生讴歌进步、鞭挞黑暗，是爱国爱教的楷模。

刘原籍浙江镇海，1909年11月出生于上海。从小受教会学校教育，1932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平时勤奋学习，尤富活动能力，有正义感。在沪江时曾担任大学学生会会长。刘自幼热爱唱歌。在学校里，他往往引吭高歌，声震屋宇，引起掌声无数。毕业后应聘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时刘年富力强，做学生工作，精力充沛，与学生接触，如水乳交融。后受到当时基督教学生运动领袖吴耀宗先生的影响，思想日益进步。

30年代，国难深重，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鲸吞蚕食的侵略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爱国青年的义愤。要求抗日的呼声震天动地，救亡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刚从大学毕业的刘良模，热血沸腾，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他挺身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擅长歌咏与指挥的刘良模，决心以歌声来唤起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他先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办民众歌咏会，前来参加的青年由数十人到数百人，十分踊跃。礼堂容纳不下了，他奔走筹划，又去八仙桥青年会建立起分会，附近的居民、店职员闻声而来。前来参加者不但分文不取，而且备受欢迎，要求只有一个：回去当“小先生”，把在歌咏会学到的歌曲，转教给亲戚、朋友、熟人。于是

一传十，十传百，歌声越唱越响、越传越远。

刘良模根据美国民歌的曲调，自编一首简单易学的《救中国》的歌。歌词只有四句：“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救国要奋斗！”调子是：“多、多、多来咪，咪来咪发梭，多、多、多，梭梭梭，咪咪咪，梭发咪来多。”这样朗朗上口的歌曲，一学就会，自然受到男女老幼的欢迎。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了，刘良模继续以他的歌声代替武器，鼓动群众，打击敌人。刘良模率领青年会组织的军人服务部和合唱团披星戴月，奔赴各地慰问，1938年9月，先生率队到达第三战区的浙江金华，展开抗日宣传及慰问工作。时值吴大琨为团长、杨帆为副团长的上海各界民众第二次慰劳团因去皖南受阻，也滞留在金华。在共同的目标下，他们曾携手合作，一起演出节目。1939年，周恩来同志去皖南视察新四军后，南返途中经过金华，住在中国旅行社。在这里，刘良模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鼓舞。没料到，当刘良模在金华不辞辛劳宣传抗日的时候，“消根抗日、积根反共”的国民党却对他进行了监视。先是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披取缔，接着，刘良模遭到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无理扣押，后经多方设法得以获释，但所有活动受到限制，迫害不断，次年即1940年，他远涉重洋，去了美国。

在美国，他广交朋友，每到一处，介绍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事迹，宣传中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不论在外国友人中或是在唐人街华侨中，每到一次，他热情洋溢，高歌抗日，引起强烈反响，他与华侨洗衣工人建立起友谊，还帮助他们组织起一支歌咏队。振奋人心的抗日救亡歌声，在太平洋两岸同时响起。

在美国，他与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由相识而相知。罗伯逊热爱真理、同情中国，他向刘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学会以

后,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唱,扩大了我国抗日救亡的国际影响,推动了各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罗伯逊把《义勇军进行曲》叫做《起来》,后来,他灌制的那套中国抗战歌曲唱片集,名命即为《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意孤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挑起了反人民的内战。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因反对蒋介石的独断独行而被放逐、以考察名义来到美国。在美时,他经常利用应邀赴各地团体或大学讲演的机会,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把军火送给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由于冯将军不会讲英语,刘良模就成了他的义务翻译之一。刘和其他旅美的爱国侨胞一样,用各种方法推动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支援中国。在美期间,刘良模和冯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冯玉祥于返国途中,在里海遭到不幸,为此,刘感到十分痛心。

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光明。祖国解放的喜讯传遍了天涯海角,海外赤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在纽约的刘良模,收到了由龚澎代表周恩来总理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刘无限激动,趁着大好秋光,偕同夫人陈维姜及两个孩子赶回阔别了九年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光荣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当他听到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前而提到的《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我们的国歌,这和刘良模的推荐有关,他认为这首慷慨激昂、正气凛然的歌曲,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他的建议遂被采纳。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为“共同纲领”的诞生而欢呼,对于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他和其他所有的基督

徒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解放以后，刘良模仍在基督教会工作。随着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向依赖帝国主义并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教会何去何从，成了教会中有识之士认真考虑的课题。

如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使基督教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亦即中国基督徒自办教会的道路？刘良模与吴耀宗、邓裕志等教会领袖，带着他们的想法和各地教会所涌现出来的问题，请教于周总理。周总理尽管十分忙碌；还是约他们谈了三次，且每次都谈到深夜。中国基督教要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即三自）的设想，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

1950年9月，包括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在内的40位基督教领袖发起、并经多次修改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刊出了。同时，还有巨大篇幅，刊登了拥护“宣言”的签名者1,500余人的名单。到1951年3月，全国各地基督徒在宣言上签名的达18万多人。《人民日报》还特地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社论、声势相当的大、接着，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从此，一个前所未有的三自爱国运动在基督教内展开了，中国基督教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自宣言”明白宣告：摆脱外国教会对我国教会的控制，促使中国基督教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积极推进“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以期改变百余年来中国基督教的“洋教”面貌。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诞生，是教会内许多先进份子应顺历史潮流共同努力的结果。刘良模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常说：基督徒既要爱教，又要爱国，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热爱祖国的典范。爱国爱教，体现了基督精神，“三自”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十年浩劫中，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多少无辜蒙受其害，刘良模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抄家、体罚、人格侮辱、没完没了的批判，刘的健康自然受到影响，及至四凶剪除，春回大地，刘已年届古稀。病弱的身体，没有影响他高度的爱国热情。由于他全心全意投入三自爱国运动，他被选为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刘良模除担任教会工作外，还广泛联系宗教界人士、归国华侨、海外侨胞。凡利国利民利教的事、无论大小，他都会高高兴兴地去做。

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他不辞辛劳，接待海外友好人士及基督教朋友，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改革开放的锦绣前途，讲给人们听。说得生动、充满激情。可惜，病魔缠住了他，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到1988年8月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丁淑静和中国基督教 女青年会

杨 树 因

一、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任中国总干事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在 1890 年由美国传入我国的。1903 年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贝宁格 (Martha Berninger) 担任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任干事。1905 年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加入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总干事由美国女青年会干事潘多克 (A. E. Paddock)、顾恩慈 (Grace Coppock)、文自立 (Rosalee Venable) 相继担任。这些全国委员会总干事到中国各地旅行、考察筹划城市女青年会和学校女青年会的组织。同时, 美国女青年会和世界女青年会陆续派遣美国以及英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的女青年会干事多人来华, 在各地筹建女青年会。1908 年上海女青年会正式成立, 接着广州、天津、北京、长沙、福州、香港、成都、杭州、南京、沈阳、济南等女青年会相继成立。1923 年时, 全国已有 12 个市会、80 多个校会。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干事在各地女青年会分别担任总干事或其他关键性职务, 共有 87 人之多; 而中国籍干事仅 50 人, 大多担任一般性职务。这时女青年会的工作主要是以官僚、买办家属为对象的家庭改良工作, 还有以中学女生为对象的少女工作、宣传改善女工童工生活的劳工工作, 并提倡体育、卫生、正当的娱乐活动, 首创全国第一所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提倡妇女就业

等。在当时，女青年会已经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有组织、能活动的妇女团体。

正当女青年会顺利发展的时候，1919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导致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爆发。1925年“五卅”惨案，上海的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学生和民众，更使非基督教运动如火如荼，这一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给予揭露和清算，一直持续到1927年。这个时期，女青年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困难。福州、武昌、长沙、南京、济南等女青年会或停办或难以开展，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干事纷纷离开中国。丁淑静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被推上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女青年协会）总干事的职位的。

丁淑静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在德州美国宣教会所办小学及通州美国宣教会所办中学读书。191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女子文理学院（原燕京大学前身），为首届三位毕业生之一，毕业后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1916年参加北京女青年会筹备工作，旋被美国宣教会派赴美国留学；在那里，她接触了美国女青年会工作。1919年回国后任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1922年12月，全国委员会邀请她担任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筹备主任。1923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丁淑静被委任为女青年协会代理总干事。次年，她代表中国女青年会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世界女青年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及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美国女青年会大会。1925年4月，丁淑静在美国纽约女青年会干事学校肄业，又代表中国女青年会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与男女青年会的联合会议，并赴北美、欧洲考察女青年会事业。1926年1月，丁淑静就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第一任中国总干事。

1903年，她被推选为世界女青年会副会长，曾赴欧美参加会议多次。

二、爱国爱教的先导

丁淑静可以称得上是基督教界的一位爱国爱教的先导。她与本邑教会的倡导者诚静怡为至交。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在已往八十年间，……和我们缔订种种独惠条约，使国家主权横受束缚……所谓自立国的自由真已剥削大半，……政事难得自由处管，经济状况日益窘迫，……政潮翻复，战事频仍，与条约有莫大关系。”她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近世的一切不幸大部份是种因于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她认为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被怀疑为帝国主义先锋，教会及西方传教士受到猜忌与排斥，也根源于不平等条约。她在1927年2月上海基督徒大会上提出“对一切不平等条约，主张唤起全国中华基督徒的同情，务达废除目的”的建议，获得通过。当时她任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她还提出中国基督教教会应由中国基督徒管理，实现自养、自传、自理本邑教会的主张。她说当时教会“西洋色彩过于浓厚，与我们中华民族格格不相入，”既影响教会的发展，又容易招致社会上的疑谤。这两项建议也获通过。当时中国基督教教会处于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基督教宣教会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实现本邑教会的主张遭到许多在华西方国家传教士的反对。丁淑静能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主张，十分难能可贵。

丁淑静爱国爱教的立场与观点，在1926年她的《游美时期对五卅案的观感》一文中即已鲜明地表达出来了。“五卅”惨案使当时在美国的丁淑静受到极大震动。在该文中，她愤慨地说，因“五卅”惨案，许多“非教”、“排外”、“过激”等臆断和误解论调在美国报

刊上发表，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的基督徒与基督徒团体对“国家主义膨胀”、“民族觉悟勃起”的中国不可漠视，告诫美国国外宣教会，如果愿意实行“基督的主义”，就应当“视中国的主权比宣教会的财产更为宝贵，民族自由的要求比几位宣教士生命的保护更为迫切”，对于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五卅”惨案就应当主持正义。这与当时某些基督教界领袖人物无视血与泪的事实主张“调查”以敷衍了事者，实有天壤之别。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侵犯我主权，杀害我同胞的事件层出不穷。1927年1月，我收复汉口英租界，英、美、法军舰随即入侵，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在济南杀害我同胞等等事件，丁淑静均致函电给世界女青年会、有关国家女青年会以及各国女青年会表示抗议，呼吁主持正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丁淑静主持下的女青年协会在向国际上呼吁制止侵略的同时，更向全世界揭露事实真相。在女青年协会号召下，各地女青年会都募款，征集药品、物资支援抗日部队，及征募训练救护队，救护难民、伤兵。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又进攻上海，十九路军迎击敌寇，上海人民及全国人民起而声援。女青年协会同事紧急投入难民收容所及救护队工作，各地女青年会踊跃捐输。九一八事变后，女青年协会即编印出版《中日问题研究大纲》，从历史上、国情上对日本侵略行径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的出路及民众的责任。各地女青年会随即纷纷成立中日问题研究会。1933年5月，日本军队占领热河，事实使丁淑静认识到停留在口头呼吁上无济于事，在《全国协会同人致各地女青年会书》中她宣称：“只有主张抵抗，武力御暴”，用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她赞扬淞沪战役鼓舞人心。她们向东北抗日战士捐献丝绵背心1400件，又捐款帮助东北同胞。华北各地女青年会在丁淑静亲自推动下，也都投

入战区紧急救济工作。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划支持汉奸在河北东部22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发动华北伪“自治运动”，把侵略势力伸展到整个华北。北平学生发动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女青年协会在1936年1月发表《为华北事告各市、校、乡会会员书》，指出局势之危急，“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坠入帝国主义直接宰割的厄运中”，不能再忍辱偷安，“坚持保全中国土地的完整及行政的完整”，“力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担当起救国的伟大任务。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丁淑静的步伐已经愈来愈接近广大中国人民了。

三、丁淑静主持下的中国女青年会工作

女青年会在历史上举行过三次全国大会。均由丁淑静筹备、主持。在1928年举行的二全大会上，丁淑静作了《今日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使命》的演讲。在谈到中国妇女状况时，她说：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处于封建礼教压迫之下，有着一部凄凉惨淡的生活史。辛亥革命以后，虽然男女平等的观念从西方传来，但远未实现。首先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少于男子，全国大专院校男校有105所，女校仅1所，男生为30903人，女生仅665人；全国师范学校男校有200所，女校仅63所，男生为21149人，女生仅7385人。其次，在法律上妇女地位低下，如选举法所规定的都只限于男子，其它各种法律命令都是单独承认男子的权利，否认妇女的权利。第三，妇女经济不能独立，接受职业训练的机会比男子少得多，职业地位也低。而且婢妾、娼妓、童养媳等现象都未消灭，因此不能说中国妇女地位已经提高。她又说，虽然有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妇女”，但她们或“不能耐劳任艰到民间去”；或鄙视中国固有

文化,不愿与平民妇女接近;或受物质诱惑,埋没了才干。有理想、有思想、有觉悟、满怀热忱的妇女,在混沌纷乱的环境里,应当共同为中国妇女谋求应有的权利和幸福。女青年会就是这样的妇女组织之一。关于女青年会的性质与使命,她说,女青年会的工作一向是培养妇女健全人格,改良家庭生活和组织妇女为社会服务。其使命是谋求妇女个性的发展,增进生活幸福;进行社会改造,使“天国在人间实现”;培养健全人格,为国家树立坚实基础。经二全大会修订的女青年会宗旨是“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达,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较之未修订前的宗旨更为接近现实生活。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丁淑静引导女青年会渡过挫折与困难。1928年二全大会举行时,全国已有13个市会、90多个校会、70多个少女前导团,会员共1.1万余人。在丁淑静任期内,从1926年到1936年,烟台、台山、重庆、武汉、太原、福山、厦门等女青年会先后成立,曾经停办的长沙、南京女青年会已经恢复。女青年会工作也从低潮走向活跃,一个重要原因是女青年会能适应时代潮流,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工作。这一时期女青年会工作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注重为平民服务。一全大会、二全大会都把提倡妇女识字运动、妇孺识字运动、平民教育等放在工作首位。1933年,三全大会进一步提出要求“工人教育深刻化,以识字为基础,注意团体生活教育,唤起工人觉悟,培养组织能力,以解决自身问题,”及“注重教育来改善农村妇女生活,帮助她们解决农民生计。”又议决将民生问题及公民教育作为工作主要内容;提倡国货,扶助民族工业,以减少失业,及提倡办妇女职业介绍所帮助失业妇女就业。大会请陶行知演讲“农工教育对社会改造的重要”,吴耀宗演讲“基督教与社会改造”。大会有女工及来自农村的代表参

加。上海女青年会女工代表在会上展出女工、童工工作及生活状况的照片，令与会者触目惊心，她们演出自编话剧《往那里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

回顾这个时期女青年会工作，首先是开展平民教育工作。平民教育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影响下，于1923年开始的，向成年妇女、失学儿童教授识字及生活常识，1928年以后发展迅速，三全大会后各地女青年会普遍举办民众学校、成人千字课班、妇女夜校、民众小学等。劳工工作在1927年也改变了原来受西方影响以提倡社会舆论来影响和促进改善女工状况为主的方针，转而以教育为中心，直接为女工服务。在女青年协会劳工部推动下，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在1928年专为女工举办平民学校（后改称女工夜校）。1930年女青年协会劳工部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合办沪西女工社，对各地女青年会劳工工作起示范作用。女工夜校对女工同学在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方面起了一些作用。女青年会在1927年也开始了乡村工作。在山东福山、广东台山、江苏大场等地设立乡村服务区，办民众学校，并进行卫生宣传、家庭改良、文娱活动等，也提倡农村合作运动。广东台山、山东福山都成立了乡村女青年会。大场乡村服务区成立之前，女青年协会乡村部曾在这里与陶行知的乡村改造社合作，进行妇女工作。

其次，在家庭改良方面，重视对家庭妇女灌输当代科学及卫生知识来保育婴儿、教育儿童、处理家务；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代替赌博等不良习惯，具体活动如演讲“家庭改良与妇女的责任”、“如何消遣”举办家政班、母亲班、保婴会、儿童幸福会、卫生保健大会、儿童健康比赛；进行婴儿、儿童体格检查；设立孕妇诊察所、医药顾问处；创办幼稚园。同时，继续推行禁烟、反对缠足、反对蓄婢纳妾等运动。

第三,提倡妇女职业。早在1927年,上海女青年会即与男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职业指导运动周;还设立职业介绍部为失业妇女及大、中、专学校毕业生介绍职业;举办女子理发速成班,培养妇女理发技能。1933年全国已有6个女青年会举办了职业学校,其它女青年会也都设立职业教育班,教授缝纫、手工、打字、女佣训练等。女青年会还组织公司、银行、商店的职员、店员参加种种业余活动,在1923年时8个女青年会办有以职业妇女及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寄宿舍,到1928年时已有12个市会设立了寄宿舍。宿膳费均低廉,住宿者终年不断,在北京、上海等文化、商业城市尤受欢迎。

第四,女青年会为各阶层妇女增长知识,学习本领,发展兴趣和才能提供了较为广泛的机会。早期的城市女青年会就办有烹饪、家政、国语、英语、刺绣等班级,以后不断发展,三全大会时已形成女青年会工作的一个方面,即成人教育工作。工作内容更是多种多样,如教授法文、德文、日文的班级,如教授编织、急救法、家庭看护、图画、口琴、武术的班级;如歌咏团、音乐研究会、排球队、网球队、游泳队等组织,举行关于时事形势、国际新闻、家庭问题、节育、优生、艺术、文化等的演讲。不少女青年会设有体育场,提倡体育运动。

创刊于一全大会后的女青年协会机关刊物——《女青年》月刊,内容涉及宗教、会务、妇女问题、劳工生活、学生生活与思想、世界状况及女子职业、家政、儿童教育、社会现状、文艺诗歌等方面。1925年为向国际上揭露“五卅”惨案真相还出版英文特刊,后又增加了英文增刊。1927年,书报部改为编辑部,特聘请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蔡葵来编辑部工作,又增加了社论、儿童文艺、学术研究等内容。读者由基督徒扩大到非基督徒。为了更好地宣传女

青年会运动,1930年编辑部扩充为文学事业部,聘请刘廷芳、赵紫宸、谢冰心、陶行知等为委员。在蔡葵主持下,《女青年》月刊积极宣传爱国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刊登《战还是降》、《中国的土地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等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文章,以大量篇幅介绍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如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及《苏联妇女生活之转变》等。对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日本妇女状况也作了重点介绍,还刊出欧亚非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每年“五一”都出《劳动专号》,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女工工资、失业问题、女工和农村妇女生活和斗争的文章,1934年曾就妇女与职业、妇女与文艺、妇女与法律、女子体育与女性卫生、恋爱与婚姻、妇女领袖与女子教育、节育与优生等各方面出版专号,分别请谢冰心、吴贻芳、俞庆棠等担任编辑顾问。《妇女与文艺》专号曾刊登陈望道的《镜花缘与妇女解放》。这时期,女青年协会出版过一些关于家庭、儿童方面的通俗书籍,如《家庭问题讨论集》、《儿童乐园》、《婴儿宝藏》等,及关于卫生、体育、娱乐等方面适合当代需要的书籍,1933年出版过一套女工教育辅导读物——《经济学》、《经济史》、《工会运动概况》、《一个女工和一个女大学生的通信》、《怎样读报》等,深受女工夜校同学欢迎;还出版过一些以大学程度读者为对象的读物,如《科学与宗教》等。

早期女青年协会会址多次搬迁,了淑静上任伊始,便考虑筹建永久性办公地点。1928年,二全大会又议决,要求女青年协会的经费改变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情况,达到自给。因此需要建设基金。1929年,女青年协会便决定利用原有在圆明园路的地基,将两幢旧楼翻建为大厦,建筑经费需40余万元,就以特别捐款为基础,并向汇丰银行借款。大厦于1930年9月25日破土开工,1931年2月25日举行奠基礼,因“一二八”战事延搁,到1932年2月28日

完工。矗立于黄浦江滨的大厦，高8层，协会会所设在第7层，1932年10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各地女青年会都派代表参加，致贺者踴跃。大厦其余各层出租。租金除偿还建筑费借款外，均作为女青年协会常年经费的一部份。

丁淑静在1936年病逝。她爱国爱教，为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献身的一生令人起敬。她主张本色教会，力图改变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洋教面孔；但由于思想的局限性，并未触及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实质。在女青年会工作上，她努力改变因袭西方国家女青年会的种种传统，使之适合中国的时代潮流和妇女的需要。她主持修订的女青年会宗旨沿用至今。她还促使女青年会放宽吸收干事的标准，可以按工作需要吸收少数同情基督教的非基督徒为干事。应该说，丁淑静为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打下牢固的基础。

余日章及其国民外交活动

史 明

—

余日章生于1882年11月25日，原籍湖北省蒲圻县。父亲是牧师。余幼时在武昌读私塾，后在宜昌读小学，13岁入武昌文华书院，18岁进上海圣约翰书院；1908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余日章和一些中外人士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救护伤兵和掩埋阵亡将士工作。当时民军统领黎元洪仓促成立军政府，余日章成了黎元洪的临时幕僚，帮助办理外交事务。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不久，清王朝就命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陆海大军进行反扑。在萨的舰队开到武汉时，扬言将炮轰武昌。一时城内民众非常惊慌。黎元洪随即召集文武僚属开会，商讨对策。余日章也列席参加。会上黎元洪表示想给萨写封亲笔信，要他以国家民族前途为重，放弃炮轰打算，但苦于无人传递，余日章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使命，并圆满完成。过后不久，汉阳失守，武昌城内缺粮。余日章又奉黎元洪之命，担任“总理后路粮台”职务，到汉口采办军粮。他身佩红十字会臂章，于晚间率领粮船往来于武昌汉口之间，几天内运得军米万石，解除了燃眉之急。

由于游说萨镇冰成功，余日章被黎元洪委任为“军政府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随后，黎元洪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军政府取消，余改任黎的外交官。

余日章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学校时就热心团契等宗教活动,他在美国读书时,和王正廷、郭秉文、曹云祥等共同发起组织“留美中国学生青年会”,促进留美学生的联络和团契。这个组织从此一直延续下来。完成学业后,他又接受委托,作为一名“旅行访问干事”,到美、加各学校访问中国同学,倡导组织分会工作。余希望通过宗教途径,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因此,当民国刚刚诞生,余日章崭露头角时,他没有在官场上继续走下去。却于1913年当上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后改为全国协会)讲演部主任干事,从此以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作为终身事业。

二

青年会全国协会设在上海,讲演部下设教育、卫生、农林、实验等四个科,余日章自己主持教育科。讲演部的特点是各种讲演都有仪器为辅,以加深听众印象。在余日章任期的三四年中,他以大部分时间往来于南北各省,进行教育讲演,从各方面阐明德智体三育并重和教育为立国的基础,并强调凡事不能存有私心。他说:“我们兴办各种事业,处处当从爱国家爱民族上着想,将自私自利之心,涤除净尽才好。”这就是他后来提倡的“人格教育”。当时在全国组合的干事还有王宠惠、徐谦等人。

1917年青年会全国组合总干事王正廷提升余日章为副总干事,以后王正廷往北京任参议院副议长,辞去全国协会总干事职,由余日章升任总干事。1919年6月余向青年会北美协会提出五年内要他们支援97位西干事,会所建筑经费200万元,据说除西干事没有完全到达要求外,捐款大部实现了。因此在那几年间,各地青年会会所建成不少。在事工方面,除德智体群等经常工作外,较突出的是开创了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这是别国青年会所没

有的。

1914年至1918年欧战时期，中国青年会曾派工作人员到欧洲为20万参战华工服务。这些华工多为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急需的莫过于教育。于是，他们为华工组织夜校、演讲会以及各种增进知识的活动，受到华工的欢迎。工作人员晏阳初等回国后继续为增进民众教育而努力。他们的志愿受到余日章的赏识和鼓励。经过晏阳初等潜心研究，创造出扫除文盲的《平民教育千字课》。经过实验，效果很好。平民教育的试验成功，引起了国内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各省也成立了分会，平民教育运动得到广泛开展。与此同时，青年会本身仍在各地举办平民教育班、高级平民学校、平民图书馆、平民讲习所等。据粗略统计，青年会自发起平民教育的15年中，接受这项教育的约有25万人。

1923年余日章在青年会全国大会中提出举办公民教育运动；目的在于使全国同胞都能认清公民的职责，各尽公民的义务。以后聘请刘湛恩博士为协会公民教育干事，由刘陆续编著公民教育材料，如公民研究会法、公民训练班办法等，有关公民研究资料有地方自治、国际问题、不平等条约及国内问题等共达20多种。1924年春先在广州和北京两地试办公民研究社，参加者非常踊跃。第二年就推广到全国各地。

余日章决意加入青年会时，就认定青年会所提倡的人格教育。是建设中国的根本要图。这是由于他看到自辛亥革命后，国事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每况愈下，政治腐败，内乱不已；外交方面，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之后我国外交上孤立无援，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甚嚣尘上。当时，国人不乏种种救国主张，而余则认为，我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

道德的退化。如果不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那末，一切救国的主张都等于空谈。于是，在他担任青年协会总干事后，就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

三

1922年美国总统哈定召集华盛顿会议，与会的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美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会议的目的：一是研讨裁减军备，二是解决远东问题，主要是中日问题，即“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山东问题。因此，除由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位官方代表外，上海总商会等团体及各省区教育会、商会联席会议等深恐北京政府迁就现实，有损国家主权，特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作为声援，推派余日章、蒋梦麟二人为国民代表一同前往。国民代表的任务是：（一）监督政府代表的工作，（二）从事宣传工作，以影响美国舆论；并以蒋廷黻、何思源二人为秘书，协助办理各项事务。

虽然参加会议的国家同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中国则尚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会议所能解决的问题极其有限，要废除二十一条条约和收回山东主权又谈何容易？然而，力图扭转国运的民心民意，通过国民外交代表的努力，居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原来华盛顿会议关于二十一条条约，仅以“承认中国保留他日解决此案之权”记录在案了事。至于山东问题，则始终偏袒日方，只作出“由中日直接交涉”的决议。当中日代表直接会谈时，我方希望无条件收回，日方却要由中国出钱赎买。说什么由于日本在巴黎和会向德国索取赔偿中，曾扣除4500万马克作为胶济铁路的代价。换句话说，中国要收回该铁路，必须偿还日本4500万马克。

这显然是敲诈勒索。国民代表事先预料会有此一着，因此在会前曾致电国内民间组织，询问有无筹款的把握，得到肯定回答后就转告政府代表团。通过国内掀起筹款赎路运动，胶济铁路的主权终于回到了我国手中。

在筹款运动中，余日章四处奔走呼号，出了大力。他被推选为“筹赎胶济铁路委员会”主任，亲赴各地演讲华盛顿会议情况，提倡储款赎路。在一年多时间内，足迹遍及河北、山东、江苏等省。余在致各界人士的“公开函”中阐述了华盛顿会议的经过和他本人的感受，第一点就指出“宜自立。不要依人，若不自立而专依人，断未有不失败者。”

四

余日章曾对青年会同工说过，“青年会是教会的辅助机关，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青年会干事，不但以推进青年会事业为己任，且当辅助教会，服务教会。”余自1914年起，就积极参与基督教协进会的活动，1923年被推选为协进会会长，连任到1928年。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怒，各地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并提出要求惩凶，撤退在华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等17项条件。对此，帝国主义先是以武力相威胁，当不能奏效时，又改变手法，提出组织所谓“国际调查团”进行“调查”。跟着，协进会就派人到中外报馆编辑部，要求对“五卅惨案”、“不要妄加判断”。协进会会长余日章和美国传教士罗宾生(E.C.Lobenstine)又用协进会名义致函租界工部局，提出要组织中外人士的“调查委员会”。余后又以青年协会总干事名义致函工部局，说什么“此案发生以来，各方报告，颇不一致”，要求“从速公平彻查”，“俾祛众疑而明真相”云云。余日章还

亲自电告各地青年会说“沪局严重……现正尽力斡旋，彻底调查真相，务使公道得申，双方领袖有接近希望”等等。

其实帝国主义军警枪杀徒手中国人民，铁证如山，是非曲直，非常清楚。帝国主义策动所谓调查，无非是拖延时间，同时又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应等相威胁，使商人的罢市无法坚持下去。上海总商会在6月26日被迫宣布停止罢市。

更有甚者，协进会在7月16日发表有关“五卅惨案”的《致全国基督徒书》中竟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是“怀抱偏狭的国家主义者”，是“自私的、盲目的、与牺牲他国以利自国的爱国主义，为基督徒所坚决反对”，“我们对于最近发生之惨案，岂不应超脱狭义的国家主义与种族偏见吗？我们岂不能以基督徒为先而以国民为后吗？”甚至说，这样做“即使不利于本国，亦不能屈从于国家”。明明是帝国主义军警血腥屠杀中国人民，而以余日章为会长的基督教协进会竟发出这样颠倒黑白，诬蔑爱国同胞，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张目的《致全国基督徒书》，实在令人气忿。

实际上，当时的协进会和青年协会，虽冠有中华二字，由中国人任会长、总干事，但实际权力完全操纵在美英传教机构手中。在中国人民掀起反帝爱国高潮的时候，发表这份《致全国基督徒书》，只是又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就是利用基督教为它们的侵略服务。

五

余日章为促进太平洋国民会议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召开做了不少工作。

第一次太平洋国民会议原为太平洋各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起，本拟讨论青年会问题。后扩大为纯粹的国民外交会议，由太平洋各国在野的政治家、学者和实业界领袖参加，余日章是这个会议

的倡导人之一。他还邀集上海各公团组成“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并担任主任委员。

第一次太平洋国民会议于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美国檀香山召开，但作为会议倡导人的余日章却因忙于对“五卅惨案”的“调查”和斡旋等事而不能出席。这次会议得到各国舆论的好评。主持会议的领袖们受到鼓舞，遂设立经常性机构“太平洋国际学会”，以便继续推进国民外交活动。各国设立分会，并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中国方面由于余日章的竭力倡导，不久就成立了分会，担任分会董事的多是社会名流，如宋庆龄、黎元洪、梁启超、唐绍仪等。

太平洋国民会议第二、三、四次大会分别在美国檀香山、日本西京和中国上海举行。余日章在1927年7月第二次大会上作《近三年中中国与太平洋的关系》演讲，在谈到在华外国驻军问题时说：“各国群指中国没有保护外侨能力，特以‘保护外侨’为名相率派兵来华……但中国人民则以为在中国革命时期，旅华外侨无论有何危险，各国似不能即据以派兵来华，任意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不相信中国是专为外国人经营商业而存在的。总括一句，当此中国人民的爱国心非常激昂，革命运动进行正急的时候，忽有如许外国军队和炮舰驰骤于中国领土内，与中国国内阻挠革命运动的势力相呼应，这不能不说是国际关系上最危险而应重加注意的问题了。”在谈到不平等条约问题时，余说：“中国人民对于别的问题意见或有分歧，惟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则莫不异口同声，绝对团结一致。”这些话都反映了爱国人士的心声。但余对此又抱有幻想，他说：“所欣慰的，各外国政府中，现已觉悟旧有条约已成过去的陈物，不适于现在的情形……表示俟‘中国统一政府成立’将召开条约谈判……”。后来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并没有发善

心，他们岂肯轻易放弃它们从侵略中攫取的权益。

六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了北伐革命成果，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由于余日章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他的才干很快为蒋所赏识。后来余领导的青年会工作和他所从事的国民外交活动，都是同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分不开的。

余日章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1927年为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作证婚人。1929年余日章的长女余庆绶同国民党励志社主任黄仁霖订婚，就是由宋美龄当介绍人，孔祥熙当主席，张之江证婚。由此也可看到余日章同蒋、宋、孔几大家族关系之密切。黄仁霖原系上海青年会干事，因蒋介石要仿效青年会的方式建立军官俱乐部“励志社”，被蒋、宋看中聘为该社上校主任干事。

1929年青年会举行第十一届全国大会，请孔祥熙到会演讲，蒋介石写来励词。余日章说，“1926、27年是青年会最晦寒的时期，但到1928年又重新转入向上的潮流。”这同余得到蒋介石政府的信赖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1931年国民党大搞“训政”。青年协会在3月函告各地青年会，“近者政局救平，国府方锐意于训政，我会对于公民训练自应培加努力。”要各市会在5月份举行“公民训练周”。

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翌年“一二八”又进攻上海。当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等卖国政策。全国人民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

1932年8月，正是蒋介石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期间，余日章却于北平燕京大学举行的青年会第六届全国干事大会以《国难期中之精神挑战》为题发表演讲，竟说：“国难究竟是什么？一种

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年年内战，赤祸的滋扰，去年九一八暴日占我东三省，今春日兵又犯我上海，内争、外侮是人祸。……所谓国难……乃实在人格扫地，宗教破产，教育堕落，道德沦亡。这种可怕的国难，现与我们的精神正在挑战。”把主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国难，说成是由于中国人民人格扫地等原因，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相呼应。

在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余日章的国民外交，就是秉承蒋介石政府的旨意进行的。他曾访问美国、加拿大，会见当时美总统胡佛和加首相金，为蒋政府作宣传。1932年秋，余又去美国，行前专程去汉口谒见蒋介石。余到美后在檀香山、旧金山、西雅图、芝加哥、纽约等地都向各地侨胞演讲，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期间，余将在美接触到的有声望人士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映写信告诉国内友人，大意是：国际联盟无力应付重大国际问题，美国虽同情中国，但除不承认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局势外，不会有进一步行动。余认为“处此情况下，中国应郑重考虑的方针是：（1）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准备抵抗日本进一步的侵略。（2）应凭自己的力量在最短时期内收复失地……（5）政府应力图国内的团结和建设，消弥一切内部冲突。”“……此间人士咸认此时中国与苏联复交是完全对的……我们诚恳地希望中苏的接近……为奠定远东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这封信反映了余在美国同爱国华侨等接触后思想的变化。他的主张，同当时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1933年1月2日日本又出兵侵占山海关，国民党军队未加抵抗即行撤退。余日章得此消息后既愤慨又忧伤。当天晚上，余拟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拍回国内，对局势有所建议，据说为了斟酌词句，煞费苦心，用脑过度，澈夜失眠，

4日晨余日章打电话给美国国务院，求见国务卿史汀生。余

同史汀生谈话约一小时，告别时余右手已不能自由伸举，被立即送往海军医院。据余夫人后来向余探询，余日章同史汀生谈话内容是余告知史，日本曾向美国保证日军不会入侵山海关，今竟食言。余问史美国对此将有何种行动。史说美国同情中国，但决不能为了中国同日本启衅，甚至连经济制裁也谈不到。这就是说，余去美见史汀生可谓一点效果也没有。

余日章在美治疗一段时期后，院方向余夫人暗示，余病已无痊愈希望，劝他早日出院。余乃带病回国疗养。于1933年9月1日回到上海。因长期患病，余于1934年12月辞去青年协会总干事职务。1936年1月22日逝世，终年54岁。

余日章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领袖，著名的国民外交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成就和错误，既有他个人的因素，更同他依靠美英差会、北美协会和蒋介石的支持分不开。

我所认识的江长川会督

孙彦理

一、青少年时代

江长川会督生于 1884 年 12 月 4 日，父亲江裕生出生上海浦东周浦镇，因家贫生活困难，十余岁即过江到上海谋生，起初学习修建烟囱，因技术精良，生意兴隆，不久成为包工头，后开设江裕记营造厂，陆续承建了几座大楼，成为上海早期三大建筑营造厂之一。

江长川 14 岁时入基督教监理公会一所学校读书，该校设在慕尔堂附近，主持人是美国女传教士师洁贞(Clara.E.Steger)。江长川聪明好学，很得师的宠爱，便加以悉心栽培。不久，江长川受洗入教。19 岁时，他立志奉献传道，1905 年入中西书院，1909 年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神学院深造，三年后得神学士学位。在学期间，他在慕尔堂兼任协理传道。神学毕业后，1914 年按立牧职，是监理公会第一个受过高级神学训练的牧师。

二、历任监理公会各堂牧师

江长川从神学院毕业后，在监理公会担任几个大教堂中的主任牧师。1914 年至 1918 年，在上海慕尔堂先任协理，一年后，为主任牧师；1918 年至 1920 年，被派任湖州海岛堂主任牧师；1920 年至 1923 年，出任苏州圣约翰堂主任牧师，1921 年兼任苏州教区教区长；1923 年至 1931 年，担任上海虹口景林堂主任牧师；1931

年至1937年，调回苏州圣约翰堂任主任牧师；1937年至1941年，调任上海慕尔堂主任牧师；1941年春祝圣为卫理公会会督（即主教）。

从这张简单的表上看，他五次调动工作岗位，在四个大教堂内任牧师，分处在三个大中城市中，两度在慕尔堂，两度在圣约翰堂，一次兼任教区长。他才华横溢，工作认真负责，在监理公会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从20年代起，他实际上已是众所瞩目的中国监理公会的最高负责人了。从1918年起至1948年解放前夕，他曾五次代表中国监理公会出席在美国召开的监理公会总议会，他是中国监理公会出席总议会次数最多的人。1938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在印度召开大会，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江长川是中国基督教代表团成员之一。江牧师在国际基督教界有较高的声誉。

江长川讲道，庄严而声音宏亮。他熟悉圣经，知识渊博，口才出众，每次上台讲道，口若悬河，深受信徒爱戴，遗憾的是他只讲不写，没有留下什么讲道集。

1926年江长川任景林堂牧师期间，第三次去美国出席监理公会的总议会。在美期间，美国肯塔基州的亚斯培利学院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他在整个基督教界的声望就更高了。五四运动后，教会内有中国教会自立之议，英美传教士为适应形势需要，建议放弃差会对中国教会的管理权。监理公会走向自立，于1927年成立了中央委员会，推进自立自养方针，江长川被选为主席，也即监理公会最高负责人。同年东吴大学增加华人为校董，江长川又被选为董事会主席；此外他还先后担任基督徒学生布道会主席，中华国内布道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主日学联合会董事，南京金陵神学院董事，上海基督教传道人联合会会长等职。在

当时基督教界内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威望。

在教会以外，江长川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为蒋介石施洗。他在景林堂任职期间，宋家是景林堂的教友。宋子良经常陪伴宋老太太到堂礼拜，宋美龄从美国回来也曾经参加景林堂的唱诗班，宋子文结婚是江长川证婚的。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联姻，宋老太太一心想请江牧师及当时适在上海的艾思华会督（Bishop W. N. Ainsworth）两人证婚。江长川因蒋介石已有妻室而不允，宋老太太无奈，便改请基督教青年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时间是1927年12月1日。婚礼先在宋家举行宗教仪式，请江长川作了祷告，为新人祝福，然后在另一家豪华大饭店举行公开婚礼。

婚礼以后，蒋介石有时也到教堂参加礼拜。江长川于1930年10月23日在宋家为蒋施洗，施洗仪式是秘密举行的，只有蒋宋家属及少数随从在场，但消息不胫而走，当天午夜便有不少中外新闻记者包围江长川的住宅，不久，“江长川牧师为蒋委员长施洗”便成为中外报纸的头条新闻。从此美国政府与蒋政权勾结得更紧，江长川师也以能为蒋介石施洗而自豪。由于他只为蒋施洗，而不为他证婚，一般信徒为此都更加敬重江牧师。

三、被选为会督到北京主持卫理公会教政

1941年春监理公会、美以美会、美普会三个卫斯理宗的分支在上海慕尔堂联合召开大会，联合成为一个教派，取名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会上一致选举江牧师为会督。随即派往北京，领导河北、张家口、山东等地卫理公会的教会。

没有多久，风云突变，珍珠港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当时教会经济主要依靠美国差会，日美开战后，教会经济来源断绝，教会的日常开支及教牧人员的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江长川感到千斤

重担压在一身，无力应付，变得消极沉闷。后来经过多方奔走，幸得几位工商界信徒和朋友的借款，才渡过难关。

经济问题暂时缓和，又遇到政治上的难题，日本军事当局要借用江长川的威望，催迫他出面组织华北基督教团，北京教会的领袖也一再劝导敦促，江长川虽不愿意，经过反复考虑，为了教会的生存，为了同工同道的安全，迫于形势，只得忍辱负重，虚与委蛇。

1945年日军投降，拨开乌云重见天日，江长川如释重负。蒋介石从重庆回到北京，广设华筵，邀请他赴宴，与美军司令分坐在蒋的左右。

四、全国解放以后

1949年初，北京解放了。由于解放前夕，谣言蜂起，江长川对共产党、解放军还不认识，心存疑虑，后来北京市人民政府召集宗教界人士开会阐明政策。江长川还多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英明能干，平易近人，给他留下很深印象。江长川对他非常钦佩，恐共之心，逐渐消除。

1949年秋，新中国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基督教界有五位爱国民主人士被邀参加，使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解放后江长川第一次公开表明他的心态，他用书面对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位基督教代表提出五点意见：(1)要求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宣传自由；(2)决心以人民立场，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以教会的人力、物力配合政府建设新中国；(3)决不受任何势力利用，也不利用任何势力，来做违反人民幸福的工作；(4)决心努力合作，促成我们教会的自立、自养和自传的早日实现；(5)决心以正义、公道、博爱、平等，和平和敬神爱人的精神，服务人民。

1950年春，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到北京谒见周

总理,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帮助解决各地教会所遭遇的困难,周总理与他们作了三次长谈,参加谈话的除了访问团成员外,还有江长川等京津等地的教会领袖十余人。江长川感到中国基督教应有自决精神。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他完全赞成,所以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时,他也是40位发起人之一。但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一面,他是有保留的,在发表这篇宣言时,他在《天风》上发表的书面谈话,只提到要有民族自决的精神,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国情、民情、思想制度的中国化教会,要团结信心,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智力来协助政府建设新中国。对文件的核心: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中国教会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没有表态。对于教会的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差会的控制与经济津贴,江长川是拥护的,但使他受到极大震动的是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罪行。他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但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控诉运动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后来,他也投入了控诉运动。

控诉运动以后,江长川担当起卫理公会全国十个年议会的教政工作,到三自革新运动两周年之际,他进一步认识到三自的重大意义。中国基督教只有独立自办,摆脱西方差会的控制,走三自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1951年起,为了工作需要,他从北京迁居上海,领导起卫理公会建设教会的工作。到上海定居后,他在精神上得到鼓励,思想开朗,工作也上了劲。1954年7月8日,三自革新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江长川被选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副主席之一。

在1956年3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吴耀宗先生提出了中国基督教的三大见证和

十大任务。江长川感受很深。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的认识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说：“在解放前，我享有会督的地位，但是教会的经济、人事工作、方针都是被美国差会所控制，我对教会工作一点点都不能作主。三自运动后，已经完全脱离了差会的控制，现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了，我们一定要以主人翁的态度，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

在那几年中，他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在三自运动中又担任了自传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政治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党和政府支持他的工作。他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他积极负起整顿教会的责任，他领导改组了卫理公会中央议会执行部，先后召开了华东年议会第八届、第九届年议会，解决了一些拖延已久的难题，又到北京主持了华北年议会第十三届年议会，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同时他还继续酝酿整顿其他几个年议会的计划。

1957年底江参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扩大)会议，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触动很大，他从心底里讲真心话：“我年纪虽大，但我决不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而影响自己的进步……过去我对党的领导虽然是拥护，但心里总还有些顾虑，我想：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信神的，我顾虑党难道真的不会干涉信仰么！今天事实已经证明，我们顾虑是不必要的，多余的，也更是错误的。八年来的经验和这次大会的辩证，使我明辨了是非，更进一步认识到党的领导，党从来也没有干涉我们的信仰，因此我尽可放心大胆地全心全意的信赖党，拥护党的领导。”这肺腑之言，早几年是不可能出自他口的。

1958年8月初江长川感冒不适，数日后进医院检查，确诊为严重肺炎，经悉心诊治终不见效，于1958年8月23日蒙召归天，终年74岁。

慕尔堂史略

彭 圣 儻

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48年开始，美国南方的卫斯理教派首先派人来上海传道、行医，办学。1852年派来耿惠廉(W·G·E·Cunningham)，接着又陆续派来兰柏(J·W·Lambeth)、雷大卫、唐雅各三人。1860年又派来林乐知(young J·Allen)、华美德二人。兰柏、林乐知二人来华后，除在上海郑家木桥建立教堂、造住宅、办学校、办美华书坊外，还向南翔、嘉定、苏州扩大。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经济断绝，1870年左右，以上所说的几个传教士除兰柏、林乐知二人外，其他都先后回国。兰柏充当了美国驻上海副领事，林乐知充当上海制造局翻译和上海广方言馆教习。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兰柏、林乐知才回教会专任教会职。美卫理公会又增派传教士，扩大传教范围。

至1885年，美监理公会在华教会已初具规模。当时在华的西教士已有林乐知等七、八人，华人中受长老、执事职的已有曹子实等九人。上海、南翔、苏州三个连环教区，信徒有146人，讲堂7所。所办的学堂有中西书院及博习书院及小学7所。于是在当年11月17日在上海昆山路林乐知的住宅举行了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年议会。正式定名为“中华监理公会”。

当时，监理公会虽在城内虹桥头有化善堂，西新桥有三一堂，但认为，上海日益繁荣，教会一定有发展前途，决定在中区造一较大的礼堂。所以于1887年，由李德牧师(C·F·Reid)在现云南路

汉口路口建堂，名“中区监理会堂”。后来，美国有一资本家，为了纪念他死去的女儿。捐了一笔钱给监理公会，以他的姓氏慕尔(Moore)为名，改称慕尔堂。慕尔堂从一开始就是监理公会的重点堂。

1891年，中西女塾(监理公会所办的第一所贵族化的女中)就造在慕尔堂的左侧。次年，兰柏死于日本神户，监理公会为纪念其在华传道32年，为之立碑。置于慕尔堂，可见其对慕尔堂之重视。1898年，监理公会举行“五十周禧年”庆祝大会，就在慕尔堂举行。

历届的上海教区长多以慕尔堂为驻在堂。1917年安迪生派来慕尔堂后，把慕尔堂办成社交会堂，活动范围扩大。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慕尔堂的教友总数已达1200余人，社交活动也日益增多，原有堂址已不敷使用，创建新堂之呼声很高。于是，由慕尔堂的信徒与差会方面合组成建堂委员会，筹划建堂。

1926年在众信徒一致的努力下，募得50000元的巨款。大大超过了原订的数目。于是，新建堂就进入了具体规划阶段。可是，存款的银行突然倒闭，不独50000元之数付之东流。连建堂计划也几乎被打破。后来，据说是安迪生出面交涉，一面重新筹划募捐，始得恢复原数。差会也把三一堂产业卖去，得款17万元(两)，有了钱，就等正式施工了。

那时，香港有人来上海，计划在南京路大公司附近造一座大旅馆，他们看中了中西女塾的原址(即现在慕尔堂所在地)，计划租地造屋。以25年为期，到期把全部产业、房屋一并归还教会。当时中西女塾已迁至江苏路，改名中西女中，学生人数增加，为建总课堂及大礼堂等，正急需巨款。中西女校和香港商人商议。把慕尔堂旧址给香港商人建旅馆。而把中西女塾旧址给慕尔堂建新堂，新堂大门面向西藏路，跑马厅。三方协商同意，由当时上海教区长

雷约翰在合同上签字。

1929年慕尔堂新堂开始建造，至1931年落成。这座座落在西藏中路汉口路的慕尔堂，包括大堂及钟楼，四层楼附屋，后进附屋及女子宿舍，建筑费约250000两。新堂被当时称为“建筑雄伟，居全国各堂之首”。监理公会第46届年议会就是在这一新落成的慕尔堂举行的。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慕尔堂收容灾民1000余人，为沪上各教堂之首。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监理公会有些“中央机构”就迁设于慕尔堂。1941年，在华的三个美国卫斯理教派（美以美会、监理公会、美晋会）合并，在慕尔堂召开第一届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合并后的中文名字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1945年9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慕尔堂从日军占领下收复，仍是一座占重要地位的教堂。全市性的培灵会、大布道会、圣诞崇拜、复活节礼拜、传道人联谊会年会等等，也借慕尔堂举行。

慕尔堂初建时，仅有宗教活动。1918年前后，慕尔堂办成了社交堂、办起了学校、社会福利等事业。1931年，新堂建立后，有了更多的活动场所，慕尔堂的事工也扩大了，社会服务工作，自婴儿而至于老年，应有尽有。当时有“亚东最大的社交堂”之称。

慕尔堂设有传道部、教育部、小学部、社会服务部、体育部等，历年来都设有主任牧师。身为协理兼社交主任的安迪生是实际的总负责人。自1920年至1950年的30年中，主教收师虽五易其人，而协理兼社交主任却没有更动。

传道部即宗教事工，这是慕尔堂的主要事工。它由主任牧师及数位协理牧师负责。另有女传道数人协助。除礼拜日的礼拜外，还有祷告会、查经会、家庭礼拜、家庭探访、布道会、培灵会等。

为了配合和推动这些工作，下面又设有成年组、壮年组、青年组、少年儿童组等。

慕尔堂办成社交堂后，开设女校、夜校、后又办小学及幼稚园。女校分为女班、少女班、专修科及缝纫班。据说当时四马路上许多妓院的妓女曾来女校就读。

慕尔堂从抗战时正式开办小学，日军占领慕尔堂时，慕尔堂搬到合肥路，小学也搬去。抗战胜利后，慕尔堂恢复，合肥路的小学称为慕尔堂第二小学，而西藏路本堂内的小学为第一小学，已办成了男女兼收的完全小学。幼儿园原是附属于小学的，胜利后，也成为独立的幼儿园。

社会服务部的工作范围较广。主要是救济工作。“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慕尔堂曾收留受灾同胞千余人。附近各牧境的牧师亦多有避难于此。对贫困者救济米饭。事后又发起“兵灾济助捐”，资助信徒中受难的家庭。

1937年“八一三”，战火延及江浙淞沪，那时慕尔堂也曾收留许多难民（多为信徒），也发放物资救济。后组织“自救”擦皮鞋组、理发组勃然兴起。

抗战胜利后，美国教会援华会（后来改名为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会），总部设在慕尔堂。这个救济机构将大批物资分到全国各教会团体——包括教堂、医院、学校及孤儿院。慕尔堂是近水楼台。当时也接受一批物资，用以救济。

慕尔堂办有医务室、有护士上门探访，为小孩进行健康检查，为小病小痛施诊发药，还开放女子浴室。

慕尔堂还创办女宿舍。供家庭在外地的单身女子（信徒）借宿，收取较廉之租金，可以长住。当时有几十人在此住宿，慕尔堂负管理的责任。其他还有阅览室、食堂、男浴室。

体育部设有健身房、篮球场、请体育教师指导，供人展开体育活动。

1941年12月8日，慕尔堂被日军所占，成为宪兵司令部，勒令所有的人搬出。因此许多工作都无法进行。礼拜天礼拜也是借八仙桥青年会。妇女服务会、卫斯理团契，必要时也借青年会。其他只能作探望，家庭礼拜。

1945年9月16日，教会收回慕尔堂。大堂曾为日军做马厩，座椅大多破坏，后来七拼八凑才恢复礼拜。至1948年，从美国定做了一套座椅，使用迄今。慕尔堂收回后，东吴大学一时无校舍，曾借慕尔堂教室上课。至1948年，慕尔堂各方面工作始行恢复。

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史略

许道武

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初创时名为虹口长老会堂，创于1888年秋，为前上海长老宗三堂之一（按上海长老宗三堂为沪南清心堂、沪北鸿德堂及闸北堂。）

美国北长老会差会于1860年派传教士范约翰(John Farnham 1820—1917)来沪传道。他先在南市创办女校（即后来的清心女中，现在的第八中学）。后来差会又派他管理美华印书馆事务。职工每天有早祷会，每星期也有礼拜，由范约翰等主持。附近信徒及职工家属也来参加聚会，形成教会。1889年，区会派范约翰主理传道事务，并派沪北堂陈藏谷、沪南堂吴子翔二位长老协助工作，租赁虹口中虹桥元芳路（今商丘路）源芳里两幢一厢房为聚会所。当时信徒多为美华印书馆职工，多数住在附近，子女很多。于是在堂中附设小学校，聘请陈藏谷、吴子翔、朱石亭、鲍感恩等的夫人担任小学教员。当时教会和小学校的一切经费都是由差会供应。1890年，成立堂会，为虹口长老会堂，由范约翰为署理牧师，立陈藏谷、吴子翔、翁光照为长老；朱石亭、章旌云、李良智为执事。此后，信徒日增，堂务日繁，堂所不敷应用。乃于1892年迁至汉璧理路（今汉阳路）永祥里。租用楼房两幢，租金全由差会所出。

1894年，范约翰牧师例假回国。聘请杭州区会属下新市堂牧师俞国帙为本堂正式牧师（即闸北堂第一任牧师）。并请鲍哲泰为长老，徐维绘为执事。俞国帙牧师，字宗周，宁波人，毕业于杭州育

英女塾(之江大学前身),后即奉献作主圣工。初在杭州宁波等处传道,后任湖州新市牧师,与陈藏谷长老为同学、同级、同年、同乡。

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俞牧师首先提出反对将保教条款列入不平等条约,认为这是一切教案的祸根。他要求取消不平等的保教条款,挽回教权,提倡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不受外国差会的管辖。闸北堂当时虽初具规模,但经济并不充裕,教友每月奉献捐款约60余元,不足付各项费用及牧师的薪金,尚须依赖差会的补助,因俞牧师主张教会自立,不受差会管辖,差会及传教士对他极为不满,据说,每当俞牧师到范约翰处领取补助款时经常受到范约翰的讥讽,后来差会更勒减补助费,教会开支顿形支绌。俞牧师和众信徒对自立、自养办教会的意念更为坚决,大家都慷慨捐助。

后来某信徒所办的船厂,捐银500两给闸北堂。于是俞牧师购地建堂,力求教会的自立自养。1903年,他在海宁路、克能海路(今康乐路)转角,购地6分,价银3300两,于1904年用银3700两建造三上三下楼房,房屋分作两半,一半为礼拜堂与住宅,附设立志小学校;另一半沿克能海路建市房数间,租给张日升糟坊,年租600元,房租收入一部分作为堂中开支,其余款项以偿还建堂的借款,当时朱石亭和翁光照因年老告退,信徒推举徐维绘、鲍咸恩为长老,翁学雷、韩明杰为执事。

1914年,因信徒增加,堂小座位容纳不下。因商务印书馆文昌阁印刷厂迁到闸北宝山路新建印刷厂,厂中很多本堂信徒都住在附近,于是由包文德等建议,出售海宁路礼拜堂的房屋及地基,将所得之款1.1万两在该厂相近的宝通路购地2亩3分(计价银4500两),建筑礼拜堂一座,牧师住宅三幢。新屋于1916年正式落成,此即为闸北堂自立长老会。当时堂中的职员,有牧师俞国楨,

长老陈藏谷、鲍哲泰、徐维绘、鲍咸恩，执事翁学雷、郁厚坤、包文德、许新江、韩明杰，信徒 138 人，俞牧师担任本堂牧职计 30 年。当时已有唱诗班。

俞国桢牧师深知中国教会必须脱离外国差会的管辖，走自立、自养、自传的道路，他不但谋求闸北堂自立自养，并于 1906 年倡议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得到爱国信徒的广泛响应，1910 年，俞牧师受各地信徒之托，向清廷呈奏折、请求挽回教权、也就是取消不平等的保教条款。1920 年，自立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总会，俞牧师被举为终身自立会全国总会会长，俞牧师当时仍担任闸北堂牧职，并主张闸北堂脱离长老会差会的管辖，加入自立会，另一派以徐维绘、徐亦庄等为首，主张仍保持与差会关系，最后于 1924 年，俞牧师被迫辞职，但仍住在堂内，直到 1932 年离去，与俞牧师同时辞职者有陈藏谷、鲍哲泰、鲍咸恩等长老，当时本堂信徒共 168 人。1934 年，俞牧师以 80 岁高龄蒙召归天，他生前于传道之余，亦热心于地方公益，曾参与发起闸北水电公司、闸北保卫团和救火会等。

1924 年，俞国桢等辞职后，闸北自立长老会堂即改为闸北长老会堂。堂会进行改组，聘请杭州区会属下的东阳堂会韦绍曾牧师为本堂牧师，选举曹子馨、郁厚坤、谢宾来、陈露衣、郁厚培、毛文吟等为长老，并添举邵长庚、胡鹤鸣、陈兆荣、郁厚坤夫人等为执事，此外又选举徐亦庄、张朗素、张锡三、孔锡鹏、谭毅公、史麟芳等为董事，以辅助堂务及筹划经费，遇重要事项，召开长老执事董事联席会议。

韦绍曾牧师，浙江东阳人，曾毕业于杭州育英书院，在校求学时经同学曾绍贤引导信教，后至南京金陵神学院深造，毕业后，派在本乡东阳教会工作，来闸北堂工作时，年约 38 岁。韦牧师参加

闸北堂工作后，堂内各项工作有所发展，主日上午礼拜外，有儿童主日学，下午有勉励会，星期一晚有祈祷会，星期三晚有查经班，星期四晚有布道会，星期五晚有夜礼拜；此外在各信徒家中还有轮流聚会，还有唱诗班、弦乐队等组织，1925年起，又开办小学一所，以礼拜堂前面的门房间及书报室拆通，充作校舍。

1926年，又举鲍咸绥、胡根德为执事。1927年金有方及陈金鏞为本堂协理牧师。

1927年，北伐革命军到沪，商务印书馆工人组织纠察队，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本堂信徒徐同康、陈安芳等亦参加工人纠察队的救护队工作。战斗即在闸北堂附近宝山路上展开，陈安芳不幸于救护工作中被敌人狙击手击中要害，英勇牺牲，时年仅23岁。

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北长老会为中华基督教会成员之一。从此闸北长老会堂即改为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闸北首当其冲，本堂亦遭日本侵略者焚毁，信徒多受灾害，家宅被毁者80余家，信徒当时主日礼拜与鸿德堂合假四川中路青年会礼堂举行。数月后，鸿德堂迁回原处，本堂即与鸿德堂合并礼拜。鸿德堂因蒋时叙牧师于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杀害，成为有堂无牧，本堂则有牧而无堂，因此区会派韦绍曾牧师任鸿德堂署理牧师，二堂合作有四年之久。各项事工继续进行，并添举周文浩与周盛清为执事。“一二八”事变后，筹划在闸北原地重建教堂，大家分头劝募，筹得巨款，存于明华银行。不幸，明华银行不久倒闭，巨款顿失。本堂虽再受巨大损失，而教徒们力谋重建。不久即募得捐款2万余元，于1936年春，开始建造，几个月后，礼拜堂和牧师住宅同时落成。8月16日起先开始礼拜，10月18日举行落成典礼。

本堂《堂务周刊》于1937年2月14日诞生，由韦绍曾及周盛清担任编辑及印行工作。青年团契亦于该日举行成立大会。

1937年4月，本堂因工作需要，添举孔锡鹏、周盛清、郁厚坤夫人、鲍哲泰夫人为长老，并举陈升海、杨学森、曹裕敏、王敏康、谢芸庭、徐永生为执事。

新堂只使用一年，又遭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战祸。本堂正处于火线之内，新厦又惨遭浩劫。

在抗战时期，本堂借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550号协进中学的礼堂作为主日上午礼拜之用，于是年8月15日开始礼拜。足有9年之久，同时成立儿童主日学，并设办事处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728号修德小学。1937年秋，因工作需要，聘请赵华苏为堂传道，1940年4月，添举王心康、沈炳章为执事，并成立执事部，举王心康为主席，徐永生为书记、沈炳章为司库，曹裕敏、王敏康为会公。

抗战期间，本堂各项工作仍照常进行。1940年起，成立进德会。这是成年信徒团契，每月聚会一次，籍以彼此交流宗教经验及协助教会事工。1940年1月6日，圣歌团为筹募基金，联合弦乐团假山东路天安堂举行音乐会，同年，本堂接受南翔妇女学道馆，作为本堂南翔分堂。1942年，江南区会托本堂代为负责川沙教会，于是又成立了南翔分堂委员会及川沙分堂委员会，分别负责二处教会的事工。

抗战期间，闸北堂被毁，清心及鸿德两堂虽未毁，但地处南市与虹口，均为日军控制地区，聚会等有所不便。于是由本堂发起，三堂联合筹建中心会堂。于1940年7月26日召开三堂长老执事及信徒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中心会堂执行委员会，进行筹募款项及购地事宜。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计划无形停顿。抗战胜利后，解放

战争随即发生，差会以时间未定不肯助以巨资，于是中心会堂遂成泡影。

为推进教会事工及筹建中心会堂，本堂于1941年8月10日立王心康、曹裕敏为长老；曹子卿夫人、凌惠黎、陈升潮、张耕生、朱德四等五人为执事；改组执事部，举徐永生为主席，凌惠黎为书记，张耕生为会计，并于10月19日，假慕尔堂（即今之沐恩堂）召开本堂事工人员会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全国欢腾，本堂信徒亦甚振奋。9月1日，青年团契曾假慕尔堂小礼堂举行庆祝胜利联欢会，演出大型话剧及音乐等节目。同年12月，本堂妇女团契成立；翌年1月，本堂壮年男女信徒组织仁社；皆以促进基督化生活，协助教会事工为宗旨。

本堂二次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主日聚会于1946年7月7日起，从协进中学迁到新闻路内地会，同时，积极筹划建堂事宜。

1947年4月14日特别堂会上决议：在宝通路原址重建新堂，并成立建堂委员会，下设灵修、建筑、经济、义卖等四组，分头筹募资金进行工作。并向差会申请资助，得美金壹万元。1947年6月8日举行破土典礼，8月10日举行奠基，12月初即建成完工，12月25日举行感恩礼拜及庆祝圣诞，28日在新堂举行第一次礼拜。当时，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建堂费用共达时币12亿余元。

1948年3月14日为本堂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并举行新堂奉献礼拜。同时又举朱复日、凌惠黎、陈开潮等为长老；徐同康、洪继舜、周金卿、谷保罗、郁约瑟、韦郁琳、郑世纲为执事。全国总会、长老会、差会及中华基督教会各堂均有代表参加。

1950年12月，中华基督教会上海区会在晋益社召开常会，派许道武为闸北堂助理牧师。

解放后，闸北堂改长执联席会议为堂务会议，除原教牧、长老、执事参加外，邀请一些信徒及工友参加，如沈德溶、毛震耀、张乐昌、冯国华等。

闸北堂于解放前后曾搞了一些服务救济活动。抗战胜利后，向信徒分发救济总署的剩余物资、衣服等。解放前夕，闸北堂附近有许多苏北等地逃难来的难民，陈升潮曾拿出一笔款项，嘱陈天愚等买了大批棉衣等，向这些难民分发。孔锡鹏医师于解放初，曾在闸北堂免费施诊，每星期有二三个上午为信徒及非信徒治病。

闸北堂自1937年2月14日起，每逢星期日印发堂务周刊。内容有证道短文、教会及信徒消息、聚会通知、捐款征信等。出版26期，后因“八一三”战事而停刊，至1938年复活节复刊。1942年1月起，改为月刊。抗战胜利后，由徐同康负担印刷费用，并每年合订成册。解放初，曾一度恢复为周刊，至1951年停止出版。1948年，为纪念闸北堂六十周年及新堂落成曾编印《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六十周年新堂落成纪念特刊》一册。内容有历任传道人、长老、执事及堂所、各团体的照片、本堂史略、工作人员组织、事工、三次建堂经历、工作人员传、大事记、论述、欠证、工作报告、本堂掌故、信徒名录等。

抗战胜利后，闸北堂青年团契与圣歌团组织一个联合编辑委员会，出版一份刊物，定名《闸青》。经费由信徒捐助，免费分发给堂中青年信徒。内容有证道短文、随笔、通讯、青年团契及圣歌团活动消息等。证道文章多数为转载其他教会刊物或翻译外国书刊的。解放后(1950年)《闸青》又复刊，是附于堂务月刊后面，每期一面，直至堂务月刊停刊。

民国初年，闸北堂长老谢宾来等以本会归天信徒无处安葬，乃筹划集资，先后购得闸北八字桥水电路土地10亩，建立公墓。10

余年后,公墓已将葬满,又会同清心、鸿德二堂负责人合力再购墓北之地 17 亩,辟为新公墓。并成立中华基督教会三堂公墓委员会,初由谢宾来任干事,负责事务工作,后由周盛清为继任,1945 年后,则由许道武、曹光祖等负责。1956 年,上海市少年体育学校征用新公墓,墓葬迁至江湾公墓,寿穴每穴发还 30 元穴费。1958 年上海耐火材料厂扩建,征用老公墓土地,墓葬迁至杨行公墓,于是公墓事宜宣告结束。

怀恩堂简史

戚庆才

怀恩堂从开始到现在，已有 73 年的历史。在这期间，随着世事变化，怀恩堂也有不少的变化。单就地址来说，已迁移过 5 次。每次迁移，就等于开了一个新堂。现在，我就按迁移的次数，把 5 处怀恩堂的事迹述说如下：

第一处怀恩堂

远在 1910 年，怀恩堂诞生在四川北路底溧阳路（前名狄思威路）口的对面。1904 年，美南浸信会宣教士乐灵生牧师来上海，在溧阳路买了 5 亩多地，用以建筑学校校舍，开办明强高初两级小学校。乐灵生自任校长，方叔康任副校长。当时出入在后面农村的小路上，很不方便，因四川北路尚未延伸至该处。1910 年，乐灵生把明强学校的校舍扩建，改名为明强中学。同时，有南美浸信会宣教士万应远（R. J. Bryan）牧师，在明强中学外边又买了 18 亩多地直通到四川北路，在该址上建筑了新式三层楼校舍和两座西教士住宅，把晏摩氏女中迁入，沿着四川北路兴建了这第一处怀恩堂。

第一处怀恩堂落成以后，由乐灵生担任牧师，并兼任两校校长，约十余年。当时还有冯剑光先生担任传道职务，于 7 年后被按立为副牧师。过了两年，冯剑光辞职。乐灵生因冯剑光辞职，便辞去校长职务，专职教会工作。以后又请毛复初先生为传道。但一

年以后，乐灵生也辞去牧师职务，去另就上海公理会办的教务杂志的编辑主任了。当时，怀恩堂又另行按立方叔康先生为牧师。

正在那时，由美南浸信差会出面，把第一处怀恩堂、明强中学、晏摩氏女中，以及两座宣教士住宅的全部房地产售出。得到大批款项后，在闸北北宝兴路买了大批地皮，建筑了许多楼房，将明强与晏摩氏两中学迁入。又建筑了一座礼拜堂，名为怀施堂。该地发展成为浸会庄。

美南浸信差会发展浸会庄以后，置怀恩堂于不顾，引起了怀恩堂教友们的不满，曾多次与差会交涉和力争。结果，差会不得不从出卖怀恩堂的售款中拿出两万元作为赔偿费，交给怀恩堂负责的执事郭梅生（上海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张嘉惠（大律师）、金美令、汤宝琳等，在市区又重建一处怀恩堂。

第二处怀恩堂

怀恩堂执事们就以美南浸信差会的赔款，买了闸北东宝兴路（四川北路口）271号处的两亩多地及其上的房屋，又加上信徒们的捐献，建筑了一座新堂。于是第二处怀恩堂于1924年建成了。

开堂以后，由方叔康担任牧师，又开办了怀恩中小学及幼稚园等事业，由方叔康兼任校长。一年以后，方叔康辞去牧职，专任校长之职，改为义务牧师。毛复初本为传道，也于1926年辞职，调往浸会庄，到明强中学任教去了。因此，怀恩堂约有八、九年之久，既无正式牧师，又无正式男传道人，只有一位未经神学训练、又无圣经知识的年老女传道。怀恩堂荒凉的情况，可想而知了。

我在浸会书局工作的时候，曾常去怀恩堂礼拜，见到参加礼拜的人数很少，差不多完全是怀恩中小学的学生。1935年，我从华北浸会神学院回来以后，怀恩堂约我担任主日学的工作。同时也

请我主领过两次礼拜，1936年1月我被按立为该堂牧师。当时我年28岁。前任义务牧师方叔康交给我的一本教友名册，上写“男宝贝”（指教友）8人，“女宝贝”36人。每主日来礼拜的人数平均只30人左右，但礼拜堂的容量，可坐400余人。等到学校放了假，教会也好似放了假，堂内空空如也。据说怀恩堂在四川北路底的时候，教友很多。为什么会搞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教会多年来没有正式教牧人员；另一方面是，因美南浸信差会只顾发财致富，看到电车越界筑路通到四川北路底，使那里地价猛涨，就把低价买进的土，以高价卖出去大力发展浸会庄，置怀恩堂于不顾，使教友很长时间没有地方礼拜，以致教友分散了。

怀恩堂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驻堂的美国宣教士。当时上海浸信会各堂都有美南浸信差会派遣的驻堂宣教士，宣教士驻在那个堂，差会的经济津贴也发到那里。怀恩堂既无驻堂的宣教士，差会自然不发给经济津贴，因此，他们对怀恩堂的会务，也不加过问。至于怀恩堂所需要的经费，大部分是靠学校收入的学费。

怀恩堂的经费既靠学校，权柄也就落在学校手里。学校使用教会的一切房屋，教会实际上成为学校的附属品。教会要开什么会，需要地方，不得学校的许可，不能随便动用，这也是当时各浸信会的一般情况。中国各地的浸信教会差不多都办有学校，驻堂的宣教士掌握学校，也就控制了教会。这是美国差会控制中国教会的另一种手法。那时我在怀恩堂作牧师，连一间小小的牧师办公室都没有。执事会决定牧师住宅，楼上作我的卧室，楼下一间（约八九个平方米）作我吃饭的地方，就是这么一小间也被学校占用，美其名为借用，作为教员吃饭之处，使我出入都不方便，每天只能绕到后门上楼。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力发展教会事工，只能专心等候神的安排和带领。

第三处 怀恩堂

1937年八一三日寇发动侵略上海的前一天，怀恩学校和怀恩堂一同搬到当时的英租界黄家沙花园路32号。在那里参加礼拜的人数日渐增多，后来甚至连楼梯上都坐满了。我们迫切需要较大的会场。当时，我们的经济十分困难，曾多次要求美南浸信会差会支援我们，帮助我们买房或租房，后来，看中了一处房子，售价1.5万元老法币。差会同意帮助，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把闸北东宝兴路271号怀恩堂的房屋交还给差会。这个条件很不合理，我们拒绝了差会的条件，决定自力更生，租房开堂，不再向差会要求什么。

第四处 怀恩堂

到1938年，怀恩堂的组织健全起来，有了较强的执事会，也有了较多的教友，奉献也随之增加，遂于4月间租到了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平安大戏院里边前安凯第商场的二楼。

怀恩堂自迁到该处以后，脱离了怀恩学校的束缚，自由发展会务，参加礼拜的人数达700余人。大房东是一个非基督徒，但对我们很好。我们堂内容量不够，许多信徒坐在凉台上，落雨刮风都不方便，他就给我们把堂内的面积扩大到外边的凉台。

第五处 怀恩堂

后来，我们买了陕西北路375号的那块土地和其上的房屋。美南浸信会差会看到怀恩堂日益发展，自然想把怀恩堂拉入到他们的范围里，因此，买这块土地时，他们拿出了1.8万美元。

基地买到后，我们就筹备建造1000人左右的大礼拜堂。先找

工程师打了样，再找营造厂估价。建堂需要当时通用的老法币 15 万元(不包括二层楼，二层楼是 1947 年加建的)。我们与森昶泰营造厂签了合同，言明在基地上的一座大楼作价 4 万元，归森昶泰，余款每月付 1 万元。开工时，差会只帮助我们 5000 元美钞，其余款项全由怀恩堂负责自筹。我们做了一个建堂奉献箱，写上“甘心乐意奉献”。每月都按时照数交给森昶泰营造厂 1 万元，从未拖欠过。新堂于 1940 年开工，到 1942 年落成。过了 5 年(1947 年 8 月)开始加建二楼，到 1948 年春完成。

怀恩堂自迁入陕西北路 375 号新堂以后，礼拜人数更加增多，会务发达，经济也丰裕起来，成了一个大教堂。

1947 年秋，怀恩堂与中华浸会神学院合作，开办了怀恩业余神学院，课程大体与神学院相同。解放后，中华浸会神学院于 1952 年并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怀恩业余神学院由怀恩堂单独负责办理，直到 1955 年秋并入中国灵修神学院。

怀恩堂于 1958 年并入静安区联合礼拜。到 1966 年 8 月 23 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红卫兵破坏。经过 14 年于 1980 年秋收回。经过数月的修理，焕然一新，于 1980 年 12 月 28 日开始恢复礼拜。现在，每个星期有三次礼拜，共有 5600 余名左右信徒参加。来堂参观的外宾都说：“我们国外的礼拜堂，没有这样兴旺，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这一切说明了我们的教会走三自爱国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加强团结，互相尊重信仰，以彼此相爱的精神，把我们的教会办得更好，将来写出更光辉的历史。

上海国际礼拜堂今昔

彭 圣 儒

在上海西区，衡山路和乌鲁木齐南路拐角上，有一座墙上布满常青藤、银灰色屋顶高耸的建筑物，她就是闻名中外的基督教国际礼拜堂，英文名字是 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

这所礼拜堂是 20 年代初由当时在沪的外侨兴建的，一向是一所不分教派的基督教礼拜堂。她庄严的崇拜和优美的圣乐，吸引着众多的信徒，许多中外牧师都曾在这里主持布道。

早在 1917 年，在上海的一些美国人，出于过宗教生活的渴望，在东湖路一对美国夫妇家中唱诗礼拜。到 1920 年，前来聚会的人增加到数百人，其中主要是在沪外侨，也有少数懂英语的中国教徒，遂萌发于贝当路 53 号（即现在的衡山路 53 号）建堂之意，1923 年发起建堂募捐，购买了原属美童公学的十多亩土地，次年动工，建造起大堂主体及两侧的一些房屋。由于教徒来自中外各教派，于是教堂取名为 Community Church，取义于“协和万邦”，后改称为国际礼拜堂，1925 年 1 月 1 日，在教堂尚未全部竣工的情况下，举行了第一次礼拜。当时堂友约有 500 人左右。该堂规定教友有三原则：一、信仰基督教；二、具有他堂的推荐信；三、保证联合一体，不分宗派。

礼拜堂第一任牧师是美国匹兹堡卫理公会费礼门 (Luther Freeman)，以后几位也都是美国人。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部份外籍堂友被日军关进集中营，此时始有中国牧师布道。当时

的中国牧师顾子仁、丁光训，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干事，所以这一时期前来做礼拜的，不少是青年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牧师与外侨重又回来。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曾借此堂举行用中文讲道的“学生礼拜”，在解放前的黑暗时期，“学生礼拜”曾掩护过一批进步青年免遭厄运。

解放初中国基督教内掀起轰轰烈烈的“三自”爱国运动，国际堂的广大中国信徒拥护“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了他们的控制，所有堂务均有中国信徒独立自办，逐渐改变了原来的“洋教”面孔。通过这一爱国运动，不少虔诚的基督教徒，爱国爱教、团结一致，以基督精神自勉，力求为社会做出或大或小的贡献。

国际礼拜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现称堂务委员会。解放前，充任理事长的全系外国人。50年代初，第一任中国代理理事长是法学博士李中道，继任理事长为著名医学博士、外科专家沈克非，还有欧阳旭明医生和徐继和医生。礼拜堂正式用中文讲道也是1951年实行“三自”以后开始的，过去无论程序讲道、宣传卡、布告等，一律使用英文。

妇女会是该堂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他们广泛联系群众，尤其是妇女信徒，平时活动也多。还在外事接待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自”以后，该堂的社会服务工作搞得蓬蓬勃勃，如举办爱国业余学校，应各界需要开办“托福班”，访问福利院，成立医务室，为宋庆龄基金会捐募基金。随着社会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该堂也十分重视老年教徒的工作。“老年之家”，办得有声有色，时常举办讲座、书法、棋类活动，还定期举行茶叙，为老年伉俪举行金婚、银婚活动等，给许多老年信徒以温暖。

该堂教友中侨眷、侨属不少，有港、澳、台关系的人更多。该堂

对“三胞”进行家庭访问，联系感情，宣传侨务政策，鼓励他们的海外亲友，回国观光、探亲、投资。每有教徒出国或探亲访问归来，该堂常与徐汇区三自爱国会举办欢送、欢迎会，无形之中密切了关系，加强了感情。

近年来，教徒中青年人大幅度增加，为了加强对他们的带领，该堂组织青年聚会、讲座、青年春令会、夏令会、节日联欢、旅游、圣乐欣赏等，这些工作搞得热气腾腾。青年们对音乐——圣乐有浓厚的兴趣，有的青年经培训，参加了该堂的唱诗班。88年开始，每周举行青年圣诗咏唱会，89年起恢复试办儿童主日学，现有4岁至12岁儿童60余人，每周日上午学唱圣诗，讲圣经故事。旨在通过“主日学”，培育儿童友爱、诚实、勤劳动、尊师长、讲礼貌、敬父母等良好品德。

该堂还定期举办各种讲座、如圣经知识、教会历史、基督徒婚姻观、天文科学知识，还有各种类型的报告会：如有关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还请先进工作者前来向教徒作先进事迹报告等。

传布悠美的圣乐及古典音乐、是国际礼拜堂的一大传统，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停止。这一促进精神文明的努力，显然已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圣乐团除星期日礼拜中献唱外，每逢圣诞节、复活节，还举行隆重的音乐崇拜，由爱好音乐的信徒献演各种古典和现代圣乐，前来参加的信徒和醉心音乐的非信徒十分踊跃，往往使大、小堂、侧楼为之塞，甚至连草坪上也站满了人。早年，著名钢琴家李名强、傅聪等均在这里显过身手。抗美援朝时期，国际堂曾邀请本市音乐界名流举行盛大音乐会，售票收入，悉数捐献国家。

该堂设备逐年完备，并趋向现代化，除双层大型电子琴、三角钢琴外，闭路电视分布在侧楼的各厅堂内。因大堂容纳不下，而坐在侧楼各厅堂内的信徒，通过闭路电视能同时看到大堂礼拜的实

况,大大加强了崇拜的气氛。这些现代化设备,均是中国教友所捐赠。

该堂自 1980 年复堂以来,已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万名外国和港、澳、台的基督徒来此参加礼拜和访问。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著名和平战士、南非的图图大主教、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等,都曾应邀在该堂讲道。美国前总统卡特全家也曾访问过国际堂,该堂有时也为在沪外侨举行英语礼拜及其他宗教仪式。

这里的圣工有主日崇拜、圣餐礼拜、音乐崇拜、洗礼、坚振礼、查经班、读经班、祷告会、丧礼(即追思礼拜)、家访。此外、圣侍、财务、总务等各项都有一定的制度与规定,一切工作井井有条。

该堂有专职与兼职的牧师 6 人、传道员 2 人。88 年 6 月,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在沐恩堂举行祝圣孙彦理、沈以藩二人为主教的典礼。沈以藩是国际堂的主任牧师,得以祝圣为主教,乃是该堂的光荣。

上海基督教出版事业简介

沈 德 溶

基督教是19世纪初从国外传入我国的。早期来我国的外国传教士，出于传教目的。很注重文字出版工作。第一个来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就在当时英国控制下的马来亚印刷中文圣经和一些阐述圣经的单张，然后带到广州分发给中国人。1843年，这一印刷所的英国传教士来到上海，在今山东路上创办了一所“墨海印书馆。”这是上海有基督教出版印刷单位之始。1860年，原设在澳门的美华书馆迁沪，不久“墨海印书馆”停办。

美华书馆曾特印一册大字号银质封面的圣经，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庆贺她六十寿辰，这件事曾在传教士中广为传诵。

1877年，在上海的外国传教士、曾举行过一次大会。由于中国各地已创办教会学校，为适应这一形势，会上产生了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委员会推举英格兰传教士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为总干事。当时教会学校使用的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物理等课本，就是上述这个委员会中的传教士，从英、美等国编译过来的。

1887年，韦廉臣又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会”，即后来的广学会。韦廉臣之后，继任总干事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Yoang J. Allen)，他是广学会初期写书最多的一个。

参加广学会的传教士，来自英、美、加拿大等国的各个不同宗

派。广学会的董事，原来是清一色的外国人，五四运动后，才开始有中国人担任。教会上层人物如余日章、郭秉文、张伯苓、刘廷芳，李登辉等，都曾担任过广学会的董事。

解放以前，在中国的基督教出版机构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广学会。清朝末年，我国翻译出版西学书刊的，主要有官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局（创办于上海）和设立于北京的同文馆，还有就是稍后些的民办的商务印书馆。广学会在它初创的十多年间，其出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名列前茅。据估计，广学会自创办以来，总共出版过 2000 多种书刊和图片，包括书籍、期刊、图片、布道单张、美术月份牌等。每年出版新书与重版旧书，平均总在 100 种左右。

广学会的宗旨是在中国人当中广泛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当时中国人懂外文的人不多，通过广学会这一渠道，“西学”、“西法”源源不断地传进中国，对当时蓬勃开展的变法维新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学会曾以出版《万国公报》月刊而名闻遐迩，该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及高级官员都是它的读者，被认为是丰富知识的宝库。同文书会年报第二号，在谈到这一刊物时说：“这个杂志的发行量逐月都在迅速增长，并且仍在增长；同时，更令人满意的是：几乎每个新订户都在补购已发行的若干期……”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有传教士在皇宫内看到光绪皇帝所存的全套《万国公报》。

除上而提到的机构外，基督教的有些教派和团体也设立了它们自己的出版机构，较大的有浸会设立的浸会书局（在今圆明园路上）、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设立的青年协会书局（在今虎丘路上）以及中华圣经会、中国主日学联合会等。这些出版机构，有些专门出

版各种版本的圣经(如中华圣经会),有的专门出版宣传本教派的书刊(如浸会书局),中国主日学会则专门出版供儿童阅读的主日学教材及圣经画片、图画。主日学是基督教仿照学校方式,在星期日开设的一种儿童宗教班级。基督教称星期日为“主日”,意即主耶稣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基督教出版会议。当时,正是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悍然冻结我国公私团体在美财产之后不久,一向依赖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出版单位,面临巨大困难。出版总署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协助基督教出版事业克服困难,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这次会上,通过了基督教出版事业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时发出六项号召:一、全国尚未停止接受外国津贴的出版机关,立即停止接受任何方式的外国津贴;二、号召全国基督教出版机关在思想及其他方面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影响,并积极推进“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三、切实遵守共同纲领;四、发扬基督徒新民主主义的爱国精神;五、超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传统,鼓励创作,以期根据基督教本质,树立中国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六、在尊重信仰自由及分工专业、互助合作的原则下,团结并调整全国基督教出版事业,逐步走向统一经营。

1956年12月,广学会与其他三个基督教出版单位联合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揭开了出版事业新的一页。四单位组成董事会,推选基督教著名人士黎照寰博士为董事长,总干事为胡祖荫,后为丁光训(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不久,丁光训应金陵协和神学院之聘赴南京工作,继任者为江文汉(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联合书局机构庞大,人员众多,总干事及各部负责人都学有所长,在教内有一定威望,因此,一时声势颇盛。出版的书籍也不少,

但好景不长,自 1957 年下半年开始,“左”风越括越猛,联合书局的工作难以开展,因此,自 1958 年以后,没有出版过什么书籍。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四年间,联合书局只是处于一种维持的局面,主要靠出售存书过日子。1966 年 8 月 23 日,红卫兵上街大破“四旧”,联合书局就成了他们“横扫”的一个目标,招牌被砸烂,书籍被销毁,最后被封闭,从而结束了它短短几年的历史。

